朗朗书房·教育史论丛书

巴黎高师史

[法] 弗朗索瓦·杜费 皮埃尔-贝特朗·杜福尔 著
程小牧 孙建平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高师史/[法]杜费,[法]杜福尔著;程小牧,孙建平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朗朗书房·教育史论丛书)
ISBN 978-7-300-093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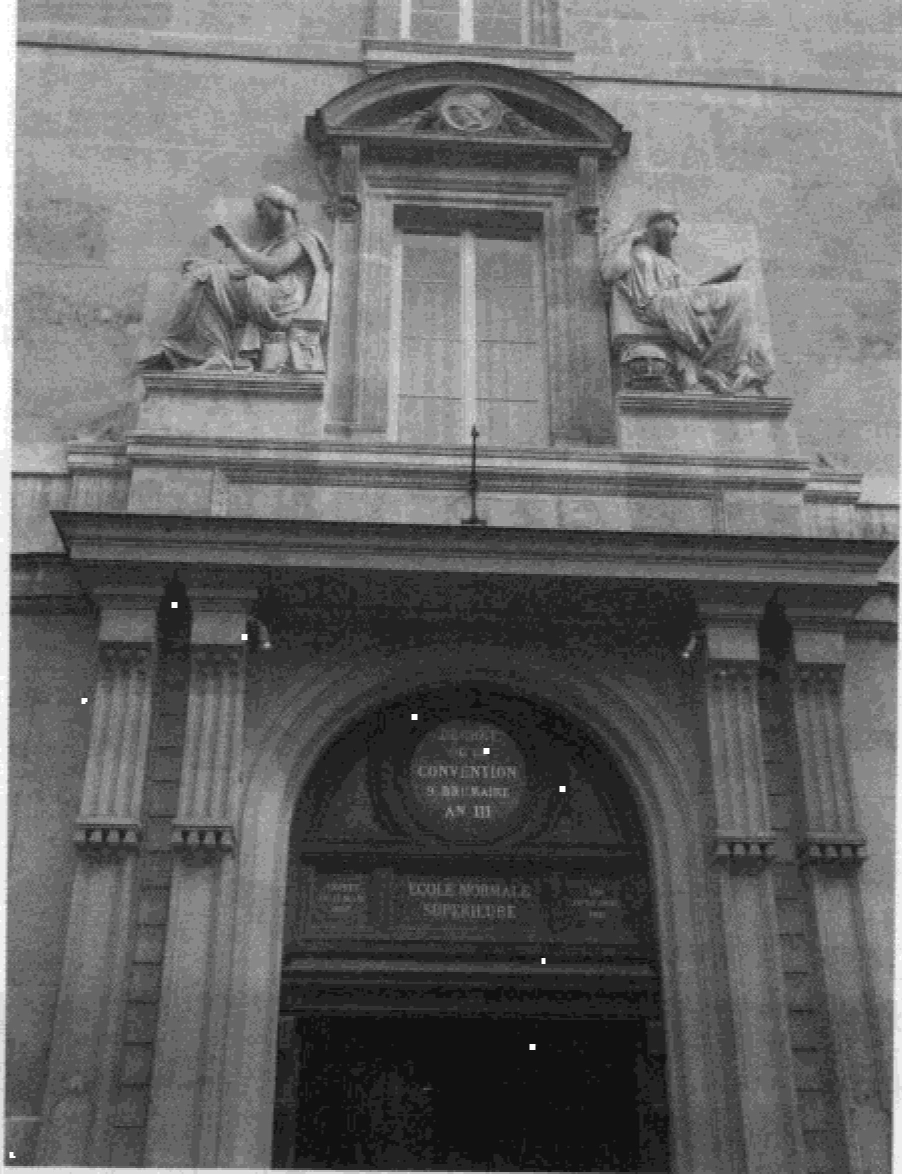
Ⅰ.巴…
Ⅱ.①杜…②杜…③程…③孙…
Ⅲ.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校史
Ⅳ.G659.5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0077 号

朗朗书房

朗朗书房·教育史论丛书
巴黎高师史
[法]弗朗索瓦·杜费 皮埃尔-贝特朗·杜福尔 著
程小牧 孙建平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51502011 编辑热线:010－51502036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6　插页 2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2 000	定　　价	24.80 元



→学校大门，上书“共和国三年雾月九日法令”、“高等师范学校”。两尊女神雕像分别象征着文学与科学。



↓立在校门口的国家文化遗产介绍牌，概述了高师的建校历史。



→高师围墙外余乐姆街的人行道，路的尽头是先贤祠。



←被戏称为“水族馆”的学校门厅，由于右侧的玻璃传达室而得名。现在这间传达室变成了公用电话亭。

↓19世纪末的校园。左边是著名的“恩斯特水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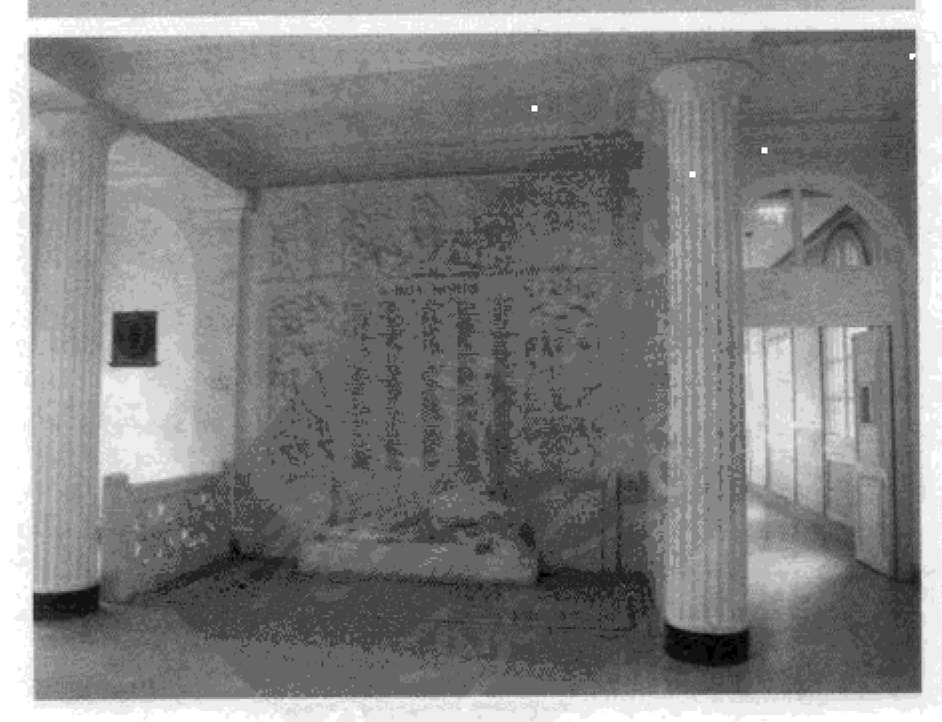
↑校园中庭与著名的恩斯特水池。



→校园一角。

1939 - 1945

1886 ABRAHAM	1920 DELAUNEY	1934 LEVY
1887 BERNHEIM	LACKENBACHER	PIOBETTA
SACERDOTE	NAVES	TRANCHAND
1896 BERNHEIM	1921 MARTIN	1935 GARNIER
1897 BLOCH	1922 BROSSOLETTE	KHANTINE
DREYFUS	1923 CAVAILLES	LAMARQUE
ZIVY	1924 ALEXANDRE	ZINGER
1898 HALBWACHS	LE COEUR	1936 CUZIN
1900 BERTHOD	NIZAN	DE FERRIER
LEVY	PERON	1937 ABRAMOVICI
1904 ASCOLI	1925 MONOD	ALTAR dit ALTER
BLOCH	1926 LAUTMAN	XIMENES
GOSSE	VATTIER	1938 BIGIO
1905 CRU	1927 CAHEN	CHABANON
1906 BRUHAT	1928 MARTY	JUIN
COLLOMP	1929 FARINEAU	KRON
1907 PARMENTIER	FEYEL	1940 CHAINE
1909 MOREL	PETITBON	1941 BERTRAND
1912 LENOUVEL	1930 PIZARD	BIGOT
1913 FLAMANT	ROMIEU	1942 CABOS
GARDINIER	1932 BONNEFOY	CATALA
1914 LALANDE	FOGLIZZO	VOISIN
1919 BAUDUIN de BELLEVAL	GOSSET	1943 VEROLLE
DOMBROWSKI	1933 CROLAND	Agent PRILLIEZ
PREVOST	GARRY	
ROSSIGNOL	MAGNIN	
1915 LERNER	MUSZL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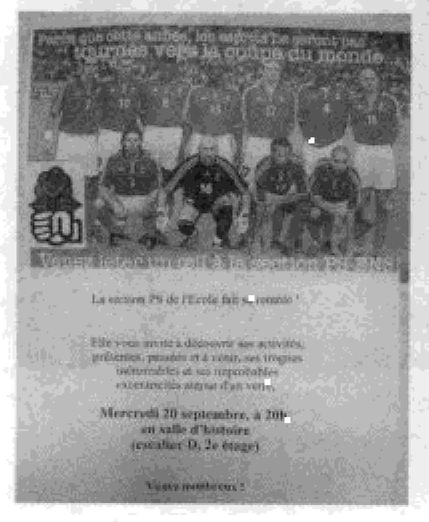


←一战和二战中为国捐躯的高师人纪念碑。人名前所标注年份为入学时间。其中1910届有20名学生牺牲在一战战场上，而当时每届学生还不到50名。

→学校后院的巴斯德雕像。



↓社会党高师党支部的集会海报，写着："今年不会忙着看世界杯，到社会党高师党支部来瞧瞧吧！"





→校内的新建筑，其中一部分为扩建的图书馆。

↓中庭四方环形主建筑上的伟人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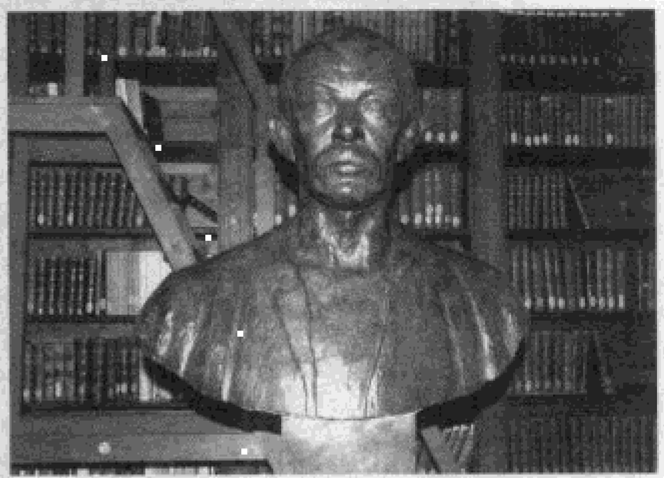


↓藏书巨丰的文科图书馆，共六进，其中三进为老馆。





↑文科图书馆老馆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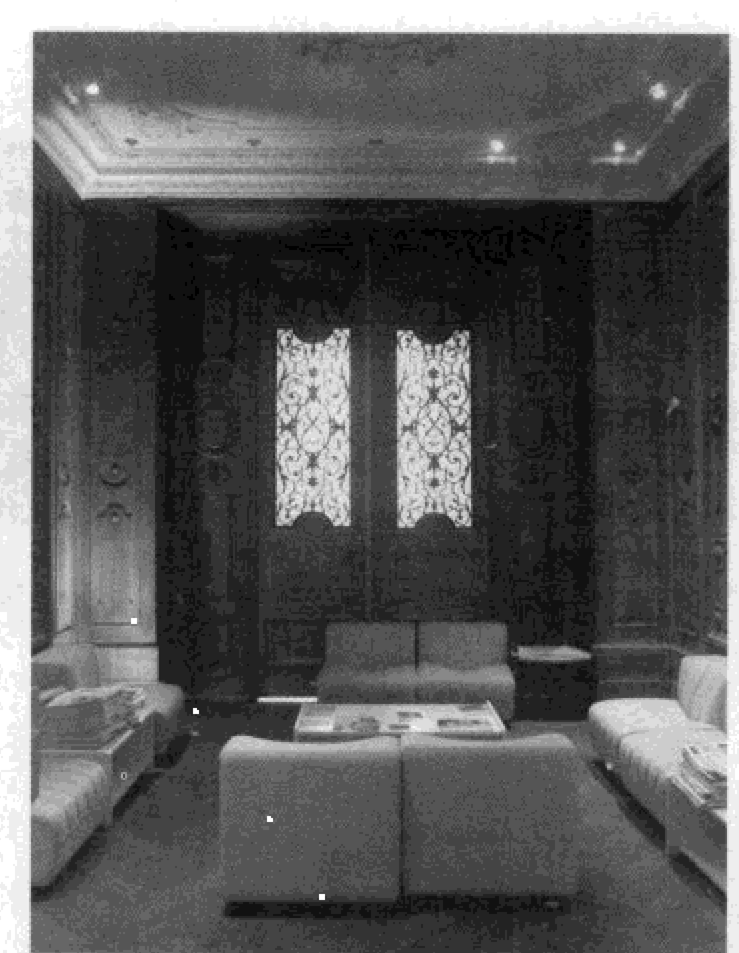


↑图书馆中的埃尔雕像，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图书管理员对高师的影响十分深远。



←中庭的四方环形建筑一角。该建筑是高师的主建筑，历年整修，但仍维持了原貌。一层为教室，二层为图书馆和系办公室，三层以上为学生和教师宿舍。

→文学系会客厅、原学校礼拜堂内景。



↓原学校礼拜堂的大门，供校内的天主教徒做礼拜用。现在这间礼拜堂已经变成了文学系的会客厅和教师休息室。





↑以西蒙娜·薇依的名字命名的教室。



→教室走廊。



↑楼顶露台。



↑对着楼顶露台的被称为“学习室”的学生宿舍的窗户。

↓正对校门的新校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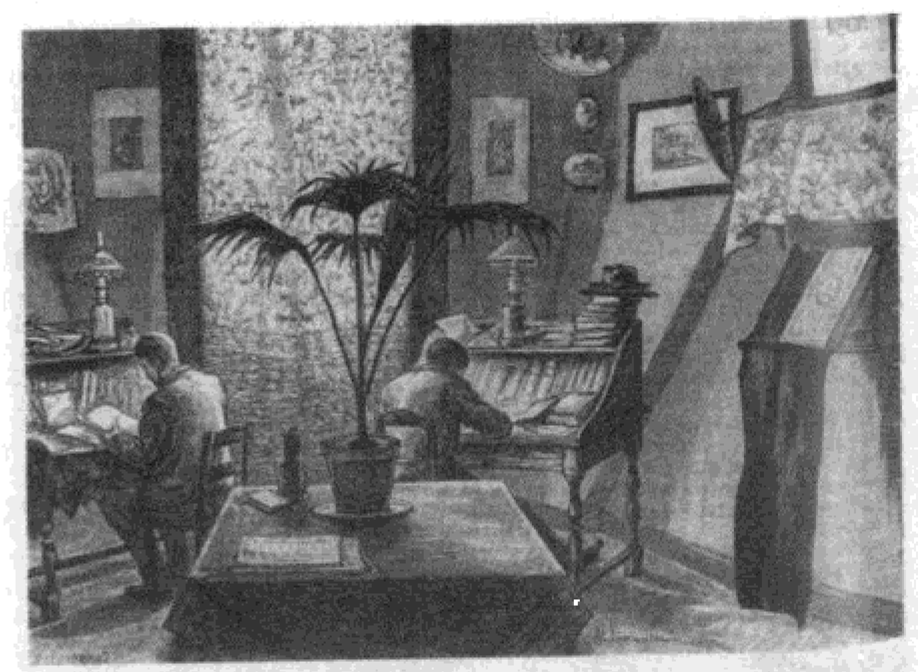
→巴斯德楼，其中保留了当年巴斯德的办公室作为纪念馆。

↓文科图书馆新馆一角。





→理科楼，位于老校园北边，建于20世纪70年代。



↑ 19 世纪末的一间“学习室”内景。



→夏尔·贝玑，1894 届学生。



↓ 1878 届合影。第一排左二为让·饶勒斯，最右边为亨利·柏格森。



↑作家于勒·罗曼，1906届学生。



→高师人的经典运动：翻越学校屋顶。

↓1914年，战争的杀戮开始前几个月，高师人与他们的女友在学校的庭院里跳舞。最左边为未来的作家莫里斯·热纳瓦。





↑出类拔萃的1924届学生，包括阿隆（第一排左二）、尼赞（倒数第二排左二）、萨特（最下排左二）、冈纪兰姆（第二排左三）、拉加什（第三排右二）等。



↑ 1931 届的“忧郁的美男子”乔治·蓬皮杜。



→戴着单片眼镜和礼帽的公子哥即路易·普瓦耶（左），未来的大作家于连·格拉克。

↓高师杰出的作家季洛杜（正与戏剧家路易·茹弗一起阅读他的剧本）。



←“被枪杀者”：让·普雷弗，抵抗派作家，在抗德游击队基地韦科尔倒在纳粹的子弹下。

←“被枪杀者”：罗伯·巴西亚克听着他的死刑宣判（19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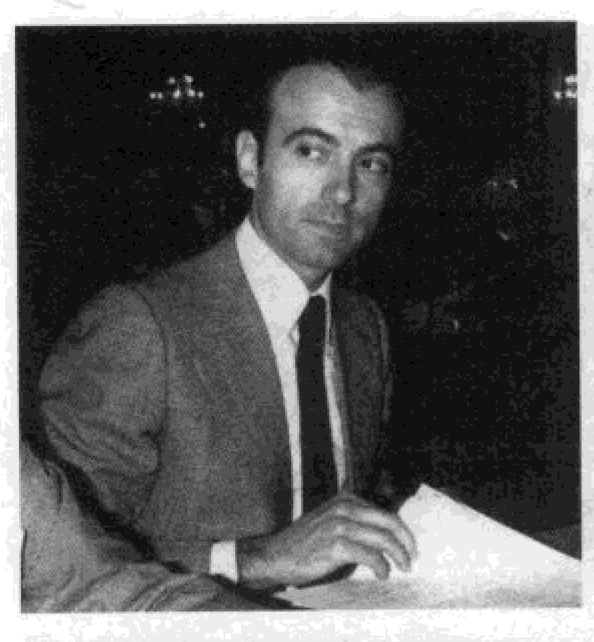


↑1980年、哲学巨擘、几代高师人的“精神导师”路易·阿尔图塞在他的办公室里。此后不久后他就犯下了杀妻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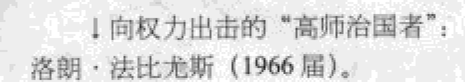
←海杰斯·德贝，1967年于玻利维亚狱中。

↓当年的“小伙伴”历史性的握手：1979年6月20日，萨特与阿隆在“一艘开往越南的船”新闻发布会上相遇。





←向权力出击的“高师治国者”：阿兰·朱佩（1964届）。



↓向权力出击的“高师治国者”：洛朗·法比尤斯（1966届）。



←多米尼克·费尔南德，年轻的兰波派唯美主义者。



←还未成为明星的预科班学生贝尔纳－亨利·列维（1968届）。

原书序：风格问题

每一个法国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都会面对一个挥之不去的老房子的“幽灵”，这所房子坐落在贝利省、布列塔尼省或上卢瓦尔省的乡间。在那里，他们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死气沉沉的夏天，忍受着无聊与厌倦的煎熬，唯一的渴望就是与这一切决裂——“家庭，我恨你！”然而岁月的长河会重新赋予它一种神奇的、微笑的生动形象，年少时他们很难发现，再回到这里才怦然心动。幽暗的走廊，细长的百叶窗将下午的阳光洒在过于宽大的房间里，挂钟嘀嗒作响，清晨门前椴茶花的香味。位于巴黎深处的高等师范学校好像一个度假者的隐修院[①]，高师学生在那里度过了青春时代，那些随意挥霍的时光随着岁月流逝才变得如此宝贵。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总想逃离，而30年后，却很乐意声明自己不仅曾是而且仍是高师人，似乎高师人的意识后来才启动。这些美丽的谎言产生在追忆中，时态好像变成了未完成过去时，最好再把第一人称改成复数，用“我们”这个称谓为几代人唱一曲更盛大的赞歌。难道这地方的神奇之处只在于这种集体性的怀旧，这种或多或少的自恋的共鸣吗？叠加了一个多世纪的回声终于使它成了一个回忆之地。

承认吧，余乐姆街是穷人的天地，感怀的记忆，庭院的回声。在

---

① 高等师范学校是四方形带回廊类似修道院式的建筑，由此产生“隐修院”的说法。

恩斯特[1]水池边，踌躇满志的穷学生们体会过贵族子弟的潇洒。别相信这些感觉。当他头发还很茂密，等着参加教师资格会考时，净往水池里吐痰、撒尿。1964年，人们曾请我向公众介绍高等师范学校，我遵从尼赞对这所学府的标准定义："一个可笑甚至是可憎的对象，被一个爱国的、虚伪的、有权势的、崇拜军队的小老头统治着。"（这样的说法同样愚蠢而可恶。我们的校长——伊波利特是一个睿智的普世主义者，既慷慨又谦和。）今天，这本书让我们田园牧歌式地漫步穿越了一个世纪，我又忍不住回到了"我们"的称谓。曾经作为预科生[2]标志别在外衣翻领上的猫头鹰[3]在日暮时分飞走了，人们也就明白我在以一个临近退休的、资质正常但绝非优秀的高师人的身份来谈谈他的同学和他自己。

我永远也写不出如此完整、丰富的可以称之为"善意的高师人"的宏伟篇章[4]。这部小说式的名人传记出色地让那些不太著名的人物从那些过于著名人物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作者明智地讲述着各种人物的故事而无意剖析集体精神。他们把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留给了我：分析而不描写。我并不完全赞同他们对人物的评判（尤其是他们以"高师治国者"的称呼把所有的从政者混为一谈）。他们的意图不是回答母校向一个媒体学者提出的深层问题，诸如高师是制造棋子的模子、驯兽场，培养学究和看家狗，是葬送天才的坟墓之类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谈论它的文科部分，而且这已是老生常谈了。然而，是生

---

① 恩斯特(Ernest)，池塘名，高师校园里一处著名的风景。——译者注

② 高师预科班的学生。要进人高师学习必须在高中毕业后上两年预科班，之后参加激烈的竞争考试，优秀者才能被高师录取。预科班设在几所著名高中里，如亨利四世高中或路易大帝高中，其间的学习非常艰苦。后文有所论述。——译者注

③ 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译者注

④ 此处借用了于勒·罗曼的小说《善意的人》(*Les hommes de bonne volonté*)的标题，这部作品是一部描绘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社会生活的鸿篇巨制。——译者注

母还是后妈?是温暖的母体还是窒息的牢狱?我觉得谱系学的方法还是有用的,让我们在思想领域辨认出那些标记、那些永久的伤痕。

高师的编年史可以追溯到拉卡纳尔时代,这所学校是启蒙运动的姊妹,学者掌权是它完美的基础。最初的师范学校主要是一所理科学校,教授数学、物理和天文学。[①] 拉普拉斯和蒙日曾在高师任教,还有巴斯德[②],他曾长期担任学校的行政负责人,他们的光芒被饶勒斯、柏格森和萨特所遮蔽。最初的伟大希望更多地寄托在他们身上,而不是寄托在那些文法学家和哲学家身上。共和国雾月九日的建校法令写道:为了使知识浸透"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完善"传授人类知识的艺术",使得"这纯净、充裕、光明的知识源头,从共和国的先人那里一步步地传遍整个法兰西,并在此过程中不失其纯正性。"不要忘了,这个小小的殿堂并不是献给荷马、维吉尔和拉辛的,而是讲授牛顿、贝托莱和拉格朗日的。数字的讲坛先于词语的讲坛,因为它要培养的并非美的思想而是博学之士。

说到法国文化中师范教育的能力和潜力,应该从预科班、学习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操练中去寻找。我们无数次地出色演练着这所技艺精湛的学校所传授的论文作法、发言的三段论结构,吓唬人的引经据典,装模作样的架势,我们对此有着确凿的记忆和分析。[③] 这

---

① 有关世纪之交科学对文学的驱逐,我们可以参考 *Paris 1800 de Michel Serres*, in Eléments d'histoire des sciences, Paris, Bordas, 1989.

② 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 1749—1827),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蒙日(Gaspard Monge, 1746—1818),法国数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译者注

③ Pierre Bourdieu, *Epreuve scolaire et consécration sociale. Les classes préparatoires aux grandes Ecoles*,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 39 (septembre 1981).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La Khâgne, les lieux de mémoire, II, La Nation (tome 3). Et Pierre Nora, *Khâgne* 1950, Le Débat, n°3 (juillet-aout 1980), texte non signé.

不是我们两位作者的目的。他们选择了肖像画廊和全景式的视角从侧面切入当时的知名人士，冒着将千差万别的人和真正的创造者罗列一处的危险。限于我那一代人和我的学科范围内，看到像阿兰·巴蒂(Alain Badiou)和克雷芒·罗塞(Clément Rosset)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消失在那些哗众取宠者背后，这样的文化闹剧肯定会激怒我的同宿舍老友们。还是一笑了之吧。

视听造成的喜剧效果：在飞快的时间内作评判，一个不露面的伟大人物肯定不如海报中不见作品的人物形象给人的印象深刻。然而，作者很清楚他们所撰写的不是一个光荣榜而是一部真实的小说，其中一系列多少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像版画插图一样逐渐阐明了一个包含两方面的主题。这个主题也可以这样表述：高师制造着高师人；高师人构成了一个同一的空间，随时随地都展示着高师人这个同一体。这是两个极大胆的假设。

关于第一个部分，请注意，我们可以走进余乐姆街但不成为高师人，或者相反，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高师人而不“融入”高师（一两年的预科班学习就足够了）。有一些碰巧进了高师的临时高师人，或者由于一个语法错误、口试中一个诗歌韵律的差错被打发到了别处的预科班学生。我觉得大家之所以想进这所学校，既不是为了成为中学老师，也不是出于对拉丁文的热爱，而是因为它有一圈神奇的光环。然而这个群体的神话很多是建立在它的叛逃者和边缘人身上的：那些辱骂它的人，比如贝玑和尼赞；满不在乎的人，比如萨特，或者被它亲手扼杀的人，如阿尔图塞夫妇。这是一个奇怪的团体，以被驱逐的人为代表。如果要明确这株食肉植物开花的确切年代，即1880年到1980年，这延续了一个世纪的神话确实已由辉煌走向黯淡，从被遗忘的法国社会主义导师吕西安·埃尔的圣徒光环，一直到晚年阿尔图塞精神失常的隐秘黑暗。这两个极为不幸的人物曾唤起一代代高师人思考的快乐，像入口处的两尊半身雕像一样相对而立。

我们永远的大师阿尔图塞,共产主义信徒,后继无人;吕西安·埃尔也没有遇到饶勒斯和勃鲁姆……米赛亚的救赎已经结束,这所“修道院”早已抛弃基督信仰还俗了。活着的人均等地与这两个影子的轮流对话已成为高师的传统。

至于第二个构成了全书的中心思想的欢快的假设,显而易见地招来了反对意见。不,高师人不构成一种流动的“实现”[①],一成不变地穿越各个时代。被选中的可笑的思想的仆人,优雅的物质的敌人,在一个富丽堂皇、自然大方的拱廊式建筑的花园中对着一片睡莲蹦跳玩耍的温柔的小天使,他们从来都不存在。这些与理性结缘之人的这一前拉斐尔时代的视角,对于历史事实的忠诚度就像乡野牧歌之于农产品加工企业或田园诗之于某种精神生态链的生态学。首先,应当说明“高师人”中拉皮条者、学者、银行家、弱智、胆小鬼和臆想症患者的比例与在“军人群体”、“医生群体”和“乘坐地铁群体”中的比例不相上下。我们知道“全体的模糊性”这个道理,然而能够在此把一个可以同时容纳红衣主教和共济会会员、抵抗者和合作者[②]、到工农群众中“落户”的人和资本家、女子理发师和脑力劳动者的团体说成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整体或一个整体中的分支吗?难道这不是一个类似把花菜、螺丝刀、自行车归为一类的纯粹习惯性的集合吗?没有什么比某种高师沙文主义更近似智力种族主义的了,可爱

① Enthéléchie,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概念,可直接译为“隐德莱希”或“完成”、“圆满实现”等,指条件的本质充分实现变成现实,如灵魂是人的实现和完成。——译者注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两种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法国人,抵抗者指抵抗德国侵略、争取法国解放的爱国人士,合作者指法奸、卖国通敌的人。——译者注



的恶作剧的风俗使这种种族主义有所缓和[如“保尔代夫问题”[1]和为民主先驱埃热斯普·西蒙(Hegesippe Simon)塑像的计划]。生物学的或封建世袭的本源论隐喻古已有之。二战前,季洛杜已经提到过“族系”一词(“高师人与大作家同族。他很可能是渺小平庸的,但他属于他的族系”)。1963年,蓬皮杜在为阿兰·佩尔菲特的《余乐姆街》一书所作的很理性的序言中用的是“种类”一词,谈到他“天之骄子”的青年时代时,他说:“我们是高师人,就如同我们是皇家血统的王子……这是本质性的。我们不是成为高师人,而是生来就是高师人,就好像骑士生来就是骑士,入学考试只是某种受封仪式。”其他没那么狂热的人则认为这个天真的初学者群体组成的是“伏尔泰信徒的修道士之家”,他们的最高信仰是《百科辞典》,他们的最高神殿是先贤祠。要不是这些幼稚的真理爱好者有不把自己当回事的美德,那后果将是令人恼怒的。那些不相信宿命论、等级制或终极理念的人会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吗?

我把自己算在这后一类人中。然而,我自问我的第一个否定是不是错误的?我不禁惊慌起来:如果本书的作者们言之有理?如果“高师精神”确实存在?如果真如某个可鄙的高师人所说的“高师人都很相似,就像黑鬼都很相似一样”?若真是这样,我们就永生都被打上了烙印,无比悲痛地成为一个浅薄的舞文弄墨的“民族”的“侨民”。其实两个高师人不可能像两个古罗马的占卜官一样认真严肃地倾听对方发表长篇大论而不发笑。小团体的成员只要瞄一眼就能认出这种独断的、花哨的、巨细无遗的“看起来好像说了什么但其实

① La Question de Poldève,保尔代夫(Poldavie)是一个杜撰出的国名。1929年3月,记者、右派保皇组织“法兰西行动”的成员阿兰·迈莱策划了一个恶作剧,旨在讽刺共和国左派议员。他给各位议员打电话,要求他们介入“受压迫的保尔代夫人民”的解放运动。——译者注

都没说"的风格。它很能糊弄外行,在报刊上混出个一席之地,也很能引起最无知者的钦佩,特别是政客,这些可怜人总是缺少一个"会写作的高师人"(因为他们混淆了写作和编撰,不知道人们是用脑袋编撰,而用鲜血写作的)。但在同类中,这全无作用。一席空话而已。对别人去说吧,我的老朋友。我知道你们的秘诀:这也是我自己的秘诀。

我的确没发现存在着一种"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把所有高师人统一起来的精神联系",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哪怕在反目成仇的师兄弟之间也存在着一种连贯性,一种远距离的家庭气氛,一种不可避免的表达和思考的特定风格。或许应该用地理学来破解这个秘密。国家随着历史发展,其经济、制度、意识都在发生变化。但在物理范围内部,它是不变的。在我们国家,那些海西褶皱、大西洋海滨和罗纳尔河走廊将永远存在。如同在欧洲大陆上有一种"法国式风景"一样,在知识界存在着一种"高师精神",它是清晰可辨的。诚然,这样的精神、风景是一种社会建构,它们表征着这个社会。我们用轶闻闲谈、虔诚的形象、著作和绘画造就了它们,而反过来它们也影响和造就了我们。对此我们无能为力。高师精神与法兰西思想研究和艺术创造的关系可能并不大,就像一个"坐落在山脚下响着钟声的小村庄"与我们六边形国土的客观环境关系不大一样。但这镜中的风景、一种集体身份的见证长久地演示着,它不是没有理由的。每一个即将出生的小法国人明天仍会在邮政年历和选举广告上重见这些景色,每一个未来的高师人都将重温预科班的文风。

它很像一种缺陷,遗传因素摆在那儿呢。这无须狡辩,但也并非是无法逾越的厄运。这种我说不上来的贫弱的、谨慎的、人工的,但也是精致的、耀眼的、傲慢的东西——两者相辅相成——将我们置于国家的范围。小村庄、小侯爵、小骗子、小奸小坏,同时也有做文章的快乐、发现和巧思:这是一种小范围内的园艺学。我们称之为"人文

主义”，这是“小范围”的冠冕堂皇的说法（在艺术中绰号“内景主义”[①]），在“在人性化的范围内”，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小世界。培植我们的花园，高贵雅致不是我们的类型，野生自然也不是我们所擅长的。高师的人文主义是一道防线，表面上兴高采烈，内心里忧伤至极。它把生的扼杀在熟的之中。为了理解这一物理的稳定性、统计学的预见性和这一穿越年龄和性别的坚定而细微的音符，我们应该想象所有令我们迷失的音乐或我们不再习惯、不再有品位及感受力去聆听的音乐。我们应该体会一下蓬皮杜与戴高乐、季洛杜与塞利纳[②]、伊波利特与卡尔·马克思，或者更进一步，利奥·德立勃[③]与瓦格纳的关系；叛逆与反抗、恶作剧与讽刺剧（farce）的关系；以及最终，勃艮第丘陵与科罗拉多峡谷的关系。这也是，又一次是，范围的问题。请看地图，我们是“法国人”，并更进一步是“高师人”。想找最尖锐的批评，到我们这里来吧；而最伟大的作家，请到别处去找。

请相信，“高师恶疾”并非不治之症，有死里逃生者。证明：米什莱（Michelet，原高师历史学巨擘）、贝玑、饶勒斯、柏格森，离我们更近者有萨特、格拉克、福柯，更不用说布尔迪厄、塞赫和德里达了，他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只要杀死那个自我之中的高师预科生，一个哲学家是有可能不变成诡辩家的。所以并非所有的高师人都注定要成为一种雅致的“全知全能”的翻版，并非所有的文学家都注定要以讽刺挖苦为能事。但这谈何容易！布尔迪厄说得对：这地

---

① Intimisme，以室内家庭情景为题材的画派或画法，如现代法国画家博纳尔（Pierre Bonnard）的作品。在文学中指表达个人内心感情的诗派和诗歌风格，这种风格也发展到小说等其他文学体裁，如所谓“私小说”、“个人化写作”。——译者注

② 塞利纳（Céline，1894—1961），原名 Louis-Ferdinand Destouches，法国 20 世纪重要的作家之一，职业为医生。因其作品的反犹主义倾向而引起巨大争议。——译者注

③ 利奥·德立勃（Léo Delibe，1836—1891），法国作曲家。——译者注

方既不培养科学家,也不培养先锋派,而是重复一切既定的规则,制造些迷惑人的小修小补。学院气氛和浮华生活,两个相反的概念共同维系着一个整体。是的,重温走过的高师路,这是每个人每天都要进行的战斗。说到此,别抱有幻觉:死亡率很高,复发的可能性也一直存在。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本人也是一例。

我说了高师的劣根性。但它仍有长处,甚至是相当优秀的长处。我们不能把装饰性的塑料花和某种法国式的彬彬有礼的表达混淆起来。这种长处体现在工作方法上,它是两重性的:首先是考察、搜集、挖掘;然后以流畅、优雅的文笔写来,让人看不出博学和科学的痕迹。这也是法国式的微笑:抹去常常是空洞无物的学究气的德国式晦涩,添加一些英国式的实证主义的积极的概括性,尽管有时难免目光短浅。说到风景,不涉及地层深处不一定就是肤浅。总的来说,不要为了与众不同而刻意自寻烦恼;否则就是把实验室当成了收藏馆,如果我们不加注意就会把高师变成高等行政学院第二。确实,民主的继承者们隆重地取代了共和国出钱资助的学生①(圣克鲁高师②近一二十年来一直扮演着曾经属于余乐姆街的社会攀升机器的角色)。

没有理由重复尼赞荒诞的悖论,他在反权威主义的圣战中提出了这一悖论。其实从1930年以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大学的废墟上,我们并没有看到无产阶级或正义的崛起,而是看到了金钱和影像的崛起。今天的看家狗不再学习拉丁文或希腊文,而是研究经济学和电视媒体。他们的最终归宿是银行。所以,必须作出选择:走向总

---

① 指高师学生。一般来说,每一个高师学生都能拿到国家提供的每月7000多法郎的奖学金。——译者注

② 与巴黎高师一体的另一所文科男子师范学院,原来位于巴黎近郊圣克鲁,后迁至里昂。——译者注

体化的无序状态并听从廉价品的统治，还是重新打开"修道院"的大门？这道院墙为家庭的儿女们保留着最美好的脱离家庭和释放压力的机会。高师可能是唯一一个能让人抽离其原本出身——无论其贫富——的地方。它阻碍而不是促进社会再生产的机械运动。高师人肯定不会代表绝大多数人的精神思想。尽管遗传因素很不利，但如果我们可以不顾一切地永续这个谱系的话，那么我相信是为了两个原因：首先，进入这所学校的人有一切机会去认识现在这个世界不是从1945年才开始的，甚至也不是从1789年开始的，而是早在3000多年前，在特洛伊附近就开始了，显然这完全超出了高等行政学院学生的理解范围；其次，从高师出来的人有五分之一会成为捣乱分子，与时代氛围相抵触，而这个概率在高等行政学院毕业的人中只占千分之一（更不用说综合理工学校出来的人了，他们的职责和义务就是顺从）。

坚持理念并不容易。曾有过决裂。从教育之邦到诱惑之邦的过程把"小教师们"抛弃在了道路两旁。从1974年以来，当政者们就没读懂罗兰·巴特的《明室》(*La Chamber Claire*)。他们固执地更钟情于照片的刺点(punctum)而不是文本的研点(studium)[①]。对这些人来说，一个杂志封面上的花花公子将永远比国家图书馆里长着粉刺的学者更胜一筹。我们的最近两任共和国总统很熟悉综合理工学校、高等政治科学院、各大学法学院和高等商学院，他们来自这些学校，但与他们的前任相反，他们从来没有踏入过余乐姆街高师的大

---

① 研点(studium)与刺点(punctum)是罗兰·巴特在论摄影的著作《明室》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巴特将摄影的意义分为明显的、指示性的，也就是所谓"意指"(dénotation)，和模糊的、"隐含的"(obtuse)，即所谓"意涵"(connotation)两种。在《明室》中，"研点"即指照片所表现的明显意义，而隐含在照片中的令人感动但又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元素成为"刺点"。"刺点"会像箭一般地射向观者，甚至令人感到心痛。——译者注

门。印刷品时代的共和国对这所年轻人的学术殿堂应该保持敬意，然而我们不敢断言那里的学生对抑扬格诗句的断音会比对下一次市政改革更加了解。尽管将求知的过程与对权力的追求分离开来并不容易，但共和国自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奉行着非功利、独立和免费的教育原则并以此为荣。现在，我们这个视听的世界有它衡量优秀的标准。它看不上这些倔强的才子：他们赚的钱不够多，也没有名气，不足以受人瞩目或被人喜爱。

是的，有过好几次信徒的背叛，有的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有的则相反是由于体制。我们过多地谈论了前者，而很少谈论后者。因为在今天，是共和国背叛了它的信徒们——这可以从社会现状、从法庭审判和司法丑闻等判断出来，这对它并无益处。从高师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只要坚持做好抑扬格诗歌就是对这个两百年的共和国保持忠诚。共和国曾经关爱过他们，现在却不太为他们着想了。我们的公务员学生们将继续为共和国服务，只要他们不为任何人服务，也不起什么作用，只为神圣的语言和神圣的知识服务。

是季洛杜，又是季洛杜，这个最好也最糟的完美的高师人，提出了“修道士般的戒律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存在的支柱”，他深刻地给这个世俗性的“神甫之家”下了最公正和持久的定义：“一所按人数比例出版了最多的书，而只有最少的畅销书的学校。”死在抗德游击战中的拉丁文学者让·普雷弗本可以作出同样的定义。这句话还将长久地在我们的耳畔响起，像一句箴言，也像一句诺言。

海杰斯·德贝



译序:民主精神与精英意识

法国高等教育有一个不同于欧洲各国乃至全世界的独特之处,即存在着“大学校”(grands écoles)与大学(universités)两个泾渭分明的并行系统。法国的大学系统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起源于宗教神学院,后来随着启蒙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成为世俗化的高等教育中心,逐渐形成多学科并存的综合性大学。而大学校的诞生则相对晚近,始于法国大革命期间,为拿破仑所支持和倡导。1794年,数学家、分析几何学大师卡斯帕尔·蒙日在巴黎创立了第一所大学校:综合理工学校(Polytechnique)。之后,一系列师范、工程技术、军事、农学、商业、行政等专业大学校也相继成立。

历史地来看,大学校的产生源于近代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分工的细化,社会对专业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强。很多大学校的招生要求学生进行两年预科班的学习(这些预科班通常设在重点高中),然后参加竞争考试择优录取。大学校提供相当于本科加硕士的教育,颁发专门文凭,一般不设博士阶段。由于大学校的专业培训水平更受到行业内部的承认,有的还有政府部门和工商会资助的背景,所以大学校出身的学生有更多的实习机会和更好的就业前景。相对而言,大学的招生门槛就低得多,尤其是1968年学运之后,只要学生通过高中毕业会考即可到大学注册。大学更注重基础学科的建设,包括文史哲、数理化,也包括法律、医学等实用而古老的

学科,设有博士阶段文凭。

由于严格的录取制度、领先的专业培训水平和毕业生日后在社会上的出色表现,在法国人的眼里,大学校才是真正培养精英的地方,大学倒成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立志于学术研究者除外,他们会去大学继续博士阶段的学习)。这就是法国高等教育的独特之处,即专业技术类学校比综合性大学好。不仅如此,两者之间的差别甚至发展成等级差别,体现在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用人制度、市场规律到观念习俗,"大学校"情结随处可见,不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很难体会。凡是名字里有 école、collège、institut 的基本上都属于大学校系统,对法国人来说似乎都比 université 显得有档次。

最负盛名的大学校当属综合理工学校、国家行政学院(ENA)、巴黎高等商校(HEC)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纵观近一两百年来的法国历史,几乎所有的国家首脑、行政领导、企业高层和思想文化界的大师都出自这几所大学校。因此,说这几所学校主宰着法国的命运亦不为过。

全法国最好的大学校预科班集中在巴黎的几所著名高中,这些学校不是在拉丁区就是在塞纳河右岸的富人区。想要进入这些预科班,住在普通城区和郊区家庭的孩子显然没有那么便利,而外省的孩子不仅要成绩优异,而且家庭也要有能力支持他们在巴黎的学习。巴黎的著名高中与其他普通高中的教学质量简直是天壤之别。举例来说,高等师范学校最好的预科班是大名鼎鼎的亨利四世高中和路易大帝高中的预科班。它们垄断了高师录取人数的一半以上,抵得上全国所有其他高中预科班的总和。于是自然而然,最终进入著名大学校的学生基本上都来自巴黎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家庭以及外省的优越家庭;而社会中下层、移民家庭、有色人种的孩子如果想继续高等教育,几乎只能去综合性大学。

久而久之,大学似乎代表着法国高等教育中的民主精神,而大学

校则象征着某种精英意识。这个砍了国王的脑袋、革命最彻底的国家却维系着这样一种近乎等级制的教育系统，不得不令人联想，是不是一个社会最终仍需要通过某种途径实现贵族与平民、精英与大众的分野？当然这个贵族已经现代化了，不再是住在城堡里、享受田产和俸禄的公爵们，而是家住巴黎十六区、善于竞争、智力出众的资产阶级子弟。

关于两个高教系统的利弊之争一直不断，甚至有人呼吁取消大学校制度，全部并入大学系统。对大学校的批评，除了机会不均等外，很重要的一条是过于实用和技术化，缺乏对人的全面塑造和对宏观思考能力的培养。大学校是科技革命和工业文明的直接产物，体现了现代性的社会分工，然而在唯理论、科技至上主义造成了一系列文明的灾难，整个世界越来越需要平衡和综合治理的时代，狭隘的大学校教育就显得过于单薄了，它们生产着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

然而有一所特立独行的大学校，不但没有局限于技术实用主义，而且几乎成为20世纪法兰西精神文化的象征，20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思想大师几乎都和这所学校紧密相连。从萨特到阿尔图塞，从福柯到德里达，参看它的学生名录，我们会惊讶于这所学校的辉煌历史。如果考察一下它的规模，就更不可思议了。直至20世纪70年代，这所学校的在校学生都维持在200人左右。今天，它的在校生总数也不会超过800人，每一届约有200名学生，文理科各半。

它就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这里所说的以及本书所谈论的高师是指位于巴黎市中心先贤祠附近的余乐姆街(rue d'Ulm)高师，然而巴黎的高等师范学校并非只有这一所。为了搞清楚巴黎高师的历史以及法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情况，有必要回顾一下巴黎高师的建校过程。

共和国三年雾月九日(1794年10月30日),根据议员拉卡纳尔[①]的提议,共和国政府颁布了建立师范学校的法令。法令的第一条即声明:"在巴黎建立一所师范学校,召集全国各地受过应用科学教育的公民,由师范学校为他们提供各领域最出色的学者传授教育法。"[②]此处的"教育法"原文为l'art d'enseigner,即教学的技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高师确实属于技术专门学校,只不过这里传授的是一门特殊的、其技术性常被忽略的技艺——教育法。学校旨在培养中学和大学教师。从学科设置来看,它文理兼备,主要包括数学、化学、天文学、地理、文学、哲学、历史等专业,鼓励跨学科的研究和通才的培养,这一点也非常不同于其他的大学校。

法令颁布之后,学校于1795年初第一次开学。由于缺乏具体的招生、管理制度,那里成了大革命期间激昂而混乱的思想论坛,加之缺少必要的资金,一年后就关闭了。其后又几经波折,直至1847年才迁至余乐姆街,奠定了迄今未变的格局。1880年至1882年间,于勒·菲利(Jules Ferry)主持创建了塞弗尔女子高师(ENSJF)、枫丹纳女子高师(ENS de Fontenay)和圣克鲁男子高师(ENS de Saint-Cloud),都位于巴黎近郊。后两所高师建校的宗旨是培养初等教育的老师,后来这一最初的设计逐渐被打破,至1966年,已完全等同于其他高师。1912年又成立了仅有理工科的技术教育高师(ENSET),即今天巴黎南郊的卡尚高师(ENS Cachan)。1985年,塞弗尔女子高师并入余乐姆街高师。同年7月颁布的法令规定,枫丹纳和圣克鲁两所高师合并,只留文科,同时在里昂创建一所理科高师。然而合并

---

① 拉卡纳尔(Joseph Lakanal,1762—1845),哲学家、修辞学家,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公会议员,近代教育制度的改革家。

② Alain Peyrefitte, *Rue d'Ulm*, Dates Fondatrice, Edition du bicentenaire, Fayard, 1994, p. 4.

后的枫丹纳/圣克鲁高师仍保留了理科专业。1996年，该校又设置了经济学和社会学专业。由于在原校址扩建的困难，该校决定迁至里昂。2000年，里昂的新校址落成，位于理科高师附近。2004年，该校又增加了艺术教育专业，包括艺术史、音乐、戏剧和电影等，并增设了博士阶段课程。

一般考进巴黎高师后，每个学生每月都能得到教育部发放的约7000法郎(1200欧元)的补贴。学生在第三年或第四年应参加教师资格会考，取得教师职称。毕业后，学生必须在高中或大学为教育部工作相当长的时间，或在大学边读博士边给本科学生教授少量的课程。领取如此高额的奖学金多少有点儿和国家签约的味道，所以中途放弃或转行被认为是背叛和耻辱。

原先外省也有地方师范学校，但其招生只要求通过入学考试而无须预科班的学习，与巴黎高师不属于一个级别。1989年以来，这些学校被新设立的一个教师培训系统(IUFM)所取代，主要培养初中和小学老师。

余乐姆街高师是所有师范学校中最古老而杰出的一所，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巴黎高师”——那所位于拉丁区深处、充满传奇色彩的学校。它依然维持着1847年以来的建制，保留着严厉得近乎残酷的选拔程序。哲学大师雅克·德里达也是两考而中。尽管如此，学校还是一再申明，他们的招生制度是最公平的。录取的唯一标准就是竞争考试的成绩，包括笔试和口试，考生凭借的完全是个人才能，而其他大学校会以“适应性”或“个性”的名义挑选学生。高师仍然称得上维克多·雨果所说的“民主学校”。高师毕业生所投身的是教师职业，一个付出远远大于回报的职业，收入平平的生活保持了高师人朴素的品质。而其他大学校的毕业生很快就能进入金融财团或平步青云地步入政界，一跃而为“成功人士”。

高师是民主精神与精英意识的奇特融合，它培养的是精神贵族。

一开始,这所大革命的共和派学校就汇集了法兰西最出色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拉普拉斯、蒙日、拉格朗日、巴斯德……为什么它具有如此非凡的魅力?或许应该从它所秉承的启蒙精神中去寻找。康德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如何摆脱这种不成熟状态,成为自身的主人、理性的主体?教育是一个核心问题。正当的公民教育成为启蒙的第一要务,是整个现代社会的起点,这一神圣的使命自然吸引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这也是为什么以研究教育法和培养教师为初衷的高等师范学校具有其他专业大学校所缺乏的精神理想的深层原因。直到20世纪这一精神仍没有过时,福柯在1984年讨论康德的启蒙观念时写道:"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对启蒙的反思一直是一种不失其重要性或有效性的哲学思维方式。我们当然不能将关于自身的批判本体论视为一种理论或教律,甚至也不能把它看做一套不断积累中的永恒的知识体系,而是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哲学生活。"这一精神价值的隐秘传承,使得高师一直占据着法兰西思想前沿的位置。为什么法国最出色的大学是一所小规模的师范学校、为什么这所学校一百多年来大师辈出也就有了一种解释。

《巴黎高师史》原书名为《高师人》,是一部20世纪余乐姆街高师文科部分的纪传体并纪事本末体史书。作者在一开头即声明,这本书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忽略了高师的科学家们,包括诸位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得主。该书所记录的主要是高师的人文历史。

对久闻其名、不谙究竟的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巴黎高师的校史、风俗、名人旧事,且偏重描述,流畅易读。

两位作者都是高师出身。弗朗索瓦·杜费是《观点》周刊的记者,皮埃尔-贝特朗·杜福尔是政坛要人的文学幕僚。限于二人的职业习惯,其写作风格略有轻浮之嫌,某些立论也显得单薄,如同哲学

家、南美革命的法国战士海杰斯·德贝在序言中所批评的一样，流于“预科班的修辞术”。对于热爱萨缪尔·贝克特、西蒙娜·薇依的读者来说，书中的某些描述恐怕也难以接受。然而同样也是出于二人的职业，他们对整个法国社会文化有着全面的认知，可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如果不以学术著作的标准来要求，该书仍不失为一部内容丰富、文笔风趣的佳作。

原书出版于1993年，高师建校两百周年前夕。今天看来，某些时态和结论已不复准确。

近二三十年来，许多高师人也纷纷改行进入大众媒体和工商业界。看来“消费主义”的全球性浪潮不仅席卷国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精英也未能幸免。

译笔匆匆，是以为序。

程小牧

2006年9月于巴黎十四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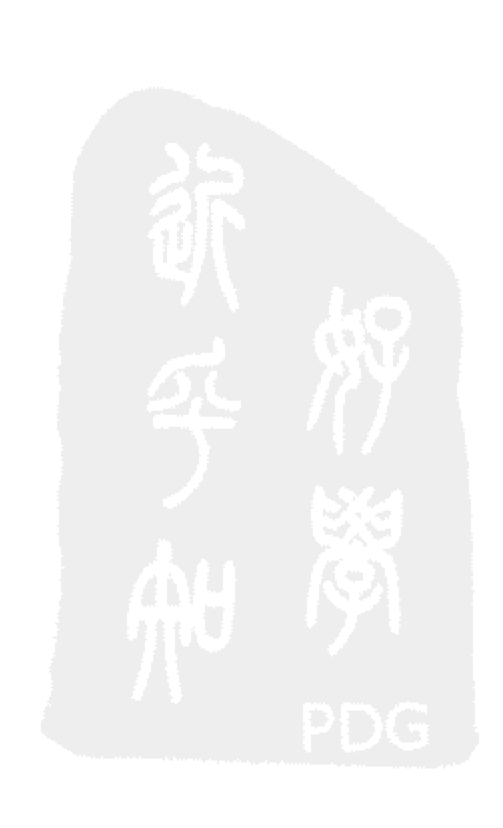


目　　录

黄金时代

理性的冲动

当今时代



黄金时代





一所堪称典范[1]的学校

从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和陈年发黑的照片上看，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并没有改变昔日的风貌，还是坐落在拉丁区后面余乐姆(ULM)街45号。那是一条没有一家商店的小街的尽头，再笔直往前走，就到了先贤祠。学校的外观像一座省政府的办公大楼，四周绿荫环抱，大门的上方是两尊典雅的女神石像，分别代表文学和科学。正中的门额上是一行金色的大字："高等师范学校，制宪会议法令，法兰西共和国三年雾月九日"[2]。

进去吧，大门是从不关闭的……一进门您就到了大厅。由于门房的值班室四面是玻璃，学生们便把这个大厅叫做水族馆。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圆柱形大厅，学生们常在这里漫不经心地闲步。大厅的尽头是花园，秋冬时节，园子里的落叶被风卷着直扑大厅的玻璃。花园的中央有一个池塘，一注清水从茂密的枝叶中汩汩流出，这便是著

---

① 法语 Normale 一词有多种意思，可以指"规范的"、"典范的"，"师范"一义即引申于此，也可以指"正常的"、"平常的"。——译者注

② 法兰西共和国始于1792年9月21日。共和国日历确立于1793年10月24日。一年分12个月，每月30天。一年始于9月22日秋分。12个月分别是葡月、雾月、霜月(秋季)，雪月、雨月、风月(冬季)，种月、花月、牧月(春季)，穑月、热月、果月(夏季)，共和国日历推行了13年。——译者注

名的“恩斯特水池”[1]，多少代的文人学者曾在这水池旁滞步观鱼。花园的四周是六十座半身的石雕像，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石雕像的鼻子都发黑了。绿草茵茵的草坪上，巴西亚克曾经写道：“年轻的时候顽蛮不肖，把唱片匣子、茶杯到处乱扔，也把姑娘到处乱扔……”

岁月如梭，高师不改旧貌，高师人也一如既往。1993年的学生还像于勒·罗曼(Jules Romains)的年代一样衣冠不整、无所顾忌，或许稍稍多了点儿冷漠，却总是那么自信，那么有“优越感”，那么讥讽嘲弄，那么从容傲慢。成群结队的年轻人聚集在陈旧的走廊里，是议论刚上完的希腊碑铭学讲座，还是策划什么恶作剧，那就不得而知了……这些年轻人对现时的思想不感兴趣，令他们陶醉的是那些被人们所遗忘的概念：思想的自由，信念的爱好和无政府状态……

您会奇怪，这是一所学校还是一个夏令营？这里不炫耀什么出类拔萃或成名成家，既没有“美国式的大学校园”，也没有盛气凌人的巨柱长廊。这里以简朴为荣。这所最负盛名的学府对它的竞争对手——综合理工学校、高等商业学校或国家行政学院——那些装饰得金碧辉煌的玻璃、水泥建筑不屑一顾。高师崇尚的是精神至上。

两百年来，高师这座苗圃为法国培育了最显赫的知识精英、最敏锐的作家、最慷慨的政治家。饶勒斯、勃鲁姆、贝玑(Péguy)、季洛杜(Georges Dumézil)、萨特、尼赞、迪梅齐、于连·格拉克、让·端木松和海杰斯·德贝，他们的美好青春都是在那些肃穆却不失魅力的院墙里，在那清教徒式的工作室里，在那金鱼徘徊其中的花园水池旁度过的。那些墙粉剥落的教室里回荡过圣伯夫(Sainte-Beuve)、柏格森、朗松、雅克列维奇、梅洛-庞蒂和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等教授谆谆教诲的声音。

---

① “恩斯特”指的是水池中的金鱼。因为最早的金鱼是恩斯特·贝尔索(Ernest Bersot)引进的，他是1871—1880年的校长。——译者注

要加入高师这个团体，并不取决于门第、势力。“这是一所学校，一所真正的学校，踏入这所学校意味着生活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高师建于共和国三年

巴黎高师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它的建校典礼定在共和国三年雨月（1795 年 1 月 20 日[①]）。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零下十一度，大雪盖地，塞纳河也结上了冰层。那年月，时局混乱，物资匮乏，可那天的店铺里却奇迹般地有面包出售。[②]

清晨，贫穷的圣玛索（Saint-Marceau）镇上的居民们眼见着一长列气宇不凡、年龄不等的人从街上走过。他们步履匆匆前往自然博物馆的阶梯大厅——师范学校的校址。在那里他们将学到民族精英传授的知识，直到有一天他们也成为民族复兴的工具。博物馆阶梯大厅里悬挂着蓝、白、红三色的旗帜，议员拉卡纳尔身穿制服，腰佩长刀、头戴礼帽，庄严地登上讲台。他用地中海人特有的洪亮嗓音诵读了建校宣言：“鉴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为了让共和国全体公民能得到统一的教育，国家议会颁布以下条例：一、在巴黎建立一所师范学校，召集全国受过应用科学教育的公民，由师范学校为他们提供各领域最出色的学者传授教育法……”

共和国需要杰出的学者，学校的师资力量格外显赫。拉格朗日（Lagrange）和拉普拉斯（Laplace）教授数学，蒙日主讲几何学，贝尔多莱（Berthollet）负责化学，拉哈伯（Laharpe）传授文学，弗勒纳（Vol-

---

① 似为 1796 年 1 月 20 日。——译者注

② La fondation de l'Ecole normale est racontée en détail dans le livre de Paul Dupuy, *L'Ecole normale de l'an III*, Hachette, 1895.

ney)执教历史,贝尔纳丹(Bernardin)专管伦理……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这些各专一门的科学家、知名学者汇集到这个传授知识的殿堂,让他们各尽其能,弘扬学识,桃李天下。

当时的讲课是在一种激进的亢奋气氛中进行的,这种气氛几近浮夸与毫无约束的温情主义。人满为患的阶梯大厅中爆发出狂热的掌声,教授们精彩的、戏剧性的演讲换来的是听众满眶的热泪。

照计划师范学校得在四个月里培训出一批教师并自备部分师资力量,然而当时任教的大人物们不屑关注教育法。从一开始,师范学校就转向办成一个高层次的文化殿堂,而不是教育学院。由于这一导向的错误,加上资金不足,这一次试验无果而终。开学不到一年就关门大"结"了。

19 世纪初,为了给法兰西第一帝国配备教师,拿破仑给了它新的生命。师范学校以寄宿学校的形式重开旧业,培养高中的师资队伍,与 1795 年时无政府状态的师范学校相比已面目一新了。拿破仑本人给学校制定了强化教育大纲。他决定"首先让年轻人通读健康、强有力的作品,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博叙埃(Bossuet),这才是他们应读的大师。他们的作品是博大精深的,是有规则的、平和的和有序的。他们不搞革命,也不诱发革命。"[①]由于学校保持了共和革命的倾向,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波旁王朝复辟时期(1814—1830)曾一度被取缔过。直到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师范学校才奠定了它至今未变的形式,并被授予了高等学府的称号。高师在为它专门兴建的余乐姆街安营扎寨。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期间,高师与当局发生过多次冲突,但并没有影响到学校的生存。

19 世纪,高师培养的高中教师不计其数,其中出类拔萃者为数

---

① Abel-François Villemain, *Souvenirs contemporains*, Didier, 1854, 2e édition, p. 157.

不多。19 世纪末，随着共和体制的确立，高师这个母体孕育了以作家、哲学家为主，政治家、知识分子为辅的一大批优秀学子。1878 年，同时入校的有饶勒斯、柏格森，次年有埃米勒·迪尔克姆——社会学的创始人，1886 年有未来的作家罗曼·罗兰和苏亚雷斯，1890 年有雷翁·勃鲁姆，1894 年有夏尔·贝玑，1903 年有季洛杜，1906 年有于勒·罗曼等等。一张不可思议的名人榜，一代才华横溢的精英，由此演绎出高师的神奇传说。

高师人是凡夫俗子吗？

雷蒙·阿隆暮年时赞叹不已地提起让他遇到萨特和尼赞的学校，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从来没有在如此狭窄的空间遇到过如此众多的睿智大才。"①

非凡的精神、百科全书般地包罗以及多学科的融会，高师培养的是广采博学的特殊人才。20 世纪以来，高师人的才干引人注目。伊伯利特·泰纳的同届学友把他比作"一方不可思议的海绵，海绵的每一个毛孔无不贪婪地吸吮着书籍、人际、事件中任何可以汲取的养分，只要用手把海绵一挤，那其中的知识源流便汩汩不绝地溢出来"②。

高师的另一个奇才是饶勒斯。自中学时代起，这个农夫的儿子便展示出异常的才干。他提出的问题涉及面如此广泛，连他的老师都无可奈何。其中的一位只能要求他"限于教育大纲的范围内"。他

① Raymond Aron, *Mémoires*, Julliard, 1983, p. 31.

② Francisque Sarcey, *Souvenirs de jeunesse*, Ollendorff, 1885, 2e édition, p. 162.

是1878年入学考的第一名，这位未来的社会主义演说家以他铿锵有力的措辞、古典文学的深厚功底、精致独到的雄辩术深得同辈的敬仰。他们这样形容他："一副心绪驰骋、神情专注的样子，充满智慧的眸子，一边深思，一边含着一张纸条或一片草叶……他幻想万千，自语自吟，仿佛面前站着一群听众。"①

类似饶勒斯这样的尖子学生，从小被教育部的督察员挑选出来，被老师精心培育、引导着走向高师的大门。这些平民的子弟，通过高师的入学考后，仿佛经历了授予骑士称号的仪式，成了知识贵族。他们从不炫耀自己的学识，那是没有品位的举止。季洛杜堪称高师人的楷模，他的学生保罗·莫朗②这样描述他："对季洛杜先生，我敬重他高师人的名誉以及他深藏不露的学识。他的希腊语、拉丁语、德语都是无可挑剔的。在校期间，他寒窗苦读、发愤钻研，造诣极深，但是在他的言谈举止中丝毫没有引经据典的夸夸其谈。与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知识分子在一次晚会上恨不能把名人要事统统显摆出来的作风大相径庭。"③

季洛杜甚至故意把教师资格会考④考砸了。后来，萨特、巴西亚克和福柯也效仿过他。高师人落选会被认为是由于不认真应考，而一旦入选的话，他们的成绩通常是名列榜首的。赫里欧、加克索特、

---

① Témoignage de Paul Morillot, cité par Lucien Lévy-Bruhl dans la notice nécrologique de Jaurès, *Annuaire des anciens élèves de l'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année 1916, p. 82.

② 保罗·莫朗(Paul Morand, 1888—1976)，法国诗人、作家、外交家，著书甚丰，题材甚广。他的文风被认为是文学界的印象派。——译者注

③ Paul Morand, *Giraudoux*, in *Mon Plaisir … en Littérature*, Gallimard, 1967, p. 197.

④ Agrégation，法国高中教师和大学部分学科(法学、经济学、医学、药剂学等)教师的职称会考。——译者注

阿隆、萨特(第二次参考)或蓬皮杜都在此列。蓬皮杜与季洛杜一样给人的印象是随意、从容、驾轻就熟。这种漫不经心,一半是真,一半是戏,他们高度的文化涵养来源于预科班里长期的艰苦学习。

猫头鹰——智慧的象征

成为高师人之前,他们都是预科班的学员。

在9月某个细雨朦胧的日子,他们来到巴黎的火车站。还没来得及好好看一看繁华喧闹的大街、熙熙攘攘的人群、灯火辉煌的商场,他们便手提行李登上了圣-热纳维也夫(Sainte-Geneviève)高地、腼腆地跨入一道将年轻人关闭其中的大门。

在以路易大帝高中、亨利四世高中为[①]首的高中校墙内,两百年来,年复一年地延续着为应付可怕的高师入学考试而开设的预科班——"嘎涅"(Khâgne)。四五十个男孩都是各个高中的尖子生、统考的优胜者、法国中学教育的佼佼者。

"嘎牛"(cagneux)的法语意思是罗圈腿,综合理工学校的学生把这一雅号奉送给高师预科班的学生,以讥讽他们细腿长身的羸弱外表。同样,圣西尔(Saint-Cyr)军事学校的预科班学员的雅号是"醋渍小乳瓜",即傻瓜;综合理工学校预科班学员的绰号是"叩头虫"。"cagneux"聚集的地方称之为"cagne",法语"cagne"的拼写后来被演变成希腊语,"c"换成了"kh",这样显得有品位,再加上"^"的小帽子,自嘲自讽的意思就完善了。这就成了预科班——"嘎涅"(Khâgne)现在的写法。

---

① 路易大帝(Louis-le-Grand)高中、亨利四世(Henri Ⅳ)高中是巴黎的名牌高中,有着全法最好的高师预科班。——译者注

作家格埃诺当年是高师预科班的教师，他谈起学生时充满了温情和赞赏："他们来自许多偏远的省份，带着各自浓厚的乡音和土语。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令人感叹的求知热忱。他们既不排斥批评也不缺乏幽默。很难想象他们的头脑里都装了些什么。对不明白的事物，他们很自然地流露出怀疑的神色，为了某个话题，彼此也会争得面红耳赤。但是我相信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他们相信自己的语言，相信语言的魅力。"①

他们的伟大理想源于巨大的耻辱，艰苦奋斗是通往高师、通向巅峰的崎岖小道。高师入学考试的大纲几乎是无限止的，文学、哲学、古代语言、历史、地理……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第一次作业上老师的红笔批语铺天盖地，第一个惨不忍睹的评分让学生们意识到自己无知的严重性。"在外省高中得优胜奖是一回事，到巴黎预科班名列前茅则是另一回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读预科班的加克索特这样写道。②

预科班的年月艰难困惑，筋疲力尽，令人气馁，然而又是那么丰富多彩。所有的高师人都承认预科班使他们学会了工作。大量的论文，译成本国语或外国语的作业，大量的阅读让他们掌握了修辞的要领。高师预科班对古代语言的要求颇高，并崇尚风格和质量。

师生的融合是至关紧要的，因为预科班不能没有教师，而他们又是何等出色的教师啊！从阿兰（Alain）到让·波弗雷特（Jean Beaufret）还有安德烈·贝勒索尔（André Bellessort），让·拉克洛瓦（Jean Lacroix）或让·格埃诺，这支师出名门的队伍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些令人景仰的启蒙者所上的每一堂课都是一次事件。惊喜已近狂热的预科班学员们一届届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看吧，阿兰的课跟你

① Jean Guéhenno, *La Foi difficile*, Grasset, 1957, p. 74.

② Pierre Gaxotte, *Les Autres et moi*, Flammarion, 1975, p. 17.

所上的任何课都不一样……"

艾米勒·夏蒂埃又名阿兰,是预科班无可非议的最杰出的教师。发表过系列著作《言论》(*Propos*)。1909 年至 1933 年在亨利四世高中教哲学。他的学生有让·普雷弗、西蒙娜· 薇依、马塞尔·德阿、路易·普瓦耶(笔名于连·格拉克)、让·米斯特莱,他们都深受他的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前两位。他的学生们称他为"夫子"。他们模仿他的言语、文风,从具象到抽象……

阿兰"很高,很宽,满脸皱纹,背驼得厉害,45 岁的人看起来像 60 岁"。他的学生米斯特莱这样写道:"一开始听到他鼻音很重带诺曼底口音的嗓音,我很失望。更让我吃惊的是他独特的表达方式,很显然,他是'高声'思考的人。他搜寻的不仅是言辞,而是意念以及它们的连贯性。他不断地重返前言,好比一个人在写作时,不时地回头纠正、修改……然后一切都严实了。我明白了夏蒂埃是那类极少数用自己头脑评判是非,而不是用陈词滥调糊弄人的人。他有独到的思维,而不是成品贩卖。"①

预科班对外省的学生来说意味着寄宿生活。寄宿生的统一服装是一件类似五金店职员穿着的灰色长褂,通常衣上墨迹斑斑。有时他们在长褂上缝一只密涅瓦(Minerve),它是智慧如神的猫头鹰——预科班的象征。

学生们的作息时间精确得如同带孔的音乐硬纸带:早上六点起床、上课、学习,晚上九点上床。课间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学生们多半在校园内转圈。路易大帝高中的校园被学生们叫做"野兽笼子"。

预科班的学生们满脑子装的是高师入学考试,这简直成了强迫症。"通过考试,今年通过考试",学生们病态性地重复着。想起前几届学生抽到的考题,例如"亚历山大城的街道"或者"希腊儿童的游

---

① Jean Mistler, *Le Bout du Monde*, Grasset, 1964, pp. 153~154.

戏”,学生们不由得战战兢兢。偏题、怪题是高师的传统,延续到今日。19 世纪 60 年代时,未来的总理法比尤斯口试的题目是“拉吉德王朝的公主们”①。高师人历来有对一无所知的话题也能滔滔不绝的盛名,这并非纯粹属于夸夸其谈的嗜好,而是形势所迫。

高师入学考试期间,学生们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一年的辛勤努力,至此成了地狱般的煎熬”,莫里斯·热纳瓦说,“我们一个个都被激励着成了超人,三分之一的夜晚被浪费在毫无意义的死记硬背中,夜灯只在昏睡前的一刹那才肯关闭,很快又被隔壁房间的苦役犯报复性地敲击隔墙的声音吵醒。吞下一把据说有提神作用的可乐粉……”②

最终到了考试的日子,一场无可比拟的折磨,一次真正的马拉松赛跑。冗长的笔试、口试,然后是焦心的等待。且听罗杰·马丁在《蒂勃一家》(*Les Thibault*)中的描述:“底楼一扇长窗上刚刚贴上了一张大布告。雅克感到自己被一大群吵吵嚷嚷的人群推搡着离开了地面,拥向那张判定生死的布告。

他的耳朵嗡嗡作响,安东尼说:‘通过了,第三名。’

安东尼火辣辣的话语在雅克的耳中回响了好一阵,雅克腼腆地看着他兄弟容光焕发的脸庞,好半天没明白过来他说的话。”③

然后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刻。入学考试残酷的偶然性使一些优秀的学生名落孙山。亨利· 盖菲莱克说:“每年的入学考试对某些人来说是以学涯乃至人生的悲剧而告终的。笔试、口试大刀阔斧地把同学们劈成幸福和痛苦两大类,把同学情谊搅得一片混乱。1960 年

① 拉吉德,即希腊人的托勒密王朝,公元前 323—前 30 年统治埃及。——译者注

② Maurice Genevoix, *Trente mille jours*, Seuil, 1980, pp. 95~96.

③ Roger Martin du Gard, *Les Thibault*, t. III, *La belle Saison*.

时，我曾打算就这题材写一本书，书名拟为《在分手之前》。"[1]

戴莱姆修道院

地狱般的预科班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高师的天堂。

人们把高师称做"戴莱姆修道院"[2]，充满宽容的家庭。此语不假，没有比高师更自由、更无政府状态的学校了。一切都为了减轻学生的压力，让他们的生活更有情趣，这对经过了两年、三年或四年艰巨难忍的预科班生活的学生来说反差太大了。

说是师范学校，这是唯一的一所只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即可过渡到高一年级的学校。如果说高师是一所理想的学校，这首先是因为在这里，学生们可以不读书，或者说他们在不想读书的时候可以不读书。1930 年改革以来，课程排得极少，而且是选修的。高师学生的主要课程是索邦大学的课程，当然这意味着他们得去索邦大学上课。高师的生活，与其说是以大学的学习周期为节奏的，还不如说是以舞会、冬季的戏剧演出、春天的花园酒会和名目繁多的恶作剧为节奏的。学生们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学校四边的居民对于穿着睡衣、趿着拖鞋去周围咖啡馆吃早餐的大小伙子早已见多不怪了。晴朗温和的日子里，学校的草坪上懒懒散散地躺着三五成群的年轻人，有的长时间地仰望天空，有的请朋友一起边喝开胃酒边听唱片，也有的在学习……

有阅读愿望的同学可以去近在咫尺的图书馆找书。高师图书馆

---

① Henri Queffélec, *Un Breton Bien tranquille*, Stock, 1978, p. 114.

② Abbaye de Thélème 出自 16 世纪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戴莱姆修道院的宗旨是"做你想做的事，这是一个身心精神自由的理想王国"。

是绝妙的去处,成千上万堆积如山的书籍全架开放。不少学生骑在高高的活动梯架上长时间地沉浸在手中的读物里。在绵延不绝的书架上,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扫除了所有有用的书,而只剩下那些无关紧要却妙不可言的作品。用格埃诺的话来说,"高师就是一群围绕着图书馆的年轻人"①。

高师之所以成为高师,是因为在这个学校里无纪律可言。校规吗?什么校规?校规逐年放宽,放宽到半透明、透明、抽象的地步了。19 世纪 20 年代末,学校至少还规定学生必须在凌晨一点以前归校,晚饭后不能带女朋友进来。然而,攀墙如此便利,简直不在话下。

最初,19 世纪时,学校可不像现在这样。教室里要保持绝对安静,五点起床,每天做祈祷,禁读"危险"的书报,惩罚、开除,那是 1836 年的校规。当时的高师人还穿校服呢!到 19 世纪末,这些严格的条条框框已所剩无几了。

促成这一现状的有功之臣要数保罗·杜比(Paul Dupuy),他是 1885 年至 1925 年的学校总监,他有意识地打破了校规校纪的约束,把高师变成了一所无政府主义的家园、一片思想和身体自由的绿洲。杜比对学生的随便走动、为所欲为、打斗争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有甚者,他是第一个从中取乐的人。他和学生们很亲近,与他们思想一致。作为百分之百的高师人,他对那些处心积虑、思考周密的恶作剧津津乐道。

巴西亚克说:"总而言之,高师,这个令人惊讶的、富于诗意的、无政府主义的庇护所,头一条美德便是学校不存在。"②当你想外出时,巴黎近在咫尺,它那五花八门的魅力诱惑着阅世甚少的外省青年。几百米外是保存着乡村风光的穆夫塔(Mouffetard)。不远处的卢森

---

① Dans *Changer la vie*, Grasset, 1961.

② Notre *avant-guerre*, Plon, 1941, rééd. *Le Livre de Poche*, p. 78.

堡公园(Luxembourg)景色宜人,在公园铁皮雕花的椅子上闲坐更是一番享受。蒙巴纳斯(Montparnasse)就在附近,在那儿,艺术家咖啡馆、昏暗的店堂、剧场、电影院应有尽有。

据说有些高师人从来没有去过塞纳河右岸,有些人则喜欢去登蒙马特尔高地(Montmartre),逛贫民区……然后返回高师的孤岛,躲进这方远离世俗的天地。

巴西亚克证实高师"是一座绿荫覆盖、微风拂枝的小岛,一座不为人知的小岛。那儿有圆形的石凳,有巴斯德的半身像,有环池的绿草坪,有汽灯成行的小径,还有完全没有法则的自由真空。这是一座人们梦想中的小岛,一座欢度三年长假的小岛……"

当听到某些高师人满怀深情地倾诉曾经在大学伊甸园度过了人生最灿烂的三四年光阴时,还有什么可惊讶的呢?毫无疑问,所有高师出来的作家无一例外地感叹"生活的甜蜜",他们是真正品尝过它的滋味的啊。

学习室(Thurnes)

高师人绝大部分的光阴是在书房兼寝室的学习室里度过的。每年开学,新生们便三五成群,按个人的喜好、情趣组合,聚首在他们的学习室里,那是他们独自的天地。同一个学习室的伙伴叫做室友(cothurnes)。

这些学习室与巴黎周围的别墅一样都有各自的名称和别具一格的风貌。室主们尽情发挥想象力,力求标新立异。漫不经心地参观一下,可以看到有用海报装饰的;有用新印象派、点彩派的画装饰的;有东方风格的,用日本阳伞、中国宫灯点缀,墙角钉着张开翅膀的白

鹉，墙上挂着字画。这一间的主人是主修语法的，室内装潢简朴至极，没有窗帘，淡绿的墙壁，家具仅限于一张粗朴的木桌和一把椅子，连粗笨的暖气管也不掩饰一下……

有时候，稍加修饰就会使室内别具风采。20 世纪 20 年代中，萨特的学习室里点缀着一盏独特的台灯，灯罩是女友的一条淡赭色的内裤做的……

工作室和学习室都是“友谊”室。大家在一起工作，但更多的时间是好友们海阔天空地闲谈，更确切地说是用高师人的隐语神聊。有几个学习室由于住过好几个著名的高师人而身价百倍。谁不想知道那些房间里四壁隐藏着的秘密？1886 年到 1889 年间，罗曼·罗兰和安德烈·苏亚雷斯合用过一个学习室，后来两人都成了作家，都酷爱音乐；社会党人贝吉和未来的法国大革命历史学家阿尔贝·马迪厄(Albert Mathiez)合住过的学习室的雅号是“乌托邦工作室”。作家于勒·罗曼和诗人亨利·法兰克同住过一室。萨特和尼赞共处数载，萨特与雷蒙·阿隆共同准备教师资格会考……

作家莫里斯·克拉韦尔在讲述皮埃尔·布唐和让-杜桑·德桑蒂这两位颇具盛名的哲学家当年是怎么说服他加入他们的学习室时说：“我刚完成高师的哲学口试，两个高班生，两个了不起的高班生向我走来，邀请我下一年加入他们的学习室。我的脸一阵白、一阵红……我竭尽全力让他们接受我，容纳我加入他们的思想殿堂、他们的宫殿——钟楼两边高层的回廊，屋檐下神奇的斜顶小屋。我们在屋顶上雀跃，从披檐下窄窄的窗沿上悬空从一个窗口移向另一个窗口。当我回首当时的情景，仍禁不住双腿发颤……

“我们用手枪打碎玻璃瓶，打穿荒唐的书。能工巧匠索瓦涅尼亚格(Sauvagnargues，未来的外交部长)探头进来问‘有需要修补的东西吗？’稍远一点儿住的是有点儿被人看不起的信奉天主教的学生，他们经常因我们的行为而大发雷霆……我们也时常谈论哲学，布唐

给我解说斯宾诺莎，德桑蒂谈论柏拉图，我讲述康德。”布唐是保皇派，德桑蒂是共产主义者，这一切并不妨碍这些小伙子和睦相处……

这儿有集体生活的乐趣，但对独处的学生来说也有难熬的时光。尼赞说：“20 岁不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而他的 20 岁是在高师度过的。高师清教徒般的学习室里曾隐藏着迷惑、失望、忧虑和失落。落下窗帘，关上护窗，多少年轻人忍受着孤独的煎熬。这个年龄的青年人不愁夜，只愁错失良机、空熬夜……

沸腾屋顶上的高师人

高师人是攀爬登高的动物。只要有可能，他们便扔下沉重的词典，攀着檐槽，翻上屋顶。像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一样几个小时在上面不停地行走，挟着东南西北四面来风，大声吟诵希腊语、拉丁语的诗歌……

至少高师的神话是这样说的。从于勒・罗曼到尼赞，没有一个作家不提房顶散步这一节的，这是高师文学必读的大无畏的一章。

事实上，这一惊险的习惯是有案可稽的。1895 年的《图释》(*Illustration*)杂志上发表了三幅高师学生在房顶上的照片。其中站在屋脊上走平横的是爱德华・赫里欧，他满头卷发，双手插兜，瘦得像只布谷鸟，他当时的绰号是“铁丝”，这位未来的参议院主席摆出了一副挑战的姿态。

后来高师的行政管理部门为了安全起见在通往房顶的过道上安装了铁栅门，学生们马上把门卸了下来，埋在花园的某个角落。他们以赫里欧为榜样，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向拘泥于细节的规章制度挑战，向万有引力挑战。“他们在房顶的星空下举行过好几次晚会，叼着烟

嘴、聊天或唱歌，直到值班的督察前来制止。”①

站在高师所在的斜坡上，巴黎南部的风景一览无余，大大小小的圆顶建筑冲天而起，荣军院、天文台、伟人安息的先贤祠，这一切怎能不让充满抱负的青年人无限憧憬呢？因为高师的屋顶不仅仅是走钢丝的绝妙场所，也是安静工作、沉思、喝咖啡、邀女友、听唱片的庇护所，更是野心勃勃的梦想自由驰骋的天地……

每一个爬上房顶的学生都很清楚他在步赫里欧、饶勒斯、雷翁·勃鲁姆等杰出前辈的后尘。登高可以“感受由高度引发的激情，从而联想到权力”②，由此可以勾画出远大理想的宏图。

于勒·罗曼的《善意的人》(*Hommes de bonne volonté*)的主人公——杰法农(Jerphanion)就是一个例子。他被一个同学拉上了房顶，这个外省青年感到了身处高处的眩晕。巴黎像一片大海在他脚下展开，好像一片有待征服的人群。这眩晕的一刻决定了他一生的志向：教师的儿子将成为一名演说家、政治家，为人类的进步而奋斗。预言实现了。20 年后，杰法农当上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部长。

面对巴黎城发出的豪言壮语也可能是逆向的。1938 年，尼赞的《密谋》(*Conspiration*)中年轻的高师人就在房顶上秘密筹划了一份革命刊物《内战》。面对巴黎，新一代的高师人不再幻想征服它而是想摧毁它。“坐在房顶滚烫的瓦片上，头顶有火热的太阳，他们决定在摊开的刊物封面的清样上再加上一挺机关枪。”③

不管年轻人的理想是野心勃勃的、诗意盎然的，还是叛逆的、革命的，攀爬楼顶绝不是低级趣味。向上攀登意味着藐视世间俗务，证

---

① *L'Illustration*, du 20 avril 1895; Edouard Herriot, *Le Pot*, in *Les Normaliens peints par eux-mêmes*, Chamerot et Renouard, 1895.

② Nizan, *La Conspiration*, Gallimard, 1938, rééd. Coll. *Folio*, 1973, p. 29.

③ *La Conspiration*, p. 32.

实了他们向往崇高境界的本性。季洛杜说过:"高师人是精神的仆人,这就意味着他们是物质的敌人。他们不接受俗世的重负和肉体的束缚。"①

迎空而立体现了他们自身的高拔,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历次危险行走中,从不失足闪腰。一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学生从房顶上摔下来。"说起来有过一次例外",总监杜比带点儿黑色幽默地说,"那是个工人,一个铺瓦工在暑假期间从房顶上摔下来,死了。"②

人文科学和人文主义

高师不仅是一个游玩散心的去处。这是一个文化高度集中的圣地,文学和科学相得益彰,哲学与历史相提并论,日耳曼语言学和古希腊语言学和平共处。课虽不多,但质量很高,授课教师都是高师留校的尖子。

高师的传统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直到1904年,希腊语仍是入学考试必不可少的项目。用拉丁文写作到1886年才被取消,当时的入学考试,除了用法语写文学、哲学和历史三篇评论文章,还要将一篇拉丁文翻译成法文,一篇法文翻译成古希腊文,此外再用拉丁文写一篇文章。

高师毕业的作家用众多的篇幅谈论古文经典实在是顺理成章的。在20世纪,他们的作品坚守着人性的经验,刷新着古典时期的遗产,季洛杜的剧作以古代神话为题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表现同代人在危机四伏时期的焦虑时,用的是特洛伊战争的典故。季

① *L'Esprit normalien.*

② *Paul Dupuy*, p. 51.

洛杜是他们中间最谙熟并擅长运用经典的人，总能不失讥讽并发人深省。必须有扎实的文科底子的人才能领会他的幽默，他那些层出不穷、穿越时空的典故让人感受到他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文人的文学、演说家的文学、教授的文学，而且不带丝毫的学究气。[①]

当然，一味地沉浸于过去会忽视现实社会。法律、经济，连同语言在高师的教育中是缺项或者说是退居次要位置的。就像尼赞所说的，老是与古希腊、古罗马人打交道的19岁的青年对现实生活知之甚少。[②]

预科班和高师里学的最多的是人文主义，人是一切的中心，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当学生们给预科班的阿兰老师起外号时，这个外号便是"夫子"；当高师出身的政治家饶勒斯办刊物时，这份刊物就是《人道报》；当高师作家于勒·罗曼出版他的小说时，这部作品便是《善意的人》。人总是占据一切的中心……

可是，当危险到来的时刻，当民主出现疲惫、旧世界受到威胁时，对人文主义的反叛也会变本加厉；而这种反叛正始于最成功地孕育了它的地方。后面我们可以看到，高师人轻而易举地妥协了，向反人道主义的势力妥协了。

高师人唯一铭记不忘的是对恶作剧的嗜好。

恶　作　剧(Canular)

高师人发明了"canular"一词。这是高师精神的杰作，一个彻底的独家发明。"恶作剧"一词于19世纪出现在高师人的俚语中。然

① *L'Ecole en France*, p. 126.

② *La Conspiration*, p. 46.

后才进入日常用语，20 世纪初才堂而皇之地被纳入词典。

最初，这个词指的是捉弄新入高师的学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戏弄新生（Bizutage）。

最早的恶作剧似乎发生在 1873 年，后来每年一次。11 月份时，新生们受到了老生一连串令人难堪的捉弄。首先，让新生们转圈。然后向一尊叫做“美加”的史前的大象骨架下跪。他们必须毕恭毕敬地亲吻大象的尾巴。然后让他们簇拥着站在一个巨大的锅炉上，俯首帖耳地听凭高年级学生毫不留情地挖苦他们。这是所谓恶作剧的真正仪式。最后共饮一杯“言和酒”，老生们故伎重演把新生们一个个灌醉，看他们醉态的笑话。罗曼·罗兰在 1886 年受到捉弄后，气愤地说：“谁也想不到这些聪明的年轻人竟会如此下流，令人恶心，低级趣味！”①这位未来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作者曾试图取消这种暧昧的玩笑。无奈，他发起的请愿书只有九个人签名，恶作剧照演不误。

到了 19 世纪末，恶作剧逐渐地变得精巧起来，并改变了原来的意义。恶作剧不再仅仅是开学时捉弄新生的把戏，而有了闹剧、骗局、欺骗的意思。也许捉弄新生本来就带着欺负新生老实、腼腆的意思，他们是理想的受害者。

1927 年，新生一到学校就接到学校军管处的指令，让他们换上伪装服聚集在一个教室里。一个中尉大步进了教室，命令新生们站在桌子上，做各种稀奇古怪的动作。这当然是个恶作剧。军官是高师毕业生哲学家约翰·卡瓦耶斯，1923 年入学考试第一名，未来的抗德英雄。②

---

① Romain Roland, *Le Cloitre de la rue d'Ulm*, *Cahiers Romain Rolland* n° 4, Albin Michel, 1952, p. 10.

② Entretien avec Ulysse Nicollet, mars 1993.

开学之前的入学口试每年7月在高师举行，这也成了折磨考生的机会。什么法子都想得出：贴出告示声称口试暂停，称笔试因作弊取消，在楼梯上用消防龙头冲湿考生和考官，私下组织审考团让受捉弄的考生不知所措……

最出名的一次恶作剧发生在1908年。几个高师人仿制公章，贴出告示举行一次额外的哲学口试。考官是著名的布特鲁(Boutroux)："一个微微驼背的先生，长得极瘦，满脸大胡子，倚在讲台上，用一种极其宽宏大量、饱学长者的姿态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对学生们回答的有关柏拉图的洞穴，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动力、孔狄亚克①的雕像等所有问题他都表示满意。每个考生都沾沾自喜，仿佛看到自己在排名榜上向前推进了五六个位置……

"今天早上的最后一个问题很普通，"考官问，"先生，您怎么看待康德?"可怜的考生一一陈述他所知道的物自体：现象、绝对律令，人类内心的道德法则和星空……

布特鲁点头称许："对，我看您对哥尼斯堡②的哲学家的理解是十分精到的，但是您个人的意见是什么呢？用一句话、一个词您怎么概括呢?"

"用一句话，这是不可能的。康德，《纯粹理性批评》，嗯，康德……"

"我来帮您说吧，康德是个十足的蠢……"

考生吓愣了，旁听的考生惊呆了，布特鲁却一发不可收拾了，"确实如此，十足的蠢……对所有一生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我都这么下结论，愚蠢的职业。好比我，我已75岁了，也算得上优秀了吧，"他龇牙咧嘴的苦笑将脸皱成一团，"我是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可我连给自己

---

① 孔狄亚克(Condillac,1715—1780)，法国哲学家，卢梭、狄德罗同代人。

② 哥尼斯堡(Koenigsberg)，康德的出生地。——译者注

买条裤子的钱也没有!"

考官从椅子上站起来,撩开燕尾服的后摆露出了光光的后腚……

在一个"左"倾的学校里,恶作剧自然是带有政治色彩的。1921年的"红军大炮"就是一例。当时的高师学生必须接受军训,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很多高师人表现得英勇顽强,但对军训他们却懒懒散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军事当局决定接管学校。一门大炮运到了学校。一名叫吉拉(Girard)的将军常煞有介事地召集全校师生训话。一天,大厅里的一尊半身像被转向面壁,墙上一幅大字写着:"我不想再见到吉拉啦。"大炮被拖到校门外的街上,直逼高师的炮筒上悬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红军的第一门大炮"。这个恶作剧的发起人是未来的部长马克斯・博纳夫(Max Bonnafous)和未来的作家让・普雷弗。另一个同谋出人意料是未来的法奸马塞尔・德阿,他当时是社会主义者。[①]

最擅长恶作剧的要数作家于勒・罗曼。1913年,他一心要捉弄布里索(Pierre Brisset)——一个写过两部不起眼的小说的昂日尔市铁路局的职工。罗曼致函布里索表示敬仰并与朋友一起组织了一次选举,在哲学家贝格松与布里索两人之中选出"思想王子"。事先也没征求贝格松的意见。

唱票的结果不言而喻必然非布里索莫属。布里索便顺理成章地被请到巴黎来庆祝喜讯。庆祝活动的日程是:"蒙巴纳斯火车站举行欢迎'王子'的仪式,身着轻纱的'缪斯'伴随着他乘上双篷四轮马车首先去瞻仰罗丹大师的《沉思者》雕像……下午由'思想王子'在名人俱乐部就'人类是青蛙的后代并保留着所有的特征'为题作讲座。被动员来的听众在场内齐声高喊'哇,哇'。讲座结束后人群抬着他穿

---

① *Voir Paul Dupuy*, pp. 116~117; Marcel Déat, *Mémoires politiques*, Denoël, 1989, p. 145.

过圣米歇尔桥……"

组织者将"王子"介绍给各家报刊的编辑部，所有的报纸都信以为真，发表了文章报道这一事件并大肆渲染了这一"伟人"。当事情揭晓后，很多报刊十分愤慨。《费加罗报》一直对罗曼耿耿于怀。[1]

最著名的恶作剧发生在昂贝尔(Ambert)和依索瓦(Issoire)两座宁静的小镇上。罗曼在1913年发表的《伙伴》(*Les Copains*)一书中有所叙述。一帮小伙子在奥弗涅省的两个小镇上大肆捣乱取乐。一次，小镇上举行高卢首领维钦托利(Vercingétorix)骑马像落成仪式，他们让一名同伴赤身裸体地站在布幔掩盖的高座上取代了古代民族英雄的雕像，从而把揭幕仪式闹得不可收拾。这个小说情节虽说是以罗曼和他高师的朋友们1906年的一次出游为蓝本的，然而事实上，这帮伙伴并没有对无辜的镇民做过不敬的举动，充其量也只限于言语上的冒犯。高师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恶作剧只能属于传闻。这又有何妨？一辈辈高师人不都牢记着这个美妙、滑稽、明智的恶作剧范本吗？

《伙伴》一书力求证实的是恶作剧并非单纯的学生的胡闹，"它用荒诞的方式来揭示某些重要的和令人担忧的事实。以机智和兴高采烈的报复来对付愚昧"。罗曼在1952年高师的一次讲座上这样说。巴西亚克则表示恶作剧"最大的成功标志是，人们把它当做神话传说"[2]。

---

① Jules Romain, *Amitiés et rencontres*, Flammarion, 1970, pp. 97～107.

② Conférence inédite de 1952; Brasillac, *Notre avant-guerre*, p. 85.

当不当教师?

“在一个令人不安的夜晚,我来到了一个对我来说相当有代表性的外省小城,小城死气沉沉。我意识到高师毕业后,我很可能被分配到这样一个小城的中学教课。从那以后我的想象力老是停留在那个会葬送我前程的阴暗角落。”[①]写下这几行字的是阿贝尔·埃尔芒,25年后,他还不寒而栗呢。毕业时,他完全有可能被派到一个边远小省去教书。他显然不是那种当教师的料,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了上流社会的小说家、文学院院士。

高师出来干哪一行的都有……甚至有人“心血来潮”当了老师。当教师还是选择另一种职业,是每一个高师人都必须面临的唯一的选择。

19世纪以来,高师人各奔前程。共和党派的部长于勒·西蒙(Jules Simon)对同届的学友作了个调查,老同学中有公证人,有保险公司总裁,有出版商(不是别人,正是路易·哈切特,著名的哈切特出版社创始人),甚至还有油浸沙丁鱼的生产商。1878年饶勒斯和柏格森的一届中出了主教,1891年赫里欧一届有消防队长。参议院主席赫里欧说:“高师是个奇怪的家庭,它既培养耶稣会教士,也培养歌舞剧专家。”19世纪末的高师被认为是记者培训班,众多的高师人从事新闻工作。

20世纪初,时兴投身外交事业,仅1907年一届就出了四个大使。此后,国际联盟在高师人中招聘了很多公职人员。不少人干脆转业进入董

---

① Abel Hermant, *Confession d'un enfant d'hier*, Librairie Ollendorff, Paris, 1903, p. 118.

事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十多名高师人成为法国的大企业家。对不少人来说这种过渡是十分突然的。德阿在他的《政治回忆录》(*Mémoires politiques*)中写道:"我清楚地记得皮埃尔·皮舍趾高气扬地回来,从头到脚焕然一新——一身米色的套装、黄色的皮鞋,他带着可爱的傲气说:'我把自己卖给了资本家,但至少可以装扮自己!'皮舍确实也作了许许多多的让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与德国纳粹合作,最终被枪决了。"①

一旦当了教师就不容许半途而废,辞职被视为耻辱,像丑闻一样秘而不宣。从原则上来说,高师人必须为国家服务十年,违背者将受到严厉的警告处分。然而,对于"开小差"的高师人来说,真正的处分,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对教书的怀念。不管他当了银行家、政治家或记者,他永远是一个失意的教师……

没有人比诗人亨利·法兰克更明确地表达了所有高师人心中这双重的、矛盾的愿望——调整知识爱好与付诸实践的关系。1909 年,法兰克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说:"我酷爱生活,酷爱生活中每天都有要做的事,酷爱随着论文的展开而取得的进步、随着书库的增长而富裕的生活,酷爱周日与友人同饮波尔多酒的生活……但我也喜欢绿眼睛的年轻牧童,年轻的大卫王将石块投向巨人歌利亚,就像我们把愿望投向世界一样。我爱英雄主义,爱疯狂,爱辉煌的壮举,爱舞蹈,爱美,爱战争,爱勇敢,爱快节奏的生活,爱爽朗的笑声,爱匆匆咽下的午餐,爱男女之爱。"②

这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他的言辞掷地有声。亨利·法兰克无须在他梦想的两种生活中作出选择,1912 年他死于肺结核,年仅 23 岁,身后留下的是未完成的作品和未尽的生活……

---

① Marcel Déat, *Mémoires politiques*, Denoël, 1989, p. 599.

② Lettre à Louis Fouassier du 26 octobre 1909.

教师的共和国

《善意的人》第三部中，主人公杰法农独自一人在余乐姆街高师的屋顶上反思他一个平民子弟的命运："一个乡村教师的儿子，农民的后代，一个民间最健康、强壮、单纯的家族。既没有市民疲惫的陋习，也没有平民的奢望。无产者的一生中并非只有苦涩、折磨与侮辱（然而这可爱的无产者也够不幸的）。面对不公正的社会，不需要复仇，要用冷静的目光面对一切。愤怒是随着评审的结束油然而生的，绝不能以愤怒的情绪来左右思维和判断……"①

这个人物形象来自于法国内地极普通的乡村中类似杰法农和于勒·罗曼这样的农民子弟。即使功成名就，他们的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平民阶级一边，不屈膝为社会权贵效力。

当然，高师学生中也有出身富裕的，雷翁·勃鲁姆来自巴黎大资产阶级家庭，加克索特是洛林地区公证人的儿子，雅克列维奇是医生的儿子，热纳瓦和格拉克是卢瓦尔河畔批发商业家的子弟，但他们只占少数。总的来说，高师人家庭出身比较普通，有的甚至来自社会的底层，如夏尔·贝玑的母亲是奥尔良市做椅垫的工人，格埃诺的父亲是鞋匠，又如高师 17 岁的"头名状元"，20 岁便获得教师头衔的雅克·苏斯戴尔的继父是机械工。

---

① Jules Romain, *Les Hommes de bonne volonté*, Flammarion, 1932, t. III, *Les Amours enfantines*.

其实绝大多数学生来自新生的以小公务员、教师为核心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是法国第三共和国的主流，正因为如此，第三共和国通常被称做“教师的共和国”。对1927年至1933年七届高师人所作的调查显示：公务员子弟占百分之五十，中学教师子弟占三分之一，小学教师子弟占六分之一。从农村走向大学的过程通常由三代人来完成。农民出身的父亲当上了省城师范小学的教师之后便鼓励儿子成为高师人。对天资聪颖的孩子来说，这将意味着在父亲师范小学公房的汽灯下苦读数年的考验。

作家布里斯·帕兰在《穿针引线》①一书中说：“我父亲是小学教师，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儿子们必然要超越他。婚后不久，那时他们还没有孩子，一次他去妻子的叔叔家做客。叔叔住在巴黎五区，他家的后窗正对着高师。父亲指着高师对母亲说：‘我要送我的儿子们去那儿！’”

他的父亲如愿以偿。大儿子夏尔于1913年进高师，六年后轮到布里斯，他后来成为伽里玛出版社的顶梁柱。

可惜的是，当年能进中学读书的大多数学生是资产阶级子弟，极少数的平民子弟能享有这一殊荣。他们往往靠教育部的某个督察大员鼎力相助或天赐良机获得一份奖学金才得以跨进中学的大门。

夏尔·贝玑在《金钱》中叙述他在得到小学结业证书后，定向去师范学校读书，准备毕业后当一名小学教师。奥尔良市师范学校的校长设法为他谋到了市政府的奖学金，几乎揪着他的脖子把这个有天赋的学生拉回到了高中。“他得学拉丁文。”校长说。随着拉丁文在这个年轻人面前展开的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崭新的世界，充满了温暖和柔情。② 不寻常的经历对于出身贫寒的孩子来说必然会留下烙

---

① Brice Parain, *De fil en aiguille*, Gallimard, 1960, p. 67.

② Charles Péguy, *L'argent*, *Les Cahiers de la quinzaine*, 1913, rééd. Gallimard, 1960, p. 44.

印。正因为如此，这些知识分子才会对平民百姓由衷地颂扬，这绝非偶然。于勒·罗曼在《善意的人》中用几页的篇幅深情地描写小路易·巴斯蒂德的新鞋。他的父母作出了多少牺牲才使他得到这一礼物。格埃诺的《改变人生》(*Changer la vie*)中讲到圣诞节时，孩子收到了一份礼物——橘子，因为谁也舍不得吃这么美好的东西，几个星期后，放在橱柜上的橘子在众目睽睽下慢慢地发霉变质……

高师人总的政治倾向是左派的，这显然不是偶然的。19世纪时，高师受伏尔泰思想影响，后来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1867年，高师曾遭受当局作出的集体遣散的惩罚。高师一贯主张积极、理性。在第三共和国时，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共和制的中流砥柱。高师人还倾向社会主义，为争取民众的利益呐喊、呼叫。饶勒斯便是他们的代言人。这个南方出身的高师人热情洋溢、口才卓绝，他的演说曾风靡数不清的群众大会。他曾经当过众议院主席、宣传部长、左派领袖、政府顾问、共和国的精神领袖①。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被暗杀为止，他一直是法国社会党的象征，人们称他为“社会主义高师人”。

然而，如果没有幕后的一位杰出的人物——吕西安·埃尔，饶勒斯可能将不成其为饶勒斯，法国社会主义党派也将面目全非。

吕西安·埃尔：一个默默无闻的伟人

从1888年到1926年，好几代高师人一跨进图书馆的大门，便被坐在大厅右边深处的一张大胡桃木办公桌后的一双威严的眼睛所吸引，这双眼睛审视着一切——书和来访者。这就是吕西安·埃尔，图

① Albert Thilbaudet, *La République des professeurs*, Grasset, 1927, reed. Slatkine reprints, p. 33.

书馆管理员。他是阿尔萨斯人，身材特高，饱满的额头，秃顶，典型的高卢人下垂的胡须。

不等你有时间走到书架前，那个高大的身影已出现在你面前，关注而急迫地问：

“你要哪本书？你做什么课题？”

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必然是无所不知的。他的“知识之广博精深令人震惊，他的回答从不模棱两可”。

埃尔是小学教师的后代，1883 届高师人，哲学教师资格会考第二名。他本可以在大学或政界占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选择了高师图书馆低微的职务，只拿四千法郎的月薪。所做的工作是挪移布满灰尘的书籍，发订单，将新书分门别类。到了晚上，他常常灰头土脸像个通烟囱的工人。

这份不起眼的工作是他苦苦恳求来的，他的愿望是把高师图书馆建成一种无法取代的求知工具。

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人们说埃尔是社会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眼里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应该理解为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个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人是另有所图的。他的计划是在法国知识青年高度云集的高师争取其中的精英为唯一有价值的事业——受压迫的无产者的事业奋斗。

他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谁也无法知道，“埃尔的眉头一皱……会给第三共和国的命运带来怎样的后果”[1]。贝玑在《金钱》一书中这样写。

是埃尔说服饶勒斯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所有的同学都证实：在高师时，饶勒斯的言论是共和党派的，“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日后

---

① *L'argent*, p. 189.

的社会党人的倾向”[1]。当上议员后，饶勒斯还是共和党派的。准是埃尔，也只有他才能在1892年的一个晚上，当饶勒斯回高师图书馆的时候，成功地让他转变到社会主义的立场。高师人夏尔·安德勒(Charles Andler)是不可多得的见证人，他很熟悉他们俩。“埃尔把师兄饶勒斯叫到一边，两人整整谈了一夜……这是关键的一步。饶勒斯之所以跨出了这一步是因为埃尔说服了他。这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是埃尔招纳来的。必须说明的是，埃尔也愿意让大家知道这一点……”[2]埃尔一直是饶勒斯的参谋，社会党准备办报时，肯定是他提议命名为《人道报》。

一年后还是这个埃尔又把雷翁·勃鲁姆引入社会党大门。右派大资产阶级出身、一贯出入上流社会的勃鲁姆年轻时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自己曾讲述过在1893年4月阳光灿烂的一天，埃尔怎样游说他改变了信仰。

那一天，勃鲁姆在协和广场巧遇埃尔。两人决定同行一程。随之而起的即兴谈话改变了勃鲁姆的生命历程。他说：“要想知道我在遇到埃尔之前的精神状态，不妨想象一下当年克列孟梭[3]徘徊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境遇……所有负面的因素都齐备了……埃尔传授给我的是有组织的团体思想。他的一番开导犹如给一个病人

---

① Lucien Lévy-Bruhl, notice sur Jaurès dans *l'Annuaire des anciens élèvse de l'E. N. S.*, année 1916.

② Charles Andler, *La Vie de Lucien Herr*, Rieder, 1938, rééd. Maspéro, 1977, p. 122.

③ 克列孟梭(Clemenceau, 1841—1929)，医生，极左派政治家，当过众议员、参议员，第三共和国内政部长、总理。他的不妥协立场曾遭到左、右两派的攻击。——译者注

做白内障手术[1]。”

德雷弗斯[2]事件

然而，埃尔的辉煌时刻，他一生中的巅峰是几年后发生的德雷弗斯事件。

当德雷弗斯在热带酷热的南美小岛上饱受虫蚁、蜘蛛袭击的时候，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命运有一部分是在高师的图书馆里决定的。事件一开始，高师人孤军奋战，为德雷弗斯鸣冤申诉。埃尔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可靠的消息来源证实阿尔萨斯的上尉是无辜的，埃尔发起并领导了知识分子运动。1897 年 9 月，他每天骑自行车去巴黎郊外正在度假的雷翁家里为德雷弗斯伸张正义[3]。最关键的是，他说服了一开始持怀疑态度的饶勒斯投入拯救德雷弗斯的运动。“饶勒斯最大的荣耀是与埃尔站在了一起，懂得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法律必须平等对待所有的人。当一个无辜的人被送去做苦役，即使他出身豪门、家财万贯，也经历了无

---

① Louis Lévy, *Comment ils sont devenus socialistes*, éd. *Du Populaire*, p. 22, cité par Jean Lacouture dans sa biographie de Léon Blum.

② 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Alfred Dreyfus, 1859—1935)，阿尔萨斯地区犹太人出身的法国军官，在国防部参谋部任职，受指控为德国驻巴黎军事专员提供情报。证据是一份手写的笔迹颇似德雷弗斯的情报。1894 年他遭逮捕并被判处降职流放南美的法属圭亚那一个小岛。法国以人权联盟为中心掀起了声援德雷弗斯的运动，并与以法国民族联盟为核心的声讨德雷弗斯派展开了大激战。左拉发表了著名的檄文《我控诉》，舆论哗然。后来证明指控材料中有伪造的假证，1906 年撤销了对德雷弗斯的指控。1930 年为他彻底平反。——译者注

③ Léon Blum, *Souvenirs sur l'Affaire*, Gallimard, 1935, rééd. Coll. *Idée*, 1981, p. 37.

产者的命运，因为他被排斥在法律之外了。”[1]

高师的图书馆成了指挥部，埃尔召集校内外的友人，饶勒斯、克列孟梭都是中坚分子，他们议论时事，排列需要动员的知名人士的名单。在埃尔的支持下，高师的总监保尔·杜比写了两本书：《蓝色小本子[2]》(*Le Petit Bleu*)揭露毕加(Picquart)上校提供伪证的荒谬，《罗杰将军》(*Le General Roger*)则反驳了罗杰将军在雷恩市法庭上所作的证词[3]。

德雷弗斯事件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战斗。拉丁区里，高师是捍卫德雷弗斯的主力军。每当索邦大学传出有反德雷弗斯的集会时，高师的走廊里马上出现了战前的骚动。几分钟后，一支队伍便开出高师校门，直奔索邦大学。领头的一位身着披风，脚蹬大头靴，他是刚毕业的奥尔良人——夏尔·贝玑。他手举一根沉重的手杖就像挥舞着指挥棒，发出指令：

“甲组，堵住楼梯！乙组，包抄走廊！”

贝玑在索邦大学的混战中显示出来的激情绝不逊色于当年圣女贞德抵抗英国人的壮举。高师人扯着嗓子高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流行歌曲《一切都会好的》和《国际歌》，对方一派则声嘶力竭地高唱民族主义的歌曲[4]。每次交战总是以全线人马的棍棒拼打而告终。

多亏了左拉、饶勒斯和埃尔，捍卫德雷弗斯的阵营最终大获全胜。

四十多年中，埃尔的朋友们期待他写一部关于黑格尔的巨著。他从未动笔，他的作品便是高师的图书馆。他不懈的努力把这个知

---

① *La vie de Lucien Herr*, pp. 148～149.

② *Le Petit Bleu* 是一本蓝色的记事簿，上面有所谓德雷弗斯提供的情报，是指控他的主要证据。——译者注

③ Mme Fernand Maurette, in *Paul Dupuy*, Brodard et Taupin, 1951, p. 79.

④ Jérôme et Jean Tharaud, *Notre cher Péguy*, Plon, 1926, p. 163.

识的宝库办得尽善尽美。尼赞在饶勒斯遗体运往先贤祠的仪式上谈到埃尔，“他驮着无形的没有写成的巨著的重负”[1]。

高师人对埃尔的评价泾渭分明：一派是他的追随者，另一派是他的反对者。支持者有热纳瓦、德阿、普雷弗、吉伊曼、尼赞、冈纪兰姆（他称埃尔为“阁楼里的王子”）。反对派巴西亚克其实不认识埃尔，称他为“迟钝的、一事无成却有势力影响的人”。也有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格埃诺这个工人的儿子出人意料地对高师人昵称为“埃尔教授”的影响无动于衷。

格埃诺16岁便开始做工，靠勤奋学习通过了中学生会考，进入了高师。但他和埃尔的精神社会主义理论却格格不入。他说：“只要埃尔一对我说起工人的生活，我便拘束得说不出话来。我弄不懂他怎么会比我更清楚工人的生活，而且说起来那么自信。我羡慕那些可以将这种生活用一种制度、几种倡议归纳起来的人，而我及我的父兄们却艰难得不知何去何从。”[2]

高师人中还有先赞成、后反对的贝玑。在德雷弗斯事件中，他是埃尔忠实的中尉，后来他指责埃尔将高师变成了“德国党”[3]的发源地！

埃尔到底是一个伟人，还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庸人？是一个世俗的圣人，还是一个思竭才尽的知识分子？评说自有公论。即使他死后，他的精神依然滞留在图书馆里。直到1933年，高师人走进图书馆时，仍能见到他的影子。但那是他的半身青铜雕像，就安放在当年他坐的位置——大厅右面的角落里，胡桃木办公桌后面。他那深邃的目光注视着一代又一代的高师后来人。

---

① Paul Nizan, *La conspiration*, Gallimard, 1938, rééd. *Folio*, 1973, p. 48.

② Jean Guéhenno, *Changer la vie*, p. 195.

③ 德国党指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的共产党。——译者注

幻想破灭

法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第三共和国时的高师涌出了如此学识渊博、文采超群的政治家。写作是他们的第二天性。饶勒斯竞选失败后，隐居在家，便乘机撰写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的历史。从政之前，雷翁是文学、戏剧评论家，发表过有关司汤达的散文，他的另一部有关婚姻的散文则成了丑闻。赫里欧一生中著书甚多，题材之广包括雷佳米叶夫人①、贝多芬、希腊史、古代东方史、高师历史、诺曼底地区历史……

才学出众的政治家是否就是杰出的政治家？这可是另当别论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高师人的理想主义曾经两次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第一次是1924年"左派联盟"(Cartel des Gauches)的经验。竞选中胜出的"左派联盟"由三位高师人领导，他们是赫里欧、勃鲁姆和潘勒韦(Painlevé)。

当时的法国社会以教师为主流，他们选出他们之中的精英来治理国家。可是这么多高智商的知识分子也没能挽回"左派联盟"惨遭失败的结局。

官员家庭出身的赫里欧是里昂市屡选屡胜的老牌市长，他是共和国好学生的典范。他实行的政策是保证大学的高质量，然而套用在政治上则是重大的失误。历史学家让纳内(Jeanneney)指出：赫里

---

① 雷佳米叶夫人(Madame Récamier，1777—1849)，法国著名的美人，她的沙龙里汇集了拿破仑的反对者。她的著名的肖像出自画家吉加(Gérard)之手。——译者注

欧不止一次地成为他“盲目相信良好意图、满腔热情和雄辩口才必然具有强大力量的理论的牺牲品”[①]。在对外政策上，即兴发挥和理想主义导致了颇有争议的评价。赫里欧在国际上“宣称和平”，这一政策必然导致与欧洲各国交往中的一种崭新的姿态，可是他在与狡猾的英国人的谈判中却丧失了许多立场。

更糟糕的是在对内政策上，“左派联盟”的经验在财政问题上一筹莫展。许多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他在理财方面一窍不通，单纯的文人在数据面前束手无策。比较宽容的历史学家则指出法国人的双重矛盾性——他们的心向着左派，钱包却向着右派——造成了“左派联盟”不可避免的失败。

12 年后的 1936 年，“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又把雷翁・勃鲁姆推上了政权的巅峰。同样的错误，同样的命运。“教师的共和国”又一次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由此证明，在政治上，只有智慧——赫里欧与勃鲁姆都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是不够的……

---

① Jean-Noël Jeanneney, *Leçon d'histoire pour une gauche au pouvoir*, la faillite du Cartel, Seuil, 1977, p. 51.

1924：出类拔萃的一届

从前，有三个“小伙伴”：萨特、阿隆、尼赞。三个神童，三个预科班的模范生，三人同时于 1924 年通过高师的入学考试。

高师同届校友集体照上，他们三人坐在第一排，都是一副踌躇满志的神情。面带怒气的尼赞打着领结，穿着一双英国皮鞋，他是唯一不穿外套的。与这个纨绔子弟相比，萨特与阿隆像两个不耐烦的评审团教师。穿着深色上衣的阿隆脚蹬两个护腿套，与其他学生精神抖擞的样子相比，他耸肩缩颈，一副厌倦腻烦却傲气凌人的神态。萨特显得超凡脱俗，高才生一脸的严肃，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其貌不扬的短处，更知道自己智力超人的长处。在他身上有一种含糊的、多元的还没有得到控制的能量在沸腾着。他们三人被其他同学众星捧月似的围在中间，周围是等级稍低的星星点点地排列着：乔治·冈纪兰姆，未来的科学哲学家；丹尼尔·拉加什（Daniel Lagache），未来的临床心理治疗创始人……

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届不同凡响的高师学生在入学考试中被认为哲学水平低弱。主考人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在最优秀的考卷中也很少看到哲学的人格……诚然，在这样的考试中我们并不苛求思想意识还未完全形成的学生有独创性，我们只是希望对于像今年‘什么是

智慧?'这样平常的考题,能有更多的应试者勇于展示个人的思想成果。"[①]然而,就是这届学生在法国的知识界揭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论争。

"尼特"和"萨赞"

入校时,萨特与尼赞结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好友,在教授们的眼里,对这两个学生区别不出来。连他们眼睛的斜视都是互补的,萨特的一只眼向外斜视,尼赞则向内斜视。

他们俩是 1916 年相识的。尼赞插班到亨利四世中学读初二。少年的萨特与尼赞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尼赞由于家庭的悲剧,成熟得较早。他父亲是铁路局的工程师,由于一桩不明不白的仿造炮弹的事件蒙受耻辱,降职受罚。同学们对焦虑不安的尼赞又怕又敬。萨特回忆说:"尼赞嘴里说出来的不是大道理,而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客观现实。这让我们感到局促不安,因为我们不习惯听到这样的言辞。"[②]尼赞对萨特的吸引是随着暑假的开始而中止的。1916 年夏天,萨特不得不离开巴黎,他母亲改嫁,萨特只能随她流放到大西洋边的拉罗谢尔城(La Rochelle),一住便是五年。直到 1921 年,他重返巴黎,回到亨利四世中学读高二时才又见到尼赞。这时的尼赞已确定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志向,他已不再是"畏寒的小鸡"了。尼赞是个优等生,喜好写作,技痒难捺……渐渐地在他身上自然而然地养成了纨绔子弟的习气。他同时也是预科班学生的模式。尼赞严峻的脸

① Concours 1924:*Rapport sur le déroulement des épreuves*, Archives nationales, AJ 61/171.

② Jean-Paul Sartre, *Les Mots*, Gallimard, 1964, *Folio*, 1990, pp. 185~186.

庞上常年戴着一副圆形的眼镜，双眼透着讥讽、冷酷的愤恨。未来的《密谋》的作者身上流露出刻意形成的神秘感和深知自己天赋的自信心。

刚从拉罗谢尔回来的萨特满脑子里全是青少年特有的鬼神的荒诞和历险，面对尼赞，他惊呆了。尼赞武断的建议征服了他，萨特从此沉醉于阅读普鲁斯特、季洛杜、保罗·莫朗的作品。从那时起，萨特定下了奋斗目标："不是以作家的身份，而是以博学文人的身份，进入文学行列。"①

尼赞的野心更是惊心动魄，他向萨特提议成为超人。萨特热烈响应。中学考试一结束，两人便于 1922 年同时进入路易大帝高中的预科班。初进学校，尼赞便写下了：

> 我们期待的时刻来到了，
> 否定一切希望的时刻，
> 否定过去的一切，一切的记忆
> 好比脱胎换骨的动物。

在名牌中学里，这对不离不散的"超人"很快便从云集在这儿的全国最优秀的学生中脱颖而出。他们的同学回忆说："和他俩在一起，我们连把话说完的时间都没有，他们的理解力太快了。"②当其他同学疲于应付考试埋头温习功课时，他们俩则以青年作家的姿态酝酿着新的作品。

1924 年冬，进入高师后几个月，他们在《无题杂志》(*Revue Sans Titre*)上发表了他们最得意的文学性散文。萨特在第一本比较笨拙

---

① Simone de Beauvoir, *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 Gallimard, 1981, p. 167.

② Entretien avec René Fredet, septembre 1992.

的小说《耶稣—猫头鹰，外省的教师》(*Jésus La chouette professeur de province*)中宣泄拉罗谢尔留给他的不愉快的回忆。书中对资产阶级的怨恨及对人物的描写与后来出版的《恶心》的写作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罗蓓(Laubré)太太……是一种绝无仅有的怪现象。她肥硕敦实、庞大无比，纯粹一个病妇躯体，却长着一张干瘪、棱角暴突的马脸。犹如东方传说中的神灵将一个又高又瘦的英国人的头颅错安在一个又肥又胖的德国妇人的躯干上。"[1]

才华更胜一筹的尼赞写的是《悲歌》(*Complainte*)，在挑衅性的讽刺后面，他所流露的是对死亡深深的忧虑。

在预科班里，两鬓苍白的学术大师们培养了学生们飘飘然的优越感，同时也敦促他们刻苦奋斗。然而年轻的学子们在课余之时，总是按捺不住游览巴黎的急切之心。

萨特在预科班里写的《播种与潜水服》(*La Semence et le Scaphandre*)一书讲道："……共同的理想吸引着我们，共同的喜悦激励着我们，我们俩行动一致，我们都是自豪、大胆、藐视他人的狂人。……黄烟丝的香烟不离口，他满嘴呛着荣耀的气味。巴黎的金秋，空气清新、香气袭人，让他陶醉在胜利的辉煌之中。一阵说不清的战栗让他美妙地想到了女人……年轻美貌的女人，我们能够诱惑甚至可以征服的女人。"

进入高师后，他们迷惑地发现这个传统的人道主义家园里笼罩着绝对的自由，也没有纪律可言。

尼赞一点儿也不为这"路易·菲利普[2]时代大型方正的建筑"而惊叹，相反他觉得这儿弥漫着"一种司空见惯的冷峻气息"[3]。萨特则

---

① Jean-Paul Sartre, *Ecrits de jeunesse*, Gallimard, 1990, p. 67.

② 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译者注

③ Paul Nizan, *La Conspiration*, Gallimard, 1938, *Folio*, 1990, p. 28.

异常兴奋，他充分意识到自己已成为青年萨特，就像人们通常称呼的青年柏辽兹和青年歌德那样。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十分清楚高师期间是他人生最幸福的时光，他是“千百个苏格拉底”①。

在他与尼赞合用的学习室里，萨特挂了两幅画像——让·季洛杜和詹姆斯·乔伊斯。两位同窗好友共同合作写哲学、文学散文。萨特工作相当勤奋，他一心想成为大作家。哲学散文对他来说是“最佳的写作方式”。由此产生的《亚美尼亚人》是一篇论文形式的文稿，文中掺入了各种古典文化的思维。作品并不成功，萨特没有因为试笔不成而气馁。1926 年他在给当时的女友——住在图卢兹的西蒙娜·乔丽维(Simone Jallivet)——的信中这样描写自己：“我的个性中有许多非正统的东西……荣耀吸引着我，因为我想远远地超出那些我所藐视的人，而最主要的是我雄心勃勃地想创作。我必须有所建树，随便什么，但是要有所建树……看见眼前有一张白纸，我便忍不住要在上面写些什么。”②萨特是一个在感情上不善克制、既胆怯又柔情的傻乎乎的年轻人。西蒙娜·德·波伏娃还没有在他生活中出现，他尚未决定他们“跨阶层的结合”③。萨特写给乔丽维的书信中不乏感人的幼稚的爱慕之词。这位令同学们钦佩的单纯、幽默的天才在他倾心的姑娘面前只是个爱推理的、笨拙的毛头小伙子。

他当时的心思可没放在对姑娘献殷勤上。在高师食堂宽容、喧闹的气氛中，他更如鱼得水。政见不同的学生分桌而坐，形成两军对垒之势，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们高唱《国际歌》，基督教派的学生们齐吼《以圣心的名义拯救罗马与法国》(*Sauvez Rome et la France au non du Sacré-Coeur*)。萨特扮演小丑的角色，开一些下流的玩笑。

---

① Jean-Paul Sartre, *Les Carnets de la drôle de guerre*, Gallimard, 1983, pp. 96～97.

② Jean-Paul Sartre, *Lettres au Castor*, Gallimard, 1983, p. 9.

③ 萨特是平民出身，德·波伏娃是贵族出身。——译者注

有一天,他兴奋至极,居然站起身来,推开盘碟,把他雄性器官摆上桌面。

时而与尼赞手挽手,时而伙同一帮小伙伴,萨特喜欢在夜间外出,长时间地散步或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待上几个小时。咖啡馆里有五个以学校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妓女。每天与高师学生高文化层次的接触把她们也修炼得雅致了。其中最年长的一位说:“学生一届届地走,高师和我则牢守阵地。”①

半夜时分,回到学校,萨特和尼赞有时会躲在楼梯上用水弹砸那些身着燕尾服出席上流社会晚宴后迟归的学生,这两个对资产阶级陈规陋习深恶痛绝的哲学家对那些期望有一天成为“巴黎十六区(富人区)的规矩人”②的同学是丝毫不会放过的。

萨特还是一个讲义气的不可多得的伙伴。为了帮同学拉加什物色一件年终大会穿的外衣,他陪他跑遍了城区的服装店。1925 年 3 月,高师学生谋划讽刺任职于“国际联盟”的前辈同学,排演了“朗松的灾难”。说的是高师校长朗松试图把巴西从独裁者蒂梅奥·达那奥斯(Timeo Danaos)的铁腕之中拯救出来,却迷上了独裁者美艳、丰满的夫人。萨特扮演朗松,拉加什扮演夫人。演出大获成功,尤其是三位杰出的前高师学生观看了演出,他们是“左翼联盟”的参议院主席赫里欧、众议院主席潘勒韦和教育部长弗朗索瓦·阿尔贝。

萨特的生活仿佛有“上苍福佑”,他在高师找到了完全适合他自由创造与写作的理想王国。

尼赞则相反,在这个“所谓典范,号称高等”③的学校里,他独自一

---

① Henri Guillemin, *Parcours*, Seuil, 1989, p. 23.

② Paul Nizan, *Aden Arabie*, p. 56.

③ Paul Nizan, lettre inédite *à* Hélène Fauvel du 27 mai 1924, citée par Jacqueline Leiner, op. cit., p. 26.

人纠缠在烦恼与对死亡的畏惧之中。“我20岁时容不得任何人说这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由于无法摆脱烦恼和恐惧的困扰，他只能沉溺于驱忧妙法——酒精之中。醉了便倒在街头过夜，竭力避开伙伴们的喧闹欢笑。尼赞的“忧虑是确实存在的”，萨特作证说，可是面对好朋友的不幸，他一筹莫展。

长期受到困扰的尼赞需要找到一种理念来宣泄他厌世的情绪，他以从政来摆脱意志的消沉。

1925年秋，他去意大利的托斯卡诺(Toscane)旅游时，与法西斯分子有过接触。美丽的城市吸引了他，他在记事本上写道：“我见到了凌晨清新阳光下的比萨。惊喜中我进了城，酣睡着的城市尚未醒来，这是一种近似死亡的酣睡。晨霭中，街道交错的尽头，显露出教堂的圆顶、圣洗礼堂等等建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发现砖墙会呈现出肤色般耀目的光彩。”[①]与他同行的高师人乔治・弗德曼(Georges Friedmann)却不受迷惑，他认为：“法西斯并不是仅仅得到意大利资产阶级支持的一小部分武装暴力独裁。它是一种蛊惑人心的煽动，会带动很大一批民众，摧毁无产者和知识分子的抵抗力量。”[②]

尼赞对此并不觉得可怕，他对法西斯的军服和宣传画的暴力美很敏感(他也为涂在墙上的一帧列宁的宣传画而怦然心动)。从意大利一回来，他便加入了法国的法西斯党。一贯反对军国主义的尼赞趾高气扬地穿上了耀眼的党服。一位高师人回忆说：“一天我们正在路易大帝中学预科班学习，进来了一位有着议员风度的老校友。他的穿着特别进究，一身深蓝的制服，戴着三色的帽徽。有人告诉我这

---

① Paul Nizan, carnet inédit cité par Pascal Ory, *Nizan, destin d'un révolté*, Ramsay, 1980, p. 51.

② Georges-Philippe Friedmann, *Notes Prises en Toscane fasciste*, *Europe*, 1925, pp. 476～489.

是尼赞。然而,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却找不到一丝预科班或高师人勤奋学习的痕迹。我们的老师则总能认出旧日的学生,他笑眯眯地建议尼赞在我们中找个位子坐下。他冷冰冰地回答'为什么不呢?'随后便在我旁边的空座上坐了下来,好像这就是那天早上他来校的目的。"①尼赞的法西斯主义经历为时不长,到 1926 年春便结束了。这一段经历充分体现了这个年轻人极端主义的个性。

1924 年 12 月,尼赞在高师舞会上结识了一个美丽可爱的女中学生安妮叶特·阿乐芳(Henriette Halphen)。于是,每个周日的早上,高师的纨绔子弟约漂亮的女学生去巴黎散步,内心充满憧憬,思绪缥缈万千。尽管萨特与阿隆经常陪伴这对恋人,可尼赞与同学们的距离越拉越远。女中学生喜欢邀请这几个前程远大、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去妈妈家饮下午茶。舒适的客厅里,当萨特扮小丑即兴演奏钢琴、高声歌唱之时,阿隆正锲而不舍地追求安妮叶特同样美如天仙的表妹。年轻的尼赞,尽管在上流社会中得心应手,却还是无法解除忧愁的困扰。远游也门的亚丁城是对尼赞身心有益的一次流放。

亚 丁

一天,同届学友让-阿尔贝·贝德(Jean-Albert Bédé)建议尼赞给一个住在也门亚丁的英国经销商的儿女当家庭教师。尼赞看到了一个跳出高师、远离都市的绝好时机。与萨特相反的是,哲学和文学已不足以激起尼赞的兴趣。1926 年 7 月 14 日,他决定:"集体行动的年龄已经过了。"这一突如其来的契机使他可以一走了之,结束少年

---

① Maurice Merleau-Ponty, *Signes*, Gallimard, 1960, pp. 35～36.

生活。

1926年8月，他离开法国去英国与雇主会面。一开始，伦敦海德公园里漫步的美丽姑娘和俱乐部里打高尔夫球的矫健女子令他惊喜；而几个星期后，劳工部前排成长队的失业工人和酒醉茫然的年轻妓女等社会丑态令他厌恶。[①]

11月1日他乘船来到开罗，很快他就迷上了英国富人在埃及过的舒适奢侈的生活。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写道："今天早上，我与卡拉克在体育俱乐部吃早餐，吉卜林[②]的童话世界在此成了现实。印度、世界和欧洲在这里混为一体……一位最奢侈的年轻英国姑娘将一辆六座的豪华美国轿车交给我们开着玩。"年轻的高师人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相处得极其融洽。他扬扬自得成为"人道主义共济会"[③]的一员、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他们属于同一类有学识的青年，吟诵拉丁文的诗句和柏拉图的格言如同说一句口令那么轻而易举。

好景不常，踏上也门的国土，到了亚丁，尼赞又感到了烦恼与不安，他写道："这儿有许多蠢人让我取乐……如果余乐姆街的那帮人在这儿的话，我们可以在暗中筹划，干很多大事。亚丁将持续不断地生出事端，骗局将层出不穷。"但是，现实生活单调不堪，重复无聊的琐事已唤不起他丝毫的激情。

这个未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总是走极端，他一度想成为像他

---

① Paul Nizan, *Correspondance d'Aden* éditée par Jean-Jacques Brochier, *Paul Nizan intellectuel communiste* 1, François Maspero, 1967, rééd. *Petite collection Maspero*, 1979, pp. 85～113.

② 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译者注

③ 共济会(Franc-maçonnerie, freemasonry)，秘密协会，遍布世界各国，尤其是英、法、德、意、美。共济会的信条是"寻找真理、扶正行善，弘扬普遍的伦理、科学、艺术，推行一切德行"。

的英国雇主一样富有却不顾廉耻的经销商。他在1927年2月的一封信中，半挑衅半认真地写道："我们会向东方倾销像海洋一般多的合成石油。"

由于思念故乡，牵挂女友，怀念伙伴们，尼赞放弃了在酷热的亚丁过富裕生活的幻想。

1927年，他有机会去也门内地旅游，发现当地的豪门——苏丹在英国人的协助下大肆剥削本土人后，他立即选择了自己的立场。"我将蛮横无理地视权贵为贱人。"[1]从那时起他已开始倒数着回法国的日子了。

1927年4月，尼赞回到巴黎。对殖民主义者的谎言义愤填膺。他决定筹办一桩完美的婚礼，尽快攀上文学界的金字塔。

林德伯格[2]

1927年3月，当尼赞在亚丁度日如年地等待回归故里的时候，萨特正兴致勃勃地投入一年一度的高师大联欢中。他与阿兰的学生们一起写了一部反军事法令的戏剧。众议院刚通过了一道军事法令，其中第四条规定：一旦发起全民动员，"为了国家安全的利益，在人才运用方面，要根据人才资源进行全盘的运筹"。对大多数高师人来说，这项未来的法令将限制思想的自由，是不可容忍的。

晚上演出时，一个穿着上尉军服的学生走上舞台，合着《樱桃时

---

① Carte postale cité par Pascal, op. *cit.*, p. 279.

② 夏尔·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 1902—1974)，美国飞行员，1927年5月20—21日驾驶单翼飞机第一次横穿大西洋直达法国。——译者注

节》[①]的音乐，唱道：

当天赐良机战争来临，
上尉、众议员、殖民主、参议员
人人高兴得像过节。
“勒贝尔”式步枪胜利冲昏头脑，
“斯托克”迫击炮心中充满阳光。
当天赐良机战争来临，
十字架越多，幸福越多。

观众中一部分人兴高采烈，一部分人怒气冲天，场内一片喧哗，晚会在一片混乱中闭幕。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1925 届的一个共产党派学生让·布阿(Jean Bruhat)发起了一份请愿书反对这道军事法令，请愿书发表在 1927 年 4 月 15 日的《欧洲》杂志上，签名者中有多名前高师人：普雷弗、罗曼·罗兰等。54 名在校生也签了名，阿隆、卡瓦耶斯、吉伊曼和萨特也名列其中，此举对高师校长朗松来说实属过分，他一一把他们召唤到学校纪律委员会。萨特由于部分参与并编写了反军事法令的歌曲，被召到校长办公室。刚从也门回到法国的尼赞，执意要陪同萨特前往。校长一见十分惊讶地问：“可是，尼赞先生，晚会那天您并不在巴黎呀。”“校长先生，请原谅我出言不逊。我当时确实不在巴黎，可是我给萨特的信中用过‘狗屎’一词。我在杂志上看到了它，这或许用的就是我的词。”

高师人也有不带政治色彩的娱乐。

1927 年 5 月 21 日，美国飞行员林德伯格驾驶单翼飞机“圣路易斯精神”(Spirit of saint Louis)号降落在布尔歇(Bourget)机场。成

① *Le Temps des Cerises*，法国巴黎公社时期的流行歌曲。

为第一个从空中连接新旧世界的飞行员。消息传出，人们情绪激昂。萨特与尼赞等人出了个主意，搞一出绝妙的恶作剧。他们给所有的晚报打了电话，称“鉴于林德伯格的壮举，高师纪律委员会一致同意授予他荣誉学员的称号”①。记者们全都上当了，不假思索便依葫芦画瓢地发布了消息。唯有《作品》(*L'Oeuvre*)杂志社嗅出其中有诈，杂志社编辑部里有好几个高师人。消息见报后，高师领导心急如焚地声明辟谣，忙得晕头转向。事情原本可以到此结束，可是萨特与伙伴们兴致未尽，又别出心裁地继续发挥。他们在 5 月 25 日早上的《小巴黎人报》(*Le Petit Parisen*)上发出一条短讯：“林德伯格将于今天上午 9 时 30 分到高师。”结果如何？“9 时 30 分，高师门前聚集了五百多个观望的人。”萨特给女友乔丽维的信中这样写道。

没有比这种大功告成的场面更能令高师人心花怒放的了。1926 届的学生保尔·贝尼苏(Paul Bénichou)回忆道：“有人跑来叫醒我说：‘快来看吧，校门口黑压压的人群，都来这儿看给林德伯格颁发证书呐。’我赶快下楼，学生们还穿着睡衣，兴奋地聚在学校大门前。”②尽管高师的教导员、校长反复向人群说明这是学生们胡闹的结果，可那五百多人根本不听，齐声喊着飞行员的名字。贝尼苏说：“我们也无可奈何了。随后，我们爬上屋顶，向人群泼水，可是他们还是不走。”萨特和他的朋友们一时也没了主意，可是很快他们又生出一计，“既然他们那么想看发证书，我们就发一个给他们看。”阿尔芒·贝哈(Armand Bérard)，一个金发的高个小伙子被指定扮演林德伯格。他的道具是一顶与飞行员的帽子相似的毡帽。乔治·吕西安尼(Georges Luciani)有一顶圆顶帽，可以装扮成官员。快速装扮完毕，两人从学校后门溜走，招了辆出租车，直奔高师前门。贝尼苏说：“……人

---

① Jean-Paul Sartre, *Lettres au Castor*, p. 35.

② Entretien avec Paul Bénichou, octobre 1992.

群越来越密集，当我们还在那儿装模作样的时候，来了一辆出租车。”萨特立刻招呼穿睡衣的高师人欢呼起来。人们狂热地欢迎飞行员的到来，“飞行员”谦和地向人群示意。一位老先生激动地上前吻了假飞行员的手！高师最成功的恶作剧以发假证书而告终。高师人笑得前仰后合，连《马赛曲》也唱不成调。

阿 隆

1927年春，尼赞从亚丁回来，对高师开始生疏起来。时过境迁，尽管他还是萨特的好友，但从前形影不离的朋友也开始分道扬镳了。与此同时，尼赞逐渐接近“小伙伴”中较疏远的阿隆。阿隆和他一样是哲学系的。

阿隆生于1905年，从小在巴黎西郊凡尔赛镇资产阶级的舒适环境中养尊处优。在他父母花园住宅里自家的网球场上，他学会了打网球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他父亲上过大学，由于罗马法律这门课不及格而没有通过教师资格会考，因而抱憾终生。年轻的阿隆发誓要在班里名列前茅，一直到中学毕业，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1921年，他开始学习哲学。从此在他的生活中夜晚也充满了光明，他的志向就这么定了，要尝试“痛苦思考的乐趣”[①]。1922年，他进了孔多塞(Condorcet)中学的预科班。整整两年中，学校的回廊上回荡着他与两个同窗好友雅克・欧尔贡(Jacques Heurgon)和丹尼尔・拉加什的热烈讨论。62年后，他们的同学回忆说：“他们三人都出身富裕的批发商家庭，穿着十分讲究。他们彼此都很清楚，他们不

---

① Raymond Aron, *Mémoires*, Julliard, 1983, rééd. Presse Pocket, 1990, p. 25.

同于其他同学，是要做一番大事业的。”①

1924 年考高师，他才得了第十四名，这下对他打击不小。他发誓要雪洗耻辱。四年后，在最具权威性的哲学教师资格会考中他得了第一名。

在等待荣誉来临之前，阿隆深深地为高师感到惊喜。一进校，他便结识了萨特和尼赞，并和他们一起在圣安娜(Sainte-Anne)医院听杜马(Dumas)教授的心理病理学讲座。阿隆是走读生，和同学们接触不多，很少在高师食堂用餐。“这个戴莱姆修道院……这个没有教授，没有大纲，没有时间表，没有约束，没有监督的学校”②给他提供了彻底的自由。这个优秀的学生读浪漫小说，打网球，优哉游哉，用两年的时间懒懒散散地拿了个学士学位。

萨特对政治不感兴趣。与他相反，阿隆是个左派。1926 年，他加入了大学生社会党，甚至参加了几次游行活动。

从表面上看，生活坎坷的尼赞与一帆风顺的阿隆似乎走不到一起，可两个年轻人却非常要好。

1927 年夏，尼赞请他的小伙伴阿隆安排并出席他家与未婚妻家父母的见面仪式。尼赞出身一个外省的小资产阶级家庭，而他女友则出身巴黎犹太资产阶级世家。由于阿隆对上层社会的繁文缛节了如指掌，在这种微妙的场合，他“表现得异常出色，安排得体，八面玲珑”。成为尼赞太太的美丽的安妮叶特日后提起他仍赞不绝口。③

几个月后，尼赞请阿隆和萨特当他的证婚人，他们在高师附近的第五区政府举行了婚礼。

---

① Jean Maugué, *Les Dents agacées*, Buchet-Chastel, 1982, p. 40.

② Pierre Bertaux, *Amitiés normaliennes*, in *Commentaire*, n° 28—29, 1985, p. 14.

③ Henriette Nizan, *Libres Mémoires*, Robert Laffont, 1989, p. 124.

然而,互相的信任和尊重还是没能把他们的友谊维持到1928年夏天以后,那时阿隆离开了高师。

1928年初,萨特也越来越喜欢与阿隆谈论哲学。阿隆对萨特"下笔之快捷,联想之丰富,思维之敏锐"感到惊讶。两人漫长的散步是他们密切交流的机会。萨特思如泉涌,一个接一个的想法让阿隆招架不住。萨特不是著书,便是写哲学小品,他幻想与黑格尔、斯宾诺莎、司汤达等伟人齐肩。长期与这些伟人的接触通常会使高师人具备带点儿自我嘲讽的谦卑。

一有机会,萨特便在他周围初具规模的哲学圈子中小试身手。阿隆这样叙述道:"有人向萨特提出有关尼采的问题……[①]从严格的技术风格上说来,应该把他看做哲学家还是文学家?萨特选择第一种结论。然后我也说不清他话锋怎么一转,开始论述起自在和自为。物质、树木、桌子不意味着什么,它们在这儿、在那儿是没有理由、没有目标的。而意识每时每刻都有意义,让盲目的、大量的事物有了意义。要否认这一点是不行的,没有意识这些事物便不再存在。"

由于太相信自己的天才或者太目空一切,萨特在1928年教师资格会考笔试中的尽兴发挥没有赢得评委会的好评,他们的结论是不容争议的。"水族馆"——高师大厅贴出的入选者名单中没有萨特。他的"小伙伴"阿隆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名单后,气得大吼一声,狠狠地把一顶昂贵的水獭皮帽子扔在地上,踩在脚下。"啊!笨蛋!蠢货!他们把萨特淘汰了。"阿隆本人名列榜首。萨特第二年也得了第一名。

阿隆比萨特更热衷于哲学对话,但是这种哲学对话并没有让两个未来的思想家成为亲密的挚友。

---

① *Memoires*, p. 47.

大公爵、欧也纳和莫帝梅

在高师时，拜读了让·科克托[1]的小说《波托马克》后，萨特和尼赞从小说中为他们三个"小伙伴"各自挑选了一个人物，虚构出了一个神话故事。后来出了一本《波托马克》滑稽图画小书，描述书中主人公"欧也纳"——一些半人半兽的怪物的历险记。这些形象狰狞的怪物在一群吸血女人的帮助下，在一艘邮轮上攻击并生吞了"莫帝梅"夫妇。[2] 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丑化外出度假的资产阶级。萨特和尼赞十分欣赏这个故事，他俩扮演"欧也纳"的角色，尼赞还自封为"大公爵"，严谨、不易接近的布尔乔亚"小伙伴"阿隆被一致认为是"莫帝梅"。

当年这个不惹人注意的小插曲，在数年后却有了令人惊讶的现实意义。扮演"欧也纳"的萨特，在教师资格会考以后，被分配到小城市的中学教授哲学。他一直梦想的荣耀还没有降临到这位外省的"苏格拉底"身上，他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才凭着预科班学生惯有的高傲姿态，以"完全的知识分子"身份出现在各个思想领域。

自称"大公爵"的尼赞是个时髦的作家，以艺术家自封，在摩登的杂志上发表文章。20 世纪 30 年代初，信仰共产主义的尼赞写了两篇檄文与高师的学院派哲学"清算旧账"。一篇题为《亚丁阿拉伯》(*Aden Arabie*)，另一篇是《看家狗》(*Les chiens de garde*)。"在一个被

---

① 让·科克托(Jean Cocteau，1889—1963)，多才多艺，从事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绘画的创作。《波托马克》(*Le Potomak*)是他早期的作品。

② Jean Cocteau，*Le Potomak*，1924，rééd. Stock，1950，p. 68.

武断地分割成主人与仆人的世界里，文人是没有一席之地的……剩下的唯一选择是：要么做资产阶级的同路人，要么做无产阶级的同路人。哲学家必须公开声明立场。"[1]作为"莫帝梅"的阿隆，网球高手和哲学家，他拒绝接受这种模式，很反感他的"小伙伴"对索邦大学哲学系的仇视。为什么哲学家必须是革命家呢？1930 年，他应聘去科隆大学当法语助教。这个对政治充满热忱的左派选民、犹太人知识青年一反家里世代从商的惯例，走上了文人之途。他憧憬历史将很快地、不可避免地进入社会主义。这个理想没能经得住接踵而来的现实的碰撞。在纳粹势力日益高涨的德国，阿隆决定引退，给予自己精神力量来客观地理解现实社会。既不说教，也不盲从，他要了解人类历史的条件。

一艘开往越南的船

1929 年夏，离尼赞 1940 年 5 月 23 日倒在战场上的日子还相距甚远，阿隆当年曾经如此渴望的共产主义革命在噩梦中结束。法国的电视屏幕上以及巴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同样充满着丑恶的图像。

两个早年参加过 1968 年 5 月运动的年轻人安德烈 • 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和贝纳德 • 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找到了高师 1924 届两位不同凡响的人物：萨特和阿隆。请他们去总统府，以人道主义去说服主张专家治国的德斯坦总统。

这两个老同学，一个终生投入革命事业，一个是自由主义怀疑

① Paul Nizan, *Les Chiens de garde*, Rieder, 1932, pp. 239～240.

派，此时他俩都已步入暮年，身心疲惫。在 1968 年 6 月 20 日举行的“一艘开往越南的船”新闻发布会上，在他们一个星期内的第二次见面之际，阿隆与萨特终于在多年后第一次握手。这一情景立即被摄影师摄入镜头，发到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当年的“小伙伴”握手于晚年。两个老斗士外貌的差异之大是有目共睹的。74 岁的萨特穿着羊毛上衣和“波罗”衫，由于饮酒过度，脸上明显地带着倦容，眼睛也失明了，是临近死亡的知识界的神话人物。与他相比，旁边同辈的阿隆则显得年轻、有精神，这当然得益于这位资产阶级思想大师有规律的生活习性。然而，对于这两个意识形态冷战的幸存者来说，这最后一次会面有什么意义？几个月后，两人中最负盛名的一位去世了。早年维系他们“小伙伴”的那种感情早已荡然无存。



哦，那些好日子

（一个爱尔兰人在巴黎——萨缪尔·贝克特）

1929年冬，一个严寒的周日早上，30个壮小伙子在球场上争夺椭圆形的橄榄球。身着紫色球衣的高师球队正挑战郊区的一支球队。

高师的队员被对方强大的优势压倒，比分悬殊。突然，中场窜出一个金发的高个小伙子，几个假动作、优美的大跨步，冲破了对方的防线，把一个球扣在了两根柱子中间。几分钟以后，他以同样的傲慢与轻松再度得分。爱尔兰人贝克特为他的高师队赢来了胜利。

可他对胜利却毫不在乎，让对方的球员压在地上，在草坪上笔直躺着不动。受伤了吗？不，半睡半醉的他大脑被前一夜过量的酒精熏得晕晕乎乎的。当他最终站立起来时，他的队员们听到他嘀咕着说："Never again（永远别再）……"①

外籍讲师

人们尊崇萨特，敬佩季洛杜，然而却忘了高师还出过20世纪的伟大戏剧家。萨缪尔·贝克特曾于1928年至1930年以外籍讲师的

---

① Entretien avec Camille Marcoux, octobre 1992.

身份——既不是学生，也不是教员——在高师待过两年。为他写传记的作家一致认为这两年对他至关重要。

1928年秋，高师学生见到的贝克特是一位22岁的英俊潇洒、高个金发的小伙子，穿着英国人司空见惯的法兰绒和苏格兰花呢外衣。那时的贝克特还没有遭到酒精和失眠的折磨。他刚从都柏林一所昂贵的中学毕业，来高师进修两年。这是高师前任校长朗松签下的一个交流项目。照计划，他是来对高师人传授英国文化精粹并写一篇有关诗人皮埃尔-让·茹弗[①](Pierre-Jean Jouve)的论文的。事实上，贝克特在高师这所"戴莱姆修道院"里找到了一块适合他忧郁的个性彻底发挥的土壤。

他性格比较孤僻，不善交际，很少参加校园生活。他从不上课，既不去图书馆看书，也不去食堂进餐。"对贝克特，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腼腆、内向的小伙子，平时比较克制，喝了酒后比较可怕。"当时的辅导教师让·托马(Jean Thomas)这样谈起他。[②] 贝克特偶尔也接受参加一两场橄榄球比赛，他在爱尔兰时最爱好的体育项目就是橄榄球和板球。他是个奇特的人，具有周期性。在他从事戏剧写作之前，他本身就是剧中人。他的法语很准确，能体会到词语的区别。表达时稍稍有点儿犹豫不决。他的英国式的优雅令人惊叹，尤其是他那双奢华的猫皮拖鞋，相比之下，高师人惯穿的俗气便鞋实在寒酸！

英国学者只有一个学生叫乔治·贝罗松(Georges Pelorson)，他是同届学生中唯一学英语的。10月的一天，上午11时，贝罗松来到贝克特房间门口，敲门没人应，推进门去，看到他的老师还卧床未起。自从来到高师，贝克特习惯了下午两点之前不露面。结果是两人商

① 皮埃尔-让·茹弗(Pierre-Jean Jouve, 1887—1976)，法国诗人、作家。

② *Lecteur à l'Ecole normale*, par Jean Thomas, *Arts*, 3 Juillet 1953.

定今后的课改到晚上。

贝罗松不久就发现贝克特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师。他上课主要是朗读，两人朗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很快，贝克特便提议改去蒙巴纳斯的酒吧闲聊……[1]贝克特老是问："您读过我的同胞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吗？"

事有凑巧，乔伊斯被过分虔诚的天主教会驱逐出爱尔兰，住在巴黎。不久，高师的另一位英国学者托马斯・麦克格雷维（Tomas McGreevy）把贝克特引荐给乔伊斯。很快，他得到了大作家的提携，参与《进展中的工作》(*Work in progress*)的写作。此书出版时定名为《为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乔伊斯对这个年轻的同胞深感惊叹，他让贝克特义务做自己的秘书，乔伊斯几乎双目失明，不能一个人工作。贝克特后来还翻译了一部分当时正在创作中的《安娜・利维亚・普吕哈贝》(*Anna Livia Plurabelle*)。

作家尼诺・法朗克（Nino Franck）在回忆录中描写过贝克特与乔伊斯奇特的相会。"这两人像兄弟一般又瘦又高，他俩身上体现出爱尔兰精神。只要看一下都柏林酒吧、商店、行人的明信片，就能找到他俩默契的秘密。两人一起长时间沉浸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中，时不时地交换三言两语或短促的笑声。"[2]

很快，贝克特的一举一动都效仿乔伊斯，甚至模仿他典型的嗜好。贝罗松回忆说："当他坐下时，萨姆（萨缪尔的昵称）的坐姿像乔伊斯一样，深深地陷进沙发，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螺旋型地反钩住小腿，低着头，任香烟灰散落在衣服上……"这种幼稚的模仿后来遭致亨利・米勒的斥责。有一次贝罗松带米勒出席一次晚会，乔伊

---

① Entretien avec Georges Pelorson, été 1992 et printemps 1993.

② Nino Frank, 10. 7. 2 *et autres portraits*, Maurice Nadeau/Papyrus, Paris, 1983, pp. 92.

斯与贝克特都在，看到这怪诞的模仿，米勒指责贝克特：

“您为什么要模仿大作家，而不成为您自己呢？”

贝克特无以答复。

“这个疯得出奇的爱尔兰人……”

1928年至1930年的贝克特除了模仿乔伊斯，还有其他的怪癖。夜间他一个人在高师的房间里吹笛子。有人说他，“这个疯得出奇的爱尔兰人……他老想自杀，可他每天晚上的笛声从半夜一直持续到天亮，他蹩脚透顶的笛声差点儿让高师一半的教师去自杀”[①]。

高师时期的贝克特有没有自杀倾向？贝罗松虽然不否认他朋友萨姆一生中有过“艰难的时刻”，但他反对某些将他“戏剧化”或“浪漫化”的说法，他肯定贝克特在高师的两年“并非不令人愉快”。然而贝克特神经衰弱、意志消沉的状况令人联想到他1937年发表的第一本小说《莫尔菲》(*Murphy*)，其中的主人公独自一人在“学习室”里将自己捆绑在摇椅上力求达到内心空灵的境界……

为了排解忧郁，贝克特在高师期间已开始饮酒。他对一个爱尔兰朋友说出了心里话：“在这里，没有什么比照常饮酒和无所事事更有趣的了。”当华尔街“黑色星期四”让美国人心惊胆战之际，当希特勒野心勃勃地谋取政权之时，贝克特徘徊于塞纳河两岸的咖啡馆里。威士忌换成了白葡萄酒，都柏林的酒馆换成了巴黎的酒吧。他早期的诗歌中有一首《脓液Ⅱ》(*Sanies II*)描写的就是他经常光顾的高师附近的酒吧里美妙的气氛：

---

① Richard Aldington, *Life for life's sak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41, p. 351.

那儿有一片乐土
穆夫塔街
那个美式酒吧

在那里贝克特惊奇地观察着繁忙的皮条客和女招待：

皮条客围着台球桌叫喊着比分
女招待肥大的臀部动人心魄

贝克特酒量大得惊人。"一天晚上与同学一起去蒙巴纳斯喝酒。他喝多了，警察们抓住他，揍他，并由于他抗议把他带到警局关押。"激进的社会学家、高师副校长赛莱斯坦·布格(Celestin Bougle)气愤地表示要上诉到内政部长。事情最终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经常遭到英国警察处罚的贝克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对法国警察的这次惩处愤怒不已。

以这样的生活节奏，他要写的茹弗的论文自然进展缓慢。更何况他要阅读兰波、瓦雷里、笛卡儿和超现实主义的诗，还有流行小说，莫里亚克的《爱情的沙漠》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更主要的是他开始了写作，诗歌 *Whorescope* 一炮打响。这首诗的题目由 Whore(妓女)和 Horoscope(占卜)两词组合而成，是他在高师宿舍里一夜之间写成的。这首诗使他赢得了文学比赛大奖。旅居巴黎的美国人南希·居娜(Nancy Cunard)给他发了十英镑的奖金。同年盛夏，他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的咖啡馆里写了一篇出色的有关普鲁斯特的散文。之后，他回到爱尔兰的母校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任教。

回爱尔兰后，贝克特私下表示对巴黎的生活感到惋惜，他措辞委

婉地说“法国的生活还是大致可以接受的”。他一直维持着在余乐姆街结下的友谊以及与另一位高师英国学者托·麦克格雷维的友谊。后者后来成了著名的艺术史学家、都柏林国立美术馆馆长。

为了纪念他1945年死在犹太集中营的高师同学阿尔弗德·贝洪(Alfred Péron),贝克特亲昵地叫他“Alf”或“Alfy”,他把《莫尔菲》一书献给了他。贝克特在圣三一学院教法语时还遇上了贝罗松。他俩合作一起将《熙德》(*Cid*)改写成《齐德》(*Le kid*),这是贝克特第一次的戏剧尝试。

1931年,该剧在都柏林的孔雀剧院(Peacock Theater)上演。贝克特自己扮演唐·迪亚格(Don Diègue)——熙德的父亲,确切地说是齐德的父亲。这个人物已相当贝克特化……他穿着破旧的衣服,手里托着一个巨大的闹钟。贝克特的独白节奏从正常速度逐渐加快,到后来快得让人听不明白。观众反映非常好,圣三一学院的教师却认为这是一桩丑闻,一出高师人惯演的恶作剧。这一次尝试预示了后来的《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

战争没有中断贝克特与贝罗松之间的友谊,然而,从1940年起,事情发生了不良的转机。土耳其裔的贝罗松从1942年6月起成了维希伪政府青年团活跃的主席。他建立了“青年之家”、“国民队伍”,后来又成了贝当[①]的宣传工具——“元帅之友”协会的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由于牵连过深,在监狱服刑五个月,后来为了躲避共产党人的惩罚,不得不常常去郊外避难。

贝克特则参加了抵抗运动。他同意再次会见1951年后重新露面的贝罗松。他对他朋友的过去不太计较,如同对他执意要写的小说一样。

---

① 贝当(Philippe Pétain,1856—1951),法国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占领法国部分领土,他成为希特勒在法国扶植的伪政府首脑。——译者注

为了谨慎起见，贝罗松用了个假名乔治・贝勒蒙(Georges Belmont)。1953年他参加了《等待戈多》的首场演出，贝克特从那时起一直到去世都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断受到记者和不速之客骚扰的贝克特经常隐居在贝罗松靠近先贤祠的公寓里。用一个记者的话来说："这是贝克特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他感到宾至如归的去处。他迷狂得像关在笼子里的老鹰一样，眼睛在高耸的颧骨上深深地陷下去。半夜两点，还能听到他背诵拉辛的诗句。"①

1979年1月，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穿着海蓝色的水手厚呢上衣，孤独地站在栅栏外注视着高师的正门。一个年轻人认出了他，他是1979届的安德烈・贝尔诺德(André Bernold)，当时他21岁。他走近贝克特，是他，不是他又能是谁呢？长期以来，贝尔诺德一直在寻找机会见这位《终局》(*Fin de partie*)的作者，他十分敬佩贝克特，已与他通过几次书信。

73岁的贝克特接受了这年轻的高师人的友谊，小伙子让他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在余乐姆街的经历。在他们有规律的交往中，贝尔诺德与他谈论当时的思想大师——他在高师的导师雅克・德里达和吉尔・德勒兹。老作家还很欣慰地从年轻人那儿了解到高师坚守着它宽仁为本的传统，在校园里收容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乞丐。

这是萨缪尔・贝克特晚年的最后一位高师朋友。他于1989年12月22日在巴黎去世。

---

① *Les tentations de Saint-Germain-des-prés*, par Gaston Bonheur,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 4 novembre 1965.

高师才女

“当时，我是一个严肃得要命的女青年。”在巴黎十六区的一所公寓里，身穿碎花上衣、眼镜卡在头发上的雅克丽琳娜·德·罗米莉(Jacqueline de Romilly)笑着谈起高师女生的经历。这位古希腊语专家是在1989年，继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之后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第二位女性。而鲜为人知的是，她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数极少的征服男性统治的阵地——余乐姆街高师的女性之一。当时的余乐姆街高师对女性是全面封锁的。①

在当时的高师长廊上能见到的姑娘都是高师人的女朋友，她们不一定是知识女性。尼赞《密谋》一书中男主角拉弗格(Laforgue)的女友宝丽娜·D(Pauline D)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男主角在尽情地发泄了情欲之后，粗暴地将女友赶出了宿舍……当年，有才学的女青年有她们专门的高师——地处巴黎郊区的塞弗尔(Sèvre)，可是那儿不教古希腊语，况且塞弗尔高师的名声比起余乐姆街的高师来要逊色许多。

第一位勇于冲破层层障碍跨入高师大门的是雅格丹(Jacotin)小姐，她顽强、执著，是科学专业的学生。

20世纪20年代，在女权运动的推动下，高等院校向“脆弱的性

---

① Entretien avec Jacqueline de Romilly, juillet 1992.

别"打开了大门,余乐姆街却出人意料地踌躇不定。出于宽容,文学和科学预科班开始接纳女生。1926年,不可避免的情况发生了,雅格丹小姐成功地通过了入学考试,而且得了第二名;但是在成绩公布单上,她被降到第二十一名,第一次没入选……但是她不认输,据理力争,终于得到认可。

学校当局极其被动,想方设法阻止这个僭越的女子。让姑娘进入余乐姆街这个爱闹恶作剧的单身男子汉大家庭?不可能!"这儿的歌声、喧闹和嘈杂是不能入女人的耳朵的。"学生总监这样说。高师校长则担心会发生有伤风化的事情。"宿舍区没有监督,女青年的经常出现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尤其严重的是,每个宿舍里住的人数很少,三年级学生宿舍里只住两个人。"①试想一男一女同住一个宿舍会有什么后果?人们不禁战栗起来……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虚伪的折中措施:女学生可以入校,但不能住校。

三 骄 女

第二年考试,该发生的事发生了。三个学文学的女生同时考进了高师,她们是克莱芒丝·哈姆努(Clémence Ramnoux)、苏塞特·莫丽诺和西蒙娜·贝特芒(Simone Petrement)。她们不能住校,也不能在高师食堂用餐。1927年的三个高分女生没有与男生混为一体,学校为她们另辟专门的学习室。擅长希腊语的高师人马上给她们的工作室起了个雅号"闺房"(gynécée②),至于"闺房"的主人么,他

---

① Cité par J. F. Sirinelli, *Génération intellectuelle*, p. 211.

② gynécée在古希腊语中意为"女子"。——译者注

们讥讽她们为“三骄女”[1]。

三个才女既不是主张妇女从政的狂热分子，也不是飒爽英姿的假小子，她们只是文笔出众，专心哲学，擅长拉丁语、古希腊语。她们为自己的成功而自喜，为来高师采访的记者对她们的关注而自豪，她们意识到自己完成了一次攻克堡垒式的真正胜利。她们绝非咄咄逼人的女权主义者，而是埋头读书、参试的“书呆子”。她们不爱化妆，不修边幅，没有昂贵或挑逗性的衣裳。用她们自己的话来说，她们“只是想让别人忘记她们是女性”[2]。因为要想在这个歧视女性的余乐姆街站稳脚跟，要攀上高等院校的巅峰，就必须以此为代价。

女生进入高师的历史开始后的 15 年里，高师出了很多杰出的、前程似锦的男生。校园里“恩斯特”水池旁，经常可以看到巴西亚克、莫勒尼、埃提伯勒、蓬皮杜、格拉克以及其他未来的文学、艺术和政治名流。

一开始，高师的男生对女生的来临反应很冷淡，他们的小天地里闯进了怪物——年轻姑娘。一些高师人还尖酸地指责姑娘们与他们之间的竞争是不公平的……

但是冰层很快开始融化。从相识到交换书刊杂志，进而在工作室饮茶；夏天在校园的树荫下没完没了地谈艺术、谈政治。姑娘们唯一吃惊的是：环境脏极了。“三骄女”中的克·哈姆努至今还为高师不让女生在食堂用餐而庆幸：“我从未‘赴宴’过，这样更好。男生们是那样地杂乱无章、那样地恣意喧闹！”其他的姑娘没有那么娇气，她们和男生们一起活动。1930 年进入高师的安娜-玛丽·古特(Anne-Marie Coutte)记得参加教师资格会考的那天早上，她与男生们一起在街上等候，他们高唱《国际歌》向路过的清洁工致敬，后者则以更响

---

① Selon Jacques Roubaud, *La Boucle*, Seuil, 1993, p. 262.

② Entretien avec Anne-Marie Bon, avril 1993.

亮的“全世界受苦的人”的歌声回应他们……

同学之间的友谊产生了。德·罗米莉小姐与同届(1933 届)的两个尖子学生关系甚佳,他们是热衷艺术和超现实主义的安德烈·沙泰尔(André Chastel)——未来的艺术史专家和罗杰·凯卢瓦(Roger Caillois)。

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德·罗米莉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我经常和罗杰·凯卢瓦交换纸条,那是高师专用的黄颜色的办公纸,纸条的内容无非是:‘亲爱的小姐,劳您大驾给我带某一本书。’因为高师男生与女生之间,即使是朋友,也是礼让有加的,恶作剧当然除外。”“您无法想象当时的高师男生是多么彬彬有礼的小布尔乔亚!”[1]

小 薇 依

然而,如果才女中有一人曾激起过不少人超越同学间友谊感情的话,那便是 1928 年进校的西蒙娜·薇依,未来的哲学家。

在预科班学习时,她曾经是阿兰的弟子,老师的教诲奠定了她一生的历程。薇依一年四季总是穿一套奇特的服装——一条黄褐色的羊毛裙子,一件四个兜的两用衫,一条宽皮带——像一个童子军或探险家。她的兜里塞满了散装的烟丝以备自己卷烟抽。这个被高师人叫做“小薇依”的姑娘对自己的外表毫不在乎。她同届的学生惊讶地发现:“她没有通常约定俗成的女性特征:讨人喜欢、软化他人、温柔典雅。薇依身材单薄,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丑陋,又不加遮掩。穿衣

① Entretien avec Anne Ubersfeld, avril 1993.

打扮极其草率。”[1]其实，薇依本该是个漂亮姑娘，12岁时，曾经有人在大街上拦住她问她想不想当电影演员。她同室的女友，后来为她写传记的西蒙娜·贝特芒透露说，薇依是有意识地“抛弃她天生的美貌，把它推得远远的，她追求的不是这个”[2]。薇依决定忘却自己的性别——精神追求的障碍，只为精神世界而生存。

在高师，她立场鲜明的观点、对阿兰坚贞不二的崇拜为她赢得了不少人心，但更多引来的则是嘲讽和抵制。她不由分说的立场使他人无法在她面前持不同意见。对她来说，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为精神思想而奋斗”的人——也就是阿兰思想；一边是所有“背叛精神思想”的人。

有一天，同学让·布鲁阿(Jean Bruhat)在她面前犯了“亵渎阿兰的罪过”。他随薇依去她工作室取一本遗忘在那儿的书，见到墙上的一幅画像便问道：

“这是谁啊?”

薇依目光尖锐地看了他一眼，生气地说：

“你难道连他也认不出吗？是夏蒂埃。”[3]

与阿兰一样，西蒙娜·薇依抵制不公正、压迫和当权者，她的态度比起导师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倾向左派，高师期间，如果她算不上共产党的活跃分子的话，至少也是共产党的支持者。

高师部分学生觉得薇依推行的纯粹的精神恐怖主义让人难以容忍。“人们在走廊上回避她，她逢人便要求在请愿书上签名或为钢铁

---

① Victor-Henry Debidour, cité par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Génération intellectuelle*, Fayard, 1988, p. 476.

② Simone Petrement, *La Vie de Simone Weil*, Fayard, 1973, t. I, p. 52.

③ 夏蒂埃是阿兰的真名。见 Jean Bruhat, *Il n'est jamais trop tard*, Albin Michel, 1983, p. 40.

厂工会的罢工工人捐款，容不得人有半点儿回旋的余地……"[①]高师校长布格雷也有感于这种"神圣恐怖"，在教师资格会考前，他甚至放出话来：

"某人，某人，某人可以通过考试。至于红色处女么，让她平静地为晚会准备炸弹吧……"[②]（最后，薇依得了第七名）

高师一年一度的晚会上，曾经有人打算恶毒地挖苦她，最后被取消了。可能是她的朋友们出面交涉，避免出现让她难堪的场面。这个阿兰亲昵称为"火星人"的薇依还是有一些铁杆朋友的，其中与她最接近的是卡米叶·马赫古(Camille Marconx)。

奇特的友情

来自普瓦图(Poitou)的外省青年马赫古与薇依同时进入高师，他一下子迷上了薇依。事实上，是她"选中"了他，而不是相反。[③]

那是1928年11月，刚进校正遭受老生捉弄的马赫古必须即席发表有关卢梭的演说。教师布朗舍维克(Brunschvicg)老先生对他把卢梭与康德串联起来的说法十分不满。在场的薇依则一字不漏地聆听了他无视传统、与众不同的演说。

第二天，她像幽灵般地出现在马赫古面前。"我很喜欢您昨天的演说，您是一个真正的'为精神思想而奋斗的人'！但我认为您应该写作。阿兰说不写作是无法思考的！"

从一开始，马赫古就被这个奇特的姑娘征服了。像他一样，她也

①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Génération intellectuelle*, p. 476.

② Simone Petrement, *La Vie de Simone Weil*, t. I, p. 178.

③ Entretien avec Camille Marcoux, octobre 1992.

对社会公正十分关注，胸中燃烧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很快，她把他纳入了她的行列。马赫古本不是阿兰的崇拜者，在她面前，他克制自己不对她的导师提出批评。她把马赫古带到她父母家(她父亲是医生，住在卢森堡公园附近)以及她喜欢去的场所。比如去邦博尼咖啡馆(La Bonbonnière)无休止地聊天。最高的荣耀便是她把姑娘们的学习室——“闺房”的钥匙借给他，让他去那儿安心读书。

马赫古回忆说薇依有许多奇怪的冲动：“夜里，她会突然跑到宿舍来告诉我她在某个地方遇见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家伙’。她能到处找到奇才……”

一天，她把马赫古带到塞纳河边奥兹戴里茨桥下，阴暗的河岸堆放着从船上卸下来的大块石头。“她宣布这儿是静思的绝妙场所。其实那儿是乞丐们聚集的绝妙场所。可是一心探索神秘追求的小薇依才不理会这些呢……”

又有一次，西蒙娜把马赫古拉到酒市附近的小酒馆，突然严肃地用她特有的单一语调说：

“一会儿我要去酒市签一份合同。我要去做装瓶塞自动流水线上的女工。”

这下把马赫古吓呆了。他知道他的朋友想通过体力劳动进一步了解无产者的日常生活，体会被剥削者的生存条件。她认为一个人必须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可是她，一个知识分子，笨手笨脚的，连一个普通女工的工作也做不了，随时可能出现事故。马赫古想尽办法劝阻她实施她的计划。她表面上答应了他，其实只是把这个计划推迟了。几年以后，1934 年至 1935 年，她放弃了教师的职业到工厂去做了一名女工。

在高师，两个年轻人之间产生的友谊是有目共睹的。学校年会上，有人干脆借用当时流行的歌星莫里斯·舍瓦利叶(Maurice Chevalier)的一首歌曲《我如果是姑娘》的旋律揶揄薇依：

我只迷惑了一个马赫古
这很不错但不算多，
在这个不凡之夜，
我必将一展身手！①

西蒙娜和马赫古的交往持续了两年。不幸的马赫古，他的失宠与得宠一样突如其来。现在大家都说他是被她"抛弃"的。

一天，在索邦大学，他以"社会主义普鲁东"为题作了一个讲座。薇依也在阶梯教室里。马赫古说："当我走出教室时，她在走廊里，她的眼睛狠狠地盯着我，什么话也没说，从此，她不再答理我了。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去她父母家，她对我视而不见。我的罪过在于我对普鲁东采取了保留意见，而她则对这位思想家佩服至极。

"这段长达两年的奇特交往就此中断。是恋爱吗？我们之间的同学情谊是密切的，但不太容易相处。我是否被她吸引，被她迷住了？这些词用得不太恰当。很难用'恋情'一词来形容我们的关系。我很难堪……

"我觉得她有点儿爱慕之情，但爱的不是我，而是阿兰的一个同事的儿子，叫皮埃尔·勒德里耶(Pierre Letellier)。她在预科班时认识了他，但他没有升入高师。薇依的父亲是个医生，他给这个小伙子看过病。她看他的眼光带着柔情，谈起他时，她说他是'吹笛子的人'。她这样称呼那些不从事哲学，但不'背叛精神思想'的人……"

马赫古此后见过几次薇依。没想到她神秘执著的追求最终把她引向了天主教的归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马赛港遇见了即

---

① Archives de l'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Archives nationales*, carton 61 AJ 165.

将随父母远航去摩洛哥，而后去美国的薇依。他发现她变了，变得人性化了。她缄口不提与《南方通讯》(*Les Cahiers du Sud*)以及与道明会(dominicain)修士的联系。此后，他们在马赛的哲学社团中曾两度相逢，其中一次，她还祝福了马赫古的儿子。

放　纵

薇依毕业后，高师的男女生关系明显地轻松起来。男女生相互往来，学习室也共用。女生不必经受入校时被老生捉弄的下马威，她们不再是年度晚会上遭讥讽的对象，而是积极的参与者。

一次晚会上，未来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德·罗米莉身着古典长袍，佩戴沉甸甸的项链，效仿拉辛的诗句：扮演类似格雷奥芭特的女子，感叹爱情之不如意……

“我的叹息换来的是奥古斯丁严峻的目光，这种过分的挑衅激励我复仇的血液，愤怒的吼声回响在……”

对于这个“严肃得过分”的年轻姑娘来说，这般大胆放纵实在是登峰造极了。要知道当时她还住在父母家，每天由母亲接送来校……

可以看出，这里并没有什么丑闻。可是新闻界还是担心高师院墙内会发生不测。德·罗米莉进高师的1933年，《日报》(*Le Journal*)发表了署名克雷芒·弗代勒(Climent Vautel)针对女性入校的抨击性文章。文章奉劝高师男生首先对女生不予理睬，然后不失时机地给她们难堪。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女青年以“不比男生差”为借口，与他们进行不公正的竞争，余乐姆街的高师本来招收学生的名额就很有限，而姑娘们本可以满足于报考专门为她们办的塞弗尔高师。

这些姑娘卑劣地运用她们在男审考官眼中的"女性优势",用她们的魅力诱惑他们。更有甚者,她们进入这所男性学校的言外之意是:"三年与男生同窗是一桩趣事。三年里可以随时进出男生的学习室。同学,同学,说得好听。我要向你们宣布的是三年后那些娶这些开放女性的男人可是够受的。……我知道年轻小伙子闹着玩时也去女子寄读学校……男人么,有这样那样的出格是他们的本分。反之则不行,不行,不行,年轻女子进师范大学是不正常的!"①

高师女生难道是一心要笼络男人的女子吗?高师的男生可不这么认为。1935 届的布唐说过:"高师女生才不要笼络男人呢,事实正好相反!"后来成为作家的布唐尤其有发言权,因为他的妻子就是他当年高师的女同学,而且他从一开学便盯上了她……②

布唐的话不假,最后一批高师女生深有体会。祖籍波兰的美貌才女安娜· 乌贝丝菲德(Anne Ubersfeld)一进校便受到青睐,追求她的小伙子一大帮。她金发碧眼,人们送她的美称是"白雪公主"。她的学习室里,献殷勤的人络绎不绝。然而,安娜已经有了心上人,"如果我没有订婚的话,不是我说大话,我完全可以选中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小伙子。"安娜回忆说。③

安娜·乌贝丝菲德不仅是个美人,更是个才女。她入学考试的哲学分数是打破记录的 29/30! 大家都预料她教师资格会考时一定会名列前茅。可是事与愿违。

1940 年至 1941 年,安娜是预科班学生中的佼佼者。这一年维希政府执行"犹太人法律",不允许她参加考试。

一天,她在路上遇见了她的导师莫里斯 · 巴代什(Maurice

---

① *Le Journal* du 21 juillet 1933.

② Entretien avec Pierre Boutang, mai 1993.

③ Entretien avec Anne Ubersfeild.

Bardèche)，他与他的妹夫巴西亚克一样都是维希伪政府的支持者。

"哎，笔试考得怎么样？"巴代什亲切地问。

"先生，我没考。"

"怎么？您这么优秀的学生，没去考试，真是不可思议！"

"我是犹太人，先生。"

安娜·乌贝丝菲德说完后转身将目瞪口呆的巴代什晾在了街上。

后来，她参加了抵抗运动。解放后，当她重返高师再续学业时，高师的大门关闭了……在所谓的"重新振兴塞弗尔高师"的幌子下，余乐姆街的高师向姑娘们关上了大门，一直到1986年两所高师合并，从此才取消了男女分校的旧制。

从1927年至1939年，共有25名女生冲破樊禁。最后一名女子是玛德莱纳·埃尔，高师图书馆著名的吕西安·埃尔的女儿。几年前还有一位女生是杰出的高师人、里昂市市长、参议院主席赫里欧的私生女。

25个才女中有10位终身未嫁，成家的15个人中有10人嫁给了高师人。"为什么你们中大多数人嫁给了高师人呢？""因为我们嫁不出去呀，"她们中的一个诙谐地说，"我们不善于也不乐意做家庭妇女。"

数学家、诗人雅克·鲁博(Jacques Roubaud)就出身于这样一个高师人喜结良缘的家庭。

理性的冲动





被枪杀者

1940年,法国战败。抵抗还是合作[1]?昔日的梦想家、学者、教师们,高师人处于十字路口。他们之中有两位作家作出了相反的抉择。从战前就支持法西斯的罗伯·巴西亚克沉醉于纳粹的军威,而高师的大力神[2]让·普雷弗则将以人道主义的名义与侵略者战斗到底。

罗伯·巴西亚克

1943年6月中。白俄罗斯边境日暮时分。斜阳透过薄雾,将一层暖色洒在德国装甲车上。装甲车护送着三位来访的法国朋友,他

---

① collaboration,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被占领期间一部分法国人与德国占领军的合作,即通敌、附敌的行为。——译者注

② Hercule,即Hercules,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中的半神赫拉克勒斯,宙斯与阿尔克墨涅之子,力大无比的英雄,因完成赫拉要求的十二项任务而获得永生。——译者注

们急不可待地赶来欣赏德国国防军的“排山倒海之势”[1]。罗伯·巴西亚克疲惫地与记者克劳德·让代(Claude Jeantet)和费尔南德·布里农(Fernand de Brinon)阁下坐在车子后面,这位反犹主义周刊《我无处不在》(*Je Suis Partout*)的主编在通往斯摩棱斯克的公路上体味着夕阳无限好。

“斯摩棱斯克……如果闭上眼睛,我会再次看到它,圆而高的城,建在河湾的山丘上。我喜欢在夜间抵达城下,像几百年前的朝圣者和战士一样,从城脚下仰望环绕的城墙……黄昏会抹去现代的痕迹,隐去新房子、电线,古老的城镇只剩下永恒的本质,红色的微光划破天空,不知是战火还是日暮。”[2]

自从他的朋友卡尔-罕斯·布莱梅(Karl-Heinz Bremer)出发到东部前线以来,巴西亚克第一次感到了沉溺于梦幻和激情的狂喜。由于受到巴黎斯塔非尔宣传机构(Propaganda-Staffel)新闻集团主任赫尔曼·里希(Hermann Eich)的器重,巴西亚克被派作布里农此行的陪同,他终于有机会直接表达对“在白种人文明的前线……在一部宏伟诗史中”奋战的纳粹士兵深情的赞美。

从一开始,夜色笼罩的这座中世纪古镇的废墟,就勾起了他内心深处对儿童时代摩洛哥景象的回忆,对这些,他总怀有幻影般的乡愁。在被党卫队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和国防军无名的暴行蹂躏过的旷野中,希特勒帝国血腥的东进行动正当生死攸关的时刻,

---

① Sur le voyage sur le front de l'Est, Robert Brasillach: *A l'Est vers une aube possible*, *Je Suis Partout*, 23 juillet 1943; *Sur le front de l'Est avec la Légion française*, *Je Suis Partout*, 30 juillet 1943; *La L.V.F. a deux ans*, *Je Suis Partout*, 27 aout 1943; *La nuit de Smolensk*, *Révolution nationale*, 2 octobre 1943; et Fernand de Brinon, *Mémoires*, L. L. C., 1947. “排山倒海之势”这一表达引自此最后一份文献。

② Robert Brasillach, *La nuit de Smolensk*.

《七色》(*Sept Couleurs*)的作者尽享与年轻的德国军官共度夜晚的美妙:"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部队的殷勤接待和占领军士兵所具备的良好素质——既精通艺术又精通神学和法学。"[①]

在一所纳粹国防军征用的房子里,这个"优秀"、"热诚"的诗人无比快乐地感受着"高雅、亲切的情调"、留在"军官们的大宅子"里的清静。纳粹的效忠者们围着一个陶器旧火炉,坐在一盏木轮做的吊灯下,谈话、唱歌,时间愉快地流逝着。炸弹的轰隆声和斯大林的炮火可怕的呼号就在几十公里外,大家谈论着戏剧、音乐、欧洲新闻、法德友谊。一定是由于夜晚时刻同志间粗犷、阳刚气的氛围使大家轻松欢畅,一位年轻军官向巴西亚克表露了他对苏联人民的情谊:"这是一个性格极端的民族……必须和他们说心里话。"这种信任使这位法国作家简直感动至极。他一直深信并撰文颂扬法西斯是一首"诗",一首"非凡的音乐诗"。[②] 他的见解是正确的,因为这首诗正在进行之中,德国军队正在和苏联人民说着"心里话",而他现在正是见证人。

志愿军团[③]里的苦闷小伙子

凌晨4点30分离开斯摩棱斯克后,巴西亚克久久地思考着刚刚过去的一夜。这一夜唤起了他的回忆,两年前德国纳粹带给他的另一次满怀激情的伟大经历。

---

① Robert Brasillach, *Et les coupables*, *Je Suis Partout*, 6 septembre 1941.

② 见罗伯·巴西亚克的一次谈话 *Cinq mille Parisiens acclament à Magic-City les orateurs et les idées de Je Suis Partout*, *Je Suis Partout*, 9 mai 1942.

③ 法国反布尔什维主义志愿军团(Légion Volontaire française Contre le Bolchevisme,缩写为 L. V. F.),参加苏德战争的法国法西斯武装组织。——译者注

那是1941年春天，在德语学院与卡尔-罕斯·布莱梅的见面，此人于1936年到1938年(罗伯·巴西亚克毕业四年以后)在高师做德语助教。这个精通法语和法国文学的“高大的金发小伙子”[①]一下子吸引住了《七色》的作者。后者其实一直都“喜欢将对团体的爱与对祖国的爱结合起来，将对自然的爱与对理想的爱结合起来”[②]。他发现这位想纯化法语文学的“年轻的齐格弗雷德”[③]是一个“坚强、精力旺盛、头脑敏锐”的朋友，可以充当法国元帅和德国元首之间的说客。

他们一起散步、宿营，一起去参加了1941年10月欧洲的新主人组织的欧洲作家代表大会。他们有机会在魏玛公墓一起散步，悼念歌德和席勒的亡灵。“难道这是一片墓地吗?”[④]巴西亚克写道，“不如说这是一座浪漫的公园，特别是古墓群部分，断碑残壁，交错在杂乱的灌木丛中，覆盖着枯叶和松针。这片土地在幽暗和秋意浸染的色彩中显出一种美妙的宁静。我又一次看到了涅瓦尔[⑤]的德国，充满神话和奇迹。”

晚上，在金碧辉煌的魏玛大剧院，巴西亚克与卡尔-罕斯同样激动不已地倾听了戈培尔的演讲:“我看着这位奇人讲话，看着他如此生动的脸、具有穿透力的眼睛。他此刻面对着观众，语调特别温和，动作很少，只是不时摊开优美白皙的双手。”

---

① Robert Brasillach, *Sur la mort d'un ami allemand*, *Je Suis Partout*, 18 septembre 1942.

② Lucien Combelle, *Péché d'orgueil*, Olivier Orban, 1978, p. 295.

③ 齐格弗雷德(Siegfried)，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译者注

④ Robert Brasillach, *De la cité de Goethe au nouvel 'axe' de Berlin*, *Je Suis Partout*, 8 novembre 1941.

⑤ 涅瓦尔(Gérard de Neval, 1808—1856)，法国诗人，《浮士德》的法语译者。——译者注

时间就这样逝去……在离开斯摩棱斯克单调的大平原中，总是欢欣而伤感，这位信仰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国诗人深情地回忆起了他的德国友人“迷人而生动的身影”。一年前，1942 年 5 月，他已经在依尔门(Ilmen)湖偏北一点儿的地方死去了。

然而在苏联前线吸引这位高师出身的作家、反犹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还不仅是纳粹国防军的年轻军官们。他此行的目的其实是为“光荣”的法国反布尔什维克志愿军团作宣传。

志愿军团(L. V. F.)由流氓、失意冒险家和心怀仇恨的人渣组成，他们往往来自法国的老殖民地。1941 年 7 月在奥图 • 阿贝兹(Otto Abetz)的鼓动下成立，他们一度组编成纳粹国防军的第 368 步兵团，被派去攻打莫斯科，由于“战功拙劣”，1942 年 2 月就被希特勒下令从“光荣之师”中永久剔除。从那时起，被排挤的穿德军制服的法国人无论表现如何都注定受到冷遇，招募来的雇佣兵素质很低，只能被派去追击白俄罗斯和波兰的游击队。

罗伯 • 巴西亚克一开始就被这个混杂着亡命之徒和纳粹崇拜者的没用的队伍征服了，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对统一欧洲这一信念的精神贡献”。当看到一个俄罗斯村庄被一个殖民地老军士管理时，他本能的殖民主义观念得到了满足，这个狂热的老兵让自己的两个儿子也参与了这桩不可宽恕的罪行。这支无名军队散发的暴力和杀戮的狂热气息令罗伯 • 巴西亚克如痴如醉，他只能用史诗的语言赞美 L. V. F. 的这些落魄士兵：“……多么迷人，在白俄罗斯的大平原上，这些暴烈、疑虑、苦闷、被遗弃的小伙子们选择了他们的队伍。他们如此勇敢地献身于这个未知的世界，就像文艺复兴时代哥伦布或麦哲伦在大海上的同伴。”①

① Robert Brasillach, *La LVF a deux ans*.

幽深的早晨

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这位吟唱着"生命的温情和幽深的早晨"的优美作家、余乐姆街人文主义家园的宠儿怎么竟至于狂热地歌颂纳粹的统治和在东部平原上肆虐的暴徒？其实他的命运在18年前路易大帝高中预科班教室潮湿的拱廊下就已经注定了。

这个敏感、多疑的16岁少年于1925年11月的一个早晨到达首都巴黎的里昂火车站。某种命定的偶然性决定了他的老师和喜爱的大家不是主政亨利四世高中的激进社会主义者阿兰，而是趣味广泛的优秀讲座教师安德烈·贝勒索尔，此人从不掩饰自己对"法兰西行动"[①]的支持。

在圣-雅克路精英摇篮的阴暗的走廊里，两次相遇决定了他的一生。一开学，他就被罗杰·维扬(Roger Vailland)同学吸引住了。在《我们的战前》(*Notre avant-guerre*)一书中，他深情地回忆起这位未来的共产主义作家："……一个脸庞棱角分明的长发小伙子，总爱披着斗篷，使他看起来有点儿拜伦的气质……他真的魅力非凡，很有才华，喜欢波德莱尔当然超过喜欢错误的超现实主义者。他笃定有能力用动人的语言把一个未知的世界描写出来。我长久地保存着他的短诗。"鲜为人知的是这个才华横溢而放荡不羁的小伙子喜欢醉酒的感觉，"在大自然的召唤中涅槃、消融"。他让罗伯·巴西亚克初次体验了这种超现实主义行动的眩晕滋味，并将它称为"纯粹行动"。他还让这位未来的《我无处不在》的明星社论家去比卡尔(Picard)书店，

① "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1898年诞生的极右翼反共和国政府的政治组织，曾创办《法兰西行动日报》，走极端的国家民族主义道路，希望法国复辟。——译者注

躲过店里四处悬挂的防盗反射镜把书偷走然后再放回去，把这当做一种美的游戏。

罗伯·巴西亚克正如他的老同学描述的那样“有特别女性化的一面，需要一个主人”，如果他一直与罗杰·维扬保持友谊，谁说他不会也成为一名斯大林主义的作家呢？

然而在预科班发奋苦读的秋天，另一个年轻人莫里斯·巴代什对巴西亚克产生了兴趣：“当我第一次看到他时，他正站在书桌上背诵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诗，罗杰·维扬则以韩波的诗句来回答他。那是1925年，他当时还不到16岁。他的皮肤和头发偏棕色，个儿很高，双颊不像后来那么饱满。他穿一件紫色的带着一个猫头鹰佩饰的紧身长外套，我从来没对他说过这有多难看。他戴着一副丑陋的铁丝眼镜，深色的眼睛在后面闪光，目光友善、温和。”①

巴代什欣喜地发现了这个卡塔卢尼亚年轻人，并很快决定使他摆脱罗杰·维扬的影响。一天，他在预科班的庭院里对同学们说：“巴西亚克应该找到自己在文学圈的位置，对于一个想出头的年轻作家来说，只有两条路：参加‘法兰西行动’或者参加共产党。”②

1926年年底，巴代什成了巴西亚克的朋友。他使巴西亚克迷上了莫拉斯(Maurras)③的思想。那些狂欢的夜晚，他带着巴西亚克沉醉在城市的灯火中：“莫里斯同时发现了邦丹和美丽城这些好地方，他带我去我不曾注意到的电影院。他还教会我工作，因为他始终都是个发愤工作的人。他让我阅读了普鲁斯特和巴海(Barrès)。我们一起去那些装蛤蜊的篮子就排放在绿色柜台上的小饭馆，去看凡塞

① Maurice Bardèche, *Introduction à* Robert Brasillach, *Ecrit à Fresnes*, Plon, 1967, p. 12.

② Entretien avec Georges Pelorson.

③ “法兰西行动”的创始人。——译者注

纳森林和那里的人群。”[1]

1928年巴西亚克第二次投考高师才被录取。这个未来的希特勒的歌颂者在无政府主义的共和派老宅子里尽情地享受。在《我们的战前》一书里，他写下了那些令人难忘的段落。

在高师，他自然和莫里斯·巴代什住到了一个宿舍。他的同样肤色很深的姐姐苏珊娜常来同他们聚会。小小的房间里时有风暴。他们隔壁的邻居、路易大帝预科班的老同学乔治·贝罗松仍记得“曾听到墙那边传来巴西亚克的哭声和巴代什摔门而去的声音”。

贝罗松具体地说道：“巴代什是个‘红鞋跟’，当时我们这样称呼有政治权威的人。他踢踏着鞋跟，说话果断肯定；而巴西亚克则更聪明，也更敏感。”

作家的敏感并没能让巴西亚克避免连续两年教师资格会考的失败。于是他把博学的名号留给了巴代什，自己在第三年专心写了一篇题为《维吉尔的出现》(*Présence de Virgile*)的文章。这篇引人入胜的典型的高师风格的作品既是一篇感人的维吉尔传记，也是巴西亚克的一幅自画像。从政治上来说选择维吉尔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在莫拉斯和安德烈·贝勒索尔的吹捧下，这位奥古斯丁时代的古罗马官方诗人成了“法兰西行动”必需的参照。而且当时年轻的法国民族主义者狂热地崇拜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创造的世纪“新精神”，墨索里尼至少在他铿锵有力的演讲中恢复了罗马帝国的荣耀。总而言之，《维吉尔的出现》是作家巴西亚克法西斯生涯在高师的开始。

---

① Robert Brasillach, *Notre avant-guerre*, Plon, 1941, rééd. *Le Livre de Poche*, 1992, p. 40.

无边的红色法西斯

国外“朝气蓬勃”的法西斯主义远比“法兰西行动”消极枯燥的思想更深地吸引了巴西亚克，在 1934 年 2 月 6 日“革命错失良机”之后，他永久地加入了法西斯主义阵营。他已经认识了同为高师出身的皮埃尔·加克索特，此人正是《我无处不在》的主编。1936 年“人民阵线”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令巴西亚克大为恼火，认为这“无耻至极”①。在投票的几个星期后，他开始全职为周刊工作。《我无处不在》刚被编辑们从原资方手里买过来，以吕西安·何巴代(Lucien Rebatet)为首的新主人张开双臂热情地迎接巴西亚克加入记者—股东集团。在意见和组织上，巴西亚克完全能够施加自己的影响，尤其是 1937 年 6 月他继加克索特之后担任主编。这位不到 30 岁的作家将以他每周的社论文章竭尽才智地为法西斯事业服务。

莱昂·德盖尔(Léon Degrelle)，比利时“雷克斯党”首领、未来的德国党卫军瓦隆区将军，是巴西亚克如行吟诗人般殷勤赞美的第一个英雄。他于 1936 年写道：“我们怎么能抗拒莱昂·德盖尔，抗拒他的出现、他的同志情谊、他孩子般的笑容、他情绪激动时爆发的怒火、他黑眸闪亮的双眼的直视？看到他，我们立即就会信任并热烈赞同‘雷克斯党’。我们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他将要说的一切，我们不再感到疲惫，我们准备去实现一个博爱的世界。”②与法西斯首领及群众的交往使巴西亚克近乎迷狂地陶醉着。他自愿成为一种极其雅致的美

---

① Rokert Brasillach, *Notre avant-guerre*, Plon, 1941, rééd, Le Livre de Poche, 1992, p. 243.

② Robert Brasillach, *Léon Degrelle et l'avenir de Rex*, 1936, rééd. Plon, 1969, p. 514.

学式政治宣传的猎物。在夜景或舞台效果的强烈对比下，法西斯主义在这位温柔的卡塔卢尼亚人的头脑中变成了“20 世纪的诗歌本身”，所有的法西斯首领都是语言魔术师：“当墨索里尼向意大利人谈起他们的故土和无垠的大海时，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同族诗人的后裔，他唤起不朽的罗马、水泽上的古战船。希特勒也是诗人，德国诗人，他构想着沃尔珀吉斯(Walpurgis)之夜[1]和五月的节庆，他的歌曲中混合了巨人的浪漫和情人的浪漫，森林、维纳斯山，爱上了突击队战士的爱神树的女儿们，在慕尼黑巴伐利亚英雄纪念牌前倒下的同志。另一位诗人是罗马尼亚的科德雷亚努(Codreanu)，大天使米歇尔守护着他的军团。”[2]

很快，巴西亚克也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与纳粹同样的反犹主义妄想狂。1938 年 4 月和 1939 年 2 月，《我无处不在》出了两期所有编辑者共同参与的表达狂热的反犹主义情绪的专刊。吕西安·何巴代和皮埃尔-安东尼·古斯托(Pierre-Antoine Cousteau)攀比着亵渎和侮辱的能耐。他们的主编巴西亚克也不示弱，在坚决要求制定剥夺法国犹太人公民权的种族主义法律后，他在 1939 年 3 月 31 日发表了题为《猴子问题》的文章，回应政府制定的反种族主义措施(该措施禁止民族优劣论、教派之争和激发仇恨的所有种族主义思潮)。当时种族迫害和非人道已经在整个欧洲掀起了导致暴行的可怕运动，在这篇文章中法西斯的歇斯底里完全泯灭了人道主义，而且执迷不悟。巴西亚克还煽动他的同胞对政治难民的仇恨：“它来自所有国家——德国、波西米亚、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俄罗斯；其他的国

---

① 五月的夜晚，斯堪的那维亚人庆祝春天到来的习俗，以音乐、歌唱、篝火为特色。——译者注

② Robert Brasillach, *Léon Degrelle et l'avenir de Rex*, 1936, rééd. Plon, 1969, p. 525.

家都采取措施制止猴子的疯狂繁殖。因为这些动物足够狡猾，它们来到我们这里，感到这里是它们偷盗和淫乱的庇护所。"选择灵长类动物作比喻，除了它们半人半兽和恶魔般的特性外，还使这位高师的种族主义者发明了一个引以自豪的新词："'反猴主义'[①](请看清楚)，它日益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难道我们不该承认法国男人和母猴、法国女人和公猴的反自然的结合已经生出了一种幸亏还为数不多的杂种吗?"

在法国战败和法德合作之前，通向纳粹的道路就已经畅通了。1941 年春天被释放后，巴西亚克毫不犹豫地重拾《我无所不在》的立场为占领军服务。他每周都重复着法西斯主义、贝当投降派和反犹主义的陈词滥调。他号召处死西约姆审判(procès de Riom)中的被告人，还恣意发泄对第三共和国的仇恨："我们不应该结束散发着垂死娼妓的腐烂气味、像长疮流脓的染梅毒的荡妇一样还在街上拉客的共和国吗？她一直待在那儿，褪色，破裂，在她的门槛下聚集着像老人一样枯瘦的毛头小子。她如此服侍着他们，在她的吊袜带上还塞着钞票：他们怎么忍心抛弃她呢？尽管她有淋病和梅毒，他们也被传染得腐烂到骨头了。"[②]在 1942 年 9 月 25 日的一篇题为《反祖国的七个国际》(*Les sept internationales contre la patrie*)的社论中他写道："应该将犹太人全体隔离，小孩儿也不留。"

1944 年 6 月 6 日清晨，贝当元帅执政四周年的前两个星期，联军部队在诺曼底沙滩登陆。巴西亚克知道清算他所作所为的时刻危险地接近了。他并不为此焦虑，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他就知道他热爱的

---

① antisimiétisme，与反犹主义 antisémitisme 词形很像，词干来自 simiesque，指猴子般的。——译者注

② Robert Brasillach, *La conjuration antifasciste au service du juif*, *Je Suis Partout*, 7 février 1942.

纳粹第三帝国已经不可能赢得战争了。自1943年秋天联军成功登陆意大利以来,他就怀着忧郁的宿命感看着德国国防军在各条战线无情的撤退。1944年初在德语学院喝茶时,面对自由主义者吉阿尔·海莱尔(Gerhard Heller)中尉,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感受。海莱尔讽刺地问道:

"现在已经完蛋了,不是吗,罗伯?"

"是的,完蛋了。"他忧愁地回答。[①]

从斯摩棱斯克回来以后,他最后的幻想就破灭了。当法国再一次被奴役,他终于明白了不断戏剧化地宣称的"新欧洲"、法德友谊都不过是空头许诺、弥天大谎,只能蛊惑被纳粹搞得鬼迷心窍而放弃理智的人。然而取笑命运已经为时太晚了。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几百万人的狂热,青春的营地,昔日的辉煌,队列,明亮的教堂,战场上倒下的英雄,年轻人之间和觉醒的民族间的友谊,罗西·安东尼奥(José Antonio),无边的红色法西斯"。他决定完全承担自己人生的失败。

1943年8月,他不得不把周刊让给了一个靠贩卖阿根廷肉食发财的野心勃勃的蠢货。而最令人失望的是,他所信任的朋友吕西安·何巴代和皮埃尔-安东尼·古斯托宁可满足一个门卫的贪婪也不对他保持忠诚。古斯托的背叛令他非常悲痛,他和这位《犹太的美洲》的作者的长期交往难道不是出于伟大而牢固的友谊吗?这个像打嗝一样间歇性发作的病态的反犹主义者曾于1938年驱车带巴西亚克去了西班牙。两人当时都狂热支持罗西·安东尼奥,充满传奇色彩和青春朝气的法郎日党(Phalange)的缔造者。在马德里大学区的壕沟里,两人差点儿愚蠢地被佛朗哥的摩洛哥籍士兵开枪打死……至于何巴代,尽管他保留着对《瓦砾》(*Décombres*)的文学性

① Gerhard Heller, *Un Allemand à Paris*, Seuil, 1981, p. 91.

的赞美："一首宏伟壮丽的诗史，上千页的汪洋大海，暴力、过度甚至无理性，一个对战前和战争时代、对我们的错误与希望的总体概括。"[1]但他从不怀疑它的作者内在的懦弱。

在"友谊的战线缩短"之后，巴西亚克决定为他的朋友吕西安·龚贝尔(Lucien Combelle)主编的周刊《民族革命》(*Révolution nationale*)撰写文章。苦闷和绝望使他变得更加激进，他鼓励追击抵抗者的民兵不要有丝毫的怜悯："同志们，别向这些天真的浪漫情怀屈服，它使你们常常在思想上把你们的对手看做兄弟，而事实上他们只属于可怕的流氓恶棍为真正首领的匪帮。"[2]1944年冬天，几经惨败，他理性的合作主义终于变成了内心的合作主义："我觉得我已经和德国精神建立了一种联系，永远也不能忘记……这几年来各类法国人多少都与德国合作了，争执是难免的，而回忆依然美好。"

弗莱诺监狱(Fresnes)

但是帝国的英俊士兵已经离去了。1944年11月初，这个狼狈的纳粹主义的情人，在弗莱诺监狱一区344号牢房昏暗的灯光下写下了《致60班的一位士兵的信》的前几页。

然而直到9月初，一切还都安然无恙。在德语学院的一次告别晚宴上，巴西亚克最后一次拒绝了院长卡尔·艾普敦(Karl Epting)向他发出的去德国避难的邀请。之后，他听到联军部队到来的消息时也很平静，相信在必要的时候自己可以找到藏身之处。8月16日晚，雅克·多里奥(Jacques Doriot)拉响了撤退的警报。在这个伤感

---

① Robert Brasillach, *Espoir ou colère*, *Je Suis Partout*, 11 avril 1942.

② Robert Brasillach, *Lettre à quelques jeunes gens*, *Révolution national*, 19 février 1944.

的夏夜将尽之时，民兵团和法西斯主义的法国人民党都逃跑了，何巴代、古斯托之流像行李一样被携带着。乔治·贝罗松几天之前曾在歌剧院大道偶遇巴西亚克，他“绝望得平静，确信人们会绞死他”。他已经找到了藏身处，朋友玛格丽特·卡瓦西耶(Marguerite Cravoisier)借给他的位于图尔农路 16 号的一间保姆房。8 月 25 日，看着巴黎人沉浸在欢乐的海洋，巴西亚克当然感到“孤独，并受到不公正地惩罚”，但他确信这个被各种罪行“玷污”的解放最终会使他的同胞像他一样感到厌恶。他不再相信激情的安慰，指望过安静和隐居的生活，只出门散散步。在一次散步途中，他在双猴咖啡馆前遇到了他的老朋友罗杰·维扬。维扬先对他开口说：

“人们在找你呢。我在乡下有一座房子，你去吧，六个月后一切都会平静的。”

“不必了，”他微笑着回答，“我会被抓住并被枪毙的。真的，但这样也好，我受够了周而复始的循环。”后来传来了他全家人被捕的灾难性消息，首先是他的母亲热奈维埃芙。这肯定是当局想通过他们来逮捕他：他堕入了自己选择的命运的陷阱。

9 月 14 日，大约下午 4 点钟，他最后一次忧郁地走过图尔农路古雅优美的侧墙，沿着阳光灿烂的塞纳河岸，向“远处的巴黎圣母院和圣米歇尔区，我青春时代灰色的、迷人的地方”告别。随后，他来到警察局自首，主动做了囚犯。一个戏剧性的巧合是，接待他的人竟是与他同届的高师数学系同学罗杰·勒菲弗(Roger Lefebvre)，此人是抵抗运动最早的积极成员。他建议巴西亚克回家去，因为他还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巴西亚克感到既高兴又惊讶，他拒绝了这个提议但很欣赏这样的举动。后来来了两个检察官把他带走收押。

他在奈斯勒沙克(Noisy-le-Sec)看守所待了一个月，之后被送到弗莱诺监狱。他被指控为精神通敌。他感觉很好，因为这次秋季的战争法庭不会怜悯他。作为知识分子参与合作的代表人物，他是法

西斯分子,是背叛祖国和精神附敌的象征。在关押合作者的弗莱诺监狱的庭院中,这位永恒的高师文人显得不太协调。在杀人的盖世太保分子、被纳粹国防军养肥的妓院老鸨、教会的反犹主义者和苍白可笑的前部长之中,巴西亚克是极少数愿意赴死的人。他知道难逃惩罚,于是选择了写一部作品为自己赢得身后名声。

所有的文学武器都在这最后一部著作中被调动起来。《忙人日记》(*Journal d'un homme occupé*)出于温情和破灭的幻想,讲述了一段被重新赋予私人色彩的合作历史。卡尔-罕斯,"年轻的齐格弗雷德、战胜魔法的人"在一篇感人的回忆中复活了。《致 60 班的一位士兵的信》再次并永远地向后人表达了他的反犹主义和对极权政治的热爱:"这些是法西斯主义诗歌的要素,造就了我们时代的疯狂或智慧。我敢肯定,20 年后的年轻人会忽略它的缺陷和错误,而怀着一种模糊的渴望和无可救药的怀念看待它。"

他还写了《弗莱诺诗集》(*Poèmes de Fresnes*)。高师人巴西亚克在安德烈·史尼耶(André Chénier)身上看到了一个随和的"领口敞开的兄弟"。这个参加法西斯革命的年轻的老兵被当做了

> 所有失败事业的战士,
> 那些冬天倒在行刑者的子弹下
> 那些被皇帝们的警察关进囚室
> 和因长官们仓皇逃跑而流落四方的年轻人的
> 同伴和殉道者。

然而,虽然巴西亚克的散文特别优美生动,带着内心深处热烈的、充满视觉美感的诗意,但他的诗歌却总是摆脱不了"高师预科班风格"的矫揉造作。直觉的张力不时会造就一些成功的段落,但读者几乎不可能被这样一个平庸的诗人打动。他那本特别晦涩的《希腊

诗集》(*Anthologie de la poésie grecque*)已经残酷地揭示了他的局限。也许仍是友人卡尔-罕斯·布莱梅的形象激发巴西亚克创作了他最好的两首诗:《遗憾》和不太出名的《给光荣的德国友人的生日之歌》,在整个18节六行诗中抒发着一个孤独者朴素的悲伤:

> 我们只拥有过很少的季节
> 很少的旅行和书。
> 战争标划了视野,
> 时光短暂,对于渴望生者,
> 灰烬熄灭了木柴,
> 草在寒霜下死去。

1945年1月19日早晨,文笔优美的历史学家、维希政府前部长雅克·贝努瓦-梅刚(Jacques Benoist-Méchin)在弗莱诺监狱一区的大厅里见到了巴西亚克。审判《我们的战前》的作者的时刻到来了。他的传奇故事已经开始流传。这个冬日里被送往战犯法庭的巴西亚克被贝努瓦-梅刚描绘得像《使徒传》里的圣人一般:"他穿着海蓝色的大衣,领口竖起,围着红围巾,那绽放的鲜红色在灰暗的背景中犹如一朵虞美人。半遮着他鼻子的围巾上缘露出大衣领,绕着他的脖子留出一条细细的红边。这种形象如此震撼人心,我无法将目光移开。"①

几小时后,在巴黎法院的大厅,前纳粹记者巴西亚克因精神通敌被判死刑。"这很光荣!"他以最后的勇气喊出这句话。回到牢房后,他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写了几首诗,向"从未被打倒的精神"和"二月的死者"致以最后的敬意。

---

① Jacques Benois-Méchin, *A l'épreuve du temps* 2, Julliard, 1989.

2 月 3 日晚，他的律师雅克·伊索尼(Jacques Isorni)在戴高乐将军的府邸受到接见。戴高乐的办公室只开了一盏灯，在昏暗的光线中，两人面对面坐着。伊索尼用一刻钟的时间向戴高乐讲述了巴西亚克的青年时代、他的才华和他高尚的灵魂。他带来了一封由 55 名作家联合签名的请愿书——加缪、瓦雷里、莫里亚克、克劳代尔(Claudel)、珂莱特……其中没几个人是高师出身的。这位 1940 年 6 月 18 日发表抵抗运动宣言的伟人漠无表情，不为所动。“和在所有领域中一样，在文学中，才华是责任的名字。”戴高乐后来写道。高师才子早已选择了将他敏锐而优美的才智献给虚无主义的畸形政权，他没有得到宽恕。

“我完全不是斯多葛派，要脱离我们所爱太难了。”在 1945 年 2 月 6 日那个悲伤的黎明，巴西亚克写下了这句话。对于他所仇恨的、遭到纳粹残酷迫害的受难者，他没有一句话、一丝念头；而他充满怀念的是青年时代幽深的早晨和国防军金发小伙子，它们隐约显现，又很快留在了斯摩棱斯克红色的夜幕里。

早晨 9 点 30 分刚过，他即被枪决。

让·普雷弗

1944 年 6 月 13 日清晨 9 点钟刚过，德国山地步兵 157 师的 500 名士兵已离开格利诺布尔，踏上 12 公里外通往圣尼兹杜穆什罗特的蜿蜒道路。这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步兵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到达了，还没到村口，炮火就打响了，攻势很猛烈。法国游击队的年轻射击手们第一次参加战斗就遇上了保卫绵延四公里长的韦科尔(Vercors)山区入口的任务。这支由圣尼兹农民、游击队员、工人、大学生

组成的高德维勒(Goderville)部队在韦科尔前线中心地区的第一场战役中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面对德军的机关枪扫射,那位“上衣敞开、金发飘拂、宽肩细腰”的指挥官高德维勒上校就是让・普雷弗,1919届的高师毕业生、出色的司汤达的论文的作者、新近的法兰西学院大奖得主。

普雷弗与大儿子米歇尔、女婿罗兰・贝克曼并肩作战。他精力充沛、英勇无畏地奋战了一整天,晚上,德国人终于被击退。他沿着战线和同伴们分享这短暂的胜利喜悦,每个战士都对他满怀钦佩之情。年轻的西蒙・诺拉和他的同伴们将水壶里的第一口水献给他,“您先喝,我的上校。”这种尊敬不是奉承上级而是真心敬重这个人。

高德维勒-普雷弗以首战告捷庆祝了自己的43岁生日,他的体力、智力和道德力都处于最佳状态。这位崇尚荷马的青年作家在1925年的《运动的愉悦》中写道:“对我们来说,最美的人不是开枪最快的战争机器,而是这样一个人,他完美的体格允许他突然而猛烈地投入一种有损健康的努力。”[①]普雷弗是一名勇士,在游击队员中他的意志和人格被传为佳话。

小 公 牛

普雷弗是一对教师夫妇的儿子,父母像黑骑兵般不善通融的严厉作风常使他不自在。他在亨利四世高中预科班只读了一年就考上了高师。在那里,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民族热情高昂的英雄主义时代,因自己不到年龄不能参战而失望不已。他在自传作品《第十八年》中写道:“明确地证明自身勇气的渴望简直使我们疯狂了。在亨利四世高中,我们沿着避雷针爬上禁止学生入内的老克劳

---

① Jean Prévost, *Plaisirs des sports*, Gallimard, 1925, pp. 62～63.

维塔。我和一个同学在健身房里搞一些秘密运动，尝试危险的跳跃，脱离固定杠和高空器械。我们为身上的每一个淤青和扭伤而兴奋不已。"[1]

"小公牛"是阿兰的学生，从青少年时代的一场打斗后他就养成了"超越自己力量极限的喜好和对冷峻气质的喜好"[2]。阿兰老师的第一堂关于贺拉斯的《普拉古斯颂歌》(*Ode à Plancus*)的课深深吸引了他，他一生都保持着对这位古代和平主义哲学家广阔而清晰的了解。阿兰向他指出，"事物和思想是复杂的，应该以灵活性开启复杂性"[3]。

"半闭着好似诺曼底马贩子般的灰色眼睛"[4]的阿兰老师在预科班的学生中发现了这位"敏于行动"、"观点活跃"的年轻人。很快，他就乐于让这个学生运动员陪伴左右，这个学生的人生计划是做一名演说家或作家，总想着"死亡或出击"。

27 年后，1945 年 7 月 22 日，阿兰悲痛地听说自己的学生去世的消息，他写了一篇描绘普雷弗的文章，这篇绝好的悼念散文至今尚未发表。文章中老师向这位预科班学生"片刻不停的激情"表示敬意，这位学生曾陪他从亨利四世高中散步到弗勒尔河岸，"若没有这样一个人，生活就了无生气……他从不怀疑自己，他是我争论和辩驳的范本"。在那篇矛盾的墓志铭中，阿兰以一种普雷弗所不接受的和平主义信仰的宣言总结道："这短暂的充满象征意义并沉醉于象征意义的一生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如果我们已经投入雄心壮志的事

---

① Jean Prévost, *Dix-Huitième Année*, Gallimard, 1929, p. 13.

② Jean Prévost, *Faire le point*, 1931, repris dans Les Caractères, Albin Michel, 1948, p. 14.

③ Jean Prévost, *les Caractère*, p. 15.

④ 同上, pp. 104～105.

业，应该从它之中抽身而出。因为如果为此牺牲了自己，那么得到了和平的只有他自己。”

进入高师后，普雷弗每天早晨4点到8点阅读柏拉图的著作，整个下午耗在图书馆的阳光下。然而很快，论文和大学就让他难以忍受。教师资格会考的那天早晨，闹钟响起后他立即就把它关了，继续蒙头大睡。他实在无意做一名教员。1929年至1930年在英格兰做助教期间，他勾勒出图书馆的书呆子们沉浸于枯燥的快乐的冷酷画面：

> 年轻姑娘和大学生们蜷缩在窗户深处终日苦读，他们很少翻动的书页像灰白的镜子一样映着他们的脸。书架上，一排排隆起的书脊像黑夜中涌动的波浪。这沉默的、浩瀚的知识压抑着精神……我被一种缓慢的恐惧震慑住，像置身于死人面前一样；我感受到了僧院般的平静。[1]

这位年轻的高师学生厌恶教师职业，热衷参与政治活动。他爱上了社会党领袖皮埃尔·列诺得尔(Pierre Renaudel)的女儿。但这位年轻理智的特丽莎小姐，更愿意将她的美貌献给一个煤矿工程师，得到更安全可靠的呵护。失望又懊恼的普雷弗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小说般浪漫的体面结局：他躺在盛满热水的宿舍浴缸里，划开了手腕的血管，并且没忘记给高师的社会党员同伴马塞尔·德阿寄了一封遗书……当晚值班的一个后勤人员在偷香皂时发现了沐浴在“番茄酱”

① Jean Prévost, *les Caractères*, p. 289.

中的他，并在最后时刻救了他的命。[①]

1924 年，从学院和政治中走出来，这位青年教师开始进军巴黎文学圈。他没钱没势，忍饥挨饿，唯一的一条裤子一直穿到破，凭着坚强的意志一点点往上爬。他也出入"蓬迪尼十日"[②]这样的高雅场合。一到场，他就引起了瞩目，因为他要组织（在这个上流知识分子的聚会上至少是不合时宜的活动）一场跳高比赛！他在两个很高的桩子上架了根杆，向在场的几个年轻人发出挑战："你们能跳过去吗？"在障碍物前，所有人都拒不表态，他则一跃而过。[③]

1925 年，他和马塞尔・奥克莱尔小姐在奥斯高结婚，哈蒙・费尔南德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是证婚人，他们似乎是在向这位前途无量的才子迈入职业生涯而致敬，普雷弗却不太尊重巴黎文学小圈子的仪式和典礼。声誉正值顶点的安德烈・纪德是这位傲慢无礼的年轻人戏弄的对象之一。普雷弗相信自己的知识和判断，向纪德奉献了一首反偶像的讽刺短诗[④]：

有点儿过于隆重

---

① 关于这一自杀事件的叙述见 Paul Dupuy,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amis de l'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1947; Marcelle Auclair & Françoise Prévost, *Mémoire à deux voix*, Seuil, 1978, p. 201; Marcel Déat, *Mémoires politiques*, Denoël, 1989, p. 146.

② Décades de Pontigny, 1910 年至 1939 年之间由保罗・德雅尔丹（Paul Desjardins）策划并主持的知识分子聚会。每年在蓬迪尼修道院举行，为期十天。与会者包括作家、学者、科学家等，讨论文学、哲学和宗教问题。——译者注

③ André Maurois, *Sa plus grande force*,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28 juillet 1960.

④ Marcelle Auclair & Françoise Prévost, op. *cit.*, p. 147.

《如果种子不死》①先生
亲自宣称：男同性恋
只不过是个小手淫者

普雷弗是电影爱好者，《欧洲》(*Europe*)和《新法语杂志》(*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的专栏作者。他不仅是一位饥渴的知识分子，在征服女人方面也非常成功，他对妻子无所不谈，根本不顾及对她的伤害。他蓝色的眼睛、坚定的语言、惊人的记忆力和神一般健美的身体使巴黎社会为之倾倒。他为自己辩解道："每一位欢娱的女伴都是世间独一无二的。"他追逐着新的女人、抚摸着新的身体、搜集着新的"无意识的或粗俗的话语"……

然而作为作家，他一直不太成功。1925 年至 1939 年间他写的 25 本书留下了某种未完成状态，好像他在文学上不能像在体育和爱情上那样完全支配自己过人的精力。他曾经建议自己唯一钦佩的艾吕雅："放弃一种除了束缚和偏见不能再带来什么的革命。"②而他自己还没有完全理解作家的职业，没有完全懂得人及生活。如同他在 1939 年宣战那天向安德烈·尚松所说的："有两种作家：40 岁之前的和之后的……"③显然，他期待着自己的未来。

未来在这次谈话两天后就开始了，1939 年 9 月 3 日，他应征参加勒阿弗尔港电讯服务的工作。尽管他有加入作战联合体的计划，但他还是在那里一直待到了法国投降。这份工作给了他大量的闲暇时

① 《如果种子不死》(*Si le grain ne meurt*)，纪德 1926 年发表的自传性作品。——译者注

② Jean Prévost, *L'amour, la poésie, par Paul Eluard*, NRF, 1er août 1929.

③ André Chamson, *Quand Jean Prévost pensait à 1960*,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 20 janvier 1949.

间，他利用这些时间研究司汤达，还出版了一本出色的诗集《业余诗人》(*L'Amateur de poèmes*)，与布莱希特[①]、贺拉斯、加西亚·罗卡[②]的诗集成套出版。这是一次才华的显示，普雷弗的散文总是摆脱不了高师预科班风格的华丽修辞，而他的诗歌则自由而精美，确立了他一流诗人的地位。这本杰作之后，他在战争期间又写了一连串如珍珠般优美珍贵的诗作。1940 年 4 月(与马塞尔·奥克莱尔分手三年后)，他与第二任妻子克劳德·冯·碧艾玛结婚，他最美的一首诗《小小的遗嘱》[③]就是献给她的：

克劳德，如果战争是不确定的，
某个如此美丽的清晨将把我带走，
双脚朝前，
别把我们的名字写在地上。
我希望我的尘埃，
在风中消逝。

1940 年 6 月 12 日，为躲避勒阿弗尔的大火，在疏散的海船上，他写下了这首诗，开始了他被杀害前的最后一个创作阶段。这些作品和他的两篇关于司汤达和波德莱尔的文章仍打动和吸引着今天的读者。

他先在夏尔堡避难，后又转到卡萨布兰卡，直到 8 月 27 日才回到法国本土里昂。克劳德是犹太人，她被滞留在了北部地区。普雷

---

① 布莱希特(Brecht，1898—1956)，德国诗人、戏剧家。——译者注

② 加西亚·罗卡(Garcia Lorca，1898—1937)，西班牙诗人、艺术家。——译者注

③ Jean Prévost，*Derniers Poèmes*，p. 23.

弗向在战前结识的德国散文家弗里德里希·西堡(Friedrich Sieburg)求救，他写了一封解释情况，请求西堡帮他的妻子和女儿办护照。信中写道：

"……我不愿意有任何模棱两可的意思，我必须告诉您在这场战争中我曾艰苦地参军尽责。法国人此刻对德国的屈服在我看来和1919年德国人向法国的屈服一样令人蔑视。最终的胜利或停战都不会让我在思想上让步。"[①]1929年，敌视他的尼赞在普雷弗身上只看到了"一个将自己的懦弱掩藏在理性背后的行动派的年轻布尔乔亚"[②]；而1940年夏，普雷弗已选择了做一名抵抗者。

在韦科尔

1914年3月，普雷弗像往常一样来到格利诺布尔图书馆，参阅司汤达的手稿。他和妻子习惯到韦科尔山脚下的萨斯纳日海岸边他们的朋友建筑师皮埃尔·达罗兹(Pierre Dalloz)和画家亨利特·格尔罗(Henriette Gröll)家稍作停留。皮埃尔·达罗兹回忆道："……我们在砍一棵胡桃树，普雷弗向我解释应以什么方式、从什么角度下手。一切都是他进行分析的机会，都是他寻求这种风格的借口。我听他说着，脑子里想着其他的事情。我考虑着此地这一天然堡垒的资源状况，考虑怎么利用它摆一出克敌制胜的战局，让韦科尔山成为空降作战部队的着落点，就好像特洛伊木马计一样。普雷弗是第一个知道韦科尔堡垒机密的人。"[③]连续两年，韦科尔山只是一个计划、

---

① Odile Yelnik, *Jean Prévost*, Fayard, 1979, pp. 146～147.

② Paul Nizan, *Jean Prévost—Dix-huitième année*, *Revue marxiste*, mai 1929.

③ Témoignage de Pierre Dalloz cité par le général Alain Le Ray lors du colloque *Hommage à Jean Prévost*,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4 mai 1992.

一种希望。直到1943年1月,皮埃尔·达罗兹的念头才变为现实。伊夫·法尔热(Yves Farge)、让·穆兰(Jean Moulin),然后是德莱斯特克(Delestraint)将军都对韦科尔山的想法建立了信心并产生了热情。第一届军事委员会成立了……5月,军事委员会遭到致命打击,一个大搜捕浪潮除掉了一部分人,迫使其他人四处逃身。普雷弗最初被列入保留名单,因为他住在里昂,此刻他投入了行动。他是第二届战斗委员会的五个成员之一,化名高德维勒,多少成了韦科尔游击队基地的总管。普雷弗接受了一些冒险的任务,比如去巴黎取十几个假身份证,这些身份证被他藏在一个装满土豆的大包里;或者去取上百万法郎的抵抗运动的经费,他把它们掩护在洋葱下……最绝妙的计谋是,1943年普雷弗获得了依附于贝当的亲希特勒分子阿贝尔·博纳尔(Abel Bonnard)主持的法兰西学院的奖励,他就住在紧靠巴黎里昂站的帕兰旅馆(hôtel Palym),里面住满了德国士兵,他知道盖世太保是绝不会在穿德军制服的人中间搜捕抵抗运动的负责人的。

此后,普雷弗就住在韦科尔山北边的弗瓦洪。他骑自行车完成了大量任务,带着田径运动员的欢乐,他奔波在山区倾斜的道路上,一周能骑上几百公里。陪伴他的罗兰·贝克曼回忆说:"在抵抗运动中,他骑车经过的总公里数和攀山的高度常常比他克服的险情更令他自豪。他对自己要求严苛,甚至在体力方面也不能承认自己达到了极限。他比我更有耐力,常把我远远甩在后面,为此他显出很得意的样子。但有时候,他固执己见,常常超出了体力的极限,仅靠意志撑着,就像日后我看到他在战斗中表现的那样。"[1]待到积雪融化的季节,在奥图·阿贝兹(Otto Abetz)的唆使下,他的朋友德阿被拉瓦勒(Laval)提名出任伪政府的劳工部长,而普雷弗则和妻子在离圣阿涅

---

① Marcelle Auclair & Françoise Prévost, op. *cit.*, p. 238.

昂很近的瓦莱茨——韦科尔的中心地区定居。一天，罗兰·贝克曼在那里给他拍了一张照片。他显得很庄严，脸庞饱经风霜，这一刻他像传说中的古罗马共和国的英雄一样散发着勇气、意志和自我牺牲的光芒。他不畏惧反侵略者的战斗的考验，他渴望战斗，因为他看到了洗刷失败耻辱的机会，1940 年的战败耻辱深深地刺伤了他。

既然一切都将破灭

1944 年 6 月 15 日，尽管抵抗者们英勇顽强，高德维勒-普雷弗和他的战友们还是被有强大后援的敌人包围了，圣尼兹的抵抗力量已不再对敌人形成威胁。连续三天的战斗已使普雷弗筋疲力尽，他“竭尽全力奋勇杀敌”[①]，但当纳粹的暴行扫荡这个小村庄时，他再次与罗兰·贝克曼一道联合韦科尔的其他抵抗者们越过山脊投入战斗。

为了防御最后的攻击，游击队基地重新组织了防守。普雷弗对这次悲剧性冒险的最终军事后果不抱任何幻想，他决定与同伴们占领高罕松地区。他像爱“自已的儿子”[②]一样爱他的士兵。士兵们哼唱着《在我的金发美人身边》，跟随着这位每晚阅读蒙田作品的与众不同的长官。他将指挥部设在了一个四边环山中间荒芜的小山谷边的埃尔布伊农场。高德维勒上校整天视察哨岗，努力改善拉得过长的防御部署，直到日暮时分，他才从包里掏出打字机，继续写几页关于波德莱尔的文章，或写一点儿关于游击队员的笔记，他希望日后能将他们的勇敢精神和战斗故事描绘出来。

---

① Témoignage de Roland Bechmann lors du colloque, *Hommage à Jean Prévost*.

② Yves Farge, *Rebelles, soldats et citoyens*, Grasset, 1946, rééd. Crémille, 1971, p. 91.

他从不参与韦科尔“共和国”的军官生活，他很清高，不肯参加圣尼兹战役后组织的滑稽的庆功游行。他讨厌很多军官极欣赏的军队仪式——作为高师人他一生都蔑视的等级制传统。

不要上当受骗
也别再执行什么任务
胆怯懦弱有何用，
既然一切都将破灭
一切都不会再来？

在翻译布莱希特的作品时他写道。他不在乎空洞的荣誉，它们只能令大人物的骄奢之气不断膨胀。他的朴素和善意为他赢得了真诚的朋友，他所交往的这些朋友有军官也有平民。

韦科尔山不现实的安宁日子到1944年7月14日终于结束了。从6月中旬以来大家曾经如此盼望联军在法国南部登陆或在韦科尔山空降，但长期以来，普雷弗就明白这个山区大本营正一点点变成岩石陷阱。现在普雷弗指挥的不到400名士兵要保卫15公里长的防线。而德国党卫军在来自高卡斯的援军的支持下侵入了山区，有条不紊地施展他们残暴的能耐，焚烧房屋，屠杀男人、女人和孩子。7月22日，他们与普雷弗的游击队员遭遇。如同在圣尼兹战役中一样，为了击退敌人和保护战友，普雷弗不可思议地顽强战斗着，一种慷慨的绝望支撑着他抗拒战斗的残酷逻辑。一位韦科尔的指挥官说：“我仍记得在战斗的最后几天里普雷弗的样子。美军或英军向我们空投了反坦克火箭筒。然而我们没搞懂怎样使用那个防止滚烫的火药粉溅到开炮者脸上的活塞。普雷弗一整天都在打火箭筒，他整个人红了，像个红种人。他在萨斯纳日海岸中弹倒下之前，我所见到

的他的最后形象就是一个脸色猩红的年轻小伙子。"[①]

尽管曾经战功显赫，也牺牲了许多倒在德国炮弹下的战士，但自7月23日起，韦科尔山的最后一场战役还是失败了。撤退的命令下达后，幸存者四下穿过敌人控制的一个山区树林得以逃生。

在两位圣马丁本地的游击队员的指引下，普雷弗和几个同伴在圣阿涅昂临河村边找到了一处德军地图没有标示的仙子洞(Grotte des Fées)藏身。他们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饱受饥饿的折磨，眼看着德军焚烧每一个村子的可怕景象而痛感无能为力。普雷弗失去了耐心，他难以掩饰对妻儿命运的担忧。一天，他独自去了几公里之外的瓦莱，希望重新见到他的妻子……徒劳！他和西蒙·诺拉讨论司汤达，他还向诺拉透露了自己真实的身份，长达几小时的谈话没能安抚一个困于陷阱中的诗人和战士。他因无所行动而恼怒，终于决定离开韦科尔，去和伊塞尔的游击队基地与他的朋友阿兰·勒海会合。不顾那些比他更了解山区的严酷地形的同伴的警告，他决定出发去格利诺布尔。

7月29日晚，在八名游击队员的陪同下，普雷弗离开了山洞。在树木茂盛的山脊上步行了两夜后，还剩四位内地军战士留在了高德维勒上校身边，其中一位于连中尉在当兵前也是一名诗人。格利诺布尔就在他们眼前——迷人而致命的地平线！7月31日到8月1日夜间，他们筋疲力尽地离开了恩然村，沿着弗洪河峡谷小路向萨斯纳日前进。5点30分，天空露出了第一缕曙光，这支疲惫的小队伍备受鼓舞。萨斯纳日海岸和好友皮埃尔·达罗兹就在几公里外。普雷弗加快了脚步。他们太疲惫了，不再有耐心也顾不上危险，丧失了必要的谨慎。于是，在到达要塞之前，他们没有绕道穿越森林和岩石，而是继续沿着这条平坦的大路向夏尔维桥的方向走去。人们曾跟他们

① André Chamson, *Il faut vivre vieux*, Grasset, 1984, p. 39.

说过萨斯纳日的大路上没有德国人，畅通无阻……还没走到桥上，一个敌军的步枪手就对他们开火了。受了致命伤的普雷弗以"运动员式的最后一跳"[①]越过桥栏杆，摔在湍流的河床上。他的四个同伴在同一时刻被击毙。

一个月之前，共和国专员伊夫·法尔热曾问他是否考虑在解放后写一部关于韦科尔基地和游击队员生活的小说，他回答道："写作之前，必须战斗。"[②]这个对爱、对女人无比敏感的诗人，体魄如半神一样健美的高师学生，在预科班时就笃信一句格言："激烈地捍卫温和的思想"[③]；他毫不犹豫地将他的生命和残篇断章奉献给了反抗暴虐的人道主义战争。

---

① Témoignage de Roland Bechmann lors du colloque *Hommage à Jean Prévost*.

② Yves Farge, op. *cit.*, p. 94.

③ *Dix-Huitième Année*, p. 142.

马克思主义大学

大战、冷战之后，高师选择了它的阵营。在知识分子公开干预社会政治的年代，这座知识分子的生产基地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想的温床。高师人在对斯大林的崇拜中结为同志。年轻一点儿的更喜欢毛泽东和卡斯特罗。在新时代的边界，革命从余乐姆街的角落开始了……

精神的古拉格①

高师 20 世纪 50 年代的历史始于一个错过的机会。顶着一头爆炸式棕发的年轻唯美主义者多米尼克·费尔南德(Dominique Fernandez)是当时路易大帝高中预科班最有天分的学生。他是批评家哈蒙·费尔南德(Ramon Fernandez)和一位高师女学生的儿子，他的文学感觉和古怪行为都令同学们惊讶。

其他的学生满足于贫乏的教学大纲课本，而他只研究收入"七星

① "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苏联列宁与斯大林时期劳改制度的象征。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将这种制度喻为"群岛"，意在指出它已经渗透到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变成了苏联的"第二领土"。——译者注

丛书"[①]的作品。一天，在作关于波德莱尔的课堂发言时，他带来一台留声机，同学们很惊奇，他放了一段瓦格纳的《罗恩格林》(*Lohengrin*)的序曲。他给自己起了个别名"帕尔默德"——《追忆逝水年华》中夏吕斯男爵的名字。他热爱一位同窗好友，这人日后成了一名耶稣会会士……这位年轻的预科班学生很早就受到了文学界认可，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亲自帮助他在《圆桌》(*La table ronde*)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

通过1950年的会考，费尔南德被高师录取。然而在开学前的长假里，一次旅行改变了他的生活。以趁"圣年"之机拜会教皇的名义，他首次参观了意大利。他宿营在靠近热内亚的佩格里，一个面朝大海的欢乐的小村子……美不胜收。这个年轻人全身心地感受着地中海的启示——它的光线、气味、声音，它愉悦亲切的文明。

秋天渐至，他必须回巴黎了。这一学年余乐姆街的第一门课是关于拉丁文的。费尔南德吃惊地发现他的同学们从宿舍里出来，穿着灰色的旧睡衣、趿着拖鞋，被拉丁文的性、数、格变化搞得面黄肌瘦。"渺小、琐碎、非审美，在满是灰尘的地窖般的装饰中。"他回忆道。他再也无法忍受。第二个月，他就获得了一笔去米兰的奖学金，后来在比萨高等师范学校度过了1951至1952学年。

他在巴黎高师读书的意大利表妹则与他恰恰相反。在比萨，她住着城里最豪华的房子。而费尔南德的房间不是对着宏伟的先贤祠，而是面朝可爱的圣斯蒂法诺教堂。在这座小乐园里，这些"火一般热情的小伙子们"学习着意大利文、希腊文、建筑和音乐。没有什么学科是被排斥的，没有枯燥的唯理主义。费尔南德完全被吸引了。他又花了一年的时间准备意大利的教师资格会考，之后一生也没有

① 法国伽里玛出版社的一套丛书，收录历史上最经典的文学作品。——译者注

再跨入余乐姆街。

党支部

意大利，美、艺术、音乐……这些很重要。而费尔南德的同学们在战后的这些年操心的是更严肃的事情：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辩证法。四分之一的高师学生注册加入了共产党。20世纪50年代初期，高师党支部有五十多名党员，皆非等闲之辈，包括未来的历史学家埃玛纽尔·勒华拉杜里和保罗·维纳，未来的文学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及未来的社会学家让-克劳德·帕瑟隆(Jean-Claude Passeron)等。米歇尔·福柯与路易·阿尔图塞在此重逢。那里甚至出了共产党的领导人皮埃尔·余干。

在人文科学革命之前，这些高材生梦想着整个世界的革命，而不是成为像萨特或于勒·罗曼式的高师人。20世纪50年代"新气象"的高师学生很反感他们前辈的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不服从所谓的"高师精神"。他们只有一个理想：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一个偶像：斯大林……

他们要和过去彻底决裂。屋顶上的诗意漫步、游园会、毕业集体照统统被取消了。在东风的清扫下，在斯大林"冰冻期"的作用下，高师彻底改头换面。余乐姆街的围墙贴满了《人道报》的头版。党员学生们几乎一直聚在学校的玻璃门厅开会。沾满油渍的反对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或李奇微(Ridgway)访法的请愿书流传在酒会上、食堂里。

学生们沿着走廊敲开一间间宿舍门，募集捐款为斯大林的70岁生日奉献一份礼物。这不是开玩笑……高师梦想着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这些年，这所古老的学校实际上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精

神古拉格"[1]。

余乐姆街党支部的领导人包括日后的司汤达研究专家米歇尔·克鲁泽(Michel Crouzet),因对斯大林主义忠心耿耿而被戏称为"哥萨克骑兵"。还有勒华拉杜里,这位未来的《蒙塔尤》(*Montaillou*)的作者、虔诚的共产主义者是高师的党支部书记、学生工会主席、国家教育联合会和全法学生联盟的大学院校代表。他是位说政治套话的高手,在发表演讲、组织"社会主义竞争"和打击落后分子方面才能出众。

勒华拉杜里整天揭发维护资产阶级秩序的"警察"——包括在高师的同学之间,他以党的名义实施了一种真正的思想恐怖。学校的一些托洛茨基派分子被定为"叛徒",唯一的戴高乐主义者(未来的第戎市市长罗伯·布亚德)则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者"。

勒华拉杜里本人也付出了代价。他近视、文弱,却热衷于所有的游行示威运动,勇敢地承受最大的打击。由于积极参政,忽略了学习,他把亚维农的教皇宫说成是罗马艺术的代表作,为此他差点儿没拿到学士学位。入学考试他是最后一名,在历史教师资格会考中也挂了红灯。他的命运似乎已完全明朗,另一位历史学家保罗·维纳回忆说:"我们都认为他会是一名未来党的高层人物。他已经有点儿部长的派头,比那些煤炭工般虔诚的书呆子强得多,他不和我们中间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来往。"

然而,勒华拉杜里永远也没能成为一名党的领导人。他的资产阶级出身——诺曼底一位做过维希政府部长的大地产商的儿子——一直是他进入中央委员会的障碍。高师的另外一名学生皮埃尔·余于更为成功,这位 1951 届的德语文化专家一直升到了法共政治办公室。

---

①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Paris-Montpellier*, Gallimard, 1982, p. 77.

这些斯大林"冰冻期"的受害者、原本优秀的思想家完全放弃了批判立场。他们在巴黎学生共产党员的阵地《清晰》(*Clarté*)杂志上大力宣传党的官方作家。敏锐的文学批评家热奈特承认:"我认为皮埃尔·古尔塔德是一位大作家,阿拉贡是个天才,弗日洪是位大画家。"[①]勒华拉杜里沉醉于"斯大林的国度"(*Le Pays de Staline*)丛书[②]中的浪漫小说。它们描绘了"一个美妙的世界,那里有年轻的金发碧眼的集体农庄女社员、婴儿和托儿所、护栏电网、袖子高高卷起的强壮的拖拉机手……"[③]他们把"天才的斯大林"的书当做哲学著作来读,有些人甚至陷入了偶像崇拜。今天,勒华拉杜里是巴黎七大备受尊敬的哲学教授之一,当年他不仅在宿舍里挂着斯大林像,自己还留了胡子,叼着烟斗,摆出一副自负的架势,使自己看起来有点儿像那位人民的父亲。

只有一次,这些知识分子提出了异议,即政治办公室出了一条法令禁止党员同志们阅读《世界报》。尽管余乐姆街的同志们很乐意去推销《人道报》,却不想放弃他们平时最喜爱的读物。

这种思想恐怖的气氛使最不易受影响的学生也感到压抑。1950届哲学系的一位非党员学生说:"我对自己说,由于我不相信'一切都要社会化',我的思想是没有任何价值的。"1952届的哲学家米歇尔·塞赫回忆道,余乐姆街成了一个可怕的地方,"在那里我们要经过斯大林法庭,受到这样、那样的被称为'思想犯罪'的指控,还有一个纠察队专门去宿舍抓学生来接受审判"[④]。学生们的私生活不再受到保护。一个党员同志被传讯,被迫与一位甜点店的女店员——"被他迷

① Entretien avec Gérard Genette, septembre 1992.

② 法国1950出版的一套歌颂社会主义的长篇小说丛书。——译者注

③ *Paris-Montpellier*, p. 92.

④ Michel Serres, *Eclaircissements*, éd. François Bourin, 1992, p. 15.

惑的诚实的无产阶级姑娘”断绝了关系。

在东西方对抗最激烈的时刻,高师人要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作出积极的贡献,必要的话甚至使用暴力手段。游行、罢课、请愿愈演愈烈。在宣传和平的活动中,他们揭发了高师的物理实验室在伊夫·罗卡尔(Yves Rocard)的领导下进行原子能试验,研究凝固汽油弹。美国将军李奇微到达巴黎时,他们组织成统一战斗队,装备着短棍去迎接。在印度支那地区,当越南胡志明联盟突袭了法国远征军时,余乐姆街的住校生也进行了突袭行动,他们袭击了五区的警察,结果遭来警棍的驱打并被抓进了夜间班房。

高师人战斗的号角吹响了1951年抗议艾森豪威尔将军访法的大罢课。一百多名高师学生在反对艾森豪威尔的请愿书上签了字并举行罢课。场面非常壮观:法兰西共和国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因为抗议战胜纳粹的英雄而变成了一座死城。这次运动差点儿造成外交风波,美国大使甚至敦促法国政府处罚高师学生。当月的共产党杂志《新批评》写道:“120名高师学生参加的反对艾森豪威尔将军访法的群众抗议和爱国罢课运动招来粗暴镇压的企图:在美国大使馆的直接干预下,一位部长顾问打算开除20名学生和完全关闭学校一个月。便衣警察开进了学校,学生会议已经被禁止。学校领导三次企图把学生交给纪律委员会处理,三次都迫于高师人精诚团结的压力而屈服。”

“镇压”只在小范围内进行。1951年7月的文学和哲学的教师资格会考中,落榜的名额反常地比往年多了许多。一些评委会成员毫不犹豫地严惩参政的高师学生。“文学评委会的勒伯涅克(Le Boniec)先生对愿意听取意见者说,高师人‘不再学习’,他们参与了‘过多的政治活动’。”①

---

① *Les normaliens nous écrivent*, par Pierre Olivier, *La Nouvelle Critique*, n° 34, mars 1952.

圣日耳曼德普雷[①]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如此,余乐姆街的党支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一个六七个人组成的小团体激起了小小的分裂。他们是热情洋溢的普罗旺斯人保罗·维纳和让-克劳德·帕瑟隆,未来优秀的社会学家、《可怕的儿童》(*Enfants terribles*)的作者德·达尔热洛(de Dargelos),纺织工的儿子热拉尔·热奈特及其他几名原亨利四世高中的学生。他们自视为艺术家,与同性恋者打情骂俏,培养了一种反权威的趣味。他们互相戏称"黑手党",其他人则不无轻蔑地称他们为"民间组织"或"圣日耳曼德普雷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小团体的偶像是比他们大两三岁的米歇尔·福柯。福柯在高师教心理学,他喜欢嘲讽,才华横溢又焦虑不安,已开始沉迷于对疯狂的研究。他是共产党员,为了表明其正统性,甚至在自己的心理学讲座课上引用斯大林的话。但政治不是他最主要的兴趣。据这一时期跟他很熟的保罗·维纳说,福柯是"一个毕加索式的共产党员:因为一个创造者生来就反对这个社会"。[②] 1950 届的学生、音乐批评家安德烈·杜伯夫回忆说:"周六晚上的酒会,我常和他坐在一张桌上。我们既不谈政治也不谈哲学,哼唱着巴赫的弥撒曲。阿隆每周六晚上都来找他,他们一直在闲扯,简直像门房太太瞎聊天。他们的谈话往往以下流故事结束。"[③]晚会通常在学校医务室的福柯的房间里进行,那些年轻的崇拜者——"圣日耳曼德普雷的马克思主义

---

① Saint-Germain-des-Pré,街道名,巴黎拉丁区的象征,高师、索邦等众多高校都聚集在附近。——译者注

② Entretien avec Paul Veyne,août 1992.

③ Entretien avec André Tubeuf,juin 1992.

者"——聚集着坐在他们脚下的靠垫上,"在一种暧昧的忏悔室般的气氛中"讲着其他学生的笑话。

在福柯的保护下,这个小团体进行了反抗。他们天真地梦想着一个更开放的党。热奈特被提名担任巴黎的学生党员刊物《清晰》的主编,1954年暑假他准备将刊物改版得更现代化,减少斯大林主义的味道。但他的计划遭到了党领导的拒绝,他既难过又吃惊。上级尖刻地批评他:"这个年轻的高师学生屈服于'小资产阶级的唯美主义',想拙劣地效仿《新观察家》,他不明白《清晰》只是一本战斗刊物。"

面对这些套话和党的铁的纪律,只有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对付了。帕瑟隆是这方面的专家。在一次和平委员会讨论原子能危险的会议上,他在总结与会者的发言时说:"如果我理解得正确,这就是说苏联的原子弹是和平的,因为这是和平阵营的炮弹……"

另一次,在与一名"法兰西行动"的学生领袖讨论了战略同盟的问题后,帕瑟隆被一位强硬派的党员同志责问道:

"我希望你至少没有和他握手!"

"为什么不?莫洛托夫还和李宾特洛甫[①]握手呢!"

在场者大笑……

然而"民间化倾向"的抗议也不过是一时兴致。小团体的一位成员回忆说:"我们对党的反叛是极其天真和含混的。"

历史的意义

为什么如此众多的高师人倒向了斯大林主义?答案是多重的。

① 分别是苏共领导人和希特勒德国的外交部长,1939年二人出面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译者注

首先，刚从战争阴影走出来，牺牲了七万五千名党员的共产党的盛名、伟大的苏维埃联盟的威望和斯大林的神话充满了那个时代。有一些人，他们的父亲在与德国的合作中玷污了双手，这些人不自觉地有一种赎罪和还债的愿望……

第二种解释是：高师人博学的教条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院哲学那里找到了自我。那个时代，在余乐姆街的宿舍里，我们会为了确定《不要碰金钱》[1]是不是一部“新形式主义的”电影而讨论一整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怀有一种不可否认的革命浪漫主义情绪。并非偶然，这个时代被阅读得最多的作家不是萨特，不是阿拉贡(Aragon)，而是马尔罗，是《希望》和《人类的状况》的作者的马尔罗，而非日后为戴高乐在法国国民议会上造声势的“法西斯主义者”的马尔罗。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神化了工人阶级，神化了圣丹尼(Saint - Denis)或比扬库尔(Billancourt)[2]的无产阶级堡垒。他们随时准备牺牲，梦想着与工人同志们肩并肩地走向社会主义乐园，继承 1871 年巴黎公社和 1917 年彼得格勒的遗产。皮埃尔·余干回忆说：“我的很多同学走向了无产阶级。这是一种救赎的神学。我自己也是一个红色僧侣。有一种‘历史的意义’有待发现。我们想参与一项‘伟大的创造’。”

余乐姆街的罗伯斯庇尔们知道光明背后的阴暗面——苏维埃也存在着古拉格集中营吗？保罗·维纳回答到：“我们努力去保有一种信仰。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包括集中营的存在，但我们想忽略它……”

---

① *Touchez pas au grisbi*，1954 年，法国犯罪片大师雅克·贝克(Jacques Becker)的代表作。——译者注

② 巴黎的两处工人聚居的近郊区。——译者注

德里达与布尔迪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高师人都顺从了压倒一切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些人,比如1952届的雅克·德里达就保持了自己对另一种主流思潮的兴趣:现象学。雅其(Jackie,他的真名)出生在阿尔及尔的郊区埃尔比亚。他小时候曾梦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他是带球能手、回闪和假动作的专家,在哲学领域有着与在足球场上同样的敏捷。他是一个解释文意的高手,已经有了自己的方法和拥护者。在一次课堂发言中,他指出了胡塞尔文本的七重含义,令高师的哲学巨擘路易·阿尔图塞惊叹不已。但这一切并没能避免他在第一次教师资格会考中的失败。用当时的话说,“考试失败并不是判定了应试者的水平,而是谴责了考试制度……”

布尔迪厄也同样,这个贝亚恩人体格健壮、棱角分明,在足球方面的天赋如同他在社会学中的表现一样出色。大家叫他“费力克斯”(他的中间名),因为他的头发浓密直立,看上去像一只大猫。但他觉得自己更像一只丑小鸭。他出生于“外省和民间”,置身于学院的高墙里令他感到不自在。尽管也有其他的学生与他情况相同,他还是感到自己能侥幸通过严格的入学筛选是一个奇迹。他并没有沾沾自喜,却总感到一种隐隐的怒气。他很高兴尼赞刻毒地揭露这所老学院在培养“资产阶级的看家狗”[1]。正如布尔迪厄在预科班的同学多米尼克·费尔南德所说的,“他被一种不寻常的报复欲所激动,对我们巴黎人抱一种不信任感,甚至他健硕的体格看起来也是在宣扬反巴黎主义。我不知道他是否克服了这种感觉,是这种感觉激发他写

---

① Pierre Bourdieu, *Aspiration philosophe*, in *Les enjeux philosophiques des années cinquante*, éditions du Centre Georges-Pompidou, 1989.

出了《继承者》(*Les Héritiers*)这本优美的书……"

在高师,布尔迪厄还没有发现反学院体制的武器:社会学。此时他在扩充笔记、储备资料。什么也逃不过他批判的眼光,包括教授们的骗术,"他们的哲学即兴发挥纯粹是做戏",他们以社会阶层来衡量学生(一个清洁工儿子的作业肯定会被评为"谦卑的"),还有他的小同学们为了确保日后有更舒适的职业生涯,为了占据要职而已经使出的各种伎俩。至于体制本身,他写道:"这所被认为是自由思想与批判精神的圣地学院,提供的是符合学院规则的各种学科培训,它们合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分工或者腼腆地进行反学院派的学院派改良,而不是准备去进行决裂式的科学研究或先锋的文学艺术的反抗。"①

布尔迪厄的反叛本应使他归附共产党,然而却把他引向了相反的地方。他说:"20 世纪 50 年代,斯大林主义的压制如此令人气愤,以至于 1951 年左右我们在高师[包括比昂科(Bianco)、孔德(Comte)、马罕(Marin)、德里达、巴利昂特(Pariente)等人]成立了一个捍卫自由委员会,勒华拉杜里向校党支部揭发了这件事……"②在 1988 年《解放报》的一个采访中皮埃尔·余干错把布尔迪厄说成了高师党支部的成员。这位社会学家大怒,第二天就冷酷地让《解放报》作出更正。余干也不甘示弱,他说:"如果布尔迪厄不是党员,不管怎么说,他来参加支部会议。"

无论怎样,在所有高师出身的人文学者中,布尔迪厄无疑最持久地受这所学院的马克思主义气候影响。知情人勒瓦拉杜在谈到布尔

---

① Pierre Bourdieu, *Epreuve scolaire et consécration sociale, les classes préparatoires aux grandes écoles*,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 39, septembre 1981, p. 59.

② Pierre Bourdieu, *Choses dites*, Minuit, 1987, p. 13.

迪厄时,确信"这位大学者是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之一。对他来说,学院和大学体系以及它所灌输的文化基本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我们这些人在20世纪50年代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过于简单化了"①。

斯大林之后能有新生吗?

1953年3月,高师人头顶上的天塌下来了。斯大林,不朽的斯大林,逝世了。余乐姆街进行了追悼活动,75名高师学生(高师共有200名学生)向苏联驻法大使表达了沉痛的哀悼之情。

他们写道:"斯大林元帅的辞世促使我们去衡量这位国家领袖、联合国的缔造者之一为和平、民主和人道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这位伟大的建设者的名字多么紧密地联系着人道主义解放事业的希望,这希望活在所有民族的人民心中。我们极其沉痛地看着他非凡的顽强生命被疾病和死亡摧毁,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这就是他本人的理想。"②

从今以后,一切都不会再像从前了。斯大林逝世后,高师的共产主义开始缓慢地衰微。斯大林逝世一个月后,"白袍子"得到平反,这些犹太医生曾被指控搞阴谋。这一事件引起了反思。福柯等一些人开始与共产主义保持距离。

1956年,先是赫鲁晓夫的报告公之于众,后是苏联战车进入布达佩斯。已经动摇的余乐姆街的党支部开始分崩离析。

《世界报》的记者贝特朗·布瓦罗-代勒贝克(Bertrand Poirot-Delpech)发现高师的党支部混乱不堪:"在余乐姆街的高等师范学

① *Paris-Montpellier*, p. 79.

② Clarté, n° 41, mars 1953, p. 2.

校，再有能耐的共产主义者也难以支撑一个星期。《人道报》有好多天都没有张贴了。大家谈论着辞职的事，一位原党支部书记、现在是勒芒(Le Mans)大学的教授已确定辞职了。一篇揭露布达佩斯镇压的文章已获得联合签名……"

"仅仅几年前，有四分之一的高师学生注册加入了共产党。现在两百名学生里只有十几个党员。不是匈牙利事件或一些有名望的新党员能够挽回局面的。"[①]布瓦罗-代勒贝克总结说。

布瓦罗-代勒贝克所提到的"揭露布达佩斯镇压的文章"出自高师左派学生雅克·朱利亚之手，他崇拜孟戴斯·弗朗斯(Mendès France)，是未来的《新观察家》杂志的社论作家，他说服了高师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在他的请愿书上签字，包括热奈特、保罗·维纳、让·莫利诺及其他人。朱利亚对这一行动深感自豪，他打电话到《世界报》编辑部告知余乐姆街发生的重要事件。共产党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由高师的正统党员皮埃尔·余干出面调停。

朱利亚说："余干亲自去做所有在我的请愿书上签字的人的工作。他把法共的第三号人物雷蒙·居约(Raymond Guyot)请到学校来，扭转党支部蜕变的情况。我看到好几个学生——我不说他们的名字了——灰溜溜地来到我的宿舍，把他们的名字从请愿书上划去。他们说他们知道得太晚了，'布达佩斯的暴乱是法西斯主义的'，说'我篡改了它的性质'等等。"[②]

说到"成为勒芒大学教授的原党支部书记"，布瓦罗-代勒贝克所影射的其实就是热拉尔·热奈特。出于反感，他也在朱利亚的请愿书上签了字，并撕毁了他的党证。在此之前他没有忘记再次推开高师的共产主义监护人路易·阿尔图塞的办公室大门。

---

① *Le Monde* du 17 novembre, 1956.

② Entretien avec Jacques Julliard, novembre 1992.

其实每当一个学生感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有所动摇的时候,他们都习惯于去找阿尔图塞倾诉——高师学生把这叫做“使自己阿尔图塞化”。1939 年期间,阿尔图塞在余乐姆街教哲学。这位改信共产主义的天主教徒当时还没有创作出使他名声大噪的理论著作。他喜欢给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提建议。他从不爽约,他的热情使他受到所有人的爱戴。他在办公室接见学生们,一个堆满书的洞穴,沉浸在昏暗的光线中正适合大家作忏悔。他是一位熟练的精神导师。一位前高师学生说:“他令我们确信、给我们抚慰、排除所有的争议,他简直就是智慧的象征。我们无法不爱他。”

然而 1956 年的这个秋天,热奈特积累了太多对党的不满。这个年轻人向他的“精神导师”直言不讳地说出了所有的心里话:苏维埃对匈牙利的进犯,以及法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上的过于软弱。那位哲学家沉默地听他说着。当热奈特最终结束了他的抨击,阿尔图塞狠狠地回应了他:

“你所说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因为如果这是真实的,你就应该退党。”

热奈特的回答令阿尔图塞大吃一惊:

“谢谢你,路易,你刚说出了我还可以做的事情。”

然而凭经验阿尔图塞也应该了解斯大林的做法。与他共同生活的女友海伦娜 • 勒高蒂昂(Hélène Legotien)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她是 1950 年春天一次真正的斯大林式审判的受害者。一次司法程序的闹剧,一次“发生在巴黎的真正的莫斯科式审判”①,阿尔图塞本人如是说。他被迫待在学校的高墙里。毋庸置疑,这是高师斯大林时期最令人痛苦的一段插曲。

是什么原因使海伦娜,这位模范党员、原抵抗运动者,遭到了党

---

① Louis Althusser, *L'avenir dure longtemps*, Stock/Imec, Paris, 1992, p. 195.

的打击？谁也不知道。有人说是因为她得罪了一位党的要员。在清洗运动中，由于可怕的报复，她必定会被判罪。她可能亲自拷打过一名民兵，还对她一个情人的死负有责任。这一说法至少是透露给某几位高师党员的版本。

对她的审判在党支部代表和有关人员的参与下进行，与学生的审判有所区别，但仍有几名学生参加。她已被驱逐出党领导的“和平运动”，被认定是一名托派分子、党的敌人、行为可疑的冒险家。阿尔图塞被责令和她划清界限。这位哲学家彻底垮了，他双手抱头，向压力屈服，最终接受了和海伦娜划清界限。

但他还是背着同志们秘密地去看她。这一残酷的事件加剧了这位大哲学家长期以来的抑郁情绪。然而他拒绝吸取教训，拒绝正视斯大林主义的深层本质。“我们不能退党……”后来，只有一名参与审判哲学家的女朋友的当事人对这次丑陋的私人法庭表达了后悔之情，他就是勒华拉杜里。阿尔图塞在自传中写道：“未来是漫长的，在这个可憎的团体中，唯一要请求原谅的是我自己。”

今天，我们无法不去联想，1980 年的一个晚上海伦娜在余乐姆街被杀，是不是阿尔图塞在 30 年后执行了高师党支部对她的判决？

打倒军政者！

1956 年以后，共产主义对余乐姆的影响逐渐衰微。带着巨大的失望，从沉醉了十年的教条主义中走出来，大多数人——勒华拉杜里、热奈特、保罗·维纳、福柯等——都退出了共产党，并开始了辉煌的学术生涯。他们在高等社会学院、法兰西学院等机构一直攀上学术顶峰，并在那里与他们的非党员老同学如布尔迪厄、塞赫和朱利亚重新相遇。

奇怪的是，恰恰在高师的共产主义进入低潮之际，党组织搞了一

些引人注目的行动。

1959 年，刚重新执政的戴高乐将军来高师参加新年舞会，大家深感很荣幸。说实话，没有人强迫他这么做。他与第四共和国的前任们不同，这位新总统并没有参加大学活动的义务。然而将军喜欢高师学生。这个冬天的夜晚，陪同他到来的还有何内・布鲁耶(René Brouillet)、乔治・蓬皮杜、阿兰・佩尔菲特。即将发生的事件令他非常痛苦。

戴高乐将军穿着蓝色制服，在校长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的指引下来到舞会大厅。就在这时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将军走近了一群穿礼服的学生，向他们伸出手去，然而没有一个人有所反应。他重复了几次这一动作，而他所靠近的学生们却一个个将手背在身后，故意不和他握手。

随从人员非常沮丧，校长痛心地看着这一幕。而将军则保持镇定，他匆匆在舞会大厅转了一圈就离开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阿兰・佩尔菲特回忆说："简直比他进场时还要冷静。"但他肯定深深地受到了伤害。

于是年轻的戴高乐派参议员佩尔菲特花了整晚的时间与羞辱抵抗运动领袖的学生们谈话，想了解他们的动机。

"我们不和独裁者握手。"他们这样解释道。

"我们不在乎这些老顽固。"另一个学生加了一句。

"我们学校拒绝拿破仑一世、拿破仑三世和贝当，拒绝军政者。"①

反对者中有一些不隐瞒他们的党员身份，另一些则只提马克思主义而不提共产党。

"苏联，我们不在乎！马克思主义者，这是自然的！斯大林主义者，永远不是！"

---

① Alain Peyreffite, *Le de Gaulle que j'ai connu*, Historia, n° 338, novembre 1974, pp. 86～96.

在 1959 年这个冷场的晚会上，戴高乐将军在余乐姆街的走廊里只是遇见了第一批左派分子、1968 年 5 月风暴反对派的先驱。他将来还有更多的机会见识他们。

盖吕萨克路的街垒

刚开学，未来的高师人几乎总会被某位名师醍醐灌顶的讲话震撼，将青春期的迷惑一扫而光。1956 年一开学，在著名的昂松德萨意(Janson-de-Sailly)高中的围墙里，出身巴黎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前途无量的金发少年海杰斯·德贝发现一位哲学大师雄辩的智慧可以引起“几乎是身体的欢愉”。35 年后，在一本纪念雅克·穆格里奥尼[①]的文集《共和国的庭院》(*Préaux de la République*)里，他以优美的笔调、毫不掩饰的情感和遗憾，回忆起穆格里奥尼老师的课：“一张讲台、一张木书桌、一面黑板。淡赭或淡黄色裸露的墙面，没有图片也没有招贴画……一个男人站立着，在讲台前走来走去地说着话……他费力地、严整地说着每一句话。像一位运动员清晨起来在空旷的体育场锻炼，每一个词语都花费着他身体内部似乎来自肌肉的努力。这个人浑身大汗，随着一个又一个理念，这位思想船夫有节奏的艰苦劳作，牵引着他身后三千年的理性。”[②]

未来的革命理论家海杰斯·德贝初次接触到哲学。这一代高师的英雄梦想着改变整个世界，德贝将用在高师学到的辩证法为人民服务。

---

① 雅克·穆格里奥尼(Jacques Muglioni，1921—1996)，哲学家、亨利四世高中哲学教师。

② *Texte repris dans Contretemps*，Gallimard，1992，pp. 55～56.

新 浪 潮

三年后，1960 年春，海杰斯·德贝成了路易大帝高中预科班最杰出的学生。“海杰斯·德贝的论文非同凡响!”[1]他的同窗好友马塞尔·贝纳布(Marcel Benabou)回忆道。德贝反对戴高乐政权，高师生中入学会考“状元”拒绝与到访高师的戴高乐将军握手一事令他深深地引以为荣。后来他写道：“对我来说，这就像 12 月 2 日的巷战一样了不起。”[2]“为了对下一次出现在我们堡垒中的资产阶级分子重复这一行动”，他加倍努力去成为第一个被接见的人。他实现了自己的雄心壮志，并且也没让教授们失望：他在高师的会考中名列第一。

像他的同学们一样，德贝一上预科班就卷入了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运动。游行、传单、没完没了的论战，反殖民主义聚集了他们所有的能量。余乐姆街的人文主义弟子大批地参加了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Union des Etudiants Communistes)，这一联合会标志着经过改造的时髦的赫鲁晓夫式共产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背道而驰。1960 年 2 月，尼赞的战斗檄文《亚丁阿拉伯》在马斯佩罗出版社再版，萨特为之作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这本火暴的小书一面市就成了“圣训”。高师的党员们欢欣鼓舞，把他们的党支部命名为“保罗·尼赞”。然而在共产主义学联组织的游行活动中，高师的住校生却很少冲在前面，学生领袖例外。低年级学生们喜欢编造自己的英雄事迹，这些故事太美了以至于不可能是真的：一个学生跑去向第五区政府门口站岗的警察咨询，他隔着一人高的矮围墙一边当众撒尿一边佯装非常恭敬地与那些警察说话。

---

① *Entretien avec Marcel Benabou*, octobre, 1992.

② Régis Debray, *A demain de Gaulle*, Gallimard, 1992, p. 11.

此外，恶作剧在1960届学生中又复兴起来。由于不满于散文作家让·迪什(Jean Duché)的自以为是，学生们请他到学校来作了一个关于《面对现代世界的永恒女性》(*l'Eternel Féminin face au monde moderne*)的讲座。才华能被高师的专家们赏识，这位大师深感荣幸，急忙赶到余乐姆街……结果那天晚上他被关到了厕所里。

还有一次，高师人对国家剧院发动了真正的讨伐。那天晚上，剧院正在上演蒙泰朗[①]的《西班牙红衣主教》(*Le Cardinal d'Espagne*)。第一幕刚演了一半，五十多名高师学生强行闯入大厅，傲慢地揭露这所“资产阶级剧院”的罪恶。剧院管理人员向他们发出了警告，保安人员赶到，毫不客气地将这些骚乱分子送到了警察局。高师学生唱起了《国际歌》，相信他们的保护人伊波利特很快就会让他们重获自由。伊波利特时任高师校长，他总是毫不犹豫地随时准备出发把那些被监禁的革命信徒领回家来。

然而中学生的这些恶作剧不足以满足德贝和朋友们的革命野心。当年轻人热衷于电台的《你好，伙伴们》[②](*Salut les copains*)节目时，德贝和马塞尔·贝纳布及克劳德·比尔热兰(Claude Burgelin)则为了同一个梦想联合起来。他们有着相似的文学趣味(布莱希特、卢卡契、萨特)，参与了以乔治·珀雷克(Georges Perec)为首的一个办刊物的计划。艾森斯坦的电影《大貌》(*La ligne générale*)的观念征服了他们，他们的杂志也以这部电影命名。马塞尔·贝纳布回忆说：“这份刊物一直都没有问世，但我们为它做了大量的工作，期

① 蒙泰朗(Henry de Montherlant，1895—1972)，法国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② 20世纪60年代法国红极一时的广播流行音乐节目，每天下午5点到7点播出。——译者注

待着它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美学。它不是日丹诺夫主义[①]，它将走向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并通往幸福之途。”编辑《大貌》的年轻人们不仅爱读马克思，他们也沉迷于电影，常常出没于离高师一百米远的余乐姆街的电影院，它位于国家教育学研究院的地下室。贝纳布说：“我们惊喜地发现了电影作者，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弗里兹·朗（Fritz Lang）……”直至1962年，《大貌》或多或少地调动起了这个小团体的活力。

一个高师人在古巴

德贝本人看得更远。从第一天住校起，他就在自己的宿舍里挂了一张大幅世界地图。他迷上了有关古巴革命的图片和文章，那些欢快的长着大胡子的英雄与苏共所宣传的偶像如此不同。在古巴导弹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德贝渴望参与其中。他敲开了位于福克（Foch）路的古巴驻法国代表处的大门。工作人员觉得他很有意思，回答他说：“我们记下了您的请求并向您表示感谢。您会尽快得到回音。”[②]

这种不予理睬的回答并没有令他气馁。1961年夏，他飞往纽约，满怀好奇地就近观察他的美洲梦，这一梦想吸引着无数的法国青年。“着陆”是艰难的，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发现了一个与电影里的形象截然不同的社会。“我一路搭车逃离纽约。一整个星期都在高速公路

①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行的文化政策，要求政府对艺术进行更严格的控制，提倡一种极端的反西方的偏见。日丹诺夫（Andreï Aleksandrovitch Jdanov，1896—1948），苏联政府及共产党官员，负责意识形态宣传。——译者注

② Hervé Hamon & Patrick Rotman, *Génération* 1. *Les années de rêve*, Seuil, *Points Actuels*, 1990, p. 74.

上，从一个言语恶毒的朝鲜战争退伍老兵的车到一个面部抽搐、吸海洛因的家伙的车，从一个开始腼腆后来放肆的同性恋者的车到一帮酗酒的种族主义的白人孩子的车……从迈阿密，我逃到了古巴。”[1]

德贝于7月14日到达哈瓦那，与此同时他就卷入了一场年轻人流行的夜间革命运动。卡斯特罗还没有成为领导者，切·格瓦拉也还没有成为必然的偶像。古巴首都的夜晚，在美国佬留下的奢华装饰中是一个永远的节日。在革命的盛宴中，他没有忘记曾许诺给共产主义学联的月刊《清晰》写一篇文章。他想更多地了解古巴革命，争取被派往山区的机会，在那里革命者们教当地百姓读书写字。在东部山区的腹地，一个古巴姑娘接待了他，她是政治特派员，像革命本身一样美丽。他在优美的自传《面具》(*Les masques*)里写道："我当时20岁。她有一双绿色的眼睛，黑白混血儿的肤色，而我脸色像红虾。分派给我的任务是给隔壁咖啡豆种植园的文盲农民家庭教课。我也不知道我教的西班牙语鼻音是否正确，他们时常露出疑惑的神色。刚到山区的时候，我连一个西班牙单词都不认识。”

他感到无限快乐。一回巴黎，他就激情洋溢地召集朋友们聚会，向他们陈述在这次激动人心的经历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因为他确信(他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反抗帝国主义的战斗将在拉丁美洲展开。马塞尔·贝纳布说：“而在巴黎，我们认为应该就地投入战斗，任何想去别的地方的想法都被指责为冒险主义。但德贝的建议如此热烈和光明，我们完全被震撼了。”

尽管他的热情和光辉榜样打动了他的朋友们，但在高师他没找到任何格瓦拉崇拜者。这些余乐姆街马克思主义信徒，“长满青春痘、文弱、近视”[2]，更喜欢介人风险较小的理论层面。对这些心怀疑

---

① Régis Debray, *Les Masques*, Gallimard, *Folio*, 1992, pp. 45～46.

② Régis Debray, *Les rendez-vous maqués*, Seuil, 1975, p. 32.

虑的革命信徒来说，德贝是一个资产阶级公子哥的形象。1960 届的学生、哲学家雅克 • 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不无讽刺地回忆说："他很帅、很优秀、很有钱：他拥有一切。但对我们来说，他一直都被他所属的社会打上了印记。大家很少在学校看到他，他喜欢电影院——他是个唯美主义者。"①

理论中的阶级斗争

20 世纪 60 年代初，哲学见习生们眼中最大的事并不是卡斯特罗革命，感性的拉丁美洲史诗对于高师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们来说味道过于辛辣。他们的先知不是卡斯特罗，而是近在眼前的路易 • 阿尔图塞。

阿尔图塞在学校围墙外几乎不为人知，他是高师共产主义的关键人物，他将成为吕西安 • 埃尔之后绝无仅有的宗教式的崇拜对象。埃尔是一位神秘人物，20 世纪初高师的图书馆管理员。老生问新生们："你拜见阿尔图塞了吗？你知道吗——我是认真的——他是天才。"阿尔图塞从 1948 年起开始在高师授课，他教的几代学生都在哲学教师资格会考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功。1961 年春，一个偶然事件使他一举成名。这年 3 月份，他的一名学生阿兰 • 巴蒂乌邀请萨特来高师作一场关于"历史的可能性"的讲座。这位存在主义教父刚出版了纪念碑式的著作《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的第一卷，在一开头萨特便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所有独特思想的沃土和所有文化的前景"，简要地说即这个时代不可逾越的哲学。许多年轻的高师学生已满怀兴致地拜读过这部作品，当天晚上讲座大厅爆满。高师的左派中坚分子悉数到场：校长、著名的黑格尔翻译

① Entretien avec Jacques Rancière, mars, 1993.

者让·伊波利特坐在第一排，他身边是哲学家乔治·冈纪兰姆和莫里斯·梅洛-庞蒂。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位大人物的讲话。然而这个夜晚对萨特来说并不美妙。阿尔图塞在讲座的最后忍不住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萨特的"实践"概念不过是过时的笛卡儿主义的"我思"的修补。高师的年轻学生们被这一精辟的评论震动了，阿尔图塞作为哲学家的明晰与萨特思想文学式的兜圈子，两者的反差多么巨大！一夜之间，高师人就换掉了心目中的偶像。

当月，《思想》(*La Pensée*)杂志刊登了余乐姆街的哲学巨擘一篇题为《关于青年马克思(理论问题)》[*Sur le jeune Marx* (*questions de théorie*)]的文章。这篇艰深的文章在法国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高师，学生们更为坚定地推崇这位大师，并在他的带领下进行"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①。

迷人的阿尔图塞将引导和陪伴整整一代人。从重读马克思开始，他试图针对大学所教授的一切知识制作"一套有计划的、原则性的整体反驳理论"②。从1961年到1965年，几乎每一年阿尔图塞都要发表一篇备受关注的文章，后来他把这些文章编成了一部重要的文集：《为了马克思》(*Pour Marx*)。

阿尔图塞尤其要把他的"家"——高师——建成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的思想中心。1961年关于青年马克思的讨论课已标明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折。阿尔图塞在这个课上提出了所谓"认识论的断裂"，它将黑格尔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与作为科学史观的创始人的马克思区分开来，这一表述使阿尔图塞声名鹊起。他还想走得更远。1962年到1963年的关于结构主义的讨论课是由福柯开设的，而学生

① Louis Althusser, *Pour Marx*, François Maspero, 1965, p. 11.

② Yves Duroux, *Magazine littéraire*, novembre 1992, p. 47.

们却是在阿尔图塞的指导下选择发言题目的，一个是谈列维-施特劳斯[①]，第二个是谈拉康，第三个谈的是迪梅齐。也正是在哲学巨擘阿尔图塞的邀请下，雅克·拉康自1964年1月起在高师开设了讨论课。在阿尔图塞的组织下，语言学、精神分析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相互融合，彻底地改变了当代思想。这奠基性的一步深深地吸引了高师学生。现在的《世界报》主编、1963届学生托马斯·菲朗兹回忆当年主宰余乐姆街思想浪潮时说："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通过各种讨论课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打开整个世界的知识系统及马克思主义智慧的钥匙。"[②]

结构主义革命的指挥阿尔图塞——"所有大师中最专注、最周密且最自由的一位"[③]被近乎虔诚地供奉着。高师以外的学生们只梦想着性解放和大学的民主，余乐姆街的阿尔图塞主义者们却扮演着进行着"理论的实践"的使徒的角色。这一"理论的实践"远离具体的行动，只是巩固了他们在学术权力中年轻随从的位置。就像大师日后写到的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庞大的、史无前例的科学与哲学理论的创建与发展工作，只有具有深厚的历史学、科学与哲学修养的人或高水平的知识分子才能担此重任。"[④]

阿尔图塞主义者们走上抽象的理论道路，像给思想的冒险举行加冕仪式一样围绕着他们的大师。1964年到1965年阿尔图塞开设了关于《资本论》的讨论课。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和埃提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

---

① 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年生于布鲁塞尔，法国人类学家、哲学家，法国结构主义思想的创始人。——译者注

② Entretien avec Thomas Ferenczi, avril, 1992.

③ Clément Rosset, *En ce temps-là*, Minuit, 1992, p. 12.

④ Louis Althusser, *op. cit.*, pp. 14～15.

bar)轮流在听众云集的课上作了发言。这些发言加上罗杰·埃斯达布莱(Roger Establet)的一篇文章,由阿尔图塞作序,结成了文集《阅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这是高师学院派的代表作。

高师的列宁

1963届的罗伯·利纳尔特是阿尔图塞最出色的学生之一。他是一个求知欲旺盛、声音柔和、思维极其活跃的年轻人,那双机敏的蓝眼睛现出他的智慧和激情。利纳尔特学了三年的拉丁语,此时正在撰写历史学论文。进入高师后,他觉得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自由感"[①]。

在预科班的时候,他还没有确定从政计划。在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斗争的关键时刻,他在高师成了"政治狂人"。

如今他回忆说:"这是从我遇到阿尔图塞开始的。"因为根据惯例阿尔图塞会接见每一个哲学系新生。这一开场白式的会面对利纳尔特来说是一次洗心革面,至今强烈的记忆仍令他两眼放光,他说:"他有一种魅力、一种神奇的感召力……"很快,年轻的利纳尔特就走近了阿尔图塞主义者的小团体。然而他与这些崇拜者有所不同,他渴望摆脱老师的阴影,驱除幻想,分析高师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弱点。尽管忠诚地信仰"理论的实践"的绝对力量,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家对法国共产主义学联没有丝毫的影响。更糟的是,1964年3月在帕莱索(Palaiseau)召开的法国共产主义学联第七次组织大会上,利纳尔特发现向在座者发出的"重新发现真正的马克思"的倡议受到了彬彬有礼的冷遇。真正的论战将发生在别处,肯定更对立、更政治化也更紧迫。

---

① Entretien avec Roger Linhart, décembre 1992.

1964 年 6 月，利纳尔特在阿尔及利亚参加了“民族解放力量”在距阿尔及尔不远的西迪费鲁希(Sidi Ferruch)组织的青年大会。参加讨论的一次偶然机会，他遇见了一位西班牙农学家卡巴勒罗(Capallero)，此人向他初步介绍了毛泽东思想。正在寻找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想以摆脱纯理论的安逸的利纳尔特被“群众路线”的智慧吸引住了。今天他解释说：“在列宁的思想中，知识分子应该带给人民一种建立在外部的科学；而毛泽东的思想则认为应该到人民中去，吸取人民的思想元素而建立一种科学，并最终将它送还给人民。”从 1945 年起，毛泽东就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显而易见的。

一回到法国，利纳尔特就决定为余乐姆街的学生共产主义团体做些事。1964 年 10 月，他对那些“精心琢磨理论工具却从不用它们为无产阶级和革命服务”的人提出了谴责。作为辩证法的专家，他不容争辩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1965 年 2 月他和几个同志一起，编纂发行了《马列主义小册子》(*Cahiers marxistes-léninistes*)。他 21 岁时开始进军共产主义学联及法共的青年组织。他最好的武器就是他不容争辩的理论优势、高师式的论断。高师的列宁为了掌控共产学联做好了一切准备，甚至准备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联手。

这一立场显得难以为继，1965 年秋天，法共决定支持资产阶级政坛老将弗朗索瓦·密特朗参加总统竞选，他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支持一直让人记忆犹新。1966 年初春，决定性的危机发生了。3 月 13 日在阿让特伊(Argenteuil)举行的法共中央委员会采纳了一个“关于意识形态与文化问题的解决办法”提案，这等于是否定了阿尔图塞的思想。余乐姆街的年轻革命者觉得这件事太过分了。利纳尔特的手下干将之一、1965 届的高师学生贝尼·列维，撰写了一篇题为《应该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吗？》(*Faut-il réviser le marxisme-léninisme*?)的战斗檄文。在这篇简明扼要、了无文采的文章中，这位

年轻勤勉的革命者宣称“没有人，但有资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在这强有力的论断之后，他号召捍卫“一种真正的理论财富”，然后以斩钉截铁的逻辑得出结论：“修正主义的圈子已经被封锁了。就像列宁所说的，葡萄酒已出桶装瓶。”①

中 国 人

从此以后，高师的马列主义者就公开了与党的官方路线的矛盾，他们热烈欢迎1966年8月中国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带着整套的列宁著作，雅克·布罗埃(Jacques Broyelle)与其他的马列主义者去布列塔尼度过了发奋苦读的假期。他仍记得看到“最初几张大字报的照片时发自心底的喜悦之情……打倒政党，把它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人民大众成为主人！今天，人民群众的大民主终于诞生了”。

1966年开学之际，高师的共产主义者们不再掩饰他们的亲中立场。第十四号《马列主义小册子》集中深入地研究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在其中被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理论与实践最终结合起来了！

自12月起，余乐姆街开始了革命。高师人和法共决裂。10月10日，罗伯·利纳尔特召集一部分拥护者在学校剧院开会。会上他宣布了“共产主义(马列主义)青年联盟”的诞生。这一“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沿阵线”也成了一个可怕的意识形态战争的机器，为它服务的是高师精英们。高师变成了一所“红色的大学”。在学校剧院组织的理论培训课程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在一楼的“工会办公室”里速印机赶制着必备的文本、共(马列)青联的机关刊物，《马列主义小册子》也拥有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读者。这一高师—中国组织自诞

① Claudie & Jacques Broyelle, *Le Bonheur des pierres*, Seuil, 1978, p. 58.

生起就既是一场革命运动,也是一个时髦的现象,很快就被戈达尔的电影《中国姑娘》(*La chinoise*) 再现出来。

利纳尔特意识到运动过于知识分子化,他和同志们决定从 2 月份起建立"越南基地委员会"(Comités Viêt-Nam de Base),它的成员必须到街区、工厂和高中去招募反帝国主义的战士。"共(马列)青联"以研究理论为主曲高和寡,而"越南基地委员会"则比较群众化,立即就有广大的群众加入。

既有精英组织又有群众运动,至 1967 年春,利纳尔特已部署好了所有革命所需的武器。

切·格瓦拉的同伴

德贝没有经历这些论战。他远离高师已很长时间了,高师是个"鄙视女性的小圈子,封闭的男人帮几乎有点儿同性恋色彩,不断呈现着忌妒、反目成仇和神经危机的景象"①。他更喜欢实地考察革命。萨特发给他一张《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的委派证,1963 年夏天他又一次离开法国前往拉丁美洲。一年半的时间内,他在安第斯山脉获得了游击战的经验。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智利、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没有一个国家、几乎没有一个游击队组织是德贝所不知道的。在这次长征中,在一个隐藏在玻利维亚高原的叫做"西格罗二十"的锡矿尽头,他经历了"重生"。德贝融入了被疾病、苦难和贫穷折磨的矿工们之中,经受了一次革命的洗礼。从那里出来的时候,他突然又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天空呈现出另一种蓝色,镀着太阳的金光,当我们沉醉于一片蔚蓝,回到海角的小棚屋时,冰凉的空气沁人心脾。我深深地呼吸着,骤然感到一股发自内

① *Les Masques*, p. 161.

心的欢乐：只有与他们在一起、在这个地方，才是我的位置。无论他们做什么、我做什么，我的位置都将永远在这儿。”

在工人兄弟们友情中的重生的德贝于1965年初返回法国参加哲学教师资格会考。他在《现代》上发表了第一篇概述自己经历的文章《卡斯特罗主义——拉丁美洲的长征》(*Le castrisme : la longue marche de l'Amérique latine*)①。他是“核心点”(le foco)理论的热情拥护者，切·格瓦拉在《游击战争》(*La Guerre de Guerilla*)一书中阐述了这一理论。德贝在总结他的研究时热诚地向卡斯特罗“气氛”致敬：“这是一种联合，革命行动的‘独创性’的抒情主义与冷峻的清晰性的联合，前者从不会与卫道士的虚假热情相混淆，这一联合在我们的眼中颇具神话色彩地标志着两个伟人的历史性相聚：古巴的卡斯特罗和阿根廷的切·格瓦拉。”

这篇先锋性的文章备受瞩目。切·格瓦拉很快就发现了这篇文章，并将它推荐给革命领袖们。1965年12月，德贝刚开始他在南锡(Nancy)的雷蒙-普恩加里高中和贞德高中的哲学教师生涯时收到了一封电报：卡斯特罗亲自邀请他参加第一届“三大洲会议”(Conférence Tricontinentale)的工作。

这个未来的游击队员一秒钟也没有犹豫。第二天他就来到了哈瓦那，见到了“一位机敏的朝气蓬勃的人，细长的手，高大庄严，有一种上个世纪的陈旧气息”②。当时的卡斯特罗完全不是后来专制者的形象。这位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很快就把德贝吸收进了他的“领导班子”。德贝记得“每天晚上一过午夜……卡斯特罗就在卡勒旺斯召集拉美各游击队的小提琴手聚会，在那里他和在西耶拉与他共同战斗

---

① Etude reprise par Régis Debray, *Essais sur l'Amérique latine*, François Maspero, 1967, pp. 47～128.

② *Les masques*, p. 53.

过的女助手西丽雅·桑什(Célia Sanchez)有一套两层楼的普通住宅,位于弗拉多路11号"[1]。切·格瓦拉还在非洲,但他的宏伟计划已在进行之中,即把拉丁美洲变成反抗美帝国主义的决定性战役的基地。德贝即将告别自己最擅长的马列主义辩证法,去参加各种武装训练。在安第斯山脉创建"第二个越南"的计划中他是一名理想的新兵。1966年10月,卡斯特罗秘密地给他布置了一项在玻利维亚的侦察任务:选择一个最有利的区域在切·格瓦拉的指导下建立第一个"核心点"。借着如有神助的好运,高师的卡斯特罗分子斗志昂扬地完成了任务,他"感到不为人知的自由,自信、灵敏、坚强,可以毫不费力地蔑视全世界"。

这位刚从高师毕业的哲学家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任务。1967年1月他在哈瓦那出版了《革命中的革命?》(*Révolution dans la Révolution*?)——一部以和卡斯特罗的对话为线索的散文集。文章激荡着对游击队事业的忠诚,像一种号召:"发动起义是当前政治的首要工作。"这本小册子印了成千上万份,几周后阿尔图塞就读到了它。3月1日,余乐姆街的哲学巨擘给他以前的学生写了一封了不起的信,冷静地劝导他"撤退","重新回到主导一切的学习中来"。老师以完美的语言写下了这些伟大的建议,渗透着友谊和哲学家的严厉,然而它们来得太晚了:德贝已经在玻利维亚山区参加了切·格瓦拉的游击队。

1967年2月到达中央营地的时候,德贝看到了民族解放军从一无所有中建设起来的基地,感到很佩服:"纳卡胡祖(Nancahuazu)河岸上保卫营地入口的战壕,面包炉,电话线连接着瞭望哨岗,四周大量装修并伪装好的山洞,一片果园和种着蔬菜的灌溉田……燃料的

---

[1] Etude reprise par Régis Debray, *Essais sur l'Amérique latine*, François Maspero, 1967, p. 54.

储备库……甚至还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图书馆，所有这一切表明他们做好了长期准备。”

然而当时切·格瓦拉不在，他已离开去开拓另一个北部的地区。中央营地笼罩着轻松愉快的气氛。德贝[他给自己取名“丹东”，为了纪念德国剧作家毕希纳(Büchner)的浪漫主义戏剧《丹东之死》]直到3月19日才见到切·格瓦拉。两天后，3月21日，这位游击队领袖要求他年轻的法国同志“回法国组织一个援助网络”并“与一个为组织所需提供全部援助的朋友接头”[①]。高师出身的游击队员实际上起的是“纽带”作用，是游击队与其后援之间的信使。玻利维亚军队过早发动的战役使他没能来得及去完成这项基本任务。3月23日，头几场战役打响了。4月初，游击队员被迫放弃了他们的中央营地。为了完成联络任务，德贝决定“潜出”该地。他随游击队步行了几周。在《面具》中他讲述了在敌军的火力范围内跟在切·格瓦拉身后夜行的情景：“混乱、恐惧、疲惫、口渴。汗水流到眼睛里，模糊了视线。我们迈着无声的脚步。在这水族馆般的昏暗中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我看着面前那个无名者消瘦的背影，他在我前方几米处摸黑走着，挺直着脑袋。在四面是敌的树林里，这是一个多么脆弱的象征！”

1967年4月20日，德贝在游击队员西罗·罗贝尔图·布斯托和一个英国记者的陪伴下来到了穆约庞帕村(Muyopampa)。一个巡逻队在小镇入口处截住了他们。年轻的法国人被五花大绑，左轮手枪顶着太阳穴，当晚就被军用直升机送到了卡米里(Camiri)。切·格瓦拉得知消息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失去了一个出色的知识干部。”[②]

他成了“士官们的刻骨仇恨和最先殴打泄愤”[③]的对象，这个法国

---

① Ernesto Che Guevara, *Journal de Bolivie*, François Maspero, 1968, p. 76.

② Carnets inédits du Che, extrait cité par *Le martin* du 14 juin 1984.

③ *Les masques*, p. 90.

小伙子尝到了痛苦的滋味。在候审和盘查的过程中，他坚守着对切・格瓦拉的忠诚。切・格瓦拉让他带到古巴的最后信息好像一名注定要失败的游击队员提前拟好的墓志铭："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奋力呼喊，是号召所有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人类共同的敌人——美国的战斗号角。我们死在何处又有什么要紧？死亡将值得庆幸，只要人们能够听到我们战斗的呼喊，只要有另一只手伸出来握起我们的武器，只要在机关枪的炮火、新的战斗和胜利呼喊的嘈杂声中有人站立起来唱挽歌。"①

1967 年 4 月 23 日，法国《世界报》刊登了海杰斯・德贝可能已"在一场正规军与五十多名玻利维亚游击队员的交战中"去世的消息。德贝被秘密关押后，玻利维亚当局决定按照惯例让他先交代情况，之后处死。应该说是新闻媒体救了德贝的命。4 月 24 日，一份玻利维亚报纸刊登了一幅德贝的照片，这是他刚被逮捕时一名摄影记者在穆约庞帕偶然抓拍到的。几乎与此同时，法国就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声援运动。5 月 11 日，戴高乐将军亲自向玻利维亚总统巴利昂托发了消息。5 月 30 日，包括好几位法国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声援与保卫海杰斯・德贝委员会"在巴黎召开会议，萨特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法国人群情激昂地卷入了德贝事件，而这名法籍游击队员则对此一无所知。尽管如此，他的形象被大肆渲染着，媒体们比关心切・格瓦拉的游击队更关心德贝这个人物。

7 月 11 日，德贝终于见到了他的母亲。他必须听候初秋战争委员会的传讯。

1967 年 9 月 27 日，在卡米里开始了对他的审判。玻利维亚士兵试图让德贝穿上"001 号"囚服，由于德贝绝食反抗，没有成功。一开始，德贝只是被指控为"匪徒，无耻、残忍的流氓分子"。轮到德贝为

---

① Ernesto Che Guevara, *Ecrits* 2, François Maspero, 1968, p. 287.

自己辩护时,他说他丝毫没有超越一个记者可能的职责范围。前几场听证会正常结束,这一次审判暂停了。政府军再次加紧力量钳制游击队。1967 年 10 月 8 日,格瓦拉的队伍被突袭,并在库罗(Churo)的要塞被包围。切·格瓦拉在战斗中受伤被捕。10 月 10 日玻利维亚当局宣布切·格瓦拉已在交战中死去。其实切·格瓦拉是被杀害的。当天,德贝给他的陪审团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向死去的英雄致敬并说:"他必将被全世界所有的人民视为美洲最伟大的解放者之一。"他强调说:"我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对游击队同志们的行动负有共同的责任……如果我不能有幸得到一名战士的荣誉,那我至少也要请求得到作为他们同道者应有的荣誉。"①

以"与游击队员负有共同责任"作为辩护词,德贝对自己的前景不抱任何希望。1967 年 11 月 16 日,由埃弗朗·加夏拉·以巴内(Efrain Guachalla Ibanez)上校领导的战争委员会宣布判处德贝 30 年劳改。至 1970 年圣诞节被释放之前,他共服了四年刑。

在"文化大革命"的国度

距玻利维亚几千公里外,年轻的马列主义者们在 1967 年夏天表现得非常勤奋。在贝尼·列维和"具体分析委员会"(Commission d'Analyse Concrète)的推动下,一批向往中国的人将去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深入农村与工厂。另一个小组去了阿尔巴尼亚。

最具权威性的调查由以利纳尔特为首的政治办公室的领导成员们负责。他们荣幸地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邀请,8 月份将去中国待上一个月!

其实几个月以来,利纳尔特和他的同志们已习惯于定期去巴黎

① *Le procès Régis Debray*, pp. 29～32.

的中国驻法大使馆，向中国的外交官员介绍他们开展的马列主义工作。利纳尔特讲述道："我们向他们陈述我们所做的事情，他们非常友好礼貌地倾听。"这种宗教般的虔诚得到了公正的回报——中国之行。

法国共青联赴中国的五名领导成员包括两名高师文学系学生利纳尔特和布罗耶勒、一名高师理科学生西斯(Riss)、一名中央理工学院的学生勒丹泰克(Le Dantec)和一名来自南锡的学生斯图尔姆(Sturm)。在中国广东省一个充满着革命色的大厅里，一名红卫兵在一尊高大的白色毛主席像前等待他们。到处都是人民解放军战士。年轻的法国人兴奋无比，他们准备承受一切考验。几天后在北京，他们接受了一位红卫兵的"建议"，修剪了他们本来已很短的头发。

利纳尔特说："这是一个梦。"是梦引领着他穿越了中国大地，从解放军军营到革命女英雄的纪念碑，从东北钢铁厂到抗日战争时代留下的村庄地道网……五个法国人应邀与"中国最著名的农民"陈永贵共进晚餐，而后参观了大寨人民公社，大寨人"不怕山高地旱及自然灾害，成功地把整座高山变成了梯田"①。

为了参观大寨，载着法国共青联代表的小汽车要穿越河流浅滩，大家得推车过河。如同在宣传片里一样，利纳尔特和同志们丝毫没有犹豫：他们的脚浸在水里，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用力的表情，他们边推边齐声唱起中国的革命歌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火！

通过这次伟大的中国之行，利纳尔特不久就断言法国共青联也

---

① Jean-Pierre Le Dantec, *Les Dangers du soleil*, Presses d'Aujourd'hui, 1978, p. 90.

必须进行一场改革。他回忆说:"我觉得我们以前太多地停留在书本中了,不够深入群众。中国的经验是将权力归还人民,到群众中去。所以在接下来的旅行中,我们决定到工厂里落户。"

于是1967年9月底,利纳尔特在高师宣布开始进行一场广泛的"纠正工作方式的运动"。纠正的结果首先关系到高师的共青联成员们自己的生活。余乐姆街的激进派决定揭露长期以来统治高师的"知识分子的妄自尊大"和"理论至上主义"。说白了,就是至少要和阿尔图塞决裂。一个怀着报复心理的共青联内部简报主编宣布要"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火!"阿尔图塞的幻影失去了魅力。现在已不再是学习的时候,哪怕是学习列宁主义。高师的激进分子们不满足于仅仅抄袭红卫兵的制服,他们在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宿舍中都进行着大清理。雅克·布罗耶勒倒空了自己的书架,只放上"红宝书"。"其实一年前我已经把所有的诗集、小说、普鲁斯特、画册都从书架上请走了,只剩下三十五卷的列宁、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著作。"后来他写道。利纳尔特也决定关闭理论培训学校,并更进一步放弃以"红卫兵"作为杂志的名字,因为它太知识分子化了,而改用"为人民服务"这个看起来更具体的标题,这也成了共青联新政治路线的口号。

然而对于这所出了季洛杜和于勒·罗曼的老学校来说仅仅成为"红色基地"是不够的,应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所谓的"落户"。法国共青联的领导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前辈西蒙娜·薇依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像普通工人一样应聘到工厂里去做工了。他们决定派遣革命同志到群众中去落户,"生活在他们中间并从事生产劳动",在任何牺牲面前都毫不退缩。领袖们的女伴,包括利纳尔特的妻子妮科拉和布罗耶勒未来的妻子克劳迪都到工厂去参加劳动。

除了打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发动深入群众的运动,高师积极分子们的第三步行动就是迅速发展"越南基地委员会"和反法西

斯主义斗争。为了更有效地与戴高乐的警察和极右翼团体“西方”(Occident)作战,共青联决定仿照“全日学生自治会联合”这一日本极左派学生组织,用武术对付防暴警察。余乐姆街的优等生都变成了革命的空手道专家。利纳尔特特别自豪地学会了一个狠招,可以把对手打得肋骨骨折或肺部破裂……①

1968年2月7日,极右翼团体“西方”在巴黎互助会组织了声援南越和美军的大会。高师的激进派把这一游行活动视为不可容忍的挑衅。共青联的战士们拿着铁锹柄,戴着头盔,向“法西斯分子”和在互助会前站岗的警察发起猛攻。整个晚上维持秩序的军警受到极大困扰,大会也被严重搅乱:这是共青联战士的第一次胜利。

1968年5月风暴

罗伯·利纳尔特热情洋溢、才思敏捷,是出色的辩证法学者,他具备1968年“五月风暴”中一名学生领袖所需的全部素质。然而,从南泰尔的大学的抗议活动一开始,这位余乐姆的革命舵手既没有意识到这场正在爆发的反抗运动的重要性,也没有意识它的正确性。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教导大家:只有工人和农民才是历史的动力,在法国也同样如此。学生应该去支援革命大众而不是训练自己参加小资产阶级的请愿活动。在高师的会议厅,南泰尔学生们极端自由主义的言论“教育民主化、性爱解放”被认为是滑稽可笑的。

高师人在他们的温室里根本无法理解物质问题的尖锐性,而条件没有他们优越的同代人对这些问题是有所认识的。这种社会阶层的悬殊加上知识层次的悬殊,使得余乐姆的学生自觉高人一等,这种优越感加强了典型的高师人的倾向:只戴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看

---

① Entretien avec Jean-Pierre Lefebvre, avril 1993.

待现实。他们对 1968 年 5 月的运动也有所准备，然而他们却并不理睬这场革命。高师学生只是零散地参加了“五月风暴”的街垒战。

面对学运的爆发，利纳尔特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自己建构的封闭的哲学体系里。在游行运动的火光燃亮了拉丁区的日子里，极其擅长“具体分析”的专家们却完全误解了这一事件。事隔 15 年后，他自我批评说：“我以为当时的事件是戴高乐政府挑起的，是一个旨在将学生和工人群众隔离开的社会民主的阴谋。我没有看到群众运动的广泛性。”

利纳尔特和共青联的队伍把自己关在高师的剧院里，整整一个星期，利纳尔特用傲慢而天真的辩证法武器对抗着所发生的现实。他怎么会弄错呢？1968 年 5 月 10 日，殚精竭虑地争论到最后，利纳尔特终于疲惫不堪，几近崩溃。他所坚信的阐释方法全部受到挫败，他从此垮台并销声匿迹。当天晚上，盖吕萨克路就被街垒覆盖。

《落户》

1968 年的夏天非常艰苦。由于犯了错误，德高望重的领袖利纳尔特受到冲击，之后便隐退了，共青联陷入危机。布罗耶勒在内部简报发表的一篇严厉的自我批评中指出了他的领导利纳尔特和贝尼·列维“在论及毛泽东思想时的傲慢姿态”。“我们割裂地引用‘红宝书’，或者说按我们所需断章取义，在文本和同志们之间筑了一道围墙。实际上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种工作风格造成了大人物的倨傲态度，专制的官僚主义养成了宗派思想和裙带之风。”所有的同志都阅读了这篇文章，它敲响了清算错误的时刻。1968 年 8 月底，共青联再次在高师的剧院集会，同志们分成了毫不留情地对立的两大派：一派是严厉声讨以前的政治办公室的大多数人，另一派中，贝尼·列维野心勃勃地想谋取利纳尔特的位置，严重受创的利纳尔特完全失去了大权。

贝尼·列维在“清除派”和“修正派”的对峙中反倒成了赢家。共青联已经死亡,他将创建自己的组织“无产阶级左派”。利纳尔特面对时局无能为力,开学时,他决定到群众中去落户,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和勇气。他应聘到雪铁龙汽车公司位于舒瓦西门(Choisy)的工厂当技术工。一开始,这位年轻的高师学生就要忍受冷水澡、高速的劳动节奏及苛刻的领班们。他很快就适应了,甚至在 1969 年 2 月就成功地组织了一次罢工。在《落户》(*L'Etabli*)这本绝妙的书里他讲述了这段个人冒险的经历,其中每一页都显示着他尚未发掘的写作才华。书中的一首散文诗是高师—中国式革命的最后的杰作,这位为人民服务的年轻哲学家写道:

“我毫不困倦。
眼前的景象打破了昏昏欲睡的蒙眬。
纳伊(Neuilly)[①]市中贫穷者人潮涌动。
香榭丽舍大道上无产者一片欢腾。

我们隐蔽着的世界喷发而出并注入另一个世界,就像一个失落的大陆顷刻之间重新显现,激起狂风巨浪。惊恐的旧社会难以置信地看着那新奇的、无法理解的欢乐四处散播。

我们将击碎工厂的围墙让光和世界透进来。

我们将组织我们的工作,生产别的产品,我们都将是学者和电焊工,作家和耕夫。我们将发明新的语言。我们将驱散劳顿与成规。工友们将不再恐惧。一个从未见过的黎明!”

---

① 巴黎近郊地名,是富人区。——译者注

密 特 朗

共青联垮台后，余乐姆街由贝尼·列维掌权。他于1965年入校，是埃及裔犹太人，一个无国籍的人。他比利纳尔特处事灵活，巧妙地利用自己的身份，搞得像一个神秘的政治避难者。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绝妙的化名：皮埃尔·维克多。三年的漫长时间里，他应该为自己仅次于利纳尔特的二把手的位置感到满意。1968年的危机使他的地位超过了年长一些的利纳尔特。现在他是领袖了。1969年2月，他创建了“无产阶级左派”。他身边的人包括阿尔图塞主义的老战士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和让-克劳德·米尔内(Jean-Claude Milner)，原共青联的克里斯蒂安·西斯和菲利普·巴海(Philippe Barret)，也有一些新人如1967届的奥利维耶·罗兰及两位重量级的加盟者：“五月风暴”的领导人之一阿兰·吉斯玛(Alain Geismar)和塞尔日·朱利(Serge July)。从此以后，他们支持政治斗争“最大限度地无产阶级化”。

1970年的一个晚上，弗朗索瓦·密特朗见到了几个“自发主义者”。前左派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密特朗受高师的一位年轻右派学生之邀来学校作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讲座。这名学生名叫洛朗·韦泽勒(Lorent Wetzel)，后来成为萨特鲁维勒市(Sartrouville)市长。

当天晚上，讲座大厅座无虚席。未来的社会党第一秘书先来了一段乏味的文艺腔演讲。1968届的让-玛利·格埃诺，今天的位于奥赛码头的“分析与社会展望学中心”主任回忆说：“他先给我们上了40分钟的让人打瞌睡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课，大家都听烦了。他一直追

溯到玛士撒拉[1]、空想社会主义和第二国际……”[2]直到演讲者进行总结的一刻，大厅里都比较安静。对于到场的为数众多的自发主义者们来说，这位前总统候选人只不过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叛徒，其实他们早已决定要好好教训他一下。

很快，密特朗就被提问、叫喊和辱骂围攻，进攻的浪潮令他措手不及……现任《国际通讯》(*Courrier international*)的主编、当时的一年级学生亚历山大·阿德勒回忆说：“稍后，密特朗重新镇定下来。他站起身来对他们说，‘我会教训你们，你们听着，我会教训你们！’会议在一片嘈杂声中结束，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刚毅’的表现倒确实制止了学生们恶劣的起哄。”

罢 工

这个夜晚只是一个开始，行动还在继续。1970 年，保守的罗伯·弗拉斯里尔(Robert Flacelière)校长很遗憾地看到又一批左派分子进入了高师。1970 年入学的“新兵”包括亚历山大·阿德勒的好友严·穆利埃(Yann Moulier)，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保皇派哲学家皮埃尔·布唐的儿子。这个年代，穆利埃蓄着长发，主张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这届学生从路易大帝高中预科班升学时就备受争议，很快就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话题。

1971 年 1 月 4 日，《官方报》(*Journal Officiel*)宣布了一条新法令，关系到学校的纪律委员会，其中提到有必要维护教育机构的“良

---

① 玛士撒拉(Mathusalem)，《圣经》人物，塞特族长，挪亚的祖父，据说活了 969 岁，是《圣经》人物中最高寿的人。——译者注

② Entretien avec Jean-Marie Guéhenno, avril 1992.

好声誉”[1]。这一简单的表述似乎暗示着要把权力收归行政部门，学生们立刻义愤填膺。驻扎在余乐姆的工会组织（全国教育总工会和全国中学教师工会）唯恐被左派分子抢了先，一早就发布了学生总罢课的指令。纠察队封锁了图书馆入口，教师资格会考的课程也中断了。然而到了2月12日，两个工会就放弃了战斗。左派却不想就此止步。学校的围墙上涂满了革命的、猥亵的或仅仅是恶作剧的标语。高师酒会厅的入口处写着：“反对知识权威、反对日常生活权威！”穆利埃和同志们组织了“达摩克利斯[2]委员会”，每天都要举行一次总集会，投票表决罢工是否继续进行。穆利埃宣称：“渐渐地，斗争形式超过了最初的目的。我们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批评高师体制不透明的人。”“达摩克利斯委员会”的罢课者并不仅是调皮捣蛋的青少年。他们来到校办公室，要求校方向他们出示关于学校生活的行政文件，并查询文理科之间的经费分配情况。

余乐姆街的校长忍无可忍，因为从来没有学生向学校发起过进攻。所有的人，甚至是马列主义者，都平静地享受着他们在高师的优越条件，所有的人都尊重这所老房子里宽容而严肃的传统。然而可怜的校长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由于不赞成亚历山大·阿德勒试图在下一年恢复学校的舞会，“达摩克利斯委员会”的高师学生们决定组织一个“反舞会”行动，即1971年3月20日星期六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活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在拉丁区集会的可能性已经被警察控制到最低点。电台一广播高师将纪念巴黎公社的消息，就引起了1968年学运的老战士和武斗者们巨大的热情。

---

① Robert Flacelière, *Normale en péril*, PUF, 1971, p. 39.

② 达摩克利斯（Damoclès），古希腊叙拉古王朝的一位大臣。“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典故比喻“随时会发生的危险”。——译者注

"达摩克利斯委员会"预计会有四五百人前来参加这次活动，而当天晚上涌到余乐姆街的年轻人超过了两千。这群奇装异服长发披肩的青年很快就把预备的饮料扫荡一空。那些兴奋的寻欢作乐的来客变得越来越嚣张，他们破门而入闯到地窖里去找喝的，预示了这个充满节日气氛的夜晚将是对学校的一次大洗劫。一则涂鸦写道："我们将废除忧伤。"革命的放纵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十几扇窗户被打碎，校舍被强行闯入，人员被殴打，纪念碑被损坏，图书馆也没有幸免，一些古籍被拿到院子里烧毁……在这场以纪念巴黎公社为名的骚乱中，一个愤怒的声音对打砸抢分子高喊道："你们才是凡尔赛士兵①！"②这个人就是阿尔图塞的伴侣海伦娜。

第二天一早，面对满地狼藉，高师校长几乎要崩溃了。他给共和国总统、1931 届的高师学生乔治·蓬皮杜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情况并要求见面。没有回音。1971 年 3 月 31 日高师档案处燃起的大火令弗拉斯里尔忍无可忍。权力部门处理问题的拖延有甚于学生的荒唐行为，罗伯·弗拉斯里尔只好辞职。

亚历山大·阿德勒总结说："1971 年的罢课和庆祝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 1968 年的延伸，是 1968 年'五月风暴'期间尚在读预科班、觉得自己没能真正参与革命的一代高师学生重新体验干坏事的乐趣。"

根据教育部长的决定，高师关闭了近一个月。它从未如此危险地濒临深渊。

---

① 镇压巴黎公社社员的凡尔赛军队士兵。——译者注

② Témoignage d'Alexandre Adler.

乔治·蓬皮杜:爱丽舍宫的高师人

1969 年 5 月 15 日,蓬皮杜以 58%的选票击败阿兰·保埃尔(Alain Poher),成为第一位登上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宝座的高师毕业生。经过庄重严酷的戴高乐主义时代,1968 年 5 月的风暴仍搅扰着法国人,他们选择了一位面貌一新的总统,与戴高乐将军发号施令者的形象截然不同。

叼着香烟,两道浓眉,身材偏胖而充满活力,爱丽舍宫的新主人的形象很具有说服力。他那发音圆润,几乎有点儿喜剧色彩的名字也容易引起好感。乔治·蓬皮杜——说唱艺人叫他"蓬蓬"——展现着普通法国人的风度。新闻媒体惊讶于共和国总统"像所有人一样度假","在家人身边和他的唱片、书和狗一起度过星期日",他"首先爱好钓龙虾,奥弗涅蔬菜炖肉是他的拿手菜"!就像所有在"辉煌的三十年"[①]中发财的长官们一样,新总统也有一处"别墅"[确切地说有两处:一处在伊夫林(Yveslines),另一处在洛城(Lot)]。他戴着潇洒的围脖,他的漂亮太太也很时髦,穿着流行品牌的服装。他当选的第二天,让·拉古杜尔(Jean Lacouture)就开玩笑说:"只要看看他,千百万的法国人就觉得自己也可以当部长。"[②]

奇怪的是,这个农民般朴实的人亦是高级知识分子。所有的法

① 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 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高速发展的 30 年。

② *Le Monde* du 17 juin 1969.

国人都知道总统在路易大帝高中是桑戈尔[1]的同学，在高师是于连·格拉克和罗伯·巴西亚克的同学，这些人使他更负盛名。在新闻发布会上，新总统引用着艾吕雅的诗句，作为一名老教师演绎着他孜孜不倦的辩证法。雅克·福韦(Jacques Fauvet)在一期《世界报》上热情赞美道："戴高乐将军描绘的巨幅艺术画卷可能还令我们感到遗憾，而蓬皮杜总统作为授衔教师[2]的教育家的天赋却只能令我们赞叹。"[3]

蓬皮杜是一位赞赏理智主义的农夫的儿子，只有第三共和国以后的高师懂得如何制造这类人。在蓬皮杜当选后应邀去爱丽舍宫吃午餐的作家记者让·柯(Jean Cau)说："这是一个带着农民感觉的普通人，但这一切都被一层浓厚的高师式的文化外表所压倒。"[4]

一个"会写作的授衔教师"?

蓬皮杜如此高师化，简直有点儿漫画效果。他学业的上升——如同他社会地位的上升一样——几乎和于勒·罗曼的小说《善意的人》所描述的一模一样，这部小说是一部描绘第三共和国社会生活的鸿篇巨制，亲切而充满雄心壮志。

故事发生在僻静的法国腹地蒙布迪夫(Montboudif，在康塔尔

---

① 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1906—2001)，塞内加尔诗人、政治家，曾任总统。——译者注

② agrégé，指通过了教师资格会考而取得大学或高中教师职衔的人。——译者注

③ *Le Monde* du 25 septembre 1971.

④ Jean Cau，*Croquis de mémoire*，Julliard，1985，p. 21.

省)和阿勒比(Albi,在塔恩省),雷翁·蓬皮杜是一名小学教师,后来做了西班牙语老师,一生壮志未酬。由于没钱、没机会,他一直未能参加教师资格会考。他未竟的理想就寄托在了儿子身上。

蓬皮杜透露说:"大概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当人们问我长大了要做什么时,我就说,高等师范学校。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但这一切早已灌输给我。这个目标已经完成了。"①

19 岁时,这个奥弗涅小伙子北上巴黎。他是个洒脱又发奋的学生,和越南裔的方杜克(Pham duy Khiêm)和非洲人小桑戈尔是好朋友。他介绍桑戈尔阅读波德莱尔,同时还劝他改信社会主义。作为小学教师的儿子,蓬皮杜当然是左派。他每天早上阅读《大众报》(*Le Populaire*)上雷翁·勃鲁姆的文章。他经常去参加学生社会主义者的集会,是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组建的"共和与社会主义大学生行动同盟"(LAURS)的积极成员。他甚至打过"法兰西行动"的保皇派分子一拳,当时"法兰西行动"统治着拉丁区。

蓬皮杜才华横溢又自由闲散,这个俊美忧郁的少年已颇具传奇色彩。回忆当时的情景,至今桑戈尔都对他充满赞美之情:"我记得有一次熬夜写历史课的作文。他只瞄了一眼课堂笔记就把本子合上了。

'我受够了,我去抽支烟。'他说。

一周后,这次作文的成绩下来了,他得了第一名。"②

后来蓬皮杜在文学教师资格会考中也名列第一,尽管一部分评

---

① Pierre Rouanet, *Pompidou*, Grasset, 1969, p. 36.

② *C'est Georges Pompidou qui m'a converti au socialisme*, par Léopold Sédar Senghor, *Le Figaro littéraire*, 12 mai 1962. Même anecdote dans Merry Bromberger, *Le Destin secret de Georges Pompidou*, p. 52.

审委员认为他没有其他的应试者用功。他得到了教师职衔，先是在马赛的圣夏尔高中教法文，后来转到巴黎路易十四高中。他的学生们记得这位老师留着大背头、戴着乳白色的手套，好像演员哈蒙·诺瓦罗(Ramon Novarro)。学生们表现好的时候，他就给他们朗读季洛杜的作品。当一个孩子引用巴西亚克的句子回答问题时，他高深莫测地笑了笑——大家不知道这位《七色》的作者正是他们老师在高师的同班同学。①

但精英也有奇怪的走错路的时候。在法国被占领的黑暗时期，很多知识分子都参与了抵抗运动，而蓬皮杜却交了白卷。他仍安心地在亨利四世高中教法文和拉丁文。那些曲意逢迎的传记不恰当地遗漏了这一段历史……蓬皮杜本人强调说自己已尽可能地与抵抗运动接头。一天，他在杜洛克(Duroc)地铁站偶然遇到了高师出身的抵抗运动者、哲学家让·卡瓦耶斯，蓬皮杜提出要为他做点儿事情。但由于害怕被认出来，卡瓦耶斯没有回答他就匆匆离开了。1944 年，卡瓦耶斯被德国人枪杀。②

直至 1944 年底巴黎解放，蓬皮杜才通过一系列高师式的手法步入政界。他给自己在高师的朋友、戴高乐将军的办公室主任、后来成为临时政府负责人的何内·布鲁耶(René Brouillet)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当前的形势下，我无法满足于自己只教些拉丁文拼音。如果你认为我可以有一个职务，请考虑我。我得向你重申，我要求的不是显赫或重要的位置，而是做点儿有用的事。我将凭借的是我良好的意愿，而不是什么才能，并且我相信，这一良好的意愿是有积极意

① Témoignage de Pilippe Sénart, *Trois ans avec Pompidou*, *Le Figaro*, 1er aout 1975. *La dernière classe de Georges Pompidou*, *Lectures pour tous*, n° 198, juillet 1970.

② *Pour rétabli une vérité*, Flammarion, 1982, p. 28.

义的。”所谓“积极意义”将是30年后蓬皮杜的整个政治计划。

传说戴高乐将军询问他的助手：“一个会写作的授衔教师？”蓬皮杜在他的回忆录里直率地说，这个传说是一个“荒谬的”发明。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是蓬皮杜自己提出请求的。布鲁耶毫不犹豫地聘请了他的老友担任政府项目负责人。35岁那年，蓬皮杜就在戴高乐将军的办公室负责信息与教育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居然成了全国教育界抵抗运动奖章颁发委员会的成员！出于“同窗之情和对才智的敬重”，他甚至试图营救因参与合作而被判死刑的巴西亚克，但没能成功。

然而，不管“授衔教师会不会写作”，蓬皮杜很快就得到了戴高乐将军的赏识，以至于在1948年到1953年“法兰西人民联盟”(RPF)的冒险时期坐上了办公室主任的位置。在戴高乐将军引退的日子里，蓬皮杜一秒钟也未曾想过重拾教职。由于与戴高乐的从属关系，他得到了洛希尔(Rothschild)银行分行行长的职位，并且很快就当上了总行行长。他的文学才华远比他对数字的热爱更引人注目。据他的同事说，这位研究波德莱尔的授衔教师对金融运作几乎一无所知，但深知如何笼络大老板居伊・德・洛希尔(Guy de Rothschild)。德・洛希尔在他身上下了注，以备戴高乐将军复出以后……德・洛希尔承认：“有一些快速的晋升是由于才干或某一次特别出色的业绩，但蓬皮杜的晋升是由于他如此仁义而坚忍的品质。”①

1958年5月13日戴高乐复职。对过于现实的蓬皮杜来说这简直难以置信，他自然重返仕途。这一次，一切都正式开始了。他首先恢复了戴高乐将军办公室主任的职位；1962年4月，他当上了总理，而在此之前他连议员都没有做过……

① *Tel que je l'ai connu*, par Guy de Rothschild, *Le Monde* du 23 avril 1974.

一个不同寻常的高师人

上台后，蓬皮杜表现出了一个不同寻常高师人的气度，没有赫里欧或勃鲁姆的浮夸与煽情。他的第一部传记的作者梅里·布隆贝热(Merry Bromberger)写道："蓬皮杜的作风与人们之前设想的身居要职的高师人的风格截然相反。尽管作为激进社会主义倾向的议会主席他显得很宽容，但他具有一种冷峻的现实主义气质。不顾理论、空想或精神建构，他直接走向事实。"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务实。良好的意愿是他的信条，沉默的大多数是他的公众，努力工作是他的主导。作为高师人经历了如此多的灾祸，如此多梦想在现实中的碰壁，蓬皮杜将他的智慧体现在了权力之中——一种混合着工业现代主义的社会保守主义立场。布隆贝热说，当"他友善的目光在香烟的迷雾中的突然显现出一种不留情面的敏锐，识破他身边某事某物的真正动机的时候，他简直有点儿可怕"①。

然而，他仍保持着对高师的忠诚。在预科班时他已被选为"班级状元"。在余乐姆街时，他负责组织年终舞会。② 主政法国后，他定期邀请他的老同学们去总理府后来是爱丽舍宫共进午餐，其中有格拉克、盖菲莱克……出于虔敬之心，他在忙中偷闲为一位老同学的去世写了一则消息刊登在同学录年鉴上。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插曲：1970 年，他设法释放了入狱的路透社部门主任——1935 届高师学生

① Merry Bromberger, *Le Destin secret de Georges Pompidou*, Fayard, 1965, p. 214, 252～253.

② 1933 年，蓬皮杜任高师年终舞会筹委会秘书，见 *Archives nationales*, AJ 61 165.

乔治·帕克(Georges Pâques),此人因里通苏联而被判间谍罪。[①] 只有一个负面记录:1971年,当高师处于严重危机时,蓬皮杜拒绝了罗伯·弗拉斯里尔校长的求见。弗拉斯里尔后来写道:"一个主政爱丽舍宫的前高师学生的沉默令我非常失望和寒心。"[②]

蓬皮杜对母校的感情尤其体现在他为1963年再版的信息部部长佩尔菲特编纂的文集《余乐姆街》所作的序言中。蓬皮杜忠实于传统,以精神贵族式的、远离尘嚣的理想主义的笔法在这篇序言中描绘了高师人的形象。这一描述与他本人丝毫没有相似之处:

"我们想象一下高师人命定的杰出品质吧……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怪人。在当代社会中,他缺乏经验的愚钝令他很矛盾……他对理念现实性的信仰超越一切。"[③]

诗人之爱

蓬皮杜比热爱理念更加热爱诗歌。他在预科班的同学桑戈尔写道:"当他时不时地吟诵诗句时,简直像个非洲巫乐师,音色均衡,而节奏好像一曲祝圣歌。"[④]蓬皮杜最喜爱的诗人?毫无疑问是波德莱尔,尽管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更多地引用了艾吕雅的作品。在预科班

---

① 80名高师人在援救帕克的请愿书上签名。见 *L'affaire Georges Pâques* par Pierre Assouline, *L'Histoire* n° 81, septembre 1985, et Charles Benfredj, *L'Affaire Georges Pâques* Jean Picollec, 1993.

② Robert Flacelière, *Normale en péril*,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1, p. 47.

③ Introduction à *Rue d'Ulm*, Flammarion, 1963, pp. 15～16.

④ *Hommage au président Pompidou, un homme de culture*, catalogue de l'exposition organisé par la galerie Artcurial, avril 1987, p. 5.

时，有一个未被披露的细节：他曾把十四行诗《情人之死》(*La mort des Amants*) 抄在自己灰色外套的背部：

> 我们将有淡香四溢的床，
> 像墓穴一样深的长沙发……

他后座的同学，预科班的女生安娜-玛丽·古特(Anne-Marie Coutte)在漫长的英语课上将这首诗牢牢记在了心里……[①]

蓬皮杜如此热爱诗歌，以至于忍不住将自己最喜爱的诗汇编成集，这就是 1961 年出版的《法国诗歌集》(*l'Anthologie de la poésie française*)。

说实话，这本诗集的编选实在了无新意。除了最个人化也最冒险地收入了纪德和杰里·莫勒尼的作品外，蓬皮杜遵循的是"适中"原则。拉封丹与拉辛、波德莱尔与马拉美相映生辉。只有一个大胆的尝试：他用五页的篇幅介绍了《反韵律》(*Contrerimes*)的作者、敏锐的诗人保罗-让·图莱(Paul-Jean Toulet)。

在导言中，这位高师出身的银行家想起了自己的教师职业。他毫不犹豫地引导大家阅读纪德和莫勒尼。然后这个教科书作者全面而沉闷地回顾了法国诗歌的辉煌成就：雨果，"这个奇异的天才，这个巨人"；魏尔伦，"忧郁和悔恨的诗人"；兰波"和他流星般的命运"……不需要上高师也能作出相同的判断。

《法国诗歌集》1961 年面世，当时蓬皮杜正在洛希尔银行工作。批评家们看到了一本"银行家的诗集"、"一个价值确凿的钱包"。

---

① Entretien avec Anne-Marie Bon, née Coutte, avril, 1993.

“波普”总统蓬皮杜

蓬皮杜对诗歌的判断颇为俗套，对造型艺术的理解却很大胆。1962年他入主总理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他办公室墙上一张17世纪的挂毯旁挂上了一幅苏拉热(Soulage)的灰黑色抽象绘画。这件事成了一桩丑闻，因为法国人更喜欢政府府邸保持凡尔赛宫廷风格。

蓬皮杜迷恋流行艺术、动感艺术(Art cinétique)，热爱现代设计，积极鼓励先锋艺术的发展。这种趣味似乎在高师预科班的时候就养成了，虽然是穷学生，他18岁时就买了一本马克斯·恩斯特的拼贴画册《百头女人》(*La femme 100 têtes*)。在洛希尔银行任职时，他的经济条件宽裕起来。他和新婚妻子四处搜罗画廊的藏品，在他们位于圣路易岛的公寓墙上挂满了莱热、德劳内(Sonia Delaunay)、贾科梅蒂、克利、维庸(Villon)、伊夫·克莱因、布拉姆·梵·威尔德(Bram Van Velde)等人的作品。画商埃梅·马厄(Aimé Maeght)是这对夫妻的朋友，经常去他们家里吃晚饭。德裔画家罕斯·哈同(Hans Hartung)和安娜-伊娃·伯格曼(Anna-Eva Bergman)夫妇也是蓬皮杜夫妇的密友。有时候，总统访问画家工作室时会帮着干点儿搬画布的活儿。假期里，他们会拐到高德(Gordes)，在瓦萨雷里博物馆(Musée Vasarély)与匈牙利籍的艺术家吃午饭，或者路过圣保罗-德·旺斯(Sait-Paul-de-Vence)观摩马厄基金会的尼古拉斯·德·斯塔尔(Nicolas de Staël)作品。爱丽舍宫的全新装修体现了登峰造极的蓬皮杜风格。1969年，蓬皮杜夫妇入主爱丽舍宫后，决定改造共和国总统洛可可式宫殿。于勒·格雷维(Jules Grévy)时代的四

间沙龙完全改观了。这实际上出自蓬皮杜夫人的手笔，因为真正热爱现代艺术的主要是她。这次改造最精彩的部分是“动感”门厅，由以色列艺术家阿冈(Agam)构思设计。墙壁由七百二十多种不同颜色的铝条组成，天花板动用了五十四块板材，模仿天空变幻的色彩。照明采用日光灯管，一切都营造出“整体的动感环境”，空间随着人位置的变化而运动着。公众备感惊愕，全世界的装潢杂志都竞相刊载这些极其“新潮”的居室照片。后来，蓬皮杜的继任者们忙不迭地拆除了这些东西，只保留了饭厅的装饰。

“艺术是天使的利剑，它必能穿透我们”，通过这句优美的带点儿古怪的精神分析隐喻的奇特格言，蓬皮杜阐述了他对现代艺术出奇的热爱……他对先锋艺术的热情从未改变。画家罗杰·德·拉佛雷内(Roger de La Fresnaye)一句话道出了蓬皮杜的心声：“无力与古典绘画相抗衡，我们的同代人寻求侧面的方式使自己超脱出来。对他们的成功感到不满是徒劳无益的。”①

也就是说，现代艺术可以成为政治保守主义的掩饰，或者国家现代化的标志……让·柯写道：“一种来自高师青年时代的忧虑经常困扰着他。突然，他对现代艺术的热爱成了反驳的证据。‘如果我是保守主义者，我怎么会喜欢蒙德里安？’”②

拉汀芳斯新区和蒙巴纳斯塔楼③也表现了这种现代化建设者的心态，它们同样饱受争议。蓬皮杜总统想让“凯旋门孤零零地立在一片钢筋水泥森林的背景前”。“总统是有自己的美学趣味的；侥幸的是这也是承建者的美学趣味。”④《新观察家》杂志讽刺道。

---

① Catalogue de l'exposition d'Artcurial, p. 15, 16.

② *Croquis de mémoire*, p. 23.

③ 巴黎两处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建筑群。——译者注

④ *Le Nouvel Observateur*, du 23 octobre 1972.

也许。可是还有“蓬皮杜艺术中心”。

从20世纪60年代起，蓬皮杜每天从办公室回家都会路过“博布尔[①]平地”。风阵阵吹来，卷过这片空旷的广场，当时这广场只作停车场之用。忽然，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为什么不在这里建造一个纪念碑式的建筑献给顺应时代要求的新文化？一个巨大的多功能中心，一个创造力的中心，包括向所有人开放的图书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

当他说出自己的想法时，无论戴高乐将军还是他“杰出的朋友”马尔罗，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他感到很失望。

然而，他仍然坚持己见。一当选总统，蓬皮杜就开始实现他的“多功能”文化中心的想法，就好像他曾受到的“多学科”高师教育一样。筹委会选中了建筑师皮亚诺(Piano)和罗杰(Rogers)的方案。当他看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艺术中心的建筑模型时，他说：“这会让人惊叫的。”

蓬皮杜没能看到中心的落成。而以后的千百年，如果不会锈蚀坍塌，它将永远矗立在那里，象征着这个高师出身的总统的文化理想，这个智慧的保守主义者的最佳政绩。这座五彩缤纷的挪亚方舟将和巴黎城朴素的色调交相呼应……

① 博布尔(Beaubourg)，蓬皮杜艺术中心所在街区。——译者注

对高师的恨

“高师，我恨你！”历史学家古斯塔夫·莫诺德(Gustave Monod)喊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很少有学校会像高师一样激起如此的热爱，也很少有学校会像高师一样激起这么多的仇恨和愤慨。与高师受到的攻击相比，目前高等行政学院遭到的批评实在太温和了……

从19世纪末开始，左拉就挑起了对高师的敌意。《娜娜》的作者不喜欢余乐姆街。在他眼里，高师出身的作家和记者组成了一个秘密社团——一个“文学国度的小邦”。无论他们做什么，都是些“棋子，只是一些棋子”，一些不可救药的学究。左拉奚落道：“不管是谁沾染了高师气，一辈子都挥之不去。他们的思想固守着一种苍白陈腐的教书匠的气味。他们总是态度尖酸，需要戒尺来教训，得不到女人的老男孩们充满无声的虚弱的渴望……如果你们播种教师，那么永远也不会收获到创造者。”[1]

这种与高师如出一辙的说教式的狭隘思想很有赞同者。雅克·利弗尔(Jacques Rivière)在20世纪初投考高师落榜后，反常地庆祝了自己的失败，他写道：“大学选择它的学生，选择那些注定属于它的人，它所需要的是那些它能辨认出来的才智底下的特殊东西。高师人愚蠢的生活和可疑的玩笑被那些可怜的灵魂认为是欢乐的东西，

---

① *Le Figaro* du 4 avril 1881.

可对我们难道不是折磨吗?"[1]

不久,通过了竞争考试,但最终却放弃入学的罗杰・马丁杜加尔也表达了对高师生活的批评,他认为:"这只是中学的变相延续。这些没完没了的课程、作业、注释!对一切的遵守!……所有的思想都是共有的,为人群所玷污,在这些被称作学习室的不透气的陋室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他们的'嘎牛'词汇,他们的'钵子'和'巨鳄'[2]!不,我永远也不可能这样生活!"[3]

有时,极右派会攻击"高师是共济会秘密社团"。1939 年到 1940 年,德希约・拉罗什尔[4]在他的日记里计划解散高师,同时拆毁奥赛火车站和人道广场(Trocadéro)。高师这座共和派的老宅子对这个准法西斯主义者来说是一个秘密社团的典型。在他眼里,高师人掌控整个法国:政界、文坛、右派和左派。这所作为共和国支柱之一的过于民主的学校应该像共和国可耻的制度一样消失。[5]

诅咒之子

对高师最激烈的反对来自高师人自己,至少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没有比这些"弑君的王子"、这些层出不穷的"诅咒之子"更坏的

---

① Cité par Alain Peyrefitte, *Rue d'Ulm*, p. 256.

② 高师俚语,"嘎牛"(cagneux)如前文所提到的,原指"罗圈腿",这里指高师预科班学生;"钵子"(pot)指酒会;"巨鳄"(caïman)指某一领域的巨擘,如阿尔图塞便是高师的哲学巨鳄。——译者注

③ *Rue d'Ulm*, p. 256.

④ 德希约・拉罗什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 1893—1945),法国小说作家、散文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做了法奸,被枪决。

⑤ Pierre Drieu La Rochelle, *Journal* 1939—1945, Gallimard, 1992, p. 77, 246.

敌人了！

1880 届的高师学生，反感余乐姆的恶作剧和知识分子气的阿贝尔・埃尔芒在他的回忆录中斥责了“可憎的高师精神”。他认同左拉的说法，指出他的同学们创造力的薄弱，这归咎于他们“毫无生机的理论教条”：

“…… 我发现了一个他们共同的毛病，在我看来这是高师人的一个本质特征。他们的基本原则和信条是‘自从有了人，自从人开始思考’、谈论、写作和行动以来，早已被思考过、表达过和完成了的东西。而他们一旦参与行动、文学和哲学，就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①]埃尔芒憎恶高师的结果是最终选择了退学……为了去写他的书，而这些书其实不写更好。

尼赞接过了火炬，自高师内部发起了抨击。他是 1924 届的学生，中途退学逃去了“亚丁，阿拉伯”。他在文章中揭露的是高师的社会作用。“高师是一个可笑又可憎的对象，被一个爱国的、虚伪的、有权势的小老头统治着。”尼赞认为，高师培养的是精英教师，他们的真实使命是“使民众保持顺从和敬畏”。总而言之，这个号称人文主义的学校其实培养的是资产阶级的看家狗，而且这里只教授“修订过的思想、打磨过的理论”[②]。

20 世纪 60 年代，对高师最凶猛的揭露打着“科学”的旗号，出自另一个愤怒的高师人布尔迪厄之手。这位大学者在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中将整个高等院校钉上了绞刑架，控诉它们促进精英的再生产。尤其是他的母校，假装面向全社会招生，而实际上却越来越多地录取着长官们和教授们的儿子（布尔迪厄的儿子也上了高师，这无疑就是所谓的“再生产”……）

---

① Abel Hermant, *Confession d'un enfant d'hier*, Ollendorff, 1903, p. 146.

② Paul Nizan, *Aden Arabie*, Reider, 1932; réed. Maspero, 1960, pp. 55～56.

最后一种对庄严的高师的指责倒不是全无道理，它与 100 年前左拉的批评遥相呼应：高师的智力至上主义已经达到了荒唐的地步。罗杰·克里芒（Roger Crémant）的讽刺性著作《结构主义的上午》（*Les Matinées structuralistes*，1969）也调侃了这所名校。作者以相似于克雷芒·罗塞的笔名来讨伐这个高师毕业的哲学家，说他自以为主导着结构主义潮流，说穿了只不过是主宰一个类似“六八思潮”的拉丁分区。



路易·阿尔图塞的罪行

1980年11月16日,星期日,余乐姆街,清晨7点不到。高等师范学校还在沉睡之中。新一天的曙光微微照亮了教师公寓里路易·阿尔图塞与海伦娜·阿尔图塞卧室的一角。阿尔图塞正跪在床边,按摩着她妻子的脖子。他在自传的第一页就写道①:"我常常在沉默中忽然按摩她的后颈、背部和腰部……但这一次,我按摩的是她脖子的前部。我将两个拇指顶在她锁骨上缘的凹陷处支撑着,慢慢将一个拇指向右、另一个有点儿偏斜地向左滑动,连接起她耳朵下面硬硬的区域,做着'V'字形按摩。我感到大臂肌肉非常疲劳,我知道,按摩总是让我的大臂酸痛。

海伦娜的脸一动不动,很安宁,她双眼睁开盯着天花板。

突然间我被恐怖击中了:她的眼睛不停地瞪着,尤其是舌尖奇怪而平静地伸在牙齿和双唇间。

的确,我曾见过死人,但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被勒死的脸。然而我知道她是被勒死了。但怎么会这样?我站起身来大叫起来:'我勒死了海伦娜!'"

在精神病医生称之为"急性抑郁症突发"的过程中,这位哲学家杀死了他的妻子。

---

① Louis Althusser, *L'avenir dure Longtemps*, Stock/IMEC, 1992, pp. 11～12.

阿尔图塞极度恐慌,他穿着睡袍穿过自己的套房,冲出去跑到校医皮埃尔·埃提安纳(Pierre Etienne)的家门口。埃提安纳住在阿尔图塞正对门校医务室的楼上。

"我勒死了海伦娜!"阿尔图塞大喊着,使劲儿敲着医生家的房门。埃提安纳虽然早已习惯了他的哲学家朋友突发性的狂躁,但从未见过阿尔图塞如此激动,他甚至说要放火把学校烧了!医生拎着医药箱跟随他的朋友到了他家。阿尔图塞继续写道:"……我们俩来到了海伦娜面前。她的眼睛依然那样瞪着,一小截舌头依然位于牙齿和双唇间。埃提安纳用听诊器听了听,说,没救了,太晚了。"

面对这样的灾难和朋友的激动情绪,埃提安纳决定马上打电话给圣安娜医院要求立刻收治阿尔图塞。在这一刻,他还不愿相信这是一起谋杀案,尽管阿尔图塞本人坚持自责。一辆救护车载着阿尔图塞永远地离开了他生活、工作和执教了35年的高师。

一到圣安娜医院,阿尔图塞就被安排住院了。他逃脱了警方通常应该进行的对"疯子"的审查程序。这一特殊化的做法甚至在高师圈子里也遭到了非议。阿尔图塞写道:"一听说我没经过警方就直接被送到了圣安娜医院,高师出身的司法部长阿兰·佩尔菲特就火冒三丈,立刻打电话给高师校长让·布斯盖(Jean Bousquet),把他臭骂了一顿。"[1]

余乐姆街陷入震惊之中。一些学生拒绝相信这个事实,另一些忠诚的追随者则深受伤害。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杀妻和住院事件一曝光,右派的报刊主编们就开始大做文章。继火暴的多米尼克·亚迈(Dominique Jamet)之后,所有人都开始抨击"警方的软弱、

---

[1] Louis Althusser, *L'avenir dure Longtemps*, Stock/IMEC, 1992, p. 248.

司法的迟缓……”[①]他们心中暗喜地攻击“一个给疯子们传授抽象理论的精神病人”[②]。同一周，法兰西院士让·杜图尔(Jean Dutourd)在《巴黎竞赛报》的专栏也论述了这一事件。[③] 他毫无证据地指控高师的哲学家“小心翼翼地用一个布条围住受害人的脖子，以掩盖勒死对方的痕迹”。他继续写道：“阿尔图塞先生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但他对柏拉图、笛卡儿、莱布尼兹、康德都毫无兴趣。

这场论战的调子已定：阿尔图塞是在世的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 30 年来一直是高师的思想大师；既然阿尔图塞是疯癫和有罪的，那么哲学就是导致疯狂和罪恶的，那么高师就是一个制造疯子和罪犯的地方！1981 年 2 月，根据刑事诉讼条例第 64 条，当局宣布免除对阿尔图塞的起诉，因为他案发时处于“精神错乱”状态，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阿尔图塞将不会受到审判。

且不谈那些攻击辱骂，有一个问题至今仍无答案：为什么阿尔图塞要勒死他的妻子？简单的精神病的说法不足以解释这桩谋杀。德贝写道：“他使她窒息而死，为的是把她从他那令人窒息的焦虑中解救出来。”[④]无疑，如果有答案，那么答案应该从阿尔图塞的传记和阿尔图塞夫妇的共同生活中去寻找，他们的结合从一开始就经历了种种政治的、性爱的和情感的危机。最新披露的海伦娜·希特曼-阿尔图塞的神秘身世或许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高师上演的这出悲剧。

直到 1981 年 7 月从圣安娜医院出院，阿尔图塞才一下子看到了他的事件引起的铺天盖地的流言。之后剩下的十年生命中，他一直

---

① Extrait cité par Patrice de Plunkett, *Althusser: le philosophe en enfer*, *Le Figaro-Magazine*, 22 novembre 1980.

② 同上。

③ Jean Dutourd, *Les faits, froidement*, *Paris-Match*, 20 novembre 1980.

④ Régis Debray, *Les masques*, Gallimard, *Folio*, 1992, p. 162.

处在短暂的平静和狂躁—抑郁症复发的交替状态中。面对各种攻击，高师校长、古希腊研究学者、蓬皮杜的朋友、信仰马列主义的让·布斯盖坚决捍卫着这位患病教师的荣誉，他一再强调阿尔图塞三十多年来为高师所做的工作是杰出的。这位把一生献给了古希腊文明研究的人文主义学者无法容忍人们以诋毁一个救护车中的病人为乐，无法容忍把一个智者的陨落当做消遣。

未来永继

1990 年 10 月 22 日，沉默了十年后，阿尔图塞的名字再次登上了新闻：高师昔日的哲学巨擘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他的学生、1960 年哲学系毕业的巴里巴尔在葬礼上宣读了祷文。参加葬礼的一大半是高师人。值得注意的是，高师图书馆员、文学系负责人皮埃尔·伯迪芒赞(Pierre Petitmengin)没有出席，他不想参加。

"既是彻底的哲学家，也是彻底的共产主义者，没有在这两者之间作出甄选、分出主次，这就是阿尔图塞思想的特殊性，也是阿尔图塞选择的立场和进行的冒险。"巴里巴尔说。

此时正值柏林墙倒塌一年之后，对这位将"共产主义镌刻在了 20 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家的这番赞颂显得有点儿不合时宜。

1992 年春，阿尔图塞的自传面世，题为《未来永继》(*L'avenir dure longtemps*)。这本两百六十多页毫不留情的自我剖析获得了巨大成功。"……我只想提取情感的冲击，它标示了我的存在并赋予它形式。"阿尔图塞在作品开头以非凡的勇气写道。

马列主义的思想大师不见了，显现出来的阿尔图塞早期是一位年轻的天主教信徒，在让·吉东的培养下学会了高师预科班风格的

修辞术;后来是一个脆弱的男人,一生都活在不幸童年的阴影中,多年的精神分析治疗使这一切浮出水面。阿尔图塞揭露自己只不过一个简化的哲学文化的行骗者。昔日的哲学巨擘花了好几页笔墨谈论高师,"真像母亲的子宫,让我感到温暖和家庭的归属,保护我免受外界的侵扰,我不需要离开它就可以见到众人,因为他们总是路过或到来,尤其是我成名之后。总而言之,学校本身就像一个充满羊水的母体"①。

退出公众生活 12 年后,高师马克思主义时代的象征人物、"疯癫的"弑妻者阿尔图塞在高师的围墙外遇到的不再是盲目的信徒,而是成千上万深受震动的读者。

① *L'avenir dure longtemps*, p. 155.



当今时代





法比尤斯和朱佩:“高师治国者”

法比尤斯和朱佩这一对巴黎政治舞台上的“孪生兄弟”互不交往,两人时而在参议院的长廊上或在右派“民主联盟”与“社会党”大本营所在地——圣日耳曼大街上擦肩而过。他们同样高挑、清瘦,同样像所有“头脑发达”的人一样早早地开始歇顶。前后相差一两年的时间,他们相继在同一所大学读书,与同一类专家共事,出入于同一政权机构,他们以同样的焦躁和傲慢担任同一类的政治职务。

童年时代

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家庭出身,阿兰· 朱佩是朗台(landais)地区大农场主的儿子(三百公顷松树和一百公顷玉米),1945 年出生在蒙得马桑(Mont-de-Marsan)。他或许更愿意像法比尤斯一样在巴黎十六区的私人公馆——歇霏别墅(Villa Scheffer)中度过童年,洛朗·法比尤斯 1946 年在那里出生。

身强力壮的罗伯特· 朱佩只有小学结业证,当他顶着西南部的酷暑赤身露背驾驶拖拉机的时候,古玩商安德烈·法比尤斯正在他位于奥斯曼大街的商店里谈论绘画大师们的杰作。洛朗幼年时在拉杜(La Tour)美轮美奂的圣玛德琳娜(Sainte Madeleine)画像下就

餐。这幅被称作“法比尤斯的玛德琳娜”的画如今陈列在华盛顿国立美术馆。

巴黎资产阶级出身的神童洛朗在巴黎名牌高中昂松德萨意就学，而阿兰·朱佩只能在蒙得马桑的维克多·杜惠高中读书。

他们优异的成绩使他们殊途同归地进入了巴黎最负盛名的路易大帝高中预科班。这对法比尤斯家的继承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对外省来的朱佩来说则是第二次生命的开始。他终于摆脱了蒙得马桑令人窒息的环境，在那里他只能主持少年文艺之家的活动和一份叫做《铃铛》(*Le Grelot*)的小报。

1964 年，朱佩以第三十名的成绩考入余乐姆街的高师，他喜欢重申自己是“一举成功”的。法比尤斯则两渡难关，于 1966 年进入高师，他的哲学口试题目是“什么是英雄?”①

朱佩在高师时热衷于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在索邦大学听皮埃尔·克里玛(Pierre Grimal) 和雅克丽琳娜·德·罗米莉的课。这个冷漠的青年十分热爱地中海古代史。正是在学校组织的希腊之行中，他在帕特农(Parthénon)大殿前对他未来的妻子吟诵了雷南(Renan)的《古卫城的祈祷》(*la Prière de l'Acropole*)。这个身穿鳄鱼牌黑色衬衣的年轻人颇有戏剧细胞。他在古典文学教师资格会考中得了第十二名。相比之下法比尤斯则缺乏这种拿奖学金的学生的激情。他说:“我很感激学校，我曾经特别‘循规蹈矩’，高师教会了我自由。”当时新增设了现代文学教师职称，他是这一资格考试的头名状元。现代文学没有古典文学吃香，但是比古典文学更“入流”。

文学对他们俩来说是次要的，早在预科班学习开始之前，朱佩已经在学报上了解到国家行政学院(ENA)才是权力的阶梯。他找到了

---

① Entretien avec Laurent Fabius, mai 1993.

要走的路。他的高中同学吉约姆·克雷芒(Jérôme Clément)[1]一天在校门口闲谈时问起他今后的打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要读高师,读国家行政学院,进财政监察部,然后从政。"

1968年5月的学潮是他们始料不及的,朱佩一开始参加过学生运动,还参与了在当时的教育部长阿兰·佩尔菲特办公室前举行的静坐。[2] 但是很快他便离开了这种"无意义的游行"。他将妻儿送到外省避风,自己则埋头准备国家行政学院的考试。法比尤斯也无意于学生运动,他在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选举中正跃跃欲试地筹划组阁左派……

他们俩都知道从政的关键在于国家行政学院。朱佩日后说他在国家行政学院期间很无聊,这可能由于他第一次接触到的"真正权力"缺乏刺激性。1970年,当朱佩正埋头苦读之际,他的"孪生兄弟"法比尤斯正在电视台初露锋芒:他成了《单枪匹马》节目的嘉宾,这位奢侈的高师人无论在骑马运动(由他的兄弟——障碍马术冠军一手培训)还是智力测验中都异常出色。从巴尔扎克的化名到 *Roman de Rou*[3] 的作者,他像电脑一样有问必答。这一切并不影响他阔绰的生活。

在高师时,优雅的法比尤斯深深地爱上了伊莎贝尔·赫伯特(Elisabeth Huppert)[4]。他开的是最高级的轿车,尽管学业繁忙,但他过的生活就像电影《甜蜜生活》(*Dolce Vita*)里的花花公子一样。

---

① Jérôme Clément, *Un homme en quête de vertu*, Grasset, 1992.

② Entretien avec Laurent Fabius, mai 1993.

③ *Roman de Rou*,是1170年罗伯·瓦思(Robert Wace)写的诗歌,描写威金人和诺尔曼地区的历史。——译者注

④ 伊莎贝尔·赫伯特(Elisabeth Huppert),法国著名的女影星。——译者注

从政之路

事实上，这两个信奉专家治国的新人很快便在同学中出人头地。朱佩是“夏尔· 戴高乐”那一届的第五名，法比尤斯是“弗朗索瓦·拉伯雷”那一届的第二名。面临仕途的第一次选择时，他们俩的选择是截然不同的。对朱佩来说“真正的权力”在财政监察部，法比尤斯则看重行政法院的名望。

当朱佩在各省巡回监察，亲身体会公务员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时，法比尤斯开始了向政界挺进的历程。那是1974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竞选总统失败，高瞻远瞩的法比尤斯把赌注下在了输家身上，而不是理所当然地下在胜出的右派吉斯卡总统身上。他加入了社会党巴黎第六分区。他改变了身上的大资产阶级作风，采取一种谦和低调的姿态……很快他得到罗伯· 巴丹代(Robert Badinter)的青睐，1975年，巴丹代把他推荐给了密特朗。从此他青云直上……

一年以后，命运之神也向埋头行政事务、郁闷无聊的朱佩敞开了大门。财政监察部部长雅克·费德曼(Jacques Friedmann)发现并竭力向总理办公室主任杰罗姆·莫诺(Jérôme Monod)引荐朱佩。朱佩回忆说:“我当时31岁，穿了件新外套。莫诺简单明了地提出让我加入他的班子，主要起草雅克·希拉克的发言稿和处理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①]当他去报到时，希拉克的智囊人物皮埃尔·朱耶(Pierre Juillet)学着戴高乐将军的口气说:“你就是那位会写文章的授衔教师?”

---

① Alain Juppé, *La Tentation de Venise*, Grasset, 1993, p. 20.

他们俩把自己的命运与政治领袖紧密联系在一起，荣辱与共。敏捷的笔锋、对经济问题透彻的了解使他们很快成了领袖身边不可多得的助手。事实上，谁也无法像他们一样擅长将冗长、混乱的材料整理成简明扼要的纪要，起草一份洋洋洒洒的有关冶金工业的演说词，撰文对敌对者发起猛烈的抨击或者为周末晚上的电台采访准备一些置人于死地的言辞并保证第二天早上各家媒体会津津乐道地反复播放。

法比尤斯和朱佩都是可塑性很强的工作狂，他们看到了幕后的政治手段，这是他们的见习阶段。这两个绝顶聪明的高师人一经点拨便学会了打官腔和简洁明了的演说才能，并修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1975 年，法比尤斯发表的第一部作品的题目是《不平等的法国》(*le France inégale*)，这是他的忏悔书——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是自我检讨，他很认真地清算了自己的资产阶级过去。书中许多反叛高等院校的篇幅后来被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大段引用过。法比尤斯气愤地揭露："所谓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纯粹是骗人的，事实上考官们看重的是考生家庭的社会地位。说什么以学习态度来衡量学生，其实是以学生的家庭地位来定夺。"十年以后，法比尤斯当上了总理，这位对母校感恩戴德的高师人早已忘却当年犀利的指责，并解冻了高师的额外资金。

不管怎么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社会党神童法比尤斯和共和联盟天才朱佩已在政坛展现出他们的辉煌前程。他们一个是财政部长，随后又当上了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另一个则将担当起右派党领袖的要职……

专家治国者的灵魂

十年以后，原先咄咄逼人的年轻人开始疲倦了，他们的脸庞变得刚毅，他们的仕途坎坷莫测。尽管他们的成功是无可非议的，然而这两个理想的副手终不能逃脱命运的捉弄。难道他们就注定只能坐第二把交椅，而永远不能成为第一人吗？

他们得不到公众的爱戴，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地争取民心，到平民区去扎根——选择诺尔曼地区的刚格威利（Grand-Quevilly）和巴黎第十八区作为他们的选区。而他们自己却偏爱住在塞纳河左岸，法比尤斯住在先贤祠附近，朱佩则住在圣日耳曼德普雷。

这实在是勉为其难。他们的智慧是冷冰冰的、机械的，无论是党内人士还是电视观众都会望而生畏。朱佩对党内基层组织成员的态度生硬，认为他们"愚昧无知"[1]。不知是出于天真还是轻率，他说："我不会浪费我的时间。"[2]法比尤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副温良恭敬、矫揉造作的样子，竭力将词汇量缩减到最低限度，因为他相信一般民众只能听懂很简单的语言。希拉克早年的发言人德尼·伯端（Denis Beaudouin）谈论起朱佩时说："他是我见到唯一一个将他的高师经历完全抹杀的国家行政学院的学生。"这一尖刻的评价对这两个雄心勃勃的野心家来说实在是恰到好处。

然而还是要相信，这两位专家治国者是有灵魂的，他们的灵魂就是学识修养，学识修养意味着敏感，这是他们的第二天性。他们的宣传干事提议让他们"打破"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冷漠的形象，发掘深

① *La Tentation de Venise*, p. 56.

② *La Tentation de Venise*, pp. 115～116.

藏在技术官僚外表下的文化底蕴。法比尤斯借用饶勒斯的书名《走向大海的时候……》(*C'est en allant vars la mer…*)作为他规划书的题目,朱佩在发表自己的日记时则干脆选择了《威尼斯的诱惑》(*La Tentation de Venise*)来命名。

这样也无济于事。在这两个高师人身上学过的人文科学已经所剩无几了,他们的书中表现出来的激情是矫情的,文笔冷峻,处处可见剪辑和加工的痕迹。

这两位西塞罗[①]的崇拜者是演说家,尽管他们在采访和辩论中有问必答,但是他们无法使人们群情振奋。国家行政学院抹杀学生的口才和个性,法比尤斯非常清楚这一点。

现在他们已五十多岁了,正寻找新的契机。机械性能良好,只是缺乏火花,他们没有保留最初学到的、今天可助他们一臂之力的本领:口才、象征的意义和对理念的热忱追求。

---

①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éro,公元前 106—前 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当高师人幻想破灭时

鲁特西亚(Lutétia)酒店的晚宴结束了。要是在座的各位衣冠更严整的话,人们会以为这是综合理工学校或中央理工大学(La Centrale)的校友聚会。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皮埃尔-吉勒·德·热纳(Pierre-Gilles de Gennes)手握话筒坐在小型讲台上正生动有趣地讲述他最新的发明,并不失时机地发表了他对现时教育制度的不满。

在座的人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其中有不少工商界的头面人物,还有一些崭露锋芒的新星:经济管理人、金融家、国际级律师。没有一个是高等商校的人,这是“高师—企业俱乐部”的一次晚会。与会者都是余乐姆街那群擅长写作、以达席特(Tacite)和黑格尔为楷模的高师人。

文科生的报复

20世纪80年代的一大新鲜事:高师人开始涌向企业。谁能想到“雅皮士”时代的影响——追求利润、提倡企业精神——会波及到高师平静如水的院墙?人文科学的圣殿竟也不耻问津金钱。尽管表面上高师依然如故,但实际上,希腊语实习课和考教师资格会考的历史预习课的教师已不再人满为患了。高师人哪儿去了?他们去巴黎—

多芬内(Paris-Dauphine)大学或高等商校听法律课、经济课、金融课了。他们的课题已经转移到利润高的科目,他们的前途取决于此。

学期中转学的事已司空见惯,历史教师资格会考的优胜者、耶稣教专家改行当了高等商校的教师,音乐学专家成了货币市场的行家。这是他们情有独钟的真诚志向,还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对企业发生兴趣的原因主要是教育界的危机。高师人的必然归宿是当教师,而教师微薄的收入、低下的社会地位、流放外省的工作让这些精英望而生畏。与付出的努力相比回报实在微不足道。

与此同时,雇主们发现文学、哲学专业的毕业生可以给企业带来新的灵魂和效益。这就是"文科生的报复"。

其中的先驱者有皮埃尔·穆萨(Pierre Moussa),这位阿尔图塞的同窗学友如今已是金融界的明星了。他与同行一样一身英国式的灰色制服、条纹衬衫。这个左派知识分子已脱胎换骨成了大银行家,在英国领导他自己创立的金融集团——以雅典娜(Athena)名字命名的帕拉斯(Pallas)集团。1981年,由于他把巴黎巴(Paribas)银行的瑞士分行从国立银行中分离出来,遭到了左派的尖锐抨击,一气之下他愤然离开了巴黎巴并另起炉灶。

虽已年届六十,穆萨从不放弃炫耀他的文学学历的机会。他以高师人特有的幽默说:"聪明的才智、严谨的分析力和概括能力,我必须承认大自然给我的天赋是十分优厚的。"[1]在预科班时,他的老师盖克诺预言他会成为作家。1989年,穆萨多少应了老师的预言。他的回忆录的题目十分有趣,叫做《致富之轮》(*La Roue de la fortune*)。他在书中缅怀了高师酒吧里的年轻岁月,在学校住读时玩招魂游戏的场面,当桌子转动时,维克多·雨果会对他口述诗句[2]。

---

① *Le Figaro*,《费加罗报》,1989年9月6日。

② Pierre Moussa, *La Roue de la fortune*, Fayard, 1989, pp. 39～41.

众多高师人走上了财政仕途，法比尤斯的同届同学巴特里克·伯松勒(Patrick Ponsolle)现任苏伊士公司的总裁。有人总结说："高师人的教育并不益于他们搞工业，高师人的特长在非实干的领域，比如财政领域更有用武之地。财政事务运用的是概念性的常识"。

《无国家的法律》(*Droit sans l'Etat*)和《民主的变态》(*La Metamorphose de la Démocratie*)两本书的才华横溢的作者洛朗·科恩-达努齐(Laurent Cohen-Tanugi)认为："高师人的文学知识在法学中应用得更得心应手。"[①]这个工作狂太有发言权了。在上高师时，他就积累了许多文凭(巴黎政治学院、现代文学教师职称)，并获得了法律博士前文凭，之后他又去美国赫赫有名的哈佛大学深造。如今是他是多所法律事务所的律师(Cleary, Gottlieb, Steen and Hamilton)。他宽敞的办公室地处巴黎中心戴高乐广场附近的弗德兰(Friedland)大街上，离同届同学工作的偏远郊区可谓有"千里之遥"。他并不否认学文科的经历，十分关注高师的发展，他还热心推荐步他后尘改学法律的新人。他的事务所里已经用了四个高师人，其中有一个是女校友。他是文科毕业生中以文学底蕴获取成功的范例。他说："在我的同行看来，我是知识分子；而在知识分子阶层看来，我却是个生意人。我总有点儿阴差阳错的感觉。"

欢迎参加俱乐部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在金融界成就一番事业已不再是高师人羞于启齿的事情了。1983 年，随着"高师—企业俱乐部"的成立，关键

---

① Entretien avec Laurent Cohen-Tanugi, avril 1993.

的一步已经迈出。这不仅仅是一次文化的革命，还是对人们惯有的“高师＝争议”观念的冲击。1983 年的一天，六位进入企业工作的高师人拿着校友名册，决定结束“地下工作”，开诚布公地表明身份，并在同学间互通信息。“我们搜集到了百十来个校友的消息，接下来的工作比较困难。由于主流思想意识作祟，进入企业的校友已改头换面，不易查询。”①

第一次聚会约定了，组织者期待 30 人出席会议，结果来了 90 个人，连“学生头头”都出动了。是“天方夜谭”吗？不，是自豪，是对出身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学和期待它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自豪。

自卑感结束了，网络已打开，如今的“高师—企业俱乐部”号称有三百余名成员。诚然，“高师—企业俱乐部”的规模和聚会时的排场都无法和高等商校及综合理工学校相提并论。然而，十年后的“高师—企业俱乐部”已成为一个机构、一个工具。人们乐意在此谈生意，并物色年轻有为的新人。

此外，1987 年，“高师—企业俱乐部”的发起人还创办了一个私人企业，叫做“余乐姆公司”。名称虽然有点儿刺耳，但是它所提供的服务绝对可靠。这个坐落在纳伊(Neuilly)的企业的业务范围是提供财政咨询和法律分析，质优价廉。企业的人力来源于高师庞大的校友团体，包括在校的学生。

1971 届的阿兰・埃区格杨对高师在企业界重整旗鼓功不可没。路易大帝高中的这位哲学教授也是企业管理家。1990 年，他出版了《文学—资本》(*Capital-Lettres*)一书，该书一半是逻辑性的阐述，另一半是名人访谈。埃区格杨在书中如数家珍地罗列了文学专业毕业

① Cité par François Dufay, *Les normaliens à la conquête des entreprises*, Challenges, avril 1989.

生特有的十大美德:"对复杂事件的洞察力、对时间的整合能力、对质量的重视、对语言的苛求、对演说的精通、保留自省的距离、分析问题的两重性、综合分析的爱好、知识的内涵、对人的认识。"[①]不要把他们弃之一旁!他很实用主义地介绍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学家"的谈话,其中有皮埃尔·穆萨、巴特里克·伯松勒和依夫·加纳克(Yves Cannac)。《文学—资本》一书的价值自不在话下,它曾经是并依然是高师人跨入企业征程的启蒙读物。

尽管有不少成功的先例,"文科生的报复"更多的只是流于口号而不是事实。高师人是与众不同的,他们的批判意识与企业的清规戒律常常格格不入。高师人有标新立异的名声,对一个墨守成规的单位,他可以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对一个只求利用他的名声而不想他做实事的企业,他则是一个"危险人物"了。永远是领导助理,负责文字工作(发言稿、内部宣传),他有可能永远屈居这一位置,而不能像其他人一样青云直上坐上领导位置。

更不用说他本人很难融入"企业精神"了。"以个人能力量才录用的管理方式"让他嗤之以鼻。20 岁起便习惯于在高师院墙内完全自由地思考、独立地行动,他在企业中彻底迷失了方向。他坐在一张随时都会被抛掷的座椅上,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不少 20 世纪 80 年代获得教师职称的年轻人因向往"海市蜃楼"而投身企业,现在已心灰意冷。失败的原因在于无法参与"企业规划",不能加入团队工作,无法接受社会、职业,甚至服装的约束,总之,雄才大略的高师人成了独立和自由精神的牺牲品。

因为企业的成功对高师人来说常常意味着放弃兴趣爱好、放弃幻想、放弃文化品位。而凡是商业界成功的高师明星们绝大多数都受过国家行政学院和其他院校的熏陶。

---

① Alain Etchegoyen, *Le Capital-Lettres*, François Bourin, 1990, p. 64.

1972 届的洛朗・贝赫贝尔(Laurent Perpère)在获得了现代文学教师职称后,被分配到巴黎郊区的一所中学当教师。为了逃避现实,他试图进入出版界。伽里玛出版社的财经部主任召见他时说:"您是高师人,您挺不错的,但是我们找的是高等商校的人。"幻想残酷地破灭!贝赫贝尔随即考入国家行政学院,毕业考试得了第二名,被分配到财政监察部。自此他终于可以平步青云、大展宏图了,他一度领导过《普罗旺斯人报》(*Provencal*)[①]。

获得哲学教师职称的皮埃尔・多道豪夫(Pierre Todorov)是 1977 届的高师人,他的聪明才智在高师是人人皆知的。他很清楚能在哈切特出版社坐上主任的宝座应归功于他曾在行政法院供职的经历,而不是因为他对黑格尔了如指掌。这个年轻有为的"决策人"至少对母校是有感情的,他"怀念高师货真价实的文化氛围,而国家行政学院或其他名气不凡的院校只是'赝品'"。[②]

说到底,高师人面前摆着两条路:保持高师人惯有的精神上的独立性,满足于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或另选捷径通过国家行政学院、高等商校的台阶大步迈入成功之路。

---

① Entretien avec Laurent Perpère, avril 1993.

② Entretien avec Pierre Todorov, octobre 1992.

销声匿迹的人

高师学生名册上有许多毕业生没留下任何踪迹，既无地址，又无职位，一片空白。不少人情愿“斩断桥梁”，让时光忘却他们，其原因往往是他们现在的工作与大学时代的初衷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走江湖的魔术师

保尔·歇姆拉(Paul Chemla)就是一例。谁会想到这位49岁成为世界桥牌冠军的歇姆拉曾经是法比尤斯的同学呢？获得古典文学教师职称后，他放弃了教育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到他心爱的桥牌中去。传说他同时收到了征兵和工作分配的通知书，他把中学聘书寄给了军事当局，把征兵通知书发送到了教育部，然后若无其事地打他的桥牌去了。如此漂亮的花招，难怪人们把桥牌高手比作“走江湖的魔术师”。

乘飞机、住豪华宾馆，从温泉城到海水浴疗养地，这是一个与外省教师的生活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世界。歇姆拉过的是不同于常人的职业运动员的生活。每天下午五点以前他不会起床，之后去桥牌俱乐部——他真正的寓所——一局一局没完没了地打牌，直到凌晨。他喜欢去赌场，听意大利歌剧，抽哈瓦那雪茄，读普鲁斯特的书。他

被誉为“法国桥牌骄子”。他很清楚自己的优势，两度成为世界桥牌冠军的他总是不失时机地称赞他的对手或搭档。他一直说尽管桥牌是一项集体运动，但在他眼里他才是世界第一。高师人特有的优越感情结！

让-玛丽·维雷奇的戏剧理想

歇了顶的头上飘着一圈白发，黑边眼镜后面闪烁着一双炯炯有神的蓝色眼睛，维雷奇正忙得团团转，他在对一个女高音歌唱家示范一个剧情需要的手势。这已经是第十次重复同一个动作，他都有点儿气喘吁吁了。在歌剧《美狄亚》(*Médée*)首场演出前几天的夏邦杰(Charpentier)歌剧院里，法国著名导演维雷奇一如既往地追求着完美。

1990 年以来，他主管斯特拉斯堡国家歌剧院（Theatre National de Strasbourg)。他曾在南锡市上演了蒙特韦尔迪(Monteverdi)[①]，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了高乃依，在布鲁塞尔上演了罗西尼(Rossini)，在纽约上演了吕利(Lulli)[②]。这位巴洛克风格的大师是戏剧与歌剧两栖导演，观众为之倾倒，评论为之赞叹。1987 年在法兰西喜剧院他与指挥家威廉·克利斯蒂(William Christie)联手导演的吕利的作品《阿蒂斯》已成为经典，评论家们认为是“20 世纪 80 年代最杰出的演出”。

---

① 蒙特韦尔迪(1567—1643)，意大利音乐改革的重要作曲家，意大利歌剧的奠基人，是前期巴洛克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史中的地位完全可以与莎士比亚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媲美。——译者注

② 吕利(1632—1687)，法国作曲家，法国歌剧创始人。——译者注

维雷奇并不是科班出身,他是在实践中边干边学的。20 年的教师生涯对他来说是炼狱。17 岁时,他提出想当演员的请求,父亲不容争辩地说:“先考取了教师职称再作理论。”1959 年,他乖乖地进了高师,加入了阿尔图塞的小组。他听阿尔图塞、福柯、巴特、拉康等导师的课,考取哲学教师职称后,他老老实实地在莫兰以及第戎教了两年书。命运终于把他截回到他应走的路上。

他承认曾很实际地喜欢上了哲学,一度还以为找到了人生的道路,但是很快就发现自己背叛了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时时激励着他的志向。[①]

这个志向便是戏剧。在高师时,他听戏剧史课比听哲学课的兴趣更浓。命运是无法抗拒的。意外的相逢和天赐良机,与学生们“凑合”起来的演出和个人独角表演,维雷奇不失时机地弥补时间造成的空白。直到后来承接的形式与规模越来越复杂、庞大的剧目,直到加入当今最优秀的导演的行列。

他的强项是巴洛克戏剧,他最感兴趣的是 17 世纪,他的理想是从布满灰尘的图书馆里挖掘出古典主义以前的作品,那是法国戏剧界很少有人问津的阶段。这是高师人的通病,也是每一个导演梦寐以求的愿望,让一出僵死的剧本起死回生,将它有血有肉地展现在舞台上。维雷奇孜孜不倦的探索和他那高师人独有的细腻的文化修养是他成功的基础。

高师的爵士乐

谈到蒙特韦尔迪的音乐,洛朗·德·维尔德(Laurent de Wilde)

① Entretiens avec Jean-Marie Villiegier, mai 1993.

显然更喜爱塞隆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这个35岁、头发剪得短短的、笑起来很有感染力的小伙子在爵士乐领域里成功地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个领域对大学生来说比戏剧界更为封闭。作为职业钢琴师,他常与著名的爵士乐手即兴演奏,与萨克斯风手玛萨利斯(Brandford Marsalis)同台演出,与凯斯·杰瑞特(Keith Jarrett)的专职鼓手杰克·狄强奈(Jack DeJohnette)共同灌制唱片。

20世纪80年代初,维尔德还在高师上学期间,一次去纽约旅游发现了爵士乐。回法国后,他去见了高师校长并告诉他:"我不考教师职称了,我要成为爵士乐手。"

高师素有"宽容的大家庭"的美称,确实名不虚传。校长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叫起来。他不反对年轻人的"一时冲动",后来又"忘了"要求他去参加考试。维尔德在他出的第一张唱片的封面上真诚地感谢校长……

以他的才能为资本,维尔德开始了征服爵士乐大本营——纽约的历程,自学成才的爵士乐手在追赶美国同行的行程中历尽艰辛。"当我在啃《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他们沉浸在音乐之中,学习传统的曲子。"然而,高师人并没有被大洋彼岸激烈的竞争所吓倒。"在那里争得一席之地与考高师一样困难,所不同的是那儿的游戏规则不很明确……有时会突然袭击来个口头测验,让你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凌晨三点去演奏一曲,不管你身心状况如何,如果不能应付,你就完了……"

但维尔德完全"应付下来"了。短短几年中,他在曼哈顿烟雾弥漫的俱乐部里一级级地攀上了爵士乐钢琴家的阶梯。评论家们把他的音乐归入灵歌、抒情型的爵士乐,年轻化了的传统"上乘爵士音乐"(be-bop)。他的发行人菲利浦·凡桑(Philippe Vincent)说:"洛朗的一大优点是他的节奏与其他年轻的钢琴家不同,别人迫不及待地展示他们的精湛技艺,而他则巧妙地运用音乐的空白使他的演奏更

简练、更有音乐感！[1]”

《世界报》乐评专家弗朗西斯·马赫芒德(Francis Marmande)称赞他是“蒙克和格诺(Queneau)之子”。评论家们说他以简洁、博学的手法处理爵士乐。他本人也证实了这一点：“我构思一张唱片就像构思一篇文章一样，首先深思熟虑，然后精心挑选乐曲，必须选择与众不同的版本。总而言之，我先做档案员的工作，这令我想起在高师的时光。”

如今，他已成为法国最优秀的钢琴家之一，这位知识分子爵士乐手正筹划写一本关于蒙克的书。高师之路无所不达。

---

① Entretien avec Laurent de Wilde et Philippe Vincent, Mai 1993.

媒体明星

无论是《世界报》、《费加罗报》，还是《观点》和《新观察家》周刊，高师人无处不在。明星级的社论作者有让·端木松、让-弗朗索瓦·何维勒和雅克·朱利亚，身价极高的自由撰稿人有贝尔纳-亨利·列维、海杰斯·德贝；一般的记者则更多，他们分布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等各种新闻媒体。

这简直成了流行病！曾几何时高师人根本不屑屈尊于新闻工作。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被视为降格，有失体面。身处大学深墙大院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待媒体的态度犹如基督教传教士对妓院一般地憎恶……

可是时过境迁，近年来高师人对媒体已不再抱有成见了。是当年阿隆为《费加罗报》和《快报》撰稿树立的榜样？是教育界减员的危机促使他们另走捷径？还是想起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高师人曾在普罗沃特报业集团(Groupe Prouvost)担任过要职？反正，高师人涌进了“宣传口”。他们明白所谓的宣传只是修辞的新名词，而修辞正是他们的强项。

总之，他们放弃了高等学府的尊严、迟发的工资和默默无闻的荣誉。他们需要感受新闻工作的强力、掌控新闻的冲击性和作为明星飘飘然的成就感。但是达到这一步必须有一个适应过程。文章要从简，“角度”要找准，报道要吸引人，结尾要出奇制胜。他们时常仍免

不了暴露高师人的伎俩,"三段论"的模式常出现在他们的笔下,可谓不打自招。有些高师人,如何维勒和贝尔纳-亨利·列维,由于仇恨大学而受到学院的驱逐和冷遇。高师人在法国新闻界不乏采访记者,然而更多的是专栏记者、社论作者和分析家,他们中很多人还是重量级人物。

他们是否会形成关系网,甚至"黑社会"呢?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绝不可能。他们的网络与综合理工学校在工商界的势力或国立行政大学在政府部委办公室的关系网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何维勒自我辩解说:"我领导《快报》时,从来没有因为对方是高师人而录用他。"然而,他的报社里确实有高师毕业生,高师人腼腆地称之为"跨代友谊"。这当然谈不上什么结构性的关系网,只是一种悄悄的认同、一种相互的共识、一种"同属一个俱乐部"的感情和互通有无的帮助。

诸如一次激烈的论战使两个同届校友反目为敌,诸如一篇赞美的文章原来出自作者的同窗之手,这种高师人之间精诚团结或针锋相对的把戏对广大读者和听众来说自然是无从探知的,而一本高师学生名册则足以让人一目了然。常常在高师或预科班时便萌发的竞争会一直延续到社会上。阿蒙(Patrick Hamon)和罗曼(Hervé Roman)在1981年作了一项调查并出版了《知识分子治国》[1]一书。他们认为:"预科班是培养未来知识阶层和新闻媒体决策人物的温床。"这个论断延续至今依然有效。

---

[1] Herve Hamon et Patrick Rotman, *Les Intellocrates*, Ramsay, 1981.

三位社论作者

端木松的办公室里书刊、报纸堆积如山，像一个中学生的宿舍一样乱七八糟。他在演戏呢。他本人就是戏，皮肤永远晒成褐色，永远显得年轻干练，嗓音吊得高高的，与蓝色的眼睛同色的衬衣配了条羊毛领带，《费加罗报》社论作者的谈话妙趣横生，既有轶事又有哲理，再也没有比这个冲动的法兰西院士更可亲、更优雅、更有礼貌的人了。

有人提出高师——他的母校——在法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似乎起了不太积极的作用，这下可闯了大祸了！"不朽"[①]的智者突然生气了，蓝色的眼睛像两道闪电，"如果有什么需要维护的，那只能是高师！它是独一无二的，它综合了德国的科学、法国的宽容和英国的百科知识。绝不能摧毁这个知识与自由言论的美好神话。这是非宗教与共和精神相结合的最大成功！"以端木松侯爵的名义……

显然，端木松与高师之间两情相投的往事依然如故。从他家族的圣-法尔别墅城堡(Chateau de Saint-Fargeau)到余乐姆街的"共和国修道院"，《赢得上帝欢心》(*Au plaisir de Dieu*)的作者走过的历程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有谁比他更能代表"高师人"呢？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不折不扣的博学者、兴趣广泛的艺术爱好者，他身上体现的是一种贵族式的高师精神……

他的导师是罗杰·凯卢瓦和于勒·罗曼，端木松在法兰西学院所占的位置正是以后者的名字命名的。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师

---

① 法兰西学院的院士(académicien)被称为"不朽之人"或"永垂不朽的人"，因为他们的名字是载入史册的。

人，据他所说，他的众多作品是毫不费力，甚至是无意识地完成的。他的第一部畅销书《帝国的荣耀》(*La gloire de l'Empire*)[①]是一出大恶作剧，描写了一个臆想出来的王国……

早在少年时代，他对高师已心驰神往。法国解放后他所上的高师已趋向共产主义和精神分析。侯爵的后代进了共产主义的大学。年轻时，他竭尽全力与大家打成一片。他是个真心实意的人，也曾满怀激情地通读了《资本论》，甚至加入过法国总工会(CGT)。他回忆说："我想应该自觉地从我做起，不能摆出一副唯我独尊的姿态。我最好的朋友都是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是学生中最开放、最活跃、最聪明的。"路易·阿尔图塞当时正从基督教皈依了共产主义，他们的友谊完全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碰撞"。"和阿尔图塞结下友谊后不久，一天他笑着对我说，'日后，我自然会把你送上绞刑架的！'[②]"

端木松是个有福之人，他以高师人为自豪，然而他却不是个幸福的高师人。原因？其他的高师人早已说过："20 岁不是最美好的岁月。""上高师期间，我无所适从，有点儿像电影《狂人彼埃罗》[③](*Pierrot le fou*)里的主角，烦躁不安，厌恶一切。从高师起，我开始懒散了，三年中我一天看三部电影……"那是一个充满疑虑、对自己产生怀疑，以至于丧失勇气的年代。他在《再见，谢谢》(*Au revoir et merci*)一书中幽默、精彩地叙述了这段时光。他强调说："高师对打算写作的人来说是危险的，那里耳濡目染的都是巨作，培养的是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可用于他人也可用于自己。"

---

① 《帝国的荣耀》(*La gloire de l'Empire*)获得 1971 年法兰西学院小说奖。——译者注

② 法国大革命期间处死了很多贵族。——译者注

③ 《狂人彼埃罗》(1965)是法国新浪潮电影导演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作品。——译者注

看来40年后的今天，端木松已挣脱了高师的魔法。他发表了一系列的畅销小说、反映豪门大户的电视剧和有影响的书籍，成了法国人偏爱的贵族作家。他永远忙着出游希腊、科西嘉、土耳其等阳光明媚的地方，忙着颁发文学奖，忙着组织法兰西文学院的选举，忙着为人写前言，他发誓要静下心来做自己的事业……这个忙人很少有机会去余乐姆街，“除了一次例外，有人邀请我去作一次讲座，去了学校，才知道是一出恶作剧”。

现在让我们离开《费加罗报》，去《观点》周刊见识一位端木松的同辈人，同样获得哲学教师职称，同样“入乡随俗”。他是右派知识分子中的思想家——何维勒。他的真名叫让•雷加(Jean Ricard)，了不起的何维勒先生是个不知疲倦的人，左派的死对头。他不是贵族出身，他的父亲做进口花生(用来榨油和做肥皂)的生意。这个马赛人说话不带地方口音，年轻时在“普罗旺斯稚鹰队”(Aiglons de Provence)踢中锋。他回忆说：“在足球场上，我射门很棒。”

半个世纪以后，他依然像当年一样有爆发力。他从教育界到报界的经过曾轰动一时。1957年，他在一所中学教书，以一篇题为《哲学家有何用?》(*Pourquoi des philosophes?*)的杂文一夜成名。当时正时兴哲学，这个无名之辈竟敢批判海德格尔，摧毁拉康，攻击列维-施特劳斯。很多知识分子至今仍不能原谅他这样的亵渎。这个狂妄之徒被逐出了校门，一个“秘密团体”专门组织起来对付他。他成了大学院的“不受欢迎的人”。可这又何妨，报界为他开辟了栏目，他一度还是《快报》的主任。他解释说：“对我来说，新闻工作也是一种教育方式。我做的工作与教师没有区别，都是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

戴高乐将军的作风、知识分子的盲目性、密特朗总统的绝对主义(20世纪60年代，他还当过密特朗总统的顾问)无一幸免，都先后遭到过他毫不留情的攻击。此人擅长恶语中伤并且出手狠辣。他写杂文，更写哲学论文，文章里充满了宣判和斩钉截铁的定理。这个反对

哲学家的人自己就是一个顽固的哲学家。

谁都知道“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道理，这个卡桑德拉[①]在英、美国家比在法国更受欢迎。或许法国人对他不够了解。他是个主张自由竞争的强硬派。他写过一本很出色的有关普鲁斯特的书，曾在大学生中传阅；他还著有关于精美饮食的论文和《法国诗歌精选》，他非常主观地把阿拉贡、克劳代尔和贝玑排除在诗集外。不了解何维勒的人会很惊讶地发现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一句话说完便像孩子似的大笑起来。他的妻子是《世界报》的记者“罗罗”，即克罗德·萨洛特[②]。

《费加罗报》有端木松，《观点》周刊有何维勒，不知情的人还以为高师净出些自由右派的人物。事实当然不是这么回事，雅克·朱利亚就是左右居中的例证。

面容温和、头发灰白的朱利亚说话时带点儿前腭擦音。他在法国新闻界也称得上一大笔杆。每周的《新观察家》都有他权威性的社论。他的怒火令人畏惧，他对左派、社会、学校的分析都举足轻重。他的文笔与他的思想一样火暴、清晰。他是左派基督教徒，与他的偶像——贝玑——一个模式：严峻、清醒……

他在《新观察家》的办公室是一间镶大玻璃的房间，紧挨着副总编辑让·达尼尔的办公室，门上也挂着“副总编”的牌子。每周五，他在“欧洲一号”电台有一个专题节目。他承认自己一直有当记者的愿望。对一个著名的教授来说，也算是直言不讳了。

人们差点儿忘了，朱利亚原来是历史学家，不同于端木松和何维勒的是，他从来没有中断过与大学的联系。他是工运历史专家，研究进步工会的历史，专门研究“破坏罢工能手”克列孟梭(Clemenceau)。

---

① 卡桑德拉(Cassandra)，希腊特洛伊公主，预言家。——译者注

② 克罗德·萨洛特的母亲是娜塔莉·萨洛特，法国作家。——译者注

20 世纪 60 年代中，他以教育工会(SGEN)成员的名义参加过法国民主工会(CFDT)政治局工作，曾参与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的“第二左派”。鉴于这段经历，他至今仍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的研究生班任教，他在预科班任教的妻子也是他那时候的盟友。

别的记者往往在阅读 20 世纪 50 年代《巴黎竞赛》杂志的过程中找到了人生的志向，而他却是在翻阅发灰的《官方报》(*Journal officiel*)的时候“中了邪”的。他的父亲是葡萄酒商，也是法国南方一个小村庄里的市长。每天早上照例收到邮局送来的《官方报》。当同样这个年龄的孩子们正翻阅连环画时，他小小年纪却读起了两大议会没完没了的辩论记录，在蒙戴斯·弗朗斯(Mendès France)的讲演中神游……

他一直等待了 20 年才实现他的理想。那是在 1970 年，让·达尼尔给了他第一个机会，让他写一篇社评。37 岁的他在大学里已是个名人了，而在记者的生涯中他才刚刚起步。他回忆说：“我写第一篇文章时很想显示一番自己的才华，达尼尔让我重写了三次。新闻界是一所教人学会谦卑的学校。”

朱利亚不是那种一方面藐视新闻报刊，一方面又跃跃欲试的道学先生。为了写好一篇社论，他不惜乘飞机去南斯拉夫、苏丹、索马里实地考察。他说：“一个社论作者必须亲眼目睹他所说的事物。”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他曾在记者培训中心任教，他发现并向达尼尔推荐了一位很有天赋的年轻人吉斯贝(Franz-Olivier Giesbert)。从那以后，他一直以父辈的眼光关注着他的学生：安娜·圣克莱(Anne Sainclair)、保尔·阿马(Paul Amar)和达赫瓦(Patrick Poivre d'Arvor)。他坦言：“当吉斯贝被《费加罗报》从《新观察家》周刊挖走时，我是反对的，可同时又是自豪的……”

最终，他在教师、工会活动家和记者之间作出了选择。1981 年，

他的左派朋友在大选中获胜，走马上任掌控国家大权，尤其是1988年罗卡尔出任总理时，他完全可以参政。可是他没有。他对社会党失望了，甚至对罗卡尔失望了。他周围的人说，“最近三年来，他与罗卡尔的关系疏远了”。可是他肯定没有对新闻工作失望①。

超级明星——BHL

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简称BHL，是15年来最耀眼的媒体明星、电视台的常客、《巴黎竞赛》名人栏目的焦点人物、被讽刺的对象，在他的朋友圈子里摇滚乐明星多于哲学家。对他来说，高师是出人头地的绝好的起跑线。

20世纪60年代在高师学习时，他的名字还只是贝尔纳·列维。当他开始发表文章的时候，他把名字贵族化了，加了个亨利，这样就成了BHL。明显地潇洒了，也更显得有品位了。

一张高师时的照片上他穿着黑色的套头毛衣，那时他还尚未找到后来大出风头的衣着风格：雪白的衬衣，宽宽的领口和袖口呈新月形。每当食堂开饭的时候，他总是姗姗来迟。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身穿长长的意大利西部风格的麂皮大衣，手挽一个绝色美女，大跨步地走进来。上高师的同时，他在巴黎政治学院也注册了，由于一个教授对他“说了一句多余的话”，他挥拳打了他，被巴黎政治学院除名，因此他在高师出了名。蛮横的年轻人的女友是个有名的模特，他花在她身上的时间多于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冬季体育场，超速驾车，各种荒唐轶事层出不穷……BHL回忆说：“我让人开奇形怪状的车带我

① Entretien avec Jacques Julliard, novembre 1992, et Pierre Rosanvallon, janvier 1993.

兜风。”(至今他还不会开车)他让女友住在高师宿舍里，自己则住在位于纳伊(Neuilly)的环境更舒适的家庭公寓里。

政治立场上他倾向无产阶级，但是他可不是那种运动积极分子。1968年5月，他没有去参加巴黎的街垒战，他正忙着准备高师的入学考试(他属于那些不顾“局势”发展，对高师当局施加压力要求考试照样进行的人)。1971年，教师职称到手后，他赶上形势，成了游击队员。

事实上，为了援助孟加拉国，马尔罗(Malraux)提出成立一个国际纵队，BHL是法国唯一的志愿者。他承认，“海杰斯·德贝当年在玻利维亚所做的一切对我震动很大”。他的举动得到了阿尔图塞的支持，《战斗报》(*Combat*)为他提供了记者证，就这样他飞到了亚洲，在那儿度过了高师的最后一年。一开始他在战区待了几个星期，没有打过一枪。达卡(Dacca)解放后又到了那里为新政府效劳，他是计划部的顾问。制订五年计划期间，他与当地的一个美女——马克思主义游击队长的表妹出双入对，最后由于激进的活动于1972被驱逐出境。回法国后，他写了第一本书《孟加拉国——革命运动中的民族主义》(*Bangladesh, nationalisme dans la révolution*)，理所当然地由左派思潮的代言刊物《马斯贝罗自由手册》(*Cahiers Libres de Maspero*)出版。

经历了如此波折再回法国自然是痛苦的。教师资格会考的第八名只获得了巴黎郊区一所中学哲学教师的职务。每个星期，“老游击队员”得乘郊区火车去教30个中学生……可喜的是他的书引起了维尔尼(Françoise Verny)的注意，她嗅出了这个浪漫的高师人身上潜在的能力，她聘用他在格拉塞(Grasset)出版社工作。1973年秋，他被任命主编三套丛书，时年25岁。

四年后，新哲学家大量涌现，BHL的时机到了。电视节目《阿波斯托夫》(*Apostrophe*)中出现的BHL长发飘逸，衣着洒脱，十分引人

注目。天哪，以如此充满活力的青年人为标志的哲学一定是美妙的！他不容置疑的言辞、深谋远虑的神态、反专制主义的演说征服了法国。年轻的哲学家身上兼有马尔罗的风采和萨特的偏执。

当然，总会有人说闲话的。1981年《法兰西意识形态》(*L'idéologie française*)一书出版后受到了高师老前辈理所当然的嘲弄。BHL的作风——走捷径、说显而易见的事实、自我崇拜——激起同行们的不满。

历史学家何内·雷蒙认为《法兰西意识形态》只是“一种脱离背景、毫无意义、七拼八凑的游吟诗……”《快报》署名阿隆的文章指责BHL“违背了所有正确评价历史和处理历史的原则”。“巨鳄”还为BHL没有履行诺言而洒了一滴眼泪，说什么“我很留恋那个我几年前认识的年轻人，那时他还没有养成矫揉造作的风格，恰恰相反，从小养尊处优、一帆风顺的他是个热心做事的人。我曾经对他的天赋、他的魅力、他的高尚感情很有好感……”①

BHL是否因学院同仁的藐视而悲痛呢？虽然得不到他们的承认，但一大群朋友的支持却也足以与那些观念正统的大人物抗衡。他不断地发表匆匆完成的散文、即兴写就的小说，还有报道、艺术评论、电视追踪、舞台剧本等等，几年里他成了全国最有名的“哲学教师”。频繁地上电视的结果是他创造了崭新的媒体哲学家。

然而，他真正的杰作是他的形象，他掌控得完美无缺。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个喜笑颜开、很调皮的人，可只要有摄影师出现在他面前，他马上摆出一副严肃思想家的姿势，眉头紧锁、额头皱起……作为一个媒体内行，他很善于运用自己的魅力，凡有大事件发生，他必自告奋勇地投入。在制造舆论这方面，谁也无法与

---

① Voir Le Point du 26 janvier 1981(René Remond), et L Express du 7 février 1981(Raymond Aron).

他相比。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成功地使他的竞争对手黯然失色。当他的一个高师同学正酝酿写一本关于知识分子无所适从的书时，他立马写了一篇歌颂知识分子的文章抢先发表。当南斯拉夫战火骤起时，高师人范杰勒库（Finkielkraut）已经上了第一线，但不久他就杳无音讯了，因为几个星期后，BHL 接踵而至，把新闻报道的镜头全抢走了。

全方位的知识分子永远是他，只能是他。而他的准星瞄准的是马尔罗——浪漫主义的英雄和萨特——无法超越的知识分子的象征。

说到底，他仍是个预科班学生，不仅仅由于他的服饰（灯心绒的裤子、靴子、长发），尽管他反对陈旧的意识形态，他的演说也还是百分之百 1968 年的风格。作家马克·朗布洪这样总结道："列维是纯粹的 20 世纪 60 年代高师的产物，我们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他的剧本《最后的审判》（*Le jugement dernier*）就表现了他 25 岁时的文化背景，看看剧中教师这个人物，完全体现了 1968 年的思想。"

此外，BHL 自己也承认："当我看着他们举着冈纪兰姆的认识论，福柯的教导念念不忘，拉康理论也要捍卫，朝着充满幻想的天国前进时，无须逼我，我至今还会说这些可怕的家伙对我的慑服力是异乎寻常的……"

是的，BHL 是个大舞台上的知识分子，面对不同的观众，他变换着不同的姿势和表情。他最有灵感的文章写的是阿尔图塞，这不是巧合。阿尔图塞是他年轻时的思想导师。BHL 的成功几乎全部得归功于他。阿尔图塞是另一个具有特殊威望的人，另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哲学家①。

---

① Entretien avec Bernard-Henry Lévy, novembre 1992, Jean-Michel Deprats, décembre 1992, Jacques Massot, septembre 1992, Philippe Nemo, janvier 1993.

侯爵朗布洪

马克·朗布洪的个人履历在巴黎可算是最令人眼花缭乱了，他37岁时已经桂冠累累：高师毕业生、文学教师职称、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行政法院审查官、在伽里玛出版社发表了几部小说的作家、好几家周刊（*Le Point*，*Madame Figaro*）的专栏记者。还有什么可说的？

在这众多的桂冠中，他最引以为荣的是高师毕业生。高师是他少年时代在罗纳（Rhone）河边十分向往的学校。1974年时，他才17岁，他父亲是里昂市一个搞电力建设的大工商家。朗布洪说："我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加德满都（尼泊尔首都）或高师。"就这样他选择了高师，20世纪70年代的高师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连偶像都已日暮西山，思想家们"在一种战前纷乱的气氛中"作最后的冲刺。后来被丈夫杀死的哲学教授阿尔图塞的妻子，手提购物袋走在余乐姆街上；福柯、拉康、巴特的研究生班的课也接近尾声了……虽然朗布洪也热衷于听他们的课，可他的硕士生论文写的是德里尤·拉·罗歇尔（Drieu la Rochelle），他的博士前论文写的是保罗·莫朗。时代不同了，留短发的这一代年轻人重新发现了原来被禁止的作家以及他们那种生硬乏味的文笔和优雅的堕落。白天，朗布洪在高师上课；晚上，他出入豪华旅馆。墨镜、白昼、伊基·波普（Iggy Pop）和德里尤……后来流亡到西班牙首都，他把马德里的莫卫达（Movida）[①]当成了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把名模纳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

---

① Movida 指1977—1983年西班牙新文化潮流。——译者注

bell)当成了约瑟芬·贝克[①],把嬉皮士作家布莱特·伊斯顿·艾里斯(Brett Easton Ellis)当成了保罗·莫朗。

很快,他开始创作新浪潮小说和色情小说《马德里随笔》(*L'Impromptu de Madrid*)、《面具之夜》(*la nuit des Masques*)。两本书都得了文学奖。朗布洪的个人经历在学生中属于一流,他可不是那种冒冒失失的人,为了保证高师毕业后的出路,他选择了行政法院的工作……年纪很轻就做了父亲,住在巴黎市中心五星广场附近的一所中产阶级的公寓里。

他穿的是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千篇一律的灰衣服,脖子上系一条艺术家的红围巾,圆脸庞,留着黑色的卷发。像他这样的高材生为《费加罗报》写一篇文章如同过去交一篇文章一样轻松。他说:"当你经历过必须在六个小时内写出一篇十五页论文的训练后,用一两个小时完成一个版面是不在话下的。"朗布洪喜爱的主题?当然是与女性有关的。他在 *Madame Figaro* 上发表了颂扬连裤袜的文章,对超模们做了"普鲁斯特"心理问答调查。他对法国上层社会女性及摩登演员的描写是他人无法比拟的。他的文章里充斥着从英语里借来的词汇,那种矫情足以让法兰西文学院的院士们看后心肌梗塞。可是谁又能肯定有一天朗布洪不会加入这个名垂青史的团体呢?

到目前为止,他的两本小说大有入围的希望。不过朗布洪主要的角色是评论家,与那些大评论家一样,他的尖酸刻薄是众所周知的。不少人尝试过他的出言不逊,西蒙娜·德·波伏娃被说成是缠头巾的"母海狸",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则是"全身裹着围巾",塞尔旺-施赖贝尔(Servan-Schreiber)或菲利普·迪昂(Philippe Djian)是"单音节作家"。有人批评他对前人太残忍……好在人们对这个目中

---

① 约瑟芬·贝克(Joséphine Baker,1906—1975),美国爵士乐歌舞明星,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靡巴黎。——译者注

无人的年轻人不太计较，他下笔之快是他人学不来的。再说他有一个相当高档的“粉丝”，那就是密特朗总统。在总统府的一次酒会上，密特朗对他表示了关注，称朗布洪是“他这一代人中最有天赋的新作家”①。

① Entretien avec Marc Lambron, octobre 1992.

卢瓦尔河上的阳台

位于卢瓦尔河畔山丘上的圣弗罗朗老城(Saint-Florent-le-Vieil)时而也有寥寥无几的游人光顾，但是没有一个导游、没有一块指示牌会告诉游客，在一座悬桥旁住着当今最伟大的法国作家于连·格拉克(Julien Gracq)。82岁的格拉克隐居在他儿时的故居。《流沙海岸》(*Rivage des Syrtes*)的作者在卢瓦尔河边的一栋小屋里安度晚年。那是一栋20世纪20年代风格的灰色小屋，四周墙角用石块砌成。黄色的百叶窗除了一两扇以外，其余几乎都紧闭着，门前平台四周是雕花的栏杆。屋前的卢瓦尔河形成宽宽的河弯，缓缓地流过柳树、杨树环绕的小岛。呈现在这个风景描写大师眼前的完全是儿时的风光。“冬日里，这儿的景色酷似北方的皮卡第(Picardie)。很久以来，巴黎已经对我没有吸引力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很喜欢巴黎。可我来到这儿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和我的书做伴有益写作。”头发又短又稀的格拉克穿着棕色滑雪套装，身形消瘦。他几乎要为眼前令人沮丧的风景向远道而来的客人道歉了[①]……

屋子里摆满了布列塔尼式笨重橱柜，墙上挂着几代老祖宗的画像，书房里排列着四千多本书籍和CD。与姐姐同住在这儿，他又成了路易·普瓦耶(Louis Poirier)退休的中学教师。圣弗罗朗的居民

---

① Entretien avec Julien Gracq，décembre 1992.

多少也知道普瓦耶先生在巴黎是著名的作家，以格拉克为笔名。“然而对他们来说，写作是一种莫测高深的工作，在他们眼里，我并不存在，因为他们没有在电视上见过我……”

他的卧室兼书房面朝卢瓦尔河，格拉克在这儿写作是没有固定时间的。他描写的不再是《林中阳台》(*Un balcon en forêt*)、《流沙海岸》或《半岛》(*La presqu'île*)之类小说里那充满惊慌的等待、孤独的历程和壮丽的崩溃，而是带风景描写的、文学性的学术著作。边读书，边写作，生活就这样流过。每天他中断工作后去卢瓦尔河边或周边的小路上散步。偶尔他也接待一两个研究他作品的学者，他和蔼中带着审视。为人和善的格拉克先生从不无的放矢地接待客人，他说，“我的不易接近和不合群的名誉”可以避开那些令人讨厌的人和“那些在电视里听闻消息后来看我的人”。

除了隐隐约约听到一点儿街上的声音，这个家几乎与世隔绝，屋里只有摆钟嘀嗒作响。深深地陷在陈旧磨损的沙发里的格拉克双手交叉着，漆皮便鞋摩擦时发出轻微的嘎吱声，他平静地谈起他历史教师的生涯。他退休已二十多年了，并没有什么遗憾。1947 年至 1970 年他教过的那些中学生太幸福了，因为他们可以听到自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以来最擅长描写风景的作家来讲解“山丘”和“深泓线”。有趣的是，格拉克不愿意别人认为他以“文学”的手法来讲课。“我并不在风景上咬文嚼字，”他抱怨地说，“我只是严谨地教地理。”他原来的学生说他上课时“与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谈与课文内容无关的事。那时的他在外形上与现在差不多，为人又高傲又谦和……”[①]他的《流沙海岸》获得 1951 年龚古尔文学奖，他拒绝接受这一荣誉，直到那时他的学生们才发现他们的老师是何等人物。

龚古尔文学奖并没有促使他走上文学之路。直到 1970 年退休，

---

① Renaud Matignon, *Un vagabond bien rangé*, le Point, n° 93, 1er juillet 1974.

他一直是教育部的公务员。他承认“很佩服老同学、作家亨利·盖菲莱克,他在大战期间毅然投身文海,那时他已成家立业了。一开始他困难重重……”格拉克谨慎行事的作风或许是他与挂在墙上的画像里的身穿礼服的祖先唯一相似的地方:“精打细算、贪财、节俭、拼命地获取、继承遗产并维护它。”[1]从他们身上,格拉克继承了喜爱“深居简出,闭塞”的生活方式。

这屋里唯一向外界开启的窗口是电视机,可是电视机被推到了墙角一个柜子的后面,偶尔移出来看一场足球赛,那是他旧时的爱好。尽管媒体时常来邀请,他只上过两次电视,那还是 20 年前的事,况且每次都有一个充分的理由。一次是谈谈他的作家朋友恩斯特·容格尔(Ernest Jünger),另一次是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去世,他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启蒙者”。从圣弗罗朗看那个卷走了多少天才的旋涡般的大众传媒,一切是那么遥远。《肚里的文学》(*La littérature à l'estomac*)的作者对媒体一直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他可能是唯一没有先出大量袖珍版书就直接被编入“七星丛书”的作家。他的书往往连书页都没裁开,朴实无华的单色封面上印着粉红色的题目,他的书只在约塞·科尔迪出版社 (José Corti) 发行,他自始至终忠实于他的出版商。

偶尔格拉克会想起一个与他恰恰相反的作家让-埃登·阿利亚(Jean-Edern Hallier)。奇怪的是后者一直讨好他,还冒充是他的学生…… 可是与众多有才能的人一样,后者也被“旋涡”卷走了。以缺席对文学势力团体表示无声的责备,这一点让格拉克觉得有趣。接受采访中,他漫不经心地、几乎是出于礼貌地询问起巴黎某出时髦戏剧上演的情况……

事实上格拉克真正的对话者已不在人世,他们是夏多布里昂、司

---

① *Carnets du grand chemin*, p. 138.

汤达、普鲁斯特，他不断地探讨他们的作品，为他们作注、作评。

他说："我的世纪是 19 世纪。"

说到底，阴差阳错，20 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是个属于 19 世纪的人。

青年时代

"我不也有过美好的青春，轰轰烈烈的、传奇般的青春，可以写在金光闪闪的书笺上的青春？"格拉克最崇拜的诗人兰波（Rimbaud）曾经这样自问。早在这个神秘的大作家、教育部杰出的退休教师去圣弗罗朗隐居之前，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他那时的执著、热情、好奇与现在的超脱、出世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1920 年初的中学生集体照上，年轻的路易·普瓦耶还是个调皮、多疑的孩子，小小的脸庞，蓬乱的头发，满脑子的于勒·凡尔纳（Jules Verne）和费尼莫尔·库柏（Fenimore Cooper）。

16 岁时，他一心想进高等商校。保罗·莫朗的《列维和伊兰娜》（*Lewis et Irène*）一书让他陶醉。他渴望像列维那样成为金融界风度翩翩的小野心家，驾驶着"布加迪"，幻想生活的节奏随着股票市场的波动而起伏，与貌美的女银行家艳遇不断[①]。文学界的福音使他最终选择了亨利四世高中的预科班，成了阿兰的弟子。

1930 年，他一举成功考进了高师。路易·普瓦耶曾以常年系白色领带、戴单片眼镜的服饰大出风头，截然不同于他那些不修边幅的高师同学。今天的格拉克申辩说："那时年轻爱出风头。"

---

① *En lisant*, *en écrivant*, p. 196.

那时，每次亨利四世高中老同学搞恶作剧总少不了他。一张罕见的照片反映了当时他所处的环境，一群高师生半开玩笑、半挑衅地聚集在花园里巴斯德雕像上，其中还有埃提昂伯勒。巴斯德的头像上不伦不类地扣上了一顶军用橄榄帽，那时的高师人还得进行军训呢。格拉克高傲地坐在第一排，目光直视前方，架着单片眼镜，下巴高扬着，一副漫不经心的嘲讽神情。“格拉克有意摆出吹毛求疵的样子，这是表面现象，同学之间他是最好相处的。”盖菲莱克肯定地说。

当时他常去体育场看足球赛和中距离赛跑，也常去电影院看“新浪潮”电影，为德国表现派杰作《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le Cabinet du docteur Caligari*)和《诺斯费拉图》(*Nosferatu*) 等电影喝彩。在预科班听阿兰的课时，他读了安德烈 • 布勒东的《娜嘉》(*Nadja*) 和马克斯 • 恩斯特(Max Ernst)带拼贴画的《百头女人》，深受震动和启发。

高师的学习室成了他超现实主义的实验室，他与同住一室的英国学生雷奥(Francis Léaud)用黑色的布幔和银色的窗帘把工作室装饰成灵堂。他的一个同学回忆说：“一天晚上外出回来，不知从蒙巴纳斯哪个阴沟里捡回来一只破破烂烂的女高跟鞋，他用一根尼龙丝把它从屋顶垂下。一走进这个阴暗的房间，首先看到的是一只悬空挂着的女鞋……我不知道布勒东见到这样的场面会怎么想。”[1]格拉克自己早已把这段经历忘却了，他只记得曾经买花圈来装饰房间……

那是个好奇、探索的年代，1931 年的暑假里，他的朋友盖菲莱克——未来的《霰岛的修道院院长》(*le Recteur de l'Ile de Sein*)的作者带他去布列塔尼省游玩，那里的风景后来常常出现他的作品里。“阿尔戈”一词就是在那儿查看公共汽车时刻表时给了他灵感，导致

---

① Entretien avec Camille Marcoux, octobre 1992.

他后来写了《阿尔戈古堡》(*Au château d'Argol*)一书。格拉克喜欢北方和西方,他对这一片土地的钟爱要胜过对地中海文化的热爱。一天,他在迷恋人文主义的学友面前出言不逊地说拉丁语系的诗歌都是“陈词滥调”。

早在高师期间,他就选择了地理专业。为什么选地理而不选文学呢？他回答说:“那时候索邦大学不太出色,那儿的教师是朗松出来的,教课的内容仅限于文章的来源,而不是从文学性着眼。我们感兴趣的都是校外的导师:纪德、考克多、瓦雷里。”“我喜爱地理,因为这门学科有坚实的成分,我们去野外作业,实地考察,我讲的是实物,这是一门新的学科。我不会喜欢教文学,觉得缺少新鲜感。”

在高师时他毕业论文里描写他家乡地貌的文笔已经使很多同学惊讶不已。他们把他论文的第一句话牢记在心,在学校的走廊里大声地朗诵,格拉克也不生气。一个同学说:“这句话里有于勒·凡尔纳和巴尔扎克的风格,有夏多布里昂的节奏,我们觉得很有趣。”

令人吃惊的预兆。格拉克的作品里有丰富多彩的旅程,有罕见的地理词汇(他说是无意间运用的),他的文学作品是一个地理学家的作品。

他是个文学教授？是的,而且是“唯一称得上艺术家的教授”,评论家利纳勒蒂这样赞赏他。一个有本事的艺术家、魔术师。即使描写一幅极其平凡的风景画或一种感受,他用一个恰到好处的词语、一种引人入胜的语调就让读者身临其境。让我们忘了萨特、尼赞、季洛杜、于勒·罗曼及其他名人,自贝玑以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出来的最伟大的作家不就是于连·格拉克吗？

高师的未来

让我们鼓足勇气说:高师无用。

两百多年前为了培养教育人才而成立的高等师范学校现在培养的教师已经越来越少了。况且教育部已不在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高贵的思想者,而宁愿起用搞社会文化的工作人员来从事郊区的扫盲工作。那么又有什么必要为那些梦想家提供吃、住以及每人每月七千法郎的津贴,更何况他们中很多人日后并不从事教育工作?

更严重的是,当今社会已完全背离了高等师范学校所象征的原则:人文主义、纯文学、理智主义、推向极端的批判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另外两所学校取代了高等师范学校的地位:20 世纪 30 年代时国家行政学院走红,密特朗主政的 20 世纪 80 年代的拜金主义潮流导致了巴黎高等商校领衔的局面。在今天个人地位越来越多取决于收入水平,越来越少取决于文化修养的法国,高师人成了贫困的精英。

他们自己也有责任。这些纯理性的知识分子太容易冲动,常常用理想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而一旦出现危机,他们便无所适从。自贝玑以来,高师人一直站在反抗运动的前线,几乎一贯倾向左派,有时会倾向极右派。他们反对"物质第一","抗争"是他们的原则,他们没能适应当今这个世界。在这个"思想意识趋向死亡"的时代,高

师这个产生精神导师的摇篮是注定要走下坡路的。

然而……让我们打个赌,新一个世纪会看好高等师范学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首先,还没有创造出比高等师范学校更公正的学校,一个不以学生的适应性和"个性",而以他们的实际才能作为招生标准的学校,一个多数学生拿奖学金而不是拿遗产金的学校。没有任何一个学校像它那样在社会下层招收大批学生,向劳动人民的子弟敞开大门。今天,即使它的招生制度多少有点儿走上层路线(高干子弟与教师的后代平分秋色),可还是称得上维克多·雨果所说的"民主学校"。学校保证的薪金非薄的职业保持了学生们廉洁的品质……巴黎高师一如既往地吸引着法国最优秀的中学生。这所历史悠久的学校的魅力与时起时落的潮流不是一码事。

其次,高师培养的正是拜金主义、技术主导的文化潮流里缺乏的东西,那就是细腻的精神、纯粹的思想、高瞻远瞩的观点……对这所与众不同的学校的学生来说,知识与文化不是赶时髦的,而是超越时代价值观的。文化无用?文化过时?也许。但文化还是有现实的作用。有谁能比这些跨学科的全才更全面地考量我们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呢?

高等师范学校的竞争对手——综合理工学校、国家行政学院、巴黎高等商校——已暴露了他们的局限性,人们又重新发现了高师人的诱惑力,这种精神的自由,这种对文化的好奇心不是在那些"以成功为标准"的阶梯教室里可以学到的。"教师的共和国"的价值完全可以比得上技术家和银行家的共和国。

伏尔泰说过:"多余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共和国可以没有高等师范学校,这是肯定的,然而却是令人遗憾的。事实上,高等师范学校是法国式的智慧概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法国式智慧比德国模式更优雅,比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更精神化(可能太精神化了,它产

生的思想家多于发明家）。正因为如此，它才与已经结束的 20 世纪的文化生活紧密相连，或许也与刚刚开始的 21 世纪的文化生活紧密相连……



高师名人录

Alexandre ADLER,亚历山大·阿德勒,1969届。记者、《国际通讯》主编。

Maurice AGULHON,莫里斯·阿古龙 ,1946届。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

Alain (Emile Chartier),阿兰(化名),真名为艾米勒·夏蒂埃,1889届。哲学家。

Louis ALTHUSSER,路易·阿尔图塞,1939届。哲学家,1948年至1980年在高师任哲学教授。

Raymond ARON,雷蒙·阿隆,1924届。哲学家。

Bruno BAYEN,布鲁诺·巴扬,1969届。作家、导演。

Maurice BARDÈCHE,莫里斯·巴代什,1928届。文学评论家、散文家。

Louis BERTRAND,路易·贝特朗,1885届。作家。

Henri BERGSON,亨利·柏格森,1878届。哲学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Frédéric BERTHET,弗里德里克 ·贝尔特,1974届。作家。

Marc BLOCH,马克·布洛赫,1904届。历史学家、编年史学院创办人,被纳粹枪杀。

Léon BLUM,雷翁·勃鲁姆,1890届。参议院主席。

Etienne BORNE,埃迪纳·波尔纳,1926届。哲学家。

Raymond BOUDON,雷蒙·布东,1954届。社会学家。

Jacques de BOURBON-BUSSET,雅克·德布邦-布塞,1932届。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Pierre BOURDIEU,皮埃尔·布尔迪厄,1951届。社会学家。

Pierre BOUTANG,皮埃尔・布唐,1935 届。哲学家、作家、论战家。

Robert BRASILLACH,罗伯・巴西亚克,1928 届。作家,被判死刑,1945 年被枪决。

Pierre BROSSOLETTE,皮埃尔・布罗索莱特,1922 届。抗德英雄。

Roger CAILLOIS,罗杰・凯卢瓦,1933 届。作家。

Georges CANGUILHEM,乔治・冈纪兰姆,1924 届。哲学家。

Yves CANNAC,伊夫・加纳克,1955 届。企顾司集团(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总裁、前哈瓦斯广告传媒集团总裁。

Jérôme CARCOPINO,杰罗姆・卡哥皮诺,1901 届。古代史史学家、维希政府教育部长,1941 年至 1944 年任高师校长。

Jean CAVAILLÈS,让・卡瓦耶斯,1923 届。哲学家,1944 年被纳粹枪杀。

Aimé CÉSAIRE,埃梅・塞泽尔,1935 届。作家,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克岛法兰西堡市市长,马提尼克进步党领袖。

André CHASTEL,安德烈・沙泰尔,1933 届。艺术史家。

Maurice CLAVEL,莫里斯・克拉韦尔,1938 届。作家。

Laurent COHEN-TANUGI,洛朗・科恩-达努奇,1976 届。律师、散文家。

André COMTE-SPONVILLE,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1972 届。哲学家。

Victor COUSIN,维克多・库辛,1810 届。哲学家。

Philippe DAGEN,菲利浦・达离,1977 届。《世界报》艺术评论家。

Marcel DEAT,马塞尔・德阿,1914 届。维希政府成员,被判死刑。

Régis DEBRAY,海杰斯・德贝,1960 届。作家、哲学家。

Jean DELUMEAU,让・德吕莫,1943 届。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

Jean-Toussaint DESANTI,让-杜桑・德桑蒂,1935 届。哲学家。

Jacques DERRIDA,雅克・德里达,1952 届。哲学家。

Georges DUMÉZIL,乔治・迪梅齐,1916 届。宗教史学家。

Emile DURKHEIM,埃米勒・迪尔克姆,1879 届。社会学奠基者。

Victor DURUY,维克多·杜卢伊,1830 届。历史学家、国民教育部部长。

Alain ETCHEGOYEN,阿兰·埃区格杨,1971 届。企业顾问、散文家。

René ETIEMBLE,何内·埃提昂伯勒,1929 届。作家、文学评论家。

Laurent FABIUS,洛朗·法比尤斯,1966 届。政治家、前总理、前社会党领袖、议员。

Roger FAUROUX,罗杰 ·法鲁克斯,1947 届。前部长、前国家行政学院院长,前圣戈班集团主管。

Lucien FEBVRE,吕西安·费弗尔,1899 届。历史学家、编年史学院创始人。

Thomas FERENCZI,托马斯·菲朗兹,1963 届。《世界报》主编。

Dominique FERNANDEZ,多米尼克·费尔南德,1950 届。作家,《在天使的手中》一书获龚古尔文学奖。

Henri FOCILLON,亨利·弗西雍,1901 届。艺术史学家。

Michel FOUCAULT,米歇尔·福柯,1946 届。哲学家。

Henri FRANCK,亨利·法兰克,1906 届。诗人。

André FRANCOIS-PONCET,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1907 届。部长、大使。

Numa-Denys FUSTEL de COULANGES,努玛-德尼斯· 菲斯泰尔·德·库朗日,1850 届。历史学家,1880 年至 1883 年任高师校长。

Pierre GAXOTTE,皮埃尔·加克索特,1917 届。历史学家,《天真汉》周刊创办人、主编。

Gérard GENETTE,热拉尔·热奈特,1951 届。文学评论家。

Maurice GENEVOIX,莫里斯·热纳瓦,1912 届。作家,获 1925 年龚古尔文学奖。

Jean GIRAUDOUX,让·季洛杜,1903 届。作家、剧作家。

Julien GRACQ (Louis POIRIER),于连·格拉克(化名),真名为路易·普瓦耶,1930 届。作家。

Pierre GRIMAL,皮埃尔·克里玛,1932 届。古代史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Jean GUEHENNO,让·格埃诺,1911 届。作家。

Henri GUILLEMIN,亨利・吉伊曼,1923 届。散文家、文学评论家。

Jean GUITTON,让・吉东,1920 届。作家、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Louis HACHETTE,路易・哈切特,1819 届。哈切特出版社创始人。

Claude HAGÈGE,克劳德・阿杰日,1819 届。语言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

Abel HERMANT,阿贝尔・埃尔芒,1880 届。作家。

Lucien HERR,吕西安・埃尔,1883 届。1886 年至 1926 年高师图书馆馆员,社会党中坚分子。

Edouard HERRIOT,爱德华・赫里欧,1891 届。参议院主席、激进党主席、里昂市市长。

Guy HOCQUENGHEM,居伊・奥康让,1966 届。作家。

Roger IKOR,罗杰・伊高,1934 届。作家,《混水》(*Les eaux mêlées*)一书获 1955 年龚古尔文学奖。

Vladimir JANKELEVITCH,弗拉迪米尔・雅克列维奇,1922 届。哲学家。

Jean JAURÈS,让・饶勒斯,1878 届。政治家、议员、《人道报》创办人。

Jean-Noël JEANNENEY,让-诺埃尔・让纳内,1961 届。历史学家、前国务部长、前法国广播电台台长。

Jacques JULLIARD,雅克・朱利亚,1954 届。历史学家、《新观察家》周刊社论撰稿人及副总裁、"欧洲一号"电台专栏记者。

Alain JUPPÉ,阿兰・朱佩,1964 届。外交部长、右派共和联盟主席。

Pierre JUQUIN,皮埃尔・余干,1951 届。政治家、前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Daniel LAGACHE,丹尼尔・拉加什,1924 届。医生、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法国临床心理治疗创始人。

Marc LAMBRON,马克・朗布洪,1977 届。作家,《视点》周刊文学评论家、行政法院审查官。

Gustave LANSON,古斯塔夫・朗松,1876 届。教授、文学评论家。1919 年至 1927 年任高师校长。

Jean LAPLANCHE，让・拉普朗什，1944 届。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著作翻译家、波玛城堡主人暨葡萄酒商。

Ernest LAVISSE，恩斯特・拉维斯，1862 届。历史学家。1904 年至 1919 年任高师校长。

Jacques LE GOFF，雅克・勒高夫，1945 届。历史学家。

Emmanuel LE ROY LADURIE，埃玛纽尔・勒华拉杜里，1949 届。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国家图书馆总管理员。

Benny LÉVY，贝尼・列维，1965 届。前"无产阶级左派"领袖（假名皮埃尔・维克多），萨特的秘书。

Bernard-Henri LÉVY，贝尔纳-亨利・列维，1968 届。作家、哲学家、格拉塞出版社文学顾问。

Lucien LÉVY-BRUHL，吕西安・列维-布吕尔，1876 届。社会学家。

Emile MALE，埃米勒・马勒，1883 届。艺术史家。

Henri-Irénée MARROU，亨利-伊赫内・玛胡，1925 届。基督教历史学家。

Thierry MAULNIER（Jaques TALAGRAND），杰里・莫勒尼（笔名），真名为雅克・达拉刚，1928 届。作家。

Maurice MERLEAU-PONTY，莫里斯・梅洛-庞蒂，1926 届。哲学家。

André MIQUEL，安德烈・米盖尔，1947 届。阿拉伯问题专家、法兰西学院教授、前国家图书馆总管理员。

Jean MISTLER，让・米斯特莱，1919 届。作家、法兰西学院常务秘书、部长。

Pierre MOUSSA，皮埃尔・穆萨，1940 届。银行家、前巴黎巴银行行长、帕拉斯集团总裁。

Paul NIZAN，保罗・尼赞，1924 届。作家。

Dominique NOGUEZ，多米尼克・诺盖，1963 届。作家。

Jean d'ORMESSON，让・端木松，1944 届。作家、《费加罗报》社论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Brice PARAIN,布里斯・帕兰,1919 届。作家、伽里玛出版社合作人。

Charles PÉGUY,夏尔・贝玑,1894 届。作家。

Alain PEYREFITTE,阿兰・佩尔菲特,1945 届。部长、市长、议员、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

Georges POMPIDOU,乔治・蓬皮杜,1931 届。法兰西共和国前总统。

Jean PRÉVOST,让・普雷弗,1919 届。作家、抗德英雄。

Antoine PROST,安东尼・普洛斯特,1953 届。教育史专家、总理顾问。

Pierre PUCHEU,皮埃尔・皮舍,1919 届。维希政府成员,1944 年被枪决。

Henri QUEFFÉLEC,亨利・盖菲莱克,1929 届。作家。

Bruno RACINE,布鲁诺・拉辛,1971 届。巴黎市政府文化局局长、作家。

Jean-Bernard RAIMOND,让-贝尔纳・雷蒙,1947 届。部长、大使。

René RÉMOND,何内・雷蒙,1942 届。历史学家。

Jean-François REVEL (Jean RICARD),让-弗朗索瓦・何维勒(笔名),真名为让・雷加,1943 届。散文家、《观点》周刊社论作家、《快报》周刊前社长。

Jean-Pierre RICHARD,让-皮埃尔・里沙尔,1941 届。文学评论家。

Jean RICHEPIN,让・里什潘,1967 届。作家。

Olivier ROLIN,奥利维耶・罗兰,1967 届。作家。

Romain ROLLAND,罗曼・罗兰,1886 届。作家、1915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Jules ROMAINS (Louis FARIGOULE),于勒・罗曼(笔名),真名为路易・法里古勒,1906 届。作家。

Jacqueline de ROMILLY,雅克丽琳娜・德・罗米莉,1933 届。古希腊语专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Bertrand ROSSET (Clément),贝尔纳・罗塞,又名克雷芒,1961 届。哲学家。

Pierre-Paul ROYER-COLLARD,皮埃尔-保罗・鲁瓦耶-科拉尔,1818 届。政治家、哲学家。

Michel SAPIN,米歇尔·萨潘,1974 届。部长。

Francisque SARCEY,弗朗西斯克·萨尔塞,1848 届。作家。

Jean-Paul SARTRE,让-保罗·萨特,1924 届。哲学家、作家。1964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拒绝领奖。

Michel SERRES,米歇尔·塞赫,1952 届。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Alain-Gérard SLAMA,阿兰-热拉尔·斯拉玛,1962 届。记者、散文家。

Jacques SOUSTELLE,雅克·苏斯戴尔,1929 届。人种学家、部长。

André SUARÈS,安德烈·苏亚雷斯,1886 届。作家。

Hippolyte TAINE,伊波利特·泰纳,1848 届。哲学家。

Augustin THIERRY,奥古斯特·梯叶里,1811 届。历史学家。

Jacques THUILLIER,雅克·蒂利埃,1951 届。艺术史家、法兰西学院教授。

Alain TOURAINE,阿兰·图雷纳,1945 届。社会学家。

Duc Thao TRAN,唐·迪克陶,1939 届。哲学家。

André TUBEUF,安德烈·杜伯夫,1950 届。音乐评论家。

Pierre URI,皮埃尔·于里,1929 届。经济学家。

Paul VEYNE,保罗·维纳,1951 届。古代史史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

Paul-Marie-Joseph VIDAL de la BLACHE,P. M. J. 维达尔·白兰士,1863 届。地理学家。

Jean-Marie VILLÉGIER,让-玛丽·维雷奇,1958 届。导演、斯特拉斯堡国家歌剧院院长。

Simone WEIL,西蒙娜·薇依,1928 届。哲学家。

Laurent de WILDE ,洛朗·德·维尔德,1981 届。作曲家、爵士乐钢琴家。